

创刊词

一所好的大学，必然拥有一份甚至好几份知名的学术期刊；一个强的学科，必然有一份好的学术杂志做支撑。承蒙学界、相关机构和有识之士的关爱，由国家新闻出版总局批准、湖南省教育厅主管、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正式创刊了。在此，我们谨向亲爱的读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创办《外国语言与文化》，是湖南师范大学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梦想。孔颖达有云：“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党和国家提出了深化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宏阔的历史语境中，推进外国语言与文化的学术研究，提升我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可谓契合时代需要，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这份新生的期刊，将致力于成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提升中国学者话语权的学术阵地，致力于成为紧密联系政府、提供对外决策参考的智库平台。

那么，我们应如何办好这份期刊呢？蔡元培先生在创办《北京大学月刊》时指出，办好大学的学术期刊有三个基本原则：“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这三个原则为我国的大学办学术期刊奠定了良好传统。我们创办《外国语言与文化》，就要在坚持上述三原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凝聚海内外学者的智慧，更加注重坚持以外国语言与文化为研究对象，更加注重学术的国际视野与原始创新。一方面促进学科发展，及时反映国内外学界在外国语言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发表语言与语言学、文学与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区域与国别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促进教育教学改革，为外国语言与文化的教学和传播搭建互动交流的平台，更大范围地将最新成果分享给从业者及爱好者，为外国语言与文化类的人才培养贡献经验与智慧。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季刊 2017年创刊

| 第1卷 第1期 | (总第1期) | 2017年9月 |

主 编: 蒋洪新

Editor-in-Chief: Hongxin Jiang

副 主 编: 邓颖玲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Yinling Deng

执行主编: 曾艳钰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Yanyu Zeng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歇尔·布朗 美国华盛顿大学
王 宁 清华大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布鲁斯·罗宾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
克劳德·劳森 美国耶鲁大学
劳瑞·瑞米 湖南师范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聂珍钊 浙江大学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安·海尔曼 英国卡迪夫大学

Editorial Board

Marshall Brow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Ning Wang, Tsinghua University
Shoure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Kefei W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ongzhi W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an Shen, Beijing University
Bruce Robbins, Columbia University
Jun Xu, Zhejiang University
Dingfang Sh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Longxi Zha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laude Rawson, Yale University
Lauri Rame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Jin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Defeng Li, University of Macau
Jiande L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ongyi Ch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 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Zhenzhao Nie, Zhejiang University
Youyi Huang,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Guowen Hu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onglian H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nn Heilmann, Cardiff University

主 管: 湖南省教育厅

主 办: 湖南师范大学

编 辑: 《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

邮 箱: jllc@hunnu.edu.cn

地 址: 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路 36 号

电 话: 0731-88873041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有限公司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6-4366

国内连续出版物号: CN43-1536/H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 年 9 月 28 日

定 价: 28.00 元

整体设计: 周基东

排版制作: 书亦有道

(本刊已加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期刊数据库, 不以任何形式
收取版面费)

目次

《国标》及外语教学改革

- 001 关于起草《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新版)》的几点思考←蒋洪新 谢敏敏
- 011 “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理念与实施路径分析←曹德明
- 018 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属性与人文课程的意义——以《国标》人文课程为中心←查明建
- 027 论《国标》精神指导下的特色校标制定←邓杰

中外文学文化关系

- 037 东西方比较的挑战和机遇←张隆溪
- 047 中英文学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王宁
- 058 略论中美现代文化交融的三种模式——以赛珍珠、林语堂和汤亭亭为例←杨仁敬
- 066 潇湘八景诗之“远”意象在东渐西传中的流变←冉毅

文学与评论

- 077 乔叟在中世纪后期的经典化←肖明翰
- 089 大众传媒与美国小说的演进←朱振武 周博佳
- 098 “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论《福楼拜的鹦鹉》对历史真实的质疑和反思←何朝辉

翻译研究

- 108 翻译观认识论过程例话←黄忠廉 袁湘生
- 119 《狼图腾》英语世界译介效果研究←鲍晓英 游春艳
- 126 新世纪《译林》汉译外国通俗小说考察←李琴

语言与语言教学

- 135 移位? 还是原位? ——以被动结构为例对生成句法逻辑结构的考察←赵彦春
- 147 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量表的编制及应用研究←夏洋 孟健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1卷 第1期 | (总第1期) | 2017年9月 |

Contents

- 001 **Hongxin Jiang** Reflections on Formulating *The New National Syllabus for College English Majors*
- 011 **Deming Cao** An Analysis of the “Multilingual+” Initiative and the Methodology of its Implementation
- 018 **Mingjian Zha** On the Humanistic Nature of the English Disciplin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ities-Based Curriculum for English Majors Based on *The National Guideline*
- 027 **Jie Deng** On Establishing Teaching Quality Standards Particular for Individual Universities Using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s*
- 037 **Longxi Zhang** East-West Studies: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 047 **Ning Wang** Sino-British Literary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058 **Renjing Yang** Three Patterns of Cultural Ble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066 **Yi Ran** Changes in the Image of “Distance” in “Eight Views of Xiaoxiang” During its Spread to the West and East
- 077 **Minghan Xiao** The Canonization of Chaucer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 089 **Zhenwu Zhu** Mass Media and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Fiction
- 098 **Zhaohui He** “How Do We Seize the Past?”: On Interrogating and Rethinking Historical Truth in *Flaubert's Parrot*
- 108 **Zhonglian Huang** Comment on the Epistemological Process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 119 **Xiaoying Bao** *Wolf Totem's* Communication Effec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ommunity
- 126 **Qin Li** A Study of Translated Foreign Popular Fiction in *Trans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 135 **Yanchun Zhao** Moved or In-situ: An Inquiry into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in TG Based on the Passive Structure
- 147 **Yang Xia**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Making of a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cademic Emotions of English Majors

FLC

《国标》及外语教学改革

关于起草《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新版）》的几点思考

◎ 蒋洪新 谢敏敏

内容提要:为了更好地贯彻《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文件精神,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拟出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新版)》,作为国家标准的实施细则和指南。本文拟从制定背景、编写意义、制定过程、主要内容、编写理念等方面对其进行解读,帮助各院校充分理解国家标准的要求和内涵,明确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方向和重点,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英语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新版)》《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00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15JZD048)的子课题“我国外语教学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研究”;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办重点资助课题“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研究”(XJK014AGD011)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Title: Reflections on Formulating *The New National Syllabus for College English Majors*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National Standards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The ELT Advisory Board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now drawing up *The New National Syllabus for College English Majors* which serves as a detailed guide for releva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interpret its background, meaning, process, content, and principles to help those involved to comprehend the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s, and specify the directions of and focuses on major construction and talents cultivation. Thereby, English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s propelled forward.

Keywords: *The New National Syllabus for College English Majors*, *The National Standards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major construction, talents cultivation

Author: Hongxin Jiang,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Minmin Xie, Lecture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研究制定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推进国家教育标准体系建设是教育部近年来的重点工作之一。目前,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已经按时按质地完成了《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时下正在组织国内外专家起草相应的配套方案,以指导全国各院校因地制宜地落实和贯彻好相关标准。其中,由教指委委托、湖南师范大学牵头负责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新版)》(以下简称《新大纲》)作为《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的配套文件和实施指南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在,《新大纲》已经初步成型。本文拟就《新大纲》的制定背景、编写意义、制定过程、主要内容、编写理念等方面谈几点思考,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新大纲》制定的背景及其与《国标》的关系

评判衡量一件事情,需要有一个依据和标准。《国标》即将成为我国本科英语专业的准入、建设和评价依据,未来会是各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风向标和路线图。因此,如何达到《国标》所提出来的要求和标准,自然成为各高校最关切的问题。现阶段,国内开设英语专业的院校众多,“现有普通本科学校有1145所,其中994所设有英语专业”(蒋洪新,《几点思考》458),比例高达87%,且在办学水平、专业实力、师资力量、人才培养效果等方面良莠不齐,社会评价也褒贬不一。英语专业在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伴生了发展不均衡、方向不统一、同质化竞争激烈、特色性不强、内涵建设不够等诸多问题。《国标》虽然为我国英语专业如何解决现阶段的问题和持续化建设确定了指向,但作为具有纲领性、权威性和强制性的顶层文件,其内容多偏向于宏观性和规定性的描述,其指导意义是普遍性和广泛性的,也就无法在各院校的落实过程中给予具体指导。2014年1月,教指委在广州召开了《国标》研讨会,与会专家就《国标》的可操作性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国标》的内容不能过细,否则会损害其适用性,挤压院校发挥特色、自我调整的空间,导致一刀切的后果,从而造成国家文件和院校办学实践的断裂。

与此同时,《国标》所预留的空间也成为各高校进行解读时的变量。教指委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因实际情况不同,各高等院校对《国标》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部分院校尤其是离《国标》设定目标还具有一定差距的院校对“如何实施”也存在不少的疑惑。可见,目标和方向上的统一仍不够,还需在实施过程中划好“车道”,给予比较详细的指导,防止部分院校走偏,以免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千差万别。因此,出台一份详尽明确、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指南成为必然的选择。作为配套文件,《新大纲》与《国标》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国标》侧重于“目标”二字,即专业建设成什么样,偏向于静态;而《新大纲》则侧重于“过程”二字,即专业怎样建设,偏向于动态。两份文件如同一套“组合拳”,共同构成了完整、科学的国标体系。同时,《新大纲》也是《国标》内容的细化和延伸,为各院校解读《国标》、落实《国标》精神提供了更

为微观的视角和更为具体的依据。简而言之,《新大纲》的出台对实现《国标》由国家向地方、宏观向微观、普遍向特殊、抽象向具体的推进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大纲》的主要内容

《新大纲》由《英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参考方案》(以下简称《培养方案》)、英语专业核心课程描述和《英语专业本科生阅读参考书目》(以下简称《书目》)三大部分组成,具有承续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特点。《新大纲》以改革创新为基调,重拾了我国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部分借鉴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年)(以下简称《2000大纲》)的设计模式,同时在各板块的设计上立足于现阶段我国外语教育的教学规律、各院校英语专业非均衡发展的普遍现实、社会多元的人才需求和多变的发展态势以及国家相关战略的实施要求,旨在为我国未来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清晰的指向。

(一) 关于《英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参考方案》

人才培养是教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一点国家和学界都已有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各高校要“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胡文仲认为,“办外语教育应该时刻把人才培养的大目标放在心中,对于人才培养应该有长远的考虑和规划,应该有全面的安排”(49)。因此,《培养方案》是《新大纲》中的核心构成,专业核心课程描述和《书目》的最终落脚点也都是人才培养。《培养方案》在编写过程中遵循了以下三条原则和理念。

1. 分类指导,注重多元与差异

“分类”思想是哲学思维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映射,是对教育对象个性化和差异性的尊重。蔡元培先生说过,“故人类分子,决不当尽归于同化,而贵在各能发达其特性”(81)。我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院校众多,在办学层次、学科门类、办学重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如果只制定一种人才培养方案,必然会导致人才培养的机械化和单一化,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因此,“分类指导”成为编写小组的首要指导思想。经过多次讨论和调研,《培养方案》目前形成了综合类、外语类、师范类、理工类、财经类院校五个类别^[1]。这五大类涵盖了开设英语专业的绝大部分院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他类别的院校则以财经类人才培养参考方案为例,参照执行。在进行大学分类时,编写小组沿用了教育部以学科为主线的分类标准,这是因为“学科覆盖面反映了一所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分布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这所高等学校的综合实力”(陈厚丰 199)。需要说明的是,最初的方案中专设了“二本类”人才培养参考方案,但在最终稿中并未纳入,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二本学校涵盖了上述各类别学校,存在重复性问题;二是二本学校的划分是以办学层次为依据,与上述类别学校的划

分标准不一；三是一本、二本、三本的划分已经不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201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当前，教育部也在研究逐步淡化“一本、二本、三本”的划分。

“分类”思想还意味着《培养方案》在实施对象上要顾及院校特点、地区特色、办学传统等因素，并以此形成多样、多层的目标指向，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满足各地区、各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多元需求。因此，《国标》中的要素内容在不同类别的培养方案中要有所区分。如《国标》中的培养目标是“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厚实的英语语言文学知识和必要的相关专业知识，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英语专业人才”（转引自仲伟合、潘鸣威 116）。这种表述十分精简，为分类细化表述预留了较大的空间。而各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则以《国标》为基准，结合了不同类别院校的特点，针对性地提出了学生知识和能力培养的侧重点，并融入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内容。如外语类院校强调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国际事务参与能力；理工类院校增加了“应用性、复合型”的目标；师范类院校则对学生教育教学能力做出了明确要求；财经类则要求学生能够“从事涉外财经相关工作”。《培养方案》中的其他组成要素也遵循了类似的原则。如在方向课程设置中增加了特色方向课程，并鼓励各类院校结合师资优势、实践优势和地域优势酌情开设；教学要求中强调“注意因材施教，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评价要求中要求教师“根据培养方案确定评价的内容和标准，选择科学的评价方式和方法”等。

2. 责任制与程序性的自治结合

2013年，教育部高教司领导在新一届教指委成立大会上提到，“开展什么样的高等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本科专业教学的宏观指导，怎样开展高等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本科专业教学的宏观指导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刘贵芹 7）。这表明制定国家标准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教育改革行为，也是落实好中央关于“简政放权”精神、转变政府机关工作的一个具体行动。从大学的管理意义上看，宏观指导与院校自主、学术自由的科学结合已经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从本质上看，国家教育法案或文件的下达执行过程就是政府、大学以及社会三角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

依据伯达尔（Robert Berdahl）的观点，在教育管理活动中，“政府表现出负责的行动”（171）是责任制（accountability）的体现，所谓负责的行动即包括顶层设计、资金提供和审计以及办学活动的监督等宏观行为。而“大学或学院在它以法人的形式决定通过什么手段实行它的目标和教育计划”（172）则意味着程序性的自治（procedural autonomy）。伯达尔的这种理念与我国的《高等教育法》的相关条款存在相通之处。如《高等教育法》第四章中就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高等学校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订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新大纲》中的人才培养参考方案着重于“参考”二字，以凸显政府的指导作用和责任。同时，这也表明各院校不应照搬挪用，而是要以《国标》为目标导向，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相关内容做进一步细化和调整，制定出符合自身实情和特色的人才培养方

案。很显然,程序性的自治并不仅仅是赋予了各院校在教育活动上的实践自由,同时也要求在人才培养上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自觉。在目标类和评价类要素等方面,《培养方案》做出了比较明确或者硬性的规定,但在教学活动的主体环节——课程设置和教学进程上要为各类院校留下较大的余地,鼓励其立足于学科门类、发展定位和资源优势,借鉴参考方案课程组织模式和内容,发挥好主体性、能动性和创新性,形成科学有机的课程体系。此外,在《培养方案》的落实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明确职权范围,扮演好“舵手”的角色,及时给予建议和支持,最大程度上尊重各院校的执行权和自主权,避免对院校具体实践的干涉,让院校成为真正的“划桨手”。

3. 课程设计突出内容依托,回归人文本位

我国英语专业课程组织形式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简单到多元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伴随着人文教育和语言技能训练的互相博弈。从晚清至民国再到抗战时期,英文专业尽管在课程数量上较少,但是却体现了明显的人文教育特质。光绪年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英文系课程中“中国文学”的周课时仅次于语言技能课“英语英文”,并设有“拉丁语”“教育学”“英国近世文学史”等课程(姚小平 458)。民国时期教育部所公布的《外国语专门学校规程》中(1912),英语学科规定科目共计十门,但“国文”“历史”“教育学”“法学通论”等人文类课程就占据了七门。西南联大英文系课程则基本以文学课程为主,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同步进行。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语言工具论”大行其道,语言教学偏重把语言当做一种交流沟通的工具,具体表征为:一是课程结构严重失衡,专业技能课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人文类课程长期被边缘化,语言文学教学“甚至在一些院校被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蒋洪新,《人文教育》12);二是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千篇一律,专业内涵、特色得不到有效凸显。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认为,“学校应为每一个人创建一个智力和精神的基础,这一基础对掌握其他的知识和技能是必不可少的”(33)。但由于技能导向型课程长期处于核心地位,这种基础在英语专业教学过程中显得十分薄弱。因此,注重内容依托,在进行专业语言技能教学的同时,回归人文传统和本位,成为人才培养参考方案中课程设计的重要导向。

按照斯特瑞克(Stephen B. Stryker)的定义,内容依托教学法“暗示了语言学习和内容学习的完全整合,其通过将教学关注点从学习语言本身转向通过学习内容来学习语言,体现了对注重达成语言能力的传统外语教学方式的一次重要脱离”(5)。这种教学法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有助于消除传统外语教学中内容与语言割裂的弊端,有助于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专业知识的扩展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常俊跃 29-30)。基于这种理念,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课程体系由公共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实践环节和毕业论文设计五个部分组成,每一类课程部分的学分在规定总学分(160~170学分)的范围内进行了优化分配,其中公共课程约占20%~30%,专业核心课程约占20%~40%,专业方向课程约占20%~30%,实践环节约占15%,毕业论文约占3%,核心技能课程比例与其他类型课程比例形成了较为平衡的关系,为内容依托型课程的设计奠定了框架基础。各模块中的课程

涉及文化、文学、语言学、教育学、哲学、美学、外交、历史等多个学科和领域,有效解决了知识结构单一性的问题。在公共课程的设置上,除教育部规定课程外,各院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开设通识类选修课程。如可由综合类院校开设的“美学原理”“国学概论”“逻辑学导论”“西方哲学思潮”课程;由外语类院校开设的“外交学导论”“国际关系概况”课程;由师范类院校开设的“教育哲学”“中外教育名家思想”课程;由理工类院校开设的“世界科学技术史”课程,等等。这些课程对丰富学生的其他学科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可在听、说、读、写等技能课的基础上,增加如“语言导论”“英语文学导论”“西方文明史”“跨文化交际”等依托文学、文化内容和主题构建的知识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则形成了语言学方向、文学方向、文化方向、翻译方向以及特色方向五个序列(财经类的序列有所不同),每个序列的课程设计都紧紧遵循“内容依托”导向,开设如“英语修辞学”“英语散文”等专题性课程,真正实现语言和知识的双层同步学习。这些参考课程在进一步凸显语言教育的人文特色的同时,也让知识传递的载体和途径更加丰富,为培养多元化多层次的外语人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 关于英语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内容依托和回归人文本位并不等同于否认专业技能课程的重要性。相反,专业技能是英语专业人才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具有基础性作用,也是英语专业核心课程的主要部分。作为所有院校的必开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按《教育大辞典》的解释,核心课程是“所有学科都要学习的共同学科。是学校(或系科)所设课程中最重要、最基础的部分”(顾明远 1342)。根据《国标》,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分为英语听、说、读、写、译以及第二外语等语言技能课程和“英语语言”“英语文学”“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等专业知识课程,旨在训练语言基本功,提升专业素养。据此可以看出,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处于整个英语专业课程系列的中心地位,是其他类型课程的基本依托,其课堂教学效果与学生的语言能力形成息息相关。然而,由于认识不一,教学视角不同、教学侧重各异等原因,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在部分院校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开展,人才的语言基础还不够扎实。在上述背景下,解决核心课程教学的规范问题显得十分迫切。

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在《大教学论》中谈到,“在仔细学习一门语言或艺术以前,先把它的一般概念(是一种素描,越轻微越好,但要包括它的各个部分)告诉学生,使他刚一一开始就能明白它的目标、限度和内部结构一门艺术的概述就是整门艺术的基础”(122-23)。从国家层面对英语专业核心课程进行简练的描述,其实质在于对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设定边界,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打下基础,帮助部分教师明确教学导向、理清教学思路、规范教学行为和提高教学水平,推动英语专业人才语言技能水平的整体跃升。《新大纲》中的专业核心课程改变了《2000大纲》中语言技能课程的单一结构,形成了专业技能课程和专业知识的组合模块,强调语言技能和知识的融通传授。核心课程包括“综合英语”“英语视听说”“英

英语口语”“英语阅读”“英语写作”“英语语法”“英语演讲与辩论”“英汉/汉英笔译”“英汉/汉英口译”“语言导论”“英语文学导论”“西方文明史”“跨文化交际”，共计13门。这些课程绝大部分在很多高校已经具有多年的开设历史，具有充足的授课师资和较好的条件保障。此外，课程数量也比较适中，既不会因为太少而难以形成立体的系统，也不会因为太多而分散资源，最终影响教学质量。

核心课程描述由课程编号、课程英文名称、课程类别、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六个部分组成，描述内容主要集中在后三个板块。培养目标对相关课程的教学效果做出了详细的界定，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提出了定性要求，部分课程还做出了定量要求，如“综合英语”就明确要求学生熟练掌握3000~4000个单词及其常用搭配；“英汉/汉英笔译”要求学生最终能达到每小时译300~350个英文单词等。多数课程还特别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形成，这反映了现阶段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还比较薄弱，亟待加强。教学内容重点描述了课程内容涵盖范围、组织模式、教学重点、素材选择、难易等级等方面，为教师教学设计提供明晰的导向。教学方法则多强调“策略驱动”“启发式”“研讨式”等方法，要求教师根据实际教学内容进行择优选择。此外，为了深入推动英语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改革，进一步适应《国标》的新要求和新理念，教指委还拟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组织国内外专家，推出系列英语类专业教材，这无疑又是推动我国英语专业教育发展的一件好事。

（三）关于《英语专业本科生阅读参考书目》

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大学的使命》一书中谈到，“从严格意义讲，大学是为了把普通学生教育成为有文化修养、具备优秀专业技能的人”（95）。加塞特的观点与我国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导向不谋而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和《国标》都明确指出，英语专业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这意味着人文教育与专业技能的培养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因此，教指委专门成立了起草工作小组^[2]，制定了《英语专业本科生阅读参考书目》，作为《新大纲》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推行，旨在通过经典书目的阅读将人文教育活动延伸至课外并贯穿于整个大学阶段，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传统的经验和现实的要求是《书目》制定的出发点。自古以来，阅读便是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校早在中世纪时便会为学生开具一份课程作家的名单，以供阅读。这份名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充。“在特林贝格的休（Hugh of Trimberg）（1280）的《课程作家名录》（*Registrum multorum auctorum*）里，榜上有名的作家有80位之多”（库尔提乌斯57）。在一些学者看来，大学、经典阅读以及学生的成长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英国教育家纽曼（John H. Newman）鼓励学生多读书并且要涉猎广泛。他告诫道：“如果学生读书只囿于一门学科，那么这种劳动会助长片面追求某种知识的倾向。”（21）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也谈到，“正是在同其他心灵的接触，即阅读活动中，我们心灵的‘修养’才得以形成”（59）。

朱自清先生甚至认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5)。而吴宓先生在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时更是为学生开出了一份多达152本书的书单,成为我国外语专业类系统书目之滥觞。然而,现阶段我国大学对阅读传统的继承却不容乐观。在科学技术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下,人文文化在英国学者C.P. 斯诺(C.P. Snow)所提的两种文化之争中越来越处于弱势,大学的人文教育也越来越边缘化,经典阅读在一些大学的教学活动中长期“缺席”。受此种氛围熏染,学生也与经典阅读渐行渐远。这种严峻的现实让我们意识到,通过国家层面大规模地在大学里推行阅读计划,已经刻不容缓。庆幸的是,国内已有部分高校正在努力扭转这种现象,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南京大学推出的“悦读经典计划”就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可见,大学教育对经典阅读的需求内在而迫切。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制定《书目》、推动大学扛起引领阅读风尚大旗的决心。

《书目》的遴选过程如同雕琢一件艺术品,在检视、回炉、锻造、再检视中不断循环往复,逐渐成形。起草小组自2014年9月启动《书目》制定工作以来,历经三载,参考了国内外多份书单^[3],汇聚了学界众人智慧,先后给出建议的国内外专家多达30余位^[4],还通过学术会议、调查问卷等途径征求了上百位师生代表的意见,并根据反馈情况对《书目》的框架和内容进行了多次调整和修改,最终于2015年在济南召开英国文学年会期间形成了商定稿。在《书目》制定伊始,起草小组便从编选理念、功能定位、数量结构以及书目内容等多个方面开展科学设计。首先,在编选理念上,《书目》力求实现大学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融合。这意味着《书目》不仅要紧扣全人教育理念,凸显大学教学和人文教育的内涵,也要立足现实,把握时代脉搏,推动全民阅读。其次,在功能定位上,《书目》必须兼顾夯实学生语言基础和提升文化修养。因此,作品语言的规范性和文本的文学性便成为了遴选时的重要指标之一。再次,在结构数量上,起草小组根据对学生平均学习时间和阅读速度的调查情况,确定了进阶书目、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三个板块,并最终设定了“30+X”本的数量,其中“30”本由10部进阶书目和20部必读书目构成,而X则代表各院校根据学生水平和教学实际从选读书目中挑选或自行增设的阅读书目数量。这不仅尊重了各院校学生、各年级学生在语言能力上的差异,也形成了层次分明、循序渐进的阅读路线,符合学生语言水平渐进提升的发展规律和古圣先贤所倡导的循序致精的读书之道。最后,在书目内容上,起草小组划定了以文学为主、多类兼顾的遴选范畴。这样的划分有调研结果为事实和理据支撑,因为高达60%以上的学生都偏向于选择文学语言类书籍。的确,经典的阅读尤其要立足于文学、文化文本。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经典“可视为文学的‘记忆艺术’”(12)。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认为经典文学作品是“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4)。可见,文学类书籍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合理而且必要。而诸如历史哲学、教育心理、政治经济类的书籍则对丰富学生知识结构、拓展学生知识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书目》的制定工作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诸多专家同仁的大力支持,30本进阶书目和必

读书目现已进入编辑出版阶段。起草小组还特别邀请了一批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对每一部书籍进行导读和注释,以此拉近学生与名著之间的审美距离,进一步丰富学生在阅读时的认知和审美体验。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经典书目堪称浩瀚,《书目》所选仅是冰山一角。我们希望,《书目》选中的作品能够对学生的阅读习惯和人格修养产生持久的影响。在经典阅读的过程中,学生获得的将不仅仅是知识和才干,还能培育传承传播优秀文化传统的自觉,实现人文意识和历史意识终身性的定格,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艾略特26)。如此,《书目》的意义才得以真正实现。

《国标》和《新大纲》意义在于从思想、目标、实践等多个维度为各院校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各院校应抓紧时间解读,统一好思想,认清各项任务的长期性和动态性,加快制定校标和人才培养方案,加大教学改革力度,从而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和时代要求的高水平外语人才,共同推动我国英语乃至外语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注释 [Notes]

- [1] 这五个类别分别由山东大学王俊菊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常俊跃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蒋洪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许明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立非教授领衔团队完成。
- [2] 阅读参考书目起草工作小组核心成员为仲伟合、蒋洪新、郑燕虹、殷企平、胡强、叶冬、简功友、谢敏敏,参与专家有李德凤、叶扬、曹莉、何其莘、邓杰、陈敏哲等。
- [3] 国内参考书单主要有: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学生阅读参考书目》(2000版),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书单,民国时期吴宓、胡适等大家开出的阅读书单等;国外参考书单主要有: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阅读书目以及美国大中学生阅读书单。
- [4] 先后咨询过的国内外专家有张隆溪、叶扬、何其莘、李德凤、杨孝明、戴炜栋、陈众议、陆建德、王守仁、申丹、曹顺庆、聂珍钊、金莉、程巍、曹莉、蒋坚松、肖明翰、董洪川、熊沐清、王东风、丁宏为、阮炜、仲伟合、虞建华、殷企平、张和龙、史志康、王丽亚、胡强等。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Berdahl, Robert. "Academic Freedom, Autonomy, and Accountability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no. 2, 1990, pp. 169-80.
- 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Translated by Ninggang Jiang. Yilin, 2005. [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Cai, Yuanpei. "The Speech Delivered in High Division of Tsing Hua College." *Anthology of Cai Yuanpei's Views on Education*, edited by Pingshu Gao. People's Education, 1991, pp. 80-83. [蔡元培:《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载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第80-83页。]
- Calvino, Italo. *Why Read the Classics?* Translated by Canran Huang and Guimi Li. Yilin, 2006. [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 Chang, Junyue. "Impacts of Content-based Curriculum Reform for English Major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5, 2014, pp. 23-30. [常俊跃:《英语专业内容依托课程体系改革的影响及其启示》,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23-31页。]
- Cheng, Houfeng. *Researches on the Categoriz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Hunan UP,

2004. [陈厚丰:《中国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 Comenius, Johann Amos. *Great Didactic*. Translated by Rengan Fu. People's Education, 1984.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 Curtius, Ernst Robert.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Zhenhua Lin. Zhejiang UP, 2017. [库尔特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林振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 Eliot, T.S.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Collection of New Criticism Essays*, edited by Yiheng Zhao, China Social Sciences, 1988, pp. 24-33.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载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4-33页。]
- Gasset, José Ortega y.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Xiaozhou Xu and Jun Chen. Zhejiang Education, 2001. [加塞特:《大学的使命》,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Gu, Mingyuan, editor. *The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98. [顾明远编:《教育大词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 Hu, Wenzhong. "Review and Rethinking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English Majors in China." *Experts' Talks on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edited by Zhixiang Zhua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8, pp. 40-49. [胡文仲:《对于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回顾和再思考》,载庄智象编《外语教育名家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第40-49页。]
- Jaspers, Karl Theodor. *The Enteitement*. Translated by Jin Zou.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 Jiang, Hongxin. "The Education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Major in Chinese University." *Foreign Literature*, no. 3, 2010, pp. 10-13. [蒋洪新:《人文教育与高校英语专业建设》,载《中国外语》2010年第3期,第10-13页。]
- . "Thoughts on the *National Standards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3, 2010, pp. 456-62. [蒋洪新:《关于〈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制定的几点思考》,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第456-62页。]
- Liu, Guiqin. "Comprehending the Situation,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Fully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Majors." *Link & Think*, no. 3, 2013, pp. 4-9. [刘贵芹:《把握形势,深化改革,全面提高高校外语类专业教学质量》,载《外研之声》2013年第3期,第4-9页。]
- Newman, John Henry.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Hui Xu, et al. Zhejiang Education, 2001. [纽曼:《大学的理想》,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Proust, Marcel. *Days of Reading*. Translated by Keling Wei. China Translation, 2010. [普鲁斯特:《阅读的时光》,魏柯玲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10。]
- Stryker, Stephen B.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Models and Methods*. Georgetown UP, 1997.
- Yao, Xiaop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Chinese Teaching: from *The Educational System Regulations* of 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 in Qing Dynast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6, 2003, pp. 458-61. [姚小平:《外语教育和中文教育——从〈奏定大学堂章程〉说起》,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6期,第458-61页。]
- Zhong, Weihe, and Mingwei Pan. "National Standards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Innovation and Reflection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no.1, 2015, pp. 112-20. [仲伟合、潘鸣威:《论〈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定——创新与思考》,载《现代外语》2015年第1期,第112-120页。]
- Zhu, Ziqing. *General Comments on Classics*.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三联书店,1980。]

◇责任编辑:吴晋先

“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理念与实施路径分析

◎ 曹德明

内容提要: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多元文明对话和国际交流合作日趋频繁的新形势下, 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规格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何深入改革外语教育, 培养合格外语人才, 是中国外语教育必须要考虑的重要课题。上海外国语大学提出了培养“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的发展思路, 制定了为学生搭建跨专业, 跨学科培养平台的策略, 旨在培养至少精通两门以上外语, 了解语言对象国文化, 并掌握某一专业知识领域(经济、金融、管理、法律、新闻等)技能, 具有出众跨文化理解沟通能力的国际型人才。

关键词: “多语种+” 卓越国际化人才 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011-07

作者单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Title: An Analysis of the “Multilingual+” Initiative and the Methodology of its Implementation

Abstrac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have put higher demands on foreign language professionals. Therefore, a thorough reform becomes necessary for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o cultivate capable students who can truly meet the challen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s pioneered an educational reform strategy known as the “Multilingual+” Initiative: through an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al platform,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master at least two foreign languages, be familiar with the cultures of target-language countries, obtain skills in another field of expertise (economics, finance, management, law, news, etc.), and acquire excellen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Keywords: “Multilingual+”, initiative, methodology of implementation

Author: Deming Cao, Professo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 年发布的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开篇中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在 21 世纪需要怎样的教育？在当前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教育的宗旨是什么？应如何组织学习？”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教育也必须不断改革，外语教育更应最先体现出其对世界发展变化的应对。由于外语教育培养的人才才是国际交往的核心所在，其教育和知识应被视为全球共同利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上海外国语大学立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立足办学特色和传统经验，积累建校六十余年来的改革发展经验，提出“多语种+”人才培养战略，力争建设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

一、明确“多语种+”人才培养理念

在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人才培养方面，上海外国语大学始终坚持特色立校，厚植外语特色优势学科，培养国际化特色人才。学校发展了多语种、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优势，坚持多学科性交叉协调发展，扎实推动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平台搭建，为“多语种+”人才培养战略的提出培育了丰厚的土壤。

在学校语种不断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发展中，人才培养的重心完成了从外语技能人才到外语复合型人才、复合型国际化外语人才的转变。在发展变革中，学校不断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多语种高端翻译人才、多语种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无国界工商管理创新人才、应用经济学国际创新人才、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开设“国际公务员”等外语专业卓越人才培养实验班，为“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秉承“诠释世界·成就未来”的办学理念，坚持国际化办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并以人才培养国际化为重要突破口（曹德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2）。学校先后与 370 余所大学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保持密切交流来往；开展多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打造国际科研合作平台，为“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国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大致经历了单个语种外语人才到多个语种外语人才、外语单科型人才到外语复合型人才的阶段性发展和变化（曹德明，《高等外语院校国际化》1）。随着世界交往的频繁和世界形势的日益多变，全球学习背景对外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外语人才已不仅是交流和沟通的媒介，而是更多地承担起合作和发展的纽带作用。因此，国际交往和合作中，国家迫切需要具有交流领域的专业知识、跨文化的沟通理解能力、坚定的政治信念素养和出色的多语言能力的人才。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央提出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传统外语单一学科的理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从战略高度整合外语教育的目的和学习的组织方式从

未像今天这样迫切。外语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将直接影响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何其莘等 24）。按照“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人才培养目标，我们进行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和信息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学生获取学习资料的途径越来越多，尤其是外语学习变得越来越方便。外语专业学生如果仅依靠听、说、读、写、译的一般技巧和基本能力，很难体现出竞争优势，难以在全球环境中有效沟通，难以顺利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就业情况看，有意于从事专门性外语工作的学生并不多。上外连续四年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举办本科毕业生跟踪调查。调查资料表明，有近 30% 的本科毕业生选择攻读研究生或海外留学。而其中，选择转专业的比例非常高。例如，2012 届转专业的占 42%，2013 届转专业的占 41%，高于大陆地区“211”高校的平均比例，成为外语院校本科毕业生继续学业时对专业选择的一个特点。这同时也体现在本科毕业生的读研和留学上。

调查发现，毕业生选择读研的主要理由是“职业发展需要”（49%），其后依次是“想做学术研究”（31%）、“想改变专业”（23%）、“就业前景好”（21%）等；选择海外留学的主要理由是“增长见识，了解他国文化”（34%），其次是“增强职业综合竞争力”（30%）。可见，学生在发展和成长过程中，已经明显地要求能够接受更有益于职业发展、更能包含他国文化的教育，以增强外语学生的“职业综合竞争力”。

另外，在观察签约就业毕业生的结构时，发现学生主要就业意向体现出明显的“多语种”“分领域”和“国际化”倾向。首先，大部分签约就业毕业生的就业地选择上海，2013 届在上海就业的毕业生超过 80%。这其中的含义不仅是对上海的物质、文化发展的认同，还包括对已经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对具有更多潜在的国际化就业选择机会的认同。第二，用人单位主要类型是“中外合资/外资/独资”（46%），有 52% 签约就业的学生在 1000 人以上规模的大型用人单位工作，这部分学生毕业半年后的月薪水平也明显高于在其他类型单位工作的同学。第三，与社会对外语专业学生固有的印象不同，超过一半的就业毕业生分布在能够充分展示国际竞争力的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18.3%）、金融（银行/保险/证券）业（18%）、教育业（15.3%）。以 2013 届毕业生为例，仅有 7.9% 的就业毕业生从事的职业为翻译，就业量最大的前三位职业类别分别为财务/审计/税务/统计、金融（银行/基金/证券/期货/理财）、销售，其薪资水平高于从事其他职业的毕业生。

针对这样的就业、升学情况，学校对本科生的培养要考虑不同类型学生毕业后的去向、不同类型用人单位的文化和能力需求特点，调整人才培养的目标，通过各种手段满足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学校据此提出“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

二、构建“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知识体系

“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的基本知识素养可以归纳为“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即

既是精通外语、通晓国别区域与领域的专才，又是能够参与全球事务的通才。“多语种”指的是至少精通两门以上第二语言，具有出众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或具有较强的全球理解能力（姜锋 2017）。“+”指的是“互通互联”，即以基于多语言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为前提，打破专业、学科壁垒，以人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自觉价值观，以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促进国别、区域研究意识，以问题研究导向提升学生在某一领域的专精。“+”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强调融合，具体要实现两个任务：一是“通”，即通过开设大类课程、辅修专业、创新实践等贯通专业、学科；二是“化”，将多语言能力通过“比较”“贯通”等“化”为“领域”优势。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语人才应该具备多语种能力、高专业素养和多学科背景三大基本特质。学校通过加强专业内涵建设，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和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努力构建“多语种+”知识体系，推动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平台的搭建，为卓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夯实专业基础。学校目前的44个本科专业中，有30个语言文学类专业，14个非语言类专业，授课语种数量已达32种，这为“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了扎实的学科专业基础。学校以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卓越人文素养、优秀语言交际能力的卓越外语人才为目标，使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语言应用能力，同时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批判思维能力、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广阔的知识面和合理的知识结构、较强的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较好的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真正成为当代社会所急需的高端、精英外语专业人才。该模式在英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外语专业中推广实施，辅以人才培养实验班和中外联合办学等方式，取得可喜成效。2011年和2013年日语、俄语专业分别设置口译方向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2012年，英语专业启动专业人文化改革；2015年，西班牙语专业设置企业管理方向实验班。

其次，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多语基础能力。扎实的多语言基础是“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的基本能力。学校要求专业突出特色，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在非英语类外语专业的培养方案中，都设置有30个学分的“英语基础课程”模块，这些课程的实施与英语专业同教材、同进度、同教学要求，通过大量的专业训练提升英语听说读写译各种技能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学校还设置了英语、德语、日语、法语4个外语类辅修专业。通过40~60学分的语言强化训练，学生能基本掌握“五会”技能，达到英语专业二三年级的语言水平。此外，学校从2015年起，在所有专业课程中增设“大类平台课”，作为通识教育选修课程面向全校各专业开放。大类平台课程帮助学生突破专业局限，了解其他专业和学科：一方面，所有学生均可以选择其他语种的基础入门课程，如“基础俄语”“基础德语”“基础阿拉伯语”“基础朝鲜语”等，满足对语言课程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学生开展跨学科学习提供了机会，如西班牙语专业开设的“拉美文化概况”，阿拉伯语专业的“中东国别史”，日语专业的“日本概况”等课程均为学生开展国别区域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入门课程。

第三，打造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完善跨学科知识体系。学校通识教育教学改革根据“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的知识、素质、能力养成需求，以世界历史、区域国别、全球治理和

人文素养等为切入点,打造具有外语院校跨学科特点的模块结构和核心课程。2011年以来,学校对原有课程模块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形成了一套包括多元文明与国际视野、中华文明与文化遗产、艺术鉴赏与审美情趣等十大模块领域的核心课程体系。如语言科学与言语交际模块,除了开设西班牙语及法语等第二外语课程外,还增设了“斯瓦西里语入门”“基础乌兹别克语”“基础乌克兰语”等非通用语种课程,培养学生的语言基本技能和言语交际能力。多元文明、艺术鉴赏、法政思想等方面的课程着重培养学生成为具有世界公民情怀、追求高尚道德的自律的人,从而能自觉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和历史使命。通识教育的有效实施为培养具备优秀多语言交际能力、全面的区域国别知识、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卓越人文素养的外语人才,奠定坚实的科学人文素质和学科涵养基础。

三、创设“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成长环境

学校教学改革紧紧围绕“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核心,以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为保障,构建“多语种+”人才培养体系,搭建学生多元化成长成才平台。

实施完全学分制,提供学生个性化发展路径。本着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经过十年来实践经验的积累,学校自2016级学生起实施完全学分制,建立与学分制相适应的学籍管理制度。在学分、课程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生可以实现跨院系、跨专业选课。通过实施3年至6年的弹性学制,推行免修、免听和重修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转专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为学生的多元和个性化成才创造条件。

构建“多语种+”辅修平台,助力学生多元成才。学校优化专业结构,打通专业壁垒,打造多个“多语种+”辅修平台:2012年,设立多语种国际新闻人才特色班;2014年,开设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2016年,增设“多语种金融实验班”和“多语种国际法律人才培养实验班”。这些实验班均面向全校,从多语种语言专业中招收学生,实施专业新闻、法律、金融等知识与能力的培训。课程体系设计坚持专业与外语的深度融合、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深度融合、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深度融合等三个深度融合,实施双语或全英语授课。

以多语种国际新闻人才特色班为例,2012年上外开办了首届新华社一上外多语种国际新闻特色班。采用辅修专业、双专业、双学位等三种形式,从学校西班牙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日语等非通用语种专业中直接招收学生,在两年内修完40个学分后,获得新闻学辅修专业证书。学生既能在语言专业学习中熟练掌握两门外语,同时又能获得专业新闻知识与能力的培训。从目前毕业生的就业和深造情况来看,毕业生受到高度认可,社会反响很好。

推动境外校际交流,拓宽学生国际视野。学校与56个国家和地区的370多所大学、文化教育机构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都保持了密切的交流往来,学校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小世界”(毕家驹9)。学校陆续开发了葡萄牙语商务管理(与里

斯本新大学)、德语经济学(与拜罗伊特大学)、英语(与莱斯特大学)本科2+2双学位项目,美国天普大学“3+2”、美国西雅图大学“3+2”、新西兰怀卡托大学“3.5+1”等十余个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学生通过各级各类出国留学项目,修读境外优秀课程,进行学分转换。毕业生在学期间出境交流学习人数已占毕业生总数的40%以上。这些国际交流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也增强了学生对外国文化的正确理解和把握能力(曹德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3)。

四、塑造“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价值理念

学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外语专业课程教学,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外语专业教学有机融合的课程教学模式,打造多语种网站育人平台传播中华文化,在育人过程中引领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建设。

学校在外语类专业的教学中推行人文化教育教学改革,注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强调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吸收。外语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外语教育中要融入我们的民族精神(彭龙18)。提倡语言技能课程不仅是语言和翻译技巧的运用,更是以中国文化上的造诣作为基础,对对象国从文化和意识的角度进行理解和吸纳。如英语学院2012年以来充分发挥多语种、跨文化的优势开设了“中西方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经典导论”“国学典籍翻译”“汉英名译导鉴与翻译素养”“中西翻译理论评介”等体现人文化教改精神的课程,注重在传统中国文化教学的基础上,强化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此外,学校注重加强优质在线课程建设,如“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课程使用西班牙语系统讲授中国文化,帮助中国西班牙语教师和学生成为中国文化传播主体。

注重外语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学校在思政课教学中,实施专题化教学,根据教学内容需要和学生兴趣特点,有选择性地设置一到两个切合实际的专题,用全英语授课。如马克思主义学院和英语学院共同设计了1门面向全校各专业的全英语授课课程“中外时文选读”,旨在让学生阅读国外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学者以及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国家领导人有关中国问题的深度报道和分析文章,感受和领悟中外不同文化、思维和观念的碰撞,帮助学生正确、客观地看待现实理论问题,帮助学生澄清价值观念,坚定政治信仰,塑造精神家园。

此外,在外语专业课如阅读、翻译等课程教学中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如国家领导人讲话、中央文件及党的重大政策等文献的外文版。例如,在德语系“德语经典文选阅读”课上,教师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中国文化的历史》和《西方与东方》、荷兰汉学家克拉梅尔斯的《祖先崇拜》、德国汉学家尤塔·拿尔的《中医》、德国学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的《黄祸论》以及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节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节选)等中外文献的德文版作为阅读材料,让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树立正确的文化自信。

通过多语种网站传播中华传统文化。2014年12月,学校多语种外文网站正式发布,着力

打造“办网”“育人”和文化传播融为一体的多语种特色平台。目前共有英、法、德等21个语种网站,涵盖大部分学校开设的本科专业教学语种。学校组建学生供稿团队,鼓励学生深入体验社会,用所学语言记录亲眼看到的变化,用所学专业表达听到的真实故事,在专业实践中运用多语种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最真实的中国。学校聘请了21个语言专业的主课课程(精读课、写作课、文化课)教师对学生作品进行指导。两年来,上外多语种外文网站群形成了超过100人的专业师生、编辑团队,由专业教师担任网站主编、中外师生共同参与、校内各部门协同推进,两年来共发表各类文章近4000多篇,被德国、瑞典、希腊、法国、乌兹别克斯坦、日本等国家官方网站、主流媒体、高校、驻华领馆等转载百余次。新华网、人民网等外文版多次转载上外多语种网站报道。

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多语种+”卓越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理念正不断地进行思考,在实施路径方面也在努力探索、实践与创新,走出了一条新形势下我国外语院校顺应时代潮流、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新路径。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Bi, Jiaju.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Practice and Prospect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no. 2, 2005, pp. 8-11. [毕家驹:《大学国际化的实践与展望》,载《高教发展与评估》2005年第2期,第8-11页。]
- Cao, Deming. "Cultivating Creativ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with Global Vision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4, 2007, pp. 2-5. [曹德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培养创新型国际化外语人才》,载《外国语》2007年第4期,第2-5页。]
- . "On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Foreign Languages."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no. 3, 2011, pp. 1-5. [曹德明:《高等外语院校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3期,第1-5页。]
- He, Qixin, et al. "On the Education Reform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at the College Leve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1, 1999, pp. 24-28. [何其莘等:《关于外语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期,第24-28页。]
- Jiang, Feng.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A 'Multilingual+' Initiative." *People's Daily*, 8 June 2017, p. 17. [姜锋:《培养“多语种+”的国际化人才》,载《人民日报》2017年6月8日第17版。]
- Peng, Long.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China Higher Education*, no. 7, 2017, pp. 16-19. [彭龙:《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载《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第7期,第16-19页。]

◇责任编辑:曾艳钰

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属性与人文课程的意义 ——以《国标》人文课程为中心

◎ 查明建

内容提要: 英语专业过去长期的功利化、实用化倾向偏离了人文学科属性的要求, 导致了英语专业的危机。新的《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增加了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人文课程, 并明确规定了修读学分的最低要求, 标志着英语专业人文学科意识的增强, 表明体现专业内涵的人文课程不应是简单的人文知识传授, 而是要通过这些课程拓展学生的人文视野、培养文化自觉意识、思想能力和学术能力, 如此才能到达英语专业人才所应具备的专业素质基本要求。

关键词: 英语专业 人文学科 人文课程 《国标》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018-09

作者单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上海 200083

Title: On the Humanistic Nature of the English Disciplin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ities-Based Curriculum for English Majors Based on *the National Guideline*

Abstract: In the past, pragmatic and utilitarian approaches towards English education differentiated this discipline from the other humanities, thus leading to a crisis caused by the discipline itself. *The National Guideline on Teaching Quality for English Majors* reflects enhanced awareness of English studies as part of the humanities by adding more humanities-based courses to the curriculum, and rigorously setting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of students' credits. Humanities-based courses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merely deliverers of knowledge relating to humanities subjects, but through such course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cultivate humanistic visions, cultural awareness, critical thinking, and academic competence. Only in this way are they 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set for graduates from English departments.

Keywords: English majors, humanities discipline, humanities-based courses, *National Guideline*

Author: Mingjian Zha, Professor,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中国当代的英语专业教育，无论是20世纪50—70年代的以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为中心，还是9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培养英语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都着眼于学生语言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人文素质，功利化、实用化取向明显。这种教育理念及在其指导下设置的课程和教学模式的形成，有其客观历史原因，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胡文仲 111-17），但现在却成为造成英语专业深刻危机的渊藪。受其影响，英语专业学生知识面狭窄，人文素养欠缺，文化底蕴不足，思辨能力差，职业竞争力弱，事业发展空间狭窄，发展后劲不足。英语教育中长期的功利观、实用观，让人们严重误解了英语专业，混淆了英语与英语专业、学习英语与英语学习的本质区别，以为英语专业就是学英语，学生掌握了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就实现了专业培养目标。这种误解和偏见最终催生了英语专业“工具论”，让“英语专业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流行，给英语专业带来极大伤害。

这种错误认识产生于专业意识的淡薄，其根源在于对英语专业学科性质和专业意义认识的模糊。因此，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一、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属性与专业定位

一个专业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专业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与教学要求。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主客观原因，英语专业的学科属性总是遭到有意无意的忽视。这让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内涵经常随着现实的需要而变动。

在英语专业优质生源减少和毕业生就业难的双重压力下，英语教育界提出了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建议和方案，即从英语听说读写译的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转向复合型（英语语言技能+某种专业知识）人才的培养。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1998年颁布的《关于外语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由于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的趋势，过去那种单一外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的人才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对单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正逐渐减小。因此，外语专业必须从单科的‘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宽口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1）。为了从学理上来说明“英语+其他专业”的合理性，论者还专门提出了一种“载体论”，“从根本上来讲，外语是一种技能，一种载体；只有当外语与某一被载体相结合，才能形成专业”（4）。这种说法有意模糊了外语与外语专业的本质区别。蓝仁哲就指出，“外语‘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技能’的说法，忽视了外语专业的学科地位，认同了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外语工具论’；‘只有当外语与某一被载体相结合，才能形成专业’否定了外语专业的独立性”（5）。尽管英语界不少学者对此有异议，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向还是确定了下来。据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在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的说法，“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1）。《大纲》规定本科阶段开

设的三类课程：英语专业技能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方面的课程）和相关复合专业的课程（外交、经贸、法律、管理、新闻、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课程）（1）。

英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即“英语+某种专业知识”，一般是英语+经贸、商务、法律、新闻、旅游等所谓实用性专业。提出复合型方案的初衷，是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但实践证明，事与愿违。由于增加了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学时有限，英语专业课程被选择性缩减：精读、泛读、听力等语言技能课程得到保留，而最能体现专业性质的英语语言学、英美文学、英美文化等课程被削减，甚至被调整为选修课。学生无法开展真正的专业学习，仅仅局限于英语技能的掌握。而“英语复合型”意旨，也只是要求学生在掌握英语技能同时，能与其他专业复合。其结果便是英语专业与复合专业的双失，前者不专不精，后者徒具皮毛，自然无法实现“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初衷，也不能从根本上提升英语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仅如此，由于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无视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性质，自我贬低英语专业的专业独立性和专业价值，因而强化了英语专业教育的功利化、实用性和“英语工具论”论调，严重损害了英语专业的专业尊严和学术声誉。

英语专业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以文、史、哲为基本研究领域，以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及其外在的文化世界为研究对象，以精神性、价值性、思想性、体验性和践行性为学科特点。人文学科的核心是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维护关切人的尊严和价值，珍视人类发展史上所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就人的培养来说，人文学科致力于理想人格的塑造，着力培养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使他们具有批判思维能力，追求和维护公平、正义。在人生立意上，人文学科要求学生超越平庸的人生价值观，执著于生活意义的追求和创造。从社会、国家、民族层面来说，“人文学科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形象和精神的塑造”（张中载 455）。

英语专业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应在专业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上，体现人文学科的属性要求。

二、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属性与人文课程设置

英语专业与中文专业同属于人文学科。既然中文专业不是“学中文的专业”，英语专业也不应当仅仅是“学英语的专业”。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英语专业不是学英语的专业，而是以英语为桥梁来学习人文学科领域知识的专业，培养人文学科领域的人才。与中文专业相比，英语专业有其特殊性。中文是我们的母语，中文专业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无需再学中文，可以直接进入专业课程学习。但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英语专业学生只有在英语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进入专业学习。换言之，掌握英语语言技能，只是英语专业的最低要求，是进入专业学习的基本途径和语言能力准备，而不是专业学习的全部内容。

由于过去英语专业学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普遍较低,无法直接进入专业课程学习,因而学习和掌握英语语言技能就成为大学英语学习中的主轴,精读、泛读、语法、听力、口语等语言基础和技能课程完全压倒了英美文学、英美国家概况等专业性课程。从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属性上说,学生在大学四年,即使不能旁涉中外文史哲课程,也应当对英美文学、语言学概论、英美社会与文化等最基本的专业课程有所精研,否则便不算合格的英语专业毕业生,更不能称为英语专业人才。

张中载、蓝仁哲、黄源深、胡文仲、王守仁、虞建华、张西平、孙有中等学者面对英语专业人文学科性质被忽视、专业地位沦落的现状,发出“加强本科英语专业‘学科’的建设”(王守仁 42),“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胡文仲、孙有中 243),“外语教育本质上是人文化教育”(张西平 86),“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黄源深 11)等呼吁,引起英语学界的反思。近十年来,英语专业的学科性质、专业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改革等,成为各类英语专业会议的重要议题。全国英语学界都在反思:英语专业究竟是什么专业?其专业意义是什么?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尽管现在,人们对英语专业的定位还有诸多现实层面的顾虑,如毕业生就业,而英语专业自身也受实际条件的限制,如生源及师资力量,但基本共识已经达成,即英语专业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一样,是一门独立的专业,有其自身的学理基础、特定的专业内涵和人才培养目标,而不是仅仅学英语的专业。不少高校英语专业,不仅有理论层面的探讨,更有实际的教学改革,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以“思辨能力培养”作为改革的着眼点(孙有中 49-58),上海外国语大学实施英语专业“人文化”综合改革(查明建,《英语专业人才培养》229-39;《英语专业的人文性》50-55),大连外国语大学进行以内容依托课程体系改革(常俊跃 23-31)。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诸多专家在长达数年的反复商讨、修订后出台的《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反映了业界近十年来对英语专业现状和危机症结的反思,对专业定位和发展方向的思考,以及对英语专业人文学科属性与全国英语专业实际存在状况的综合平衡。

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属性,即“人文性”,其显在标志,就是看其课程体系是否体现了人文学科的知识内涵要求。此前已有不少学者呼吁英语专业开设人文类课程,如胡文仲、孙有中就曾提出:

英语专业应该逐步建设用英语讲授的一系列有质量的人文通识课程,如英国历史、美国历史、英国当代社会与文化、美国当代社会与文化、澳大利亚当代社会与文化、加拿大当代社会与文化、西方文化史、西方文明经典导读、西方哲学概论、世界简史、世界宗教概括、西方哲学概论、世界简史、世界宗教概况、《圣经》与西方文化、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中西文明比较、社会学概论、媒体与社会、国际关系史、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概论等;还可以用中文或英文开设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经典导读、中国艺术赏析、中国古典文学等课程。(246)

蓝仁哲主张,应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中西文化比较”“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经典导读”等选修课程(8)。张中载则建议,应“逐步增设人文社会科学的选修课和系列讲座,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西方哲学史、所学语种国家历史、中国近代史、世界文学史、美学概论、心理学概论、政治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课程”(456)。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自2010年实施人文化教学改革以来,已陆续开设了“英语文化基础阅读”“《圣经》与西方文化”“现代西方哲学经典”“中国文化经典导论”“比较文学”等课程(查明建,《英语专业人才培养》237)。

《国标》提出了一些建议开设的人文类课程,如“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英语国家历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澳新加社会与文化”“欧洲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明史”“西方人文经典”“《圣经》与文化”“古希腊罗马神话”“比较文学”,并规定了必修的学分。这些人文类课程的设立,既是英语专业人文学科意识增强的标志,也是英语专业摆脱工具性、消除“非专业”的偏见、彰显自身专业品质和独特教育价值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人文类课程教学要求

人文类课程是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可使学生接触到更富感染力、更有文化内涵的高级语言,提升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又可扩大学生的人文视野,完善旧有知识结构。除此之外,人文课程还担负着培养学生问题意识、批判思维能力、学术能力、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任务。但获得了人文知识,不等于人文修养的提升;学习了文史哲经典,不等于思想能力的增强。在教什么确定后,如何将人文知识转化为人文修养并进而提升思想能力成为关键。

人文类课程教学要越出知识传授的藩篱,与人文视野拓展和人文精神、思辨能力等诸种能力的培养相结合,把基本的事实内容作为思考的基础和出发点,着力启发学生从事实、现象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

以英美历史、英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的教授为例,其常识性内容并非教学重点,如何启发学生思考才是关键,比如:英美历史、英美社会文化为什么会如此发展?其文化基因是什么?哪些基因性质的文化因素对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基因性的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变迁中又出现了哪些变异?体现在哪些社会现象中?等等。总之,此类课程需从具体的文化现象事例入手,通过分析英美历史和社会文化形态,进一步探讨文化特质和民族特性(国民性),并相机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情况进行比较。这种从现象到本质、从外缘到内核、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型、启发式教学,可以引导学生从掌握常识、了解现象发展到发现问题,继而进入研究型的思考、分析,培养学术思想能力。

再如《国标》建议开设的《圣经》与西方文化课。《圣经》与基督教文化是了解西方文化的锁钥，失去这一文化背景，很多西方文化现象就无法解释。讲授《圣经》与西方文化课，不能只停留于解读《圣经》本身，还要在此基础上，举以西方文学、音乐、绘画、建筑，乃至历史事件、生活习俗、社会现象的典型事例，阐发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的影响，如此才能实现开设这门课程的意义，达成教学目标。

《国标》还建议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对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理念的更新、专业内涵的拓展、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有着特殊的意义（查明建，《人文素质的意义》114-17）。比较文学不仅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它是对文学、文学世界、人文生态环境、文学世界观的一种全面观照，是全面包含整个文化时空的一种视野”（Jost 29-30）。比较文学教学，不仅限于中外文学间的比较，还要在文学差异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其深层的文化原因。以中外文学中心理描写手法为例。莎士比亚《奥赛罗》第五幕第二场奥赛罗在杀死黛丝狄蒙娜之前的长篇心理独白，把奥赛罗嫉恶与怜惜、决断与不舍等复杂、矛盾的内心活动，生动地展示了出来。而中国传统小说主要通过人物动作来暗示人物的内心活动，甚少对人物心理活动进行细致描写。如《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即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如张爱玲《金锁记》中写曹七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张爱玲 260）。张爱玲通过这个推手镯的细节设计，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曹七巧万念俱灰、心如枯井的绝望心理。又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一句神来之笔——“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尝了一口”（汪曾祺 304），将巧云对十七子千般爱怜、万般无奈的心情，不着一字而感人至深地表现了出来。

文学层面上的分析、比较是教学上的第一步，比较之后还需进一步追问：中西文学何以有这样不同的心理描写特点？这就指向了中西文学背后的文化因素。西方文化的开放、直率与中国文化的内敛、含蓄，正好表现为截然不同的文学表达方式。如果再继续沿波讨源，追问中西文化为何有这样不同的特质，则又必须深入到中西文化形成的不同社会、历史、地理、生活环境等背景中进行了解和分析。透过这一番由文学现象到文化深层原因的探寻，学生可以比较深切地感受到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也加深了对中西文化不同特质的了解。

钱钟书指出，“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462）。人文学科的这种特点，为比较文学所具备。比较文学的发散型思维和善于在事物间寻找到联系点的特点，也可用于其他人文课程的教学，如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中外文化、价值观念和修辞、思维、审美及表达方式等进行比较，发现共性和差异，扩大学生的人文和学术视野，增强跨文化比较意识，激发研究兴趣。

四、英语专业人文课程的意义

人文教育本是英语专业教育的题中之意，注重人文教育，曾是我国外语教育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无论是清末的京师同文馆，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40年代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无不注重学生人文修养的培育。尤其是上述时期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外文系，更是成功培养出一大批外语专业精英人才。其成功的经验，恰恰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采用选修课程与必修课程相结合的方式，注重英美文学教育以培养学生的阅读和欣赏能力”（张美平246）。然而，功利化、实用化的外语教育理念最终取代了旧有的人文教育传统。在这一理念支配下，学生空有英语专业知识，却缺少人文素养，人生境界与识见受限。正如潘光旦所指出的，那些有一技之长但无人文情怀而又自以为是的专家，只不过“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269）。

学生受人文教育熏染，可以扩大视野，培厚情怀，健全人格，丰富想象，训练批判创造之力，最终成为一个思想圆通、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人。唯有经过这样一番锤炼，学生才能突破狭隘格局，在广阔的领域内有所作为。

此外，人文类课程还能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也许有人担心，人文类课程的增加，会占用英语技能课程学习的时间和学分，影响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水平。但事实证明，国内外语教育长期将关注点放在语言技能训练上的做法，事倍功半，费时且低效，而人文类课程加入课程体系反而有助于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对此，外语界的前辈深有体会。许国璋先生就指出，英语教育是“用英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养心智，而不是英语教学”（4）。王佐良先生说得更明确：“通过文化来学习语言，语言也会学得更好。”（1）因为，“用英文讲授的知识性、人文性课程更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求知欲，使他们有可能在运用英语作为工具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英文水平”（胡文仲、孙有中246）。

目前，全国有一千多所大学设有英语专业，院系之间的师资力量和生源质量很不均衡。受制于这一基本国情，面向全国所有英语专业的《国标》，还不可能完全体现本专业的专业性，也“无法解决英语专业的学科困境”（曲卫国13）。但相较于2000年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主张，《国标》在回归英语专业人文学科属性上，已有很大的进步。所增设的人文类课程，彰显了英语专业教育理念的人文化取向。英语专业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意义，也会在这一方向的改革中逐渐显现出来。

人文类课程的加入对英语专业教师的知识结构、科研水平和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型教学因而必不可少。英语教师唯有坚持学术研究，具备相当的学术能力，才能真正发挥人文类课程在人才培养上的作用。就目前全国英语专业师资状况来看，要达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相信只要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英语专业展现人文学科魅力、重现光荣与辉煌的那一天就终会到来！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Chang, Eileen. "The Golden Cangue." *The Complete Works of Eileen Chang*, edited by Beijing October, Vol.1, Beijing October, 2012, pp. 216-61. [张爱玲:《金锁记》,载北京十月出版社编《张爱玲全集》第1卷(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12),第216-61页。]
- Chang, Junyue. "Impacts of Content-Based Curriculum Reform for English Major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5, 2014, pp. 23-31. [常俊跃:《英语专业内容依托课程体系改革的影响及启示》,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23-31页。]
- English Se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Committee fo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eaching Syllabus for English Majors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0.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Committee fo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4, 1998, pp. 1-6.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外语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载《外语界》1998年第4期,第1-6页。]
- Huang, Yuanshen. Calling for a Fundamental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Programs for English Major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1, 2010, pp. 11-16. [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载《外语界》2010年第1期,第11-16页。]
- Hu, Wenzhong, and Youzhong Sun. "On Strengthening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5, 2006, pp. 243-47. [胡文仲、孙有中:《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第243-47页。]
- Hu, Wenzhong. "On the Training of English Major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1, 2014, pp. 111-17. [胡文仲:《试论我国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回顾与展望》,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1-17页。]
- Jost, François.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egasus, 1974.
- Lan, Renzhe. "On the Disciplinary Affiliation and Cultivating Aim of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at Higher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6, 2009, pp. 4-16. [蓝仁哲:《高校外语专业的学科属性与培养目标——关于外语专业改革与建设的思考》,载《中国外语》2009年第6期,第4-16页。]
- Pan, Guangdan. "On the Change and Redirection of Education." *Collected Works of Pan Guangdan*, edited by Naimu Pan and Naihe Pan, vol. 10, Peking UP, 2000, pp. 267-86. [潘光旦:《论教育的更张》,载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67-86页。]
- Qian, Zhongshu. "Good Poetry Comes from Agonies and Misfortunes." *Essay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ited by Chinese Department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Normal UP, 1986, pp. 452-63. [钱钟书:《诗可以怨》,载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452-63页。]
- Qu, Weiguo. "Can National Standards Save the English Majors in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3, 2016, pp. 11-13. [曲卫国:《国家标准能让英语学科走出困境吗?——谈谈英语专业改革与英语学科建设的关系》,载《外国语》2016年第3期,第11-13页。]
- Sun, Youzhong. "Toward a Critical Thinking-oriented Curriculum for English Major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3, 2011, pp. 49-58. [孙有中:《突出思辨能力培养,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载《中国外语》2011年第3期,第49-58页。]
- Wang, Zengqi. "The Tale of Danao." *An Anthology of Wang Zengqi's Self-selected Works*, edited by Zengqi W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pp. 287-307. [汪曾祺:《大淖记事》,载汪曾祺编《汪曾祺自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第287-307页。]
- Wang, Shouren.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Major."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2, 2001, pp. 42-43. [王守仁:《加强本科英语专业“学科”的建设》,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2期,第42-43页。]
- Wang, Zuoliang. *An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93. [王佐良:《欧洲文化入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
- Xu, Guozhang. "English Education Is Not English Teaching." *How to Learn English*, edit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English Stud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2, p. 4. [许国璋:《英语教育非英语教学》,载《英语学习》编辑部编《英语的门槛有多高》(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第4页。]

Zha, Mingjian. "On the Humanistic Nature of English Disciplin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Qualities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Cross-Strai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ymposium*, edited by Deming Cao,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15, pp. 50-55. [查明建:《英语专业的人文性与学生人文素质培养》,载曹德明编《外语教育:专业化与复合化——第十届海峡两岸外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第50-55页。]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Talents Cultivation and Liberal Edu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8th Cross-Strai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ymposium*, edited by Meisun Zh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2, pp. 229-39. [查明建:《英语专业高端人才培养理念与人文文化教育》,载钟美荪编《第八届海峡两岸外语教育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第229-39页。]

——.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each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Improving the Humanistic Qualities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o. 2, 2005, pp. 114-17. [查明建:《比较文学对提高外语院系学生人文素质的意义》,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第114-17页。]

Zhang, Meiping. *A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ejiang UP, 2012. [张美平:《民国外语教育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Zhang, Xiping.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is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Nature." *English Education and Liberal Education*, edited by Youzhong Su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8, pp. 86-91. [张西平:《外语教育本质上是人文主义教育》,载孙有中编《英语教育与人文通识教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第86-91页。]

Zhang, Zhongzhai. "On Utilitarianism and Humanism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6, 2003, pp. 453-57. [张中载:《外语教育中的功用主义和人文主义》,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6期,第453-57页。]

◇责任编辑:吴晋先

论《国标》精神指导下的特色校标制定

◎ 邓杰

内容提要: 结合《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制定的研究与实践经验,从把握国标精神、凝练校标特色和强化专业属性三个方面,对如何制定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学校标准进行讨论,同时提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希望能为各高校制定学校标准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外语专业 国家标准 学校标准 专业属性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027-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15JZD048)的子课题“我国外语教学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研究”;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办重点资助课题“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研究”(XJK014AGD011)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Title: On Establishing Teaching Quality Standards Particular for Individual Universities Using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s*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Standards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discusses how to build university-level standards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and useful suggestions,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ree features. Meanwhile, some issues are raised for further discussion concerning develop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and establish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standards.

Keywords: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The National Standards*, university-level standards, disciplinary affiliation

Author: Jie Deng,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颁布之后,各高等学校将根据《国标》制定并实施外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的学校标准。依据中国教科院教育质量研究课题组的说法,标准的制定是一项对专业性、学术性和技术性都有很高要求的工作,教育质量标准虽不同于由专门的标准化委员会制定的、具有独立标准号和量化标准指标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但同样具有可标准化的内容、评价和保障体系,标准的制定同样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4-16)。因此各高等学校在制定学校标准时很有必要成立专门的研制小组,确保制定符合要求、满足需要的学校标准。本文结合制定《国标》的理据探究和实践经验,重点围绕如何把握《国标》精神、凝练校标特色和强化外语学科的专业属性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同时提出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值得正确认识的问题,希望能为外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学校标准的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把握《国标》精神

(一) 制定《国标》的背景和理据

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跳跃式发展阶段,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导致了許多值得重视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发展尤为迅猛,问题更为严峻。到2013年,我国1145所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中,994所设有英语专业,开设其他语种专业高校的数量也成倍增长,在校外语专业本科人数更是达到了81万,其中英语类专业学生总数57.8万人(仲伟合,《英语专业创新发展》127-33)。我国高等教育的这种“跨越式”“超常规”发展虽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本科专业毕业生,但引起的问题也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张绍杰4-9)。比如,同类专业简单复制,人才培养“千校一面”,同质化倾向严重;教学质量下降,高层次、高素质的精英人才或特色人才匮乏。外国语言文学教育不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由于《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强调外语只有与其他专业复合才能成其为专业,“外语专业作为人文科学的一部分的地位在此遭到质疑。外语作为专业的属性遭到了颠覆”(仲伟合、蒋洪新5),外语学科的发展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针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2010年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为了贯彻落实《纲要》精神,2011年教育部、财政部印发《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2012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这些政府文件从不同层面共同强调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的战略转移(钟美荪2-6)。2013年7月,教育部新一届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及英语专业分委员会成立。新一届教指委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和制定《高等学校英语类专业本

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并以此标准为蓝本研制外语类各本科专业的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刘贵芹 4-9；钟美荪、孙有中 2-8）。

（二）《国标》的内涵和功能

国家标准既是同一专业人才培养全国统一的达标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重要依据。就达标要求而言，国家标准是“尺度”，是“底线”，是全体本科毕业生都必须达到的最低门槛，而不是选优标准或者平均水平。换句话说，“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学校，处于哪个省份，只要开办外语类本科专业，就必须达到国家标准中规定的质量要求”（彭青龙 111）。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国家标准是对学校教学的规范和监管条例，一方面使高校各类专业纵向和横向可比，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本科教学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钟美荪、孙有中 2-8）。毕竟，如果“没有标准，纵向管理，横向管理，你说你质量高，凭什么”（刘贵芹 8）。只有制定了标准，评估、检查才有依据。此外，国家标准的制定也有利于政府简政放权，把管理和放权这两个轮子都“做圆”，让高等教育这辆“马车”跑得更快，跑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制定高等教育专业国家标准也是政府转变职能的具体行动（钟美荪 2-6）。

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各行业还将根据本行业对毕业生的要求制定行业标准，各高等学校则将根据学校定位制定自己的学校标准，这三个标准分别代表高校人才培养标准的三个层次。国家标准是第一层次，是国家对相应专业全国所有本科毕业生的最低要求；行业标准是第二个层次，是能满足行业需要且行业可以接受的最低要求；学校标准为第三个层次，是与各自学校的办学定位和目标行业的人才需求相匹配的最低要求。三个层次中，国家标准具有强制性，是本科专业的准入标准、建设标准和评估标准的“三合一”：对于申请新开设本科专业的学校，具备的条件必须达到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对于已经开设本科专业的学校，国家首先将对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校的专业进行评估，其他不同层次的高校可根据各自的专业建设情况个别申请评估；评估的指标在国家标准的框架下制定，是国家标准有关要求的细化，但国家标准本身并不是评估标准，而是评估标准的依据（钟美荪 2-6；仲伟合，《英语专业本科教学》2-8）。评估在检验国家标准达标情况的同时，还将检验学校标准的达标情况，即用学校自己的标准检验自己的“产品”。多年未提出评估申请或者评估未达标高校的专业将会在一定范围内被列入预警专业名册，以敦促其加强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仲伟合，《英语专业本科教学》2-8）。

二、凝练校标特色

（一）以“分类卓越”为目标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关注学校和学科专业的层次等级，忽视学科分类的重要性，导致人才培养“千校一面”，缺乏特色（钟美荪 2-6）。随着我国经济社

会的不断发展,人才需求日益多样化,人才培养也应与时俱进、趋向多元,实现从“分层选优”到“分类卓越”的转变(钟美荪、孙有中 2-8; 仲伟合,《英语专业创新发展》127-33)。所谓“分类卓越”,形象一点来说,就是我们不但要有导弹专家,也要有制作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的专家,他们都可以达到卓越水平。各个高校不应拼命在一个等级中往上爬,而是要在不同类型上“追求卓越”,把发展模式引向注重特色、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钟美荪 2-6)。基于这一理念,校标制定应走个性化道路,在确保国家质量标准的前提下,凝练学校的人才培养特色,制定出既满足国家标准要求,又彰显专业特色的学校标准。

(二) 以国家标准为前提

突出特色,要以国家标准的质量要求为前提,缺乏质量保障,专业没有生命力,特色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如前所述,国家标准具有统一性和强制性,是全国所有同类专业本科毕业生都应该达到的门槛级别的最低要求。各高等学校在制定校标时,不得以任何借口降低人才培养要求,而必须以国家标准为依据和蓝本,确保人才培养不低于国家标准的要求。国家标准的门槛级最低要求并不是指各学科专业当下的最低水平,而是指能适应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需要、能为相关行业所接受的基本要求。目前,鉴于我国高校建设与发展存在客观差异,生源较好、教学质量较高的学校应该在国家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制定“更上一层楼”的校标,而生源相对较差、教学质量相对较低的高校也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制定“跳一跳摘果子”的校标(仲伟合,《英语专业本科教学》2-8)。如果教学质量长期达不到国家标准的要求,就业必将持续滑坡,招生必将面临困难,专业终将自然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质量的特色,犹如不皮之毛,将无以依存。

(三) 以竞争需求为导向

凝练特色,要以满足市场竞争的需求为导向,因为需求是特色的驱动力,缺乏需求的强劲支持,特色将竞争乏力且难以持久。所谓特色,简而言之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这其中的核心理念是:满足多样需求,避免同质培养,促成错位竞争,提升竞争能力。“人无我有”,则无人与我争。这无疑是最理想的竞争优势,因此无论是新增专业还是有一定基础乃至一定优势的专业,都应深入挖掘“人无我有”的独到特色,占据一枝独秀的“品牌”优势。“人有我新”往往是迫于竞争的无赖之举。同等条件下,竞争只有走创新之路才能占得优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人新我优”则是“分类卓越”的必然要求。在缺乏独有和创新优势的条件下,只有牢固树立创优意识,坚定不移地走提升质量的内涵式发展之路,苦练内功,靠质量取胜。惟有如此,特色才有生命力和竞争力,才能可持续发展,才能达到卓越的顶峰。

正如特色不一而足,谋求特色发展的途径也多种多样,概括起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首先,因为学校的处所具有唯一性,所以“人无我有”的特色往往都是区域特色,如学校所在地区独有的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经济发展特色和国家政策惠及的有关特色等。简功友在

深入挖掘湖南湘西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出的吉首大学英语专业建设的“四化”特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79-83)。再如,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大项目蕴藏着巨大的人才需求,所在地区公司企业对外语专业人才的特色需求就很值得探究。第二,对于同一区域同类专业而言,区域特色不再是独有的,但各高校在学校类别、办学定位、优势学科、历史传承等方面应该都各有所长,所长之处也就是特色所在。需要指出的是,“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标准”附件中提供了综合类、理工类、外语类、师范类和财经类五类高校的国家标准实施方案,各高校可参照相应实施方案制定学校标准,但不能照搬照抄,而应充分体现校本特色。第三,对于区域特色不明显、校本特色也不具优势,甚至在学校还处于“夹缝中求生存”地位的专业,特色发展也并不是无路可走。只要敢于挤出“夹缝”,投身市场,特色就会出现在眼前。这实际上是所有专业归根到底都必须走的道路。钟美荪指出,市场或者用人单位应介入人才标准制定以及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为人才培养提供资源和社会实践环节,评价人才培养成果,再为人才培养标准的完善提供反馈(2-6)。用人单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其产品或服务肯定有其特别之处,对所需人才应该也会有其特色要求,因此,只要深入人才市场,广泛开展调研,探索特色应该不会无功而返。

(四) 以现实条件为基础

特色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特色课程体系的开发和建设,并依赖一支能从事特色人才培养的教师队伍。开展“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特色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但特色课程体系和特色教师队伍的建设对于任何专业都是巨大挑战;而走“人新我优”的特色之路,课程体系和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压力相对较小,在同等条件下创优的难度会相对较大,而要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创优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凝练特色一定要考虑自身的实力和条件,一定要切实可行,切不可好高骛远。总体而言,生源基础和师资力量相对一般、在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中不具优势的专业,凝练特色应往应用型、实用型方向靠拢,尽可能将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行业需求紧密联系,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特色之路,力图在市场需求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源基础好、师资力量强、有实力争创“一流学科”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可考虑朝国际化、学术型、研究型方向发展,走“人有我优”的特色之路,力争引导学科专业的发展方向 and 潮流。

三、强化专业属性

仲伟合在论述外语类专业的学科发展现状时指出,外语类“专业的学科性与工具性似已成为一对矛盾体,部分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甚至一线教师将英语类专业误解为一种工具性专业”(《英语类专业本科教学》4),但根据我国《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外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隶属于文学门类。可见,外语专业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外

语专业的学科定位问题,具体地说,是怎样防止外语专业的学科人文性沦为语言工具性的问题。

(一) 工具性事实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生的英语水平不断提高,进入大学时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并不比英语专业学生的水平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在四年本科学习之后,英语专业学生非但英语语言能力没有明显优势,反而患上“思辨缺席症”(黄源深,《思辨缺席》1,《再谈“思辨缺席”》11-16;曲卫国 60-66;文秋芳等 350-55),那么,英语专业的工具性之说恐怕就很难说是“误解”了。

为了强调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大纲》明确指出,“从根本上来讲,外语是一种技能,一种载体;只有当外语与某一被载体相结合,才能形成专业”(26-27)。基于这种认识,培养复合型英语专业人才的课程跟训练学生掌握英语语言工具的大学英语课程,“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为了同一目标——训练语言技能,这也就“从根本上”坐实了英语专业是一种工具性专业的事实。现在的商务英语专业仍然沿袭这一观念,或者至少潜意识中仍然视外语为工具。例如,王立非、葛海玲在解读商务英语专业国家标准的培养目标时一再强调“培养会外语、懂专业的国际化人才……培养通外语、懂专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3-5)。“会外语”也好,“通外语”也罢,这里的外语显然不是专业,而是“懂专业”中的专业要求掌握的工具;而要求懂的“专业”实际上指的也不是商务英语专业,而是剔除了外语之后剩下下来的商务专业。

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导致“误解”的深层原因在于外语与另一个专业的“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外语人才培养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语专业教学的要求”(何其莘 226)。复合的模式主要有:外语+经济学或者法学或者新闻学(胡文仲 44);外语专业(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种)+英语、人文专业+英语、英语专业+人文专业(戴炜栋,《追忆往昔》159)。《大纲》规定“英语本科专业学制为4年”(3),在4年的时间内力图推行两个专业的复合,这在实践中很难操作,也一直未得到认同。蒋洪新指出,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培养一直以来都是见仁见智(456-62);而蓝仁哲更是严词质疑:“试想,英语专业如果是个名副其实的学科专业,四年学制,每年都有明确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具体任务,存不存在复合另一个专业的空间?学生若不在英语专业的既定水准上打折扣,哪有时间 and 精力旁骛另外一个专业?”(148)可以说,如果强调跟另一专业复合,外语容易沦为工具,《大纲》对此并不避讳,商务英语专业的国家标准对此虽不认可却也无法否认。

(二) 学科性保障及措施

为了遏制“外语工具性倾向”在我国外语界内外的蔓延,确保外语专业的学科地位,《国标》中提出了一系列强化外语专业属性的措施。首先,《国标》前言中明确指出,“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外语类专业属于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隶属文学门类”,这就为外语类专业的学科地位提供了合理依据。其次,

在培养目标中放弃对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追求，并在培养规格上进一步从素质、能力和知识三个方面突出人文性方面的要求：素质方面，强调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的融合；能力方面，首次提出外语文学赏析能力的概念，并要求注重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知识方面，要求熟悉外语文学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了解外语国家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基本情况。第三，课程体系中要求开设有关外语文学和外语国家社会与文化方面的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同时在实践环节进一步要求开展帮助学生了解民情国情和开阔学生国际视野等方面的实践活动。此外，“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标准”附件还提供了全部13门核心课程的课程描述和1种包含60本原版英语著作的进阶阅读书目，一方面按《国标》新的要求规定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内容和评价要求，另一方面为开发适应《国标》精神的新教材和促进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提供指导。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从国家政策、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上突出外语专业的人文性学科特点，而且在课程设置、教材开发、课外活动等各个环节的实践层面进一步抓落实，从而将对外语专业的学科地位和专业属性的重视贯穿于整个国家标准。各高等学校外语专业在制定学校标准时，应深刻领会《国标》的这一精神，全面深入推进我国外语专业的人文教育。

此外，“复合型”人才自提出以来始终未达成共识，且在近十几年的实践中一直争议不断。翻译和商务英语根据各自的专业特点，都强调“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商务英语同时还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王立非等 297-302；仲伟合、赵军峰 289-96）。从英语专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无论是“通识型”或“通用型”，还是“学术型”和“研究型”，都不太符合国内的实际，因为通识和通用同时也意味着缺乏特色，更主要的是，真正的通识和通用水平其实是非常高的要求，四年本科教育难以达到；而“学术型”和“研究型”的要求更高，本科教育更难以达到，而“应用型”一般要求有明确的应用领域，同时也有“工具性”之嫌，所以这三种类型也不适合英语专业；“复合型”是导致人才类型之争的源头，是英语专业最先明确要求放弃的类型。因此，英语专业未对人才类型作出要求，而是参照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提出培养“英语专业人才”（蒋洪新 459）。

（三）潜在的问题

英语、商务英语和翻译三个专业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一直是关注的焦点。钟美荪在论述《国标》的功能时强调，“专业教学国家标准要达到三个要求：一要经得起历史考验，二要经得起实践检验，三要经得起后人的评价和实践”（3）。而上述三个专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界限不够清晰的问题（冯光武，《回顾与展望》12-17，《把握国标精神》2-6；仲伟合，《英语类专业本科教学》2-8）。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教高〔2012〕9号）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新增了24个外语语种和翻译、商务英语两个专业，但其中并没有“英语类专业”的概念。仲伟合在介绍这个专业目录时称翻译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为“与英语相关的专业”，并指出“英语专业已经发展成为英语类专业”（《英语类专业创新发展》128）。但问题是：首先，

翻译专业指“以汉语(母语)为A语言与其他语言(外语)为B语言之间相互翻译的专业”(仲伟合、赵军峰 292)。根据这个定义,翻译显然并不限于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那么将翻译专业归于英语类专业,逻辑上是否成立?其次,英语用于商业事务就能衍生出商务英语专业,那么用于法律、医疗、行政管理等事务是不是也该有相应的英语专业呢?如果强大到一定程度就要另立门户,“教育英语”是不是更应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但不管怎样,“商务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专业属性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得到了认定”(王立非、葛海玲 3),所以制定《国标》时只能将这些问题搁置起来,留待后人评说,交由实践来检验。

学校标准既要符合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又要展现标准的校本特色,彰显人才的竞争优势;制定学校标准既不能脱离国家标准的框架,又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而要在各个方面进一步细化和拓展,使各项要求更加翔实、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因此,校标制定是一项对专业水平、研究能力和责任心都有很高要求的工作。为了确保制定的学校标准既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又体现专业的校本特色,校标制定小组应深入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充分了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长远规划和阶段性目标;仔细研究国内外关于教育质量标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熟练掌握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理论和方法;全面了解国家标准相关的研究成果,准确把握相关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定精神和具体要求;同时,还要深入剖析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定位,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水平,以及在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保障措施等方面的优势与不足,并深入开展市场调查和人才需求分析。

由于近年来外语专业的学科性受到质疑,外语专业学校标准的制定还肩负着重塑专业学科地位的重任。学科地位不是靠争辩就可以建立起来的,也不是打压了工具性就会提升学科性。事实上,外语专业的学科性是外语语言工具性的发展和演进,是从基于语言工具到超越工具使用的升华。因此,外语专业的学科建设不能停留在语言工具使用的层面,而应着力于利用语言工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高素质外语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Dai, Weidong. "Looking Back at the Past,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Experts Forum on 30-year Reform and Opening-up*, edited by Zhixiang Zhua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8, pp. 151-66. [戴炜栋:《追忆往昔,展望未来》,载庄智象编《外语教育名家谈(1978—2008)》(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66页。]
- . "Sec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rough Scientific Planning in the Light of National Condition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5, 2009, pp. 2-9. [戴炜栋:《立足国情,科学规划,推动我国外语教育可持续发展》,载《外语界》2009年第5期,第2-9页。]
-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P. R. China. *National Curricula for English Major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Feng, Guangwu.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Criteria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1, 2017, pp. 2-6. [冯光武:《把握国标精神、找准学校定位、突出专业特色——〈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实施建议》,载《外语界》2017年第1期,第2-6页。]

- . “On the Current Reform in the English Major Programs: Review and Prospect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1, 2016, pp. 12-17. [冯光武:《新一轮英语类专业教育改革:回顾与展望》,载《外语界》2016年第1期,第12-17页。]
- He, Qixin. “My 20 Years with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f TFL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perts Forum on 30-year Reform and Opening-up*, edited by Zhixiang Zhua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8, pp. 221-32. [何其莘:《我与教学指导委员会的20年》,载庄智象编《外语教育名家谈(1978—2008)》(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第221-32页。]
- Huang, Yuanshen. “Calling for a Fundamental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Programs for English Majors.” *Foreign Languages World*, no. 1, 2010, pp. 11-16. [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载《外语界》2010年第1期,第11-16页。]
- . “The Absence of Analytical Think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7, 1998, p. 1. [黄源深:《思辨缺席》,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7期,第1页。]
- Hu, Wenzhong. “Review and Rethinking of Teaching Reform of English Major in China.” *Experts Forum on 30-year Reform and Opening-up*, edited by Zhixiang Zhua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8, pp. 39-49. [胡文仲:《对于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回顾和再思考》,载庄智象编《外语教育名家谈(1978—2008)》(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第39-49页。]
- Jian, Gongyou. “On the Reform of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Guided by National Standards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no. 6, 2016, pp. 79-83. [简功友:《新导向新机遇新挑战新思路——试论国家标准视阈下民族地区英语专业教学改革》,载《当代外语研究》2016年第6期,第79-83页。]
- Jiang, Hongxin. “Some Thoughts o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3, 2014, pp. 456-62. [蒋洪新:《关于〈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制订的几点思考》,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3期,第456-62页。]
- Lan, Renzhe.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in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Review and Rethink.” *Experts Forum on 30-year Reform and Opening-up*, edited by Zhixiang Zhua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8, pp. 139-49. [蓝仁哲:《改革开放时代的外语专业:回顾与反思》,载庄智象编《外语教育名家谈(1978—2008)》(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第139-49页。]
- Liu, Guiqin.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to Improve the Overall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Link and Think*, no. 3, 2013, pp. 4-9. [刘贵芹:《把握形势,深化改革,全面提高高校外语类专业教学质量》,载《外研之声》2013年第3期,第4-9页。]
- NIES Research Group of Education Quality Standards. “National Standards for Education Quality and their Establishment.” *Educational Research*, no. 6, 2013, pp. 4-16. [中国教科院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研究课题组:《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及其制定》,载《教育研究》2013年第6期,第4-16页。]
- Peng, Qinglong.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English-based BA Programs* and the Collegiate Standard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1, 2016, pp. 109-17. [彭青龙:《论〈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特点及其与学校标准的关系》,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9-17页。]
- Qu, Weiguo. “Is it Deficiency in Reasoning Ability in Systematicity of Knowledge: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asoning Ability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1, 2015, pp. 60-66. [曲卫国:《缺乏的到底是思辨能力还是系统知识?——也谈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问题》,载《中国外语》2015年第1期,第60-66页。]
- Wang, Junju. “Making National Standards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Innovation and Reflection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no.1, 2015, pp. 121-30. [王俊菊:《英语专业本科国家标准课程体系构想——历史沿革与现实思考》,载《现代外语》2015年第1期,第121-30页。]
- Wang, Lifei, and Hailing Ge. “Understanding the Common Cores and Differences of Qualities,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in the National Criteria for English Major Program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5, 2015, pp. 2-9. [王立非、葛海玲:《我国英语类专业的素质、知识、能力共核及差异:国家标准解读》,载《外语界》2015年第5期,第2-9页。]
- Wang, Lifei, et al.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ional Criterion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BA Program for Business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2, 2015, pp. 292-302. [王立非等:《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点解读》,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2期,第297-302页。]
- Wen, Qiufang,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mong English and Other Liberal Arts Major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5, 2010, pp. 350-55. [文秋芳等:《我国英语专业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思辨能力

的对比研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第350-55页。]

Zhang, Shaojie. "Maki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Well-trained with 'Solid Foundations, Strong Capabilities, and High Qualities' to Meet Multi-Social Demands and Multi-Goal Orientations: New Thoughts on Reform of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3, 2010, pp. 4-9. [张绍杰:《面向多元社会需求和多元目标取向培养“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对英语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思考》，载《中国外语》2010年第3期，第4-9页。]

Zhong, Meisun. "Implementing National Standards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2, 2015, pp. 2-6. [钟美荪:《实施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推进外语类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载《外语界》2015年第2期，第2-6页。]

Zhong, Meisun, and Youzhong Sun. "Focusing on Talents Culti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FLT in China."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1, 2014, pp. 2-8. [钟美荪、孙有中:《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全面推进外语类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第五届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思路》，载《外语界》2014年第1期，第2-8页。]

Zhong, Weihe, and Hongxin Jiang. "To Be of No Use or of Great Use: A Discussion on the Ori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Subject in Light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eign Languages World*, no. 2, 2015, pp. 4-7. [仲伟合、蒋洪新:《无用与大用——从〈国标〉谈英语学科定位与建设》，载《外语界》2015年第2期，第4-7页。]

Zhong, Weihe.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Innovations of English-based BA program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1, 2014, pp. 127-33. [仲伟合:《英语类专业创新发展探索》，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期，第127-33页。]

——.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Major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s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3, 2015, pp. 2-8. [仲伟合:《〈英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指导下的英语类专业创新发展》，载《外语界》2015年第3期，第2-8页。]

Zhong, Weihe, and Junfeng Zhao.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ional Criterion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BA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Progra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2, 2015, pp. 289-96. [仲伟合、赵军峰:《翻译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点解读》，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2期，第289-96页。]

◇责任编辑：吴晋先

FLC

中外文学文化关系

东西方比较的挑战和机遇

◎ 张隆溪

内容提要: 作为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建立于 19 世纪的欧洲, 直到 20 世纪最后 10 年, 可以说一直以欧洲或欧美为中心。而跨越东西方语言、文学和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 从被怀疑、受排斥到逐渐为国际学界接受, 则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东西方比较仍然面临困难和挑战, 但同时也充满了发展的机遇。如何打破东西方文化的不平衡, 使东西方比较研究成为比较文学在新时代发展的趋势, 是文学研究者应该努力去完成的任务。

关键词: 比较文学 东西方比较 文化差异 文学翻译 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037-10

作者单位: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 999077

Title: East-West Studies: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Abstract: Established as a discipline in the human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mained largely Euro- or Euro-American-centered from its start until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contrast, after years of doubt and rejection, it has taken East-West studies—which operates across differences in languages,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a long and difficult time to establish itself in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mmunity. In our time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the world order is changing in fundamental ways; East-West studies faces not only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but also chance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Now the task of comparatists and literary scholars is to redress the imbalance of power and make East-West studies the new direction for further growth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Key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West studies, cultural difference, literary translation, world literature

Author: Longxi Zhang, Professor,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19世纪是科学发展的时代,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对全部学术的发展影响极大。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刺激之下,出现了比较不同物种的新兴学科,以追踪物种进化发展的轨迹,如比较动物学、比较解剖学等。这种学术影响也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于是有了比较文学在19世纪欧洲的兴起。比较本来是认识事物最基本的方法,《老子》第二章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说明不同事物相反相成,我们在比较中才形成有关各种事物的概念,这是普遍情形。所以比较是我们认识世界所必需的,而非可有可无,任由我们来选择决定。所以我曾经套用莎士比亚的名句说,“与生存还是毁灭不同,比较还是不比较,那并不是一个问题。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从本体的意义上说来,我们不能不做比较,而且我们随时都在比较,也由此才可能区分、识别、理解、做出判断和决定,并依据我们的决定来行动”(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 11)。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并非把不同作品放在一起,简单地比较,而是从一开始就界定为比较起码属于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作品,而且必须从原文去把握研究对象,不能依靠翻译。1877年1月出版了世界上第一份比较文学刊物,题为《世界比较文学学刊》(*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其主编梅泽尔(Hugo von Meltzl)出生在奥匈帝国时代的匈牙利,以德语为母语,同时也精通其他许多欧洲国家语言。能够掌握多种语言在欧洲学者当中虽然不能说十分普遍,却也不是特别罕见。梅泽尔任刊物主编时就提出,比较学者应该掌握10种语言,包括德、英、法、西班牙、荷兰、匈牙利、瑞典、冰岛、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家的语言,此外还有拉丁语。这固然在语言上要求严格,在学术上也十分严谨,但这十余种语言都是欧洲语言,所以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以欧洲为中心。加之19世纪到20世纪初,正是西方列强向外扩张的时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西方人认为自己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视非西方为落后,甚至野蛮,这种心态也反映在学术研究之中。例如,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他在著作中往往贬低东方,而总是以欧洲,而且主要以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为一切发展的终极目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在文学研究中同样有很大影响,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比较文学基本上是以欧洲为中心,甚至可以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在早期的比较文学中,就不大可能承认东西方比较研究有任何价值,甚至认为这种比较没有任何可能。著名的比较学者纪廉(Claudio Guillén)说,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写《比较文学的挑战》时,“对超越民族范畴而没有直接联系的比较,许多学者都相当反感,而极少有热忱的态度”(85)。所以东西方比较研究从被否认、被排斥到逐渐为国际学界所接受,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历程。

在20世纪中,已经有一些眼光远大的比较学者对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主义表示不满。法国学者艾田浦(René Etiemble)在20世纪70年代就说,梅泽尔提出那10种语言的比较文学仅仅局限在欧洲,早就该抛弃了,因为在欧洲之外,中国、日本、印度、波斯和阿拉伯文学产生许多古代经典的时候,“这十种语言的文学大部分还不存在,或者尚处于十分幼稚的阶段”(19)。美国学者迈纳(E. Miner)在《比较诗学》一书中指出,“只从一种文化传统来思考诗学问题,就只是考察单一的一种思想世界,无论这思想世界有多么复杂、细致而丰富。考虑其他种类的

诗学就必然会去探究各种文学思想全部的范畴、全部的观念和构想”(7)。纪廉一直注重东西方比较研究,认为这不是19世纪重视实际联系的实证主义式的比较,而是以思想观念和文学主题之理论关联为基础的比较,所以东西方研究代表了“比较文学最具前景的趋势”(87)。不过,东西方比较在20世纪80甚至90年代仍然远远没有被普遍接受。大致说来,比较文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直到20世纪最后10年,可以说都一直是西方为主导的学术。

笔者多年来一直从事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思考东西方比较研究领域的知识形成,时常想起三十多年前一个颇有意味的亲身经历。那时我在美国教一门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那是为专修文学的学生设计的课程。我让学生们读柏拉图哲学书简第七封信,在那封信里,柏拉图说任何事物都可以分为五个范畴,并以“圆圈”为例,说“圆圈”可以是一个名字、一种描述、一个形象、一个概念,也可以是一个纯粹的理念,而在这五个范畴中,只有最后一个,即理念,才是“认知的真正对象,即真的现实”(Hamilton and Cairns 1589)。不过我让学生读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认识柏拉图对语言的否定,尤其是否定书写文字。柏拉图说:“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那么大胆,把自己以理性思考过的东西述诸语言,尤其不能表述在不能变动的形式里,也就是用书写的象征符号来表述的形式。”(1590)

除了柏拉图哲学书简之外,我又让学生们读《庄子·天道》的一段故事,其中庄子也以“圆圈”为例(更确切地说是以圆的轮子为例),论述语言不足以达意。庄子说:“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庄子把事物表面的形色名声区别于事物之本质,即实情,并抱怨世人没有分辨能力,不能把握事物之本质。庄子并没有把事物分为不同范畴来分析,却接下去讲了一个关于工匠轮扁的故事。“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轮扁放下造轮的工具,走过去问桓公,“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桓公答道,“圣人之言也。”轮扁又问:“圣人在乎?”桓公回答:“已死矣。”于是轮扁说:“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听了这句话,老大的不高兴,就说:“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于是轮扁回答说:“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庄子用轮扁与桓公对答这个生动又具有讽寓意义的故事,说明语言,尤其是书写文字,都无法传达真义,因为事物的本质不可言传,不同于可见可闻的形色名声。这是道家对语言的基本看法,亦即《老子》开篇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钱钟书《管锥编》评论老子开篇此句,就引用了上面提到柏拉图哲学书简中那句话,并且评论说:“几可以译注《老子》也”(641)。

柏拉图的书简先区别范畴,再分析推理,采用的论说方式是我那些美国学生们所熟悉的。庄子的文章讲一个故事,有生动的对话,虽然通过解释,其含义不难被我的学生们理解,但作为一种论述,对他们说来却颇为新奇。庄子论说的方式与柏拉图论述的方式确实非常不同,于是有个学生真的感到困惑,就问我说:“按你的意思,这也是哲学吗?”我认为这个问题就集中

表现了东西方比较研究面临的挑战，同时也表现了东西方研究提供的机遇和潜在的价值。这也当然是我有意要让学生提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庄子那个讽寓故事要说的是语言不能达意，那也是柏拉图第七封哲学书简所说的意思。于是我那个学生提的问题与其说质疑庄子的文本是否是哲学，毋宁说是在质疑我们通常所谓哲学，也就是通常被称为哲学的那种论述方式。

不过且让我们认真对待那个学生的问题，仔细看看柏拉图和庄子之间有什么不同，柏拉图那个抽象的纯粹理念，与庄子关于斫轮“有数存焉于其间”那个故事，究竟有什么两样。从哲学概念说来，这好像是柏拉图所谓理性的“知识”（episteme）和实际的“技能”（techne）之间的区别。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四部仔细区分过两者，认为管理一个城邦的“知识”绝不同于这城邦可能掌握的任何“技能”，而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木匠的技术。他说：“一个城市不能因为最能生产精致的木制用品，就可以称为有智慧”（Hamilton and Cairns 668）。但他提到的各门技术——木工、修建、冶炼和农耕——也都可以称为各有其用途的“知识”和“学问”。在《政治家》一篇中，柏拉图将“治国的艺术”相比为医生的实际技能和知识，认为医生的医术乃是“超然于利害之上的认知能力”，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医术的权威以及其他任何真正权威的明确标记”（1062）。由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在柏拉图看来，实际的技术和技巧（techne）只在一个有限范围内有实用功能，而治国的知识（episteme）则以整个城邦为视野；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局部和全体的差别，但却不能将之误认为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柏拉图所说的“技术”和“知识”，在某些现代解释当中，往往形成简单的对立，其实这两者之间却有更为复杂的辩证关系。

把柏拉图和庄子视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的代表，一方面是希腊人的抽象，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的具体，那也是一种误解。如果柏拉图讨论各种实用技术是要最终引向对理论认识的理解，庄子所讲那个轮扁的讽寓也同样是要说明一个哲学的命题，那也正是柏拉图在第七封哲学书简里提出的命题，即语言不足以表达真义和实情。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提出过很多抽象概念，老庄所谓道就很抽象，无形，无名且不可名，《老子》第二十五章所谓“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就是这个意思。“阴阳”的观念、道家所谓“无”和佛家所谓“空”，也都很抽象，《周易》的卦象更是一些神秘的抽象符号，意蕴丰富，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庄子所讲的故事可能很具体，但其意向所指却是抽象的。在比较了柏拉图的哲学书简和庄子的寓言之后，我那些美国学生们应该会改变他们曾经抱有的关于哲学论述方式的观念，他们的理解应该变得更加灵活，他们的知识也应该变得更为丰富。我认为这样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再加以比较，就是知识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德国人所谓的教育或教养（Bildung）的过程。通过质疑我们一般关于哲学、诗或文学的种种概念，我们可以打破那些不假思索就普遍接受的普通观念，使我们的视野更广阔，思想更开放，更能接受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形式或概念，而这些形式和概念虽各自独立，却又有相通之处，可以做有意义的比较。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都必然有一定的思想局限和狭隘观念，通过比较，我们就可以学会超越这些局限和狭隘观念，获得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眼光，更能够认识和欣赏人类思想和创造力之丰富多样。在我看来，这就是比较研究的价值所在，是跨文化阅读可以产生的效果。

阅读和我们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极不相同的文本，从来都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令人振奋的经验，甚至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头脑和心灵，使我们变得更丰富，更有教养，而且至少在潜在的可能性上说来，使我们更具有同情理解他人的能力，也就是在伦理的意义上变得更好。哲学家阿皮亚（Appiah）认为，“绝不能因为忠于自己的社群，就忘记了作为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所有别的人负有责任”，这一原则就是世界主义的核心观念（xvi）。跨文学、跨文化的阅读，正是培养这种道德责任感一个极好的方式。为了说明这一道德原则，阿皮亚提到辛格尔（Peter Singer）曾用一个假想的情景提出的“著名类比”：“如果我正走过一个水并不很深的池塘，看见有个小孩子淹在水里了，我就应该涉水过去，把那个小孩拖出水来。”辛格尔写道。“这就意味着会把我的衣服弄脏，但这可以说微不足道，而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肯定，一个孩子的死却是很坏的事情”（转引自Appiah 158）。这段话很有意思，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西方的哲学家也用一个微型故事来论证一个哲学道理，这和庄子用轮扁的故事来讲他的道理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对我那个学生说来，这段话就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西方讲故事或类比也可以是哲学论证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柏拉图自己在他的主要著作《理想国》里，也曾经有著名的洞穴之寓言（Hamilton and Cairns 747）。不过辛格尔的微型故事之所以有意思，还有另一层原因。阿皮亚对他所谓“辛格尔原则”颇有些质疑，他的一个问题是：“认定我们应该去救一个落水的孩子，这本身并没有说出我们为什么应该这样做。”（161）也真算是一种奇特的机缘巧合，辛格尔提出的类比几乎是重复中国古人孟子在论证人性善时说过的话。孟子曾经提过一个相同的类比，而且好像早已预料到了阿皮亚那个为什么的问题。《孟子·公孙丑上》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与辛格尔在时间上相隔两千多年，他们的文本在地理和文化上都距离遥远，却又都用即将落水的孺子这一意象，来论证人之自然本能和道德行为，两者之间的确有令人惊讶之相似。东西方文本虽然很不相同，却又相通之处，像这样出人意料的类似，再加上文本的证据，使我们认识到尽管有文化、历史、政治和其他诸多方面的差异，人类还是有更多共同点，更多可以共享之处，这也就构成了东西方比较研究的内容。看见东西方思想和哲学这类相似之处，也使我们对于什么是哲学，哲学论述可以有怎样不同的表述方式，能够有更广泛的理解，更开放的头脑和观念。换言之，我们对共同的人性有了更多同情和理解，同时也可以欣赏人类的差异和多元。

然而在当代西方大部分学术研究中，强调差异远远多于注重相同，所以共同共享的人性这个概念，大多数学者几乎都避而不谈，甚至弃之如敝屣。对所有的比较学者而言，比较的基础是什么，从来就是一个避不开的问题，而对于东西方比较文学而言，这个问题变得尤为迫切。当我们越过东西方的阻隔，把很不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的文本、概念和表现方式放在一起比较时，就有更多的人表示怀疑。的确，柏拉图和庄子可以相比吗？孟子那个“孺子将入于井”的类比，与辛格尔现代伦理学的论述真有可比之处吗？西方很多学者认为，强调差异，尊重他者

不同的观念习俗，就意味着多元文化的开放和包容，在道德上值得嘉许。然而差异或类同本身并没有正面或负面的意义，强调文化差异并不必然等同于尊重他人的文化价值或生活习俗。我们不要忘记，种族主义者对他者的歧视，也正是以强调族群、习俗和文化的差异为基础。过分强调差异，结果很可能不是多元文化的开放包容，而恰恰变成高墙林立，彼此隔离，完全否定了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就东西方比较而言，一个重要任务正在于建立起东西文化之间的可比性和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打破东西文化的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表现在各个方面。就文学研究而言，西方文学的经典著作流通世界，广为人知，但东方文学的经典则很少在其本国和本文化的范围之外获得国际的声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受过一般教育的大学生都会知道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到歌德、雨果、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和诗人的名字，也会知道从乔伊斯、卡夫卡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到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的名字，但一般欧美的大学生却很少听说过中国的大诗人李白、杜甫、苏东坡或陶渊明。这种文化知识或文化资本的不平衡，当然与东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力量的不平衡相关，但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格局的逐渐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复兴，已经到了打破这种不平衡状态、改变这种文化资本分配悬殊的时候了。

目前世界文学的兴起为我们打破东西方文化的不平衡状态，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方面，西方学界早已达成了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共识，对非西方文学和文化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另一方面，全球化、互联网和电子通讯技术飞速发展，使跨越国界的交往变得越来越便利，使今日世界具有以往不可想象的相互关联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世界文学不仅使我们回归对已经成为世界上广泛流通的西方文学经典的阅读和研究，而且为中国文学和其他非西方文学的经典走出自己文化传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经典，创造了最好的机遇。我曾经在一篇促进世界文学研究的文章里说：“世界各国的文学研究者们把他们最了解的文学经典介绍出去，超越这些经典所属民族文化的范围，呈现给全世界，在我看来，这就是全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者的任务。”（“Canon and World Literature” 122）世界文学不能也不可能是世界图书市场上流通的畅销书，也不能只是西方文学的经典，而应该是世界各个文学传统之经典作品的集合。要完成这个任务，优质的文学翻译就变得十分重要。这就是说，要把各国的文学经典，尤其是非西方文学的经典，介绍给本民族文化范围之外的读者，就需要把这些经典作品翻译成世界上最广泛流通使用的语言，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国际上最普遍流通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是英语。在这一点上，西方学界强调文化差异又成为一个障碍。西方学界的翻译研究对翻译往往抱着怀疑态度，并强烈反对英语的所谓“霸权”。在翻译研究中颇有影响的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就认为，把任何作品，尤其是非西方的作品，翻译成英语，就必然会歪曲作品原文的“异质性”，而把它归顺，也就是将其控制起来。韦努蒂认为翻译在本质上必然就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而顺畅可读的译文必然会掩盖了对原文的歪曲。韦努蒂说：“好的翻译会打破这种神秘感，会在译文的语言里，展露出那个外文文本的外国性质。”（11）于是翻译研究突出的是译文要保留外国文本的异质性，读起来要像外文，而流畅性和可读性反而成为怀疑和评判的对象。可是被翻译

的外国原文在其本民族语言文化的环境里，并没有什么“外国性”或“异质性”，翻译研究强调的这种外国和异质的性质，都是站在西方人立场得出的概念。这一点在韦努蒂等人的翻译理论中，好像从未得到认真讨论和思考。这种理论从概念出发，要求译文读来像外文，也就推翻了翻译本来应有的沟通不同语言文化之目的。难怪这样的翻译理论，很难付诸翻译的实践，只能成为学院里的理论空谈。

在文学研究中，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这个概念得到广泛讨论，也相当流行。阿普特尔（Emily Apter）《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之政治意义》一书，就是以哲学和神秘主义之不可言说为模式申述这个概念的一本近著。她在书中提到，“维特根斯坦所谓无意义的话，加上《逻辑哲学论》里一套不可言说（das Unsagbare）和不可表述（das Unausprechliche）的词语……在其中神秘主义和玄学的无意义话语占据了统治地位”（10）。她还提到“关于禁止神圣经文俗语化的立法或在历史上颁布过的禁令”（12）。于是阿普特尔所谓不可译者，首先是一个哲学上不可解决的难题，一个概念上的困境，然后又是一个宗教上的观念，是神圣之静默，是神秘宗对一切语言和交往之否定，是不可言说、不可表述的逻各斯或道。在某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又回到柏拉图的哲学书简和庄子关于轮扁的讽寓，但我在别处曾经说过，“神秘宗的静默，无论是宗教的还是语言方面的，其实都会产生一种压抑不住的必须言说的强烈欲望（*Tao and Logos* 47）”，于是一切神秘主义者都会落入一种“反讽的模式”（ironic pattern），因为他们一方面否定语言及言说之用，但另一方面却不是说得更少，而恰恰是说得更多，同时又宣称他们保持了不可言说之神圣的静默。既否定语言，又尽力使用语言，这就是我所谓“反讽的模式”。“甚至最内在的经验也不可能逃脱想要表述的冲动（Buber 7）”，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也这样描述神秘主义者的矛盾，“因为道在他心中燃烧”（9）。这种在心中燃烧的欲望，在文学中就找到了最有力的表现，所以T. S. 爱略特说，诗乃是“对不可言说的袭击”（a raid on the inarticulate）（128）。沉默恰好可以变成刺激诗的灵感，正如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用极美妙的语言所表述的那样：“沉默。谁保持住内在的沉默，/便触到了语言之根。”（58）但所有这些精妙的表述，都并非不可译，因为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对语言的否定本身也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而否定语言的“神圣的静默”，也常常在许多神秘主义者的著作中激发出各式各样修辞手法辉煌的展示，使神秘宗的文章反而极具文学性和诗意。庄子之书就是一个最出色的例子，《庄子·天下》篇描述其文章风格，说他“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倦”，又“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故“其书虽瑰玮，而连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庄子》的确是一部用诗的语言讲深刻道理的奇书，不仅有哲人的洞见，也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这类著作当然都很难翻译，但也绝不是不可译，也就是说，并非不能够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不能够为原来那种语言文化环境之外的读者理解和欣赏。

但是，这不可译性的概念一旦应用于东西方比较研究的实践当中，成为一种教条，往往就变得十分愚蠢，令人生厌。很多年以前，我就亲身领教过。那时我把一本书的书稿交给某大学出版社，那还是出版社一位编辑主动向我约稿，他们按照惯例请了一位评审，而这位评审人对

我书中几处引用中文著作的翻译，就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这位先生首先申明，他并不懂中文，然而难以置信的是，他竟接下去质疑我翻译的中文，原因并不是我的译文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却恰恰是我的英文译文读来十分顺畅。这位评审人预先设定，中文作为一种东方语言，应该与英语完全不同，基本上是不可译的，所以我顺畅的英文译文必定掩盖了异国语文那强烈的异质性，忽略了原文中必定有的缝隙和自相矛盾之处，也就妨碍了对原文作解构式的阅读。那位评审的意见不仅死板教条，在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有意无意之间还暴露出其实是种族主义的偏见，因为没有一个西方学者可以在不具备必要的语言条件的情形下，就去评论法文或德文的翻译，而这位先生虽然不懂中文，却自以为完全有资格评论中文翻译。这不是对东方语言的歧视，又还能是什么呢？在那位评审人眼里，中文大概像神秘的象形文字，是一种异国语言的异样符号，完全不可解，不可说，不可表达。可是这位评审人的意见在出版社却又很有分量，我也不得不撤回书稿，后来把书交由另一个出版社出版。说到底，不可译性不仅挑战东西方比较研究，而且根本否认了人类可以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可能。

三十多年前，纪廉曾说，做东西方比较研究的人“大概是比较文学领域里最大胆的学者，从理论的观点看来，尤其如此”（16）。他这句话说得当然很对，他们的是最大胆的学者，因为东西方比较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区域，傻瓜才会急匆匆地跑进去，不仅受到专攻东方文学或专攻西方文学两方面专家的挑战，而且也被不愿意离开欧洲或欧美文学的西方比较学者们质疑，这些比较学者们懂几种欧洲语言，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做比较的工作，不愿离开他们较能适应的安全地带，而对他们自己不熟悉的跨东西方语言文化差异的比较，就总是怀疑或者轻视，甚至排斥。如果说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要求不是懂一种，而起码要懂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学传统，那么东西方比较则要求懂范围广大得多、很不相同的语言和文学传统。这是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我每次走进这个领域都深深感到，自己不懂的东西远远比自己懂的要多得多。《庄子·养生主》开头就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句话确实有道理，可以随时提醒我们，要以谦卑恭敬的态度去做学问，知道自己的无知。然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艾田浦就已经呼吁西方的比较学者们要打破欧洲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去学习“梵文、中文、泰米尔文、日文、孟加拉文、伊朗文、阿拉伯文或马拉蒂文的文学”（19）。虽然这近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艾田浦却极力呼吁西方的学者们去做那“不可能的事情”（34）。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纪廉非常鼓励东西方比较研究，认为那代表了“比较文学最具前景的趋势”（87）。东西方研究的确很有发展前景，如果我们愿意走进这个无限广阔的“领域”，就有可能做出新的发现，获得新的洞见。

《史记·太史公自序》曾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让我简略讨论一个属于最老派的比较文学的问题来作为具体例证，即讨论不同文本或来源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问题。据波提海默（Ruth B. Bottigheimer）考证，灰姑娘的故事“大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童话”（87）。早期研究童话的学者都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童话来自于民间，由一些无名氏创造，并以口述的方式传播。但近代的学者们研究书籍出版的历史后，就能够以更切实可靠的方法

式，追溯童话故事流传的过程。波提海默说：“现在出版史提供证据，就为一种新的童话史建立起了开头，也勾勒出了基本的轮廓。”（23-24）据学者们研究，19世纪早期在德国城市卡塞尔出版了许多法文书和由法文翻译成德文的书，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灰姑娘和其他一些由格林兄弟（die Brüder Grimm）讲出来的著名童话，“其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法国，而不是所谓民间（völkisch）”（51）。在17世纪晚期的法国文学中，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通过改编意大利人绛巴蒂斯塔·巴西勒（Giambattista Basile）一个更早、更具闹剧式的故事，创作出了这个童话在近世非常著名的版本。波提海默研究了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版本之间的关联，最后宣称说，灰姑娘童话“最早出现在巴西勒的集子里”（87）。

就欧洲文献资料而言，这当然毫无问题，但是把这个童话放在东西方研究更广阔的视野里来看，我们会发现灰姑娘的故事还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在中国唐代段成式（803？—863）的《酉阳杂俎》里，已经有这个童话的基本成分：一个美丽的少女受后母虐待；后来有机会“衣翠纺上衣，蹑金履”去参加“洞节”集会，而这双金履“其轻如毛，履石无声”；她在集会上被后母及其生女认出来，“遽反，遂遗一只履为洞人所得”；后来国王下令到处搜求，终于找到了刚好能穿上此履的少女，于是她重新“衣翠纺衣，蹑履而进，色若天人也”（段成式 713-14）。早在1947年，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和翻译家韦利（Arthur Waley）就已把这个中国灰姑娘的故事介绍到西方学界；他认为这个故事很可能来源于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他认为这故事主角的名字叶限“看来完全不像一个中国女孩子的名字”（230）。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也认为，“这篇故事显然就是西方的扫灰娘（Cinderella）故事”（66）。《酉阳杂俎》里这个少女的名字叫叶限，杨宪益认为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文的 Aescen，梵文的 Asan”（66）的译音，这“一字的意思是‘灰’，就是英文的 Ashes”（66）。英文版本的灰姑娘故事大多依据法文，而在英文故事里，灰姑娘穿的是一双玻璃的鞋。杨宪益觉得这可能是误译，“因为法文本里是毛制的鞋（Vair），英译者误认为琉璃（Verre）之故。中文本虽说是金履，然而又说‘其轻如毛，履石无声’，大概原来还是毛制的”（66）。世界上这个最广为人知的灰姑娘故事，怎么会出现在9世纪中国唐代的一本书里？试想这故事在古代世界的流传，其间不知要经历多少曲折艰险，有多少鲁鱼亥豕之误的可能，真不能不让人惊异，也不能不令人神往。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段成式的中文本怎么会比佩罗的法文本（1697）或格林兄弟的德文本（1812）早出将近一千年，而且《酉阳杂俎》的故事本来就来自西域，可能是印度或相当于现代的中东地区。令人惊讶的是早在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之前，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早已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关联交往，这种跨文化交流和传播在时间上和规模上，都远远超出我们一般的想象。

真所谓学无止境。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联系更紧密的“地球村”里，西方的学者和学生现在对非西方世界及其文学和文化，也有更多了解的兴趣，所以对东西方比较研究说来，我们有了比以往要好得多的环境。但与此同时，今日世界也充满了冲突和局部的战争、人道主义危机、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和移民、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灾难，而这些痛苦和灾难大多是由于我们的世界缺乏宽容和理解，尤其是缺乏不同文化、

历史和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所以认真说来,东西方比较研究不仅仅是学院里一种知识的追求,而且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和我们如何生活,都有实际的意义。我有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当我们的世界更注重超越东西方根本差异的跨文化理解的价值之时,我们也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不仅仅在理解上更好,而且是在各种意义上都更美好的世界。

(此文依据作者在芝加哥大学新出版的刊物 *KNOW: A Journal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改写而成,英文原文发表在 2017 年春季号,但此中文稿改动较多,与英文稿颇有不同。)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Appiah, Kwame Anthony.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W. W. Norton, 2006.
- Apter, Emily.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Verso, 2013.
- Bottigheimer, Ruth B. *Fairy Tales: A New Histo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9.
- Buber, Martin. *Ecstatic Confessions*. Translated by Esther Cameron. Harper & Row, 1985.
- Duan, Chengshi. *Youyang Miscellany*, edited by Zhongfu Cao.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2012. [段成式:《酉阳杂俎》,曹中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Eliot, T. S.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1909—1950*.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
- Etiemble, René. “Faut-il réviser la notion de Weltliteratur?” *Essais de littérature (vraiment) générale*, edited by René Etiemble, Gallimard, 1974, pp. 15-36.
- Guillén, Claudio.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Cola Franzen. Harvard UP, 1993.
- Hamilton, Edith, and Huntington Cairns, editors. *Plato,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Including the Letters*. Princeton UP, 1961.
- Miner, Earl.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UP, 1990.
- Qian, Zhongshu. *Guan Zhui Bian* (Vol. 2).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北京:三联书店,2007。]
- Rilke, Rainer Maria. “Für Frau Fanette Clavel.” *Sämtliche Werke* (12 vols.), edited by Ernst Zinn, Rilke Archive, 1976, p. 58.
- Singer, Peter. “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 no. 3, 1972, pp. 229-43.
-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Routledge, 1998.
- Waley, Arthur. “The Chinese Cinderella Story.” *Folklore*, vol. 58, no. 1, 1947, pp. 226-38.
- Yang, Xianyi.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2006. [杨宪益:《译余偶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 Zhang, Longxi. *The 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Duke UP, 1992.
- . “Crossroads, Distant Killing, and Translation: On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Comparison,” *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 edited by Longxi Zha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5, pp. 11-29.
- . “Canon and World Literature.” *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 vol. 1, no. 1, 2016, pp. 119-27.

◇责任编辑:陈忠平

中英文学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

◎ 王宁

内容提要: 在世界文学史上, 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分别代表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传统中最优秀的文学。由于英语在全世界文化和人文学术交流中的强势地位, 英国文学也是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国别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学科领域。但是不难发现, 中国读者对英国文学的了解要大大多于英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英国文学史上所有重要的作家, 甚至不少二流作家的作品都有中文译本, 而相比之下, 一些一流的古今中国文学作品却没有完整的英译本。在实施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战略时应将重点转向这方面的译介和传播, 以改变这种相对单向度的文学交流。

关键词: 中国文学 英国文学 翻译研究 中英文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047-11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4

Title: Sino-British Literary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Chinese and British literatures each represent the best literatur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s. Due to the hegemonic position of English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nd humanities exchange, British litera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China'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But in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British literatures, we find that Chinese readers know much more about British literature than British readers know about Chinese literature. All the important authors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ture, even quite a few second-class authors, have their works available in Chinese. In contrast, some of the first-class Chinese literary works have not yet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their complete form. In carrying out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world, we should focus on this aspect so as to change the present one-directional literary exchange.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British literature, translation research, Sino-British literary relations

Author: Ning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分别代表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传统中最优秀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此外，英语和汉语也是世界上人们使用最多的两种语言。由于英语在全世界文化和人文学术交流中的强势地位，英国文学也是我国外国文学学科国别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学科领域。在这一学科领域中，萃集了一大批国内一流并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文学研究者，他们出版了大量的批评和研究性著作。中国文学的源头一般追溯到《诗经》的时代，而英国文学的源头一般则被文学史家们追溯到民族史诗《贝奥武甫》，今天的中英文学研究者在讨论各自的文学时，一般都会提及这两大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在实际的翻译和比较研究中，我们却不难发现，中国读者对英国文学的了解要大大多于英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本文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就中英文学关系的历史及现状做出描述，并对二者的关系在未来的发展做出展望。

一、英国文学的中国之旅：以莎士比亚为例

一般认为，英国文学的汉译和在中国的介绍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后。根据现已出版的资料确证，早在1853年英国传教士宾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就与中国译者合作将班扬的《天路历程》译成中文，该书销路很好，并印刷了多次。但是英国文学在中国大规模的译介迟至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才开始。在当时大规模翻译西学的运动中，不懂外语的林纾在多位口译者的帮助下曾译出156部西方文学作品，其中英国文学作品就达93部之多。这些译著以小说为主，其中包括狄更斯和毛姆以及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谈到英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我们更是无法绕过莎士比亚这座文学的丰碑。作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莎士比亚在中国是被研究和讨论最多的西方作家之一，其作品也是被翻译和重译最多的。莎士比亚的中国之旅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与英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几乎同时开始，但直到20世纪初以来，莎士比亚才开始对中国的戏剧创作和研究真正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显然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形势有关系。

19世纪中叶，莎士比亚的名字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而被引进，但莎士比亚剧作的改编和演出则迟至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才开始，而且起初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其后，中国思想家严复于1894年、1897年，梁启超于1902年，鲁迅于1907年都在其译作中简略提及莎士比亚，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那时，不仅是普通的人们，甚至是那些跻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精英也大多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有点远离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莎士比亚表现出了冷落的态度。广大读者和观众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了解，最初始于阅读兰姆的《莎士比亚乐府》，但却很少去观赏他的戏剧演出。因此可以说，中国学者直至20世纪初才开始翻译和改编莎剧。正是由于莎剧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距离，中国知识分子所需要引进的是一个能够直接帮助改变旧中国社会现状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样，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便成了他们首选的对象，而且很快就成了中国知识精

英在艺术和政治上的偶像。确实，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易卜生那里获得的启示大大多于从莎士比亚那里获得的启示和教益^[1]，尤其是易卜生的那些社会问题剧更是在广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甚至还帮助催生了中国现代话剧。今天我们在讨论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时，可以不提莎士比亚，但却无法绕过易卜生（王宁，《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8-15；《“被译介”和“被建构”的易卜生》50-59）。当时中国的进步刊物《新青年》甚至于1918年（第4卷第6期）推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相比之下，莎士比亚则未能享受到这一殊荣，而且还受到了有意的“边缘化”待遇。中国虽然有着庞大的莎学研究队伍，但是他们大多封闭在大学校园里，并未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文学和文化变革。另一方面，中国的莎学研究也很不全面，研究者们往往更多地关注和讨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和四大喜剧，而很少关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更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中能够在国际莎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真正能够与国际莎学界直接交流和平等对话者竟然寥寥无几。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不少优秀的翻译家为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朱生豪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抗战期间仍坚持翻译莎剧，但终因疲劳过度而英年早逝，从而成为一位战时的“悲剧性人物”（Lu 521）。梁实秋则独自一人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为后人留下了精准典雅的译文。另一些杰出的翻译家和评论家，如卞之琳、杨周翰、方平、许渊冲也不断地翻译或重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从而使得莎士比亚作品的中译达到了外国文学中译的最高水平。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观众发现，莎士比亚除了在悲剧和喜剧创作上成就斐然外，他的历史剧也写得极为出色，并且对中国当代戏剧和影视创作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影响^[2]。

如前所述，与西方的莎学研究相比，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确实不够全面。但具有悖论意义的恰恰在于，在今天的中国电视荧屏上，我们却很容易看到许多胡编乱造的历史剧，这些历史剧往往用一种后现代“戏仿”的手法来再现历史，大多是描写历史上真实的王公贵族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例如唐朝皇帝李世民，三国时代的魏王曹操，清朝的雍正、康熙、乾隆及宣统皇帝，以及武则天和慈禧这样的女皇或皇太后等。这些电视剧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电视观众，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和广告利润，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影视明星。由于我本人同时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我偶尔也被邀请参加讨论这些剧作，但我时常提请这些编导们去阅读一下莎士比亚的剧作，或观赏莎剧的演出，尤其是那些有着厚重历史意识的悲剧和喜剧，乃至他的历史剧。我发现，这些编导们虽然不一定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大都知道他的主要作品及人物的名字，因此他们也许会从莎剧中获得一些灵感或间接的启迪。但是他们并没有认真研读过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更谈不上把握马克思所描述的“莎士比亚化”的美学原则之真谛了。

虽然我们很难说中国作家会通过观摩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才得到他的启示，但是至少我们无法否认，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知识生活中，并且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即使一些有着后现代意识的青年作家试图戏仿莎士比亚，但至少也说明

莎士比亚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要有所突破和超越，就必须从批判莎士比亚开始。此外，这也说明今天的作家很难全然摆脱莎士比亚的巨大阴影，因而陷入了无尽的“影响的焦虑”。例如，中国作家可以很容易地读到介绍莎士比亚生平及其创作的普及读物或期刊论文，从他对历史的审美式和寓言式书写中获得某种启迪。同样，他的剧作也不时地在中国的语境下被一些有着精英意识或先锋意识的编导们改编并在舞台上演出，虽然观众的数量并不很大，但文化层次却很高。这就说明，即使在当今这个商业大潮占主导地位的浮躁的时代，莎士比亚仍然没有被人遗忘，他的作品仍然以不同的形式丰富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培育着新一代青年的审美趣味和情操。尤其是在纪念他逝世400周年的日子里，中国再度出现了一个“莎士比亚热”，他的一些悲剧和喜剧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但是他的历史剧却未能吸引众多人们的关注，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也不多见，其原因可能是剧中发生的事情确实距离当下太遥远了，连剧中人物的名字都很难记住。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要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需要莎士比亚这样一位西方的经典作家给我们的文学和戏剧创作以启示。

今天的青年人也许更熟悉《恋爱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Love*)及其影片中的人物，但却很少了解《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及其剧中的人物，更不用说诸如《理查三世》和《亨利六世》这类历史剧了。他们也许更崇尚短暂的“闪婚”，而不去追求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永恒的爱情，这确实令人悲哀。但是我要强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像《恋爱中的莎士比亚》这类轰动一时的后现代影视作品也将被另一些更具有后现代性和实验性的作品所取代，而莎士比亚最优秀的作品则永葆其艺术魅力，将永载世界文学和戏剧经典的宝库，不断地影响和启迪一代又一代的戏剧爱好者去将其改编和上演。

人们也许会问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既然生活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而且有着多种文化艺术娱乐方面的选择，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莎士比亚并观赏他的戏剧呢？莎士比亚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读者和观众有何意义呢？毫无疑问，既然观赏他的戏剧是一种极高的审美愉悦和享受，那么我们就应该珍视他的艺术成就以及在当下的意义。在我看来，除了他的文学艺术成就外，莎士比亚作为一位历史主义者所起到的作用也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王宁，《作为历史主义者的莎士比亚》8-15）。我想就此稍作一点发挥。

首先，作为作家，尤其是作为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优秀作家，他们应该具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意识，那些只关注当下而缺乏历史意识的作家是无法成为伟大的作家的。在这方面，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以及那些以历史为题材的悲剧和喜剧对我们的启示是自不待言的。其次，作为文学批评家，我们也应该坚持“莎士比亚化”的美学原则，即意识到的内容与莎士比亚式人物刻画的完美结合。无论文学批评风尚如何嬗变，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都不会过时。尽管今天的青年人也许更欣赏“恋爱中的莎士比亚”，而忽视真正的莎士比亚经典剧作，但是真正在历史上能够留存下来的却是莎士比亚的那些经典原作。再者，我们今天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要将其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同时也要将其当作一种审美化和戏剧化的历史文献来阅读。正如美国文论家米勒（Hillis Miller）所指出的，“研究全世界的文学是理解全球化

的一种方式。这一理解使人们可成为世界公民、世界主义者，而非仅仅是某个单一语言社群的公民”（254）。同样，我也可以将其用于概括莎士比亚的意义，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今天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完全可以据此更为全面直接地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因为莎士比亚除了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外，还以艺术家的笔触创造了那段历史。

除了莎士比亚这位一流的世界文学大师外，其他主要的英国一流作家的主要作品也都被译成了中文，对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以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以狄更斯、萨克雷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以乔伊斯和伍尔夫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也有着众多的读者，他们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技巧已经渗入到了不少中国作家的创作意识中，对他们作品的译介和批评性研究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批评。五四时期几种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杂志如《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都发表了大量的英国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作品的译文以及相关评论文章。另外，《创造月刊》于1923年2月甚至推出了“雪莱纪念号”；《小说月报》也在1924年4月刊出了“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作家对英国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兴趣也相当浓厚，王尔德在中国作家中也有着众多的追捧者，他的唯美主义思想影响了不少有着现代主义倾向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周小仪、童庆生 189-195）。甚至现代英国—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在中国也有着众多的读者，尽管他的意识流小说近乎天书，但是他的代表作《尤利西斯》却有着两种印数都很大的中译本：萧乾夫妇的译本发行量超过了15万册，金隄独自翻译的译本也分别在海峡两岸发行了10万多册。由此可见，英国文学在中国是备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自己独特的经典和传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启迪作用。

二、中国文学的英伦之旅：以《红楼梦》为例

较之英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在英国的译介和接受水平要低得多，但是仍有相当一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各方努力下有了英文译本，而现当代文学作品译成英文的则不算多。翻译工作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由英国译者完成，本文主要提及的是几位汉学家做出的巨大努力，其中以霍克斯（David Hawkes）、杜德桥等牛津大学的汉学家为代表。现有的研究资料显示，中国第一部被译成英文的小说是1761年翻译出版的《好逑传》^[3]。这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的小说却打动了歌德，促使他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而18世纪以前，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却很少译成英文。后来经过一些英国汉学家的努力，中国文学和史学的一些介绍性著作也开始有了英译本，如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中国文学参考》（*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 Giles）的《古文珍选》（*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从19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这段时间，才有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了英文，包括《搜神记》、《三国演义》（前9回）等。这一时期，《红楼梦》也被介绍给了英国读者，虽然并非以全译本的形式出版，但客观上却为该书被完整地译介到英语世界奠

定了基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文学大量被译成英文的时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聊斋志异》、唐传奇、志怪小说等^[4]。相比之下,诗歌和戏剧译介到英语世界的则比较少。这里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英译以及译者霍克斯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霍克斯是英国当代最杰出的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翻译者。他曾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后长期在牛津大学担任中文教授。他酷爱中国文学,有着丰富的中文藏书。20世纪80年代,他将约4500册自己收藏的图书,捐赠给了国立威尔斯图书馆。这些图书为各类中、英、日文作品,内容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戏剧等。这些丰富的藏书为他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并研究中国文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作为一位著名的汉学家,霍克斯本人也著译甚丰。1959年,年仅36岁的霍克斯就发表了《楚辞》(*The Songs of the South*)英文版,同一年,他成为牛津大学中文系教授。他还发表了研究唐诗的著作《杜甫入门》(*A Little Primer of Tu Fu*),更具权威性且广为人知的则是他的唐诗翻译作品。在译介中国文学方面,他的最高成就是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译成英文。这部译著的巨大影响力至今在英语世界无人超越。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他为了全身心地致力于实施自己的翻译计划,毅然于1971年辞去了牛津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实际上,霍克斯早在从北京回国后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和研究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也即霍克斯准备着手翻译《红楼梦》时,他不禁吃惊地发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这部伟大的中国文学名著竟然在英语世界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英译本,有的只是漏洞百出的节译本,而且大量的翻译错误充斥其中,对此华裔汉学家吴世昌予以了严厉的批评。在吴世昌的帮助和影响下,霍克斯从一开始就本着忠实于原著的原则着手翻译《红楼梦》及其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1970年,霍克斯偶然碰到一次与企鹅出版社合作的机会,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全面启动了《红楼梦》120回的翻译工作。当时,他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全身投入到繁重的翻译工作中,要么是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翻译这部名著。霍克斯知道,他翻译《红楼梦》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因为直到那时西方世界还没有一个全本120回的英文版《红楼梦》。他经过反复考虑后最终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毅然辞去牛津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教职,以便全身心地投入《红楼梦》的翻译中。他的这一举措在当时的国际汉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因为迄今英语世界还没有哪位汉学家在年富力强时,为了翻译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而辞职回家。即使是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也是等到70岁功成名就之后才决定退休,以便专心致志地和夫人一起投入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中。

令人钦佩的是,霍克斯用了10年的时间,翻译了前80回,分别在1973、1977、1980年出版了英文版《红楼梦》分册,最后40回则由他的女婿、汉学家闵福德完成。至此,西方世界第一部全本120回的《红楼梦》诞生了,并迅速地占领了英语世界的图书市场。

毫无疑问,霍克斯的《红楼梦》英文版,至今在西方世界拥有独一无二的经典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四卷本《红楼梦》英译全本在英语世界推出以来,二十多年内还仍未出现由英

国译者翻译的新英译本。尽管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也合作翻译了《红楼梦》，但其影响和销量远远无法与霍译本相比。杨译本主要在中国国内流通，在海外只有为数不多的大学图书馆购买了该译本^[5]，而霍克斯的英译《红楼梦》则真正进入了英语世界的流通渠道，达到了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独领风骚的境地。

尽管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以及园林艺术吸引了相当一批英国人，甚至一些英国作家也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过强烈的兴趣，但西方人固有的“东方主义”观念仍然使他们对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抱有很大的偏见，正如葛桂录所中肯地指出的：

总的说来，19世纪英国浪漫作家对东方中国的印象不佳，也谈不上对中国文化的接纳。借助于鸦片、梦幻、想象力，柯勒律治在诗作残篇《忽必烈汗》里展示了神奇的异域风情，但在德·昆西那里则是一场恐怖的噩梦。德·昆西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在他眼里，中国人非常低能，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所以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且主张依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在浪漫诗人笔下，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同样是消极的。拜伦眼中的中国人是受到蔑视和嘲笑的。雪莱也把中国当做“未驯服的”“蛮族”看待的。（11）

毫不奇怪，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这些偏见是西方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更遑论中国文化和文学了。为了改变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这种被扭曲的形象，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的外文出版社组织一批译者翻译了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并一度出版了多语种《中国文学》杂志，全面地在海外推介中国文学。在国内译者和英国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现当代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也被逐步译成英文，从而使英语世界的广大读者能够通过文学的中介了解新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但是与大量英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盛况相比，中国文学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影响则要小得多（江慧敏 30-38）。有些作品虽然由中国的外文出版社组织翻译，但是由于流通渠道不畅通，许多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却仅仅为国内读者所诵读，远未进入广大英国读者的阅读视野，更谈不上对英国文学产生影响了。这无疑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但却为我们今后的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工作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比较的和世界的视野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离不开我国英国文学教研界的巨大努力。与其他国家文学在中国的研究相比，英国文学研究队伍最庞大，实力最强，取得的成果也最显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现了一批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研究英国文学的具有国际水平的著述。如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英国：从威廉·坦普尔到奥列佛·哥尔斯密斯》、《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陈

受顾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钱钟书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方重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等，这些作者从比较的视角出发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英国的传播和接受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还有一些学者则专门从事英国文学史的编写和英国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如陈嘉、刘炳善的英国文学史编撰以及陈嘉本人的莎士比亚研究，李赋宁的英语史编撰和从语言的角度对英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卞之琳对英国诗歌的翻译和研究，袁可嘉对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侯维瑞的20世纪英国小说史的编撰和研究，还有陆建德等新一代留学归来的学者对艾略特、利维斯、劳伦斯、伍尔夫等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的研究等，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下面笔者将着重评述两位已故的优秀英国文学研究者杨周翰和王佐良在译介和研究英国文学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杨周翰的比较文学研究始于英国文学研究，并有着鲜明的中国立场和视角。他曾领衔主编《欧洲文学史》，而他真正的学术实力主要体现于莎士比亚研究。当然，提到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人们很快会想到这样一批杰出的老学者：朱生豪、梁实秋、曹禺、陈嘉、孙大雨、卞之琳以及比他年轻一些的方平、陆谷孙和何其莘。但是上述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仅仅在国内有着一定的影响，而杨周翰的莎士比亚研究则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演讲以及在其基础上改写后发表于美国《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杂志上的论文《〈李尔王〉变形记》(“King Lear Metamorphosed”)，就体现了他从中国的独特视角对莎剧做出的全新阐释(Yang 256-263)。尽管中国莎学研究者们在译介莎士比亚的过程中各自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中一些学者还凭借翻译的中介再创造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然而只有杨周翰一人同时在翻译、评论和研究莎士比亚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国际性的影响，这显然得益于他的比较文学视角。他主编的两卷本《莎士比亚评论汇编》(1979)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莎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了翻译和介绍莎士比亚作品之外，杨周翰还发表了数篇分量很重的学术论文，例如《十九世纪以前的莎评》和《二十世纪莎评》。如果这两篇论文运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方法还不突出的话，其弥尔顿研究中的这一特征则趋于明显。《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一文突破了同一文化传统内的比较，达到了跨中西文学和文化比较之境地。作者并没有局限于讨论加帆车这一实物在《失乐园》中的作用和意义，而是以此作为引子，深入到了文化的深层次，所涉猎的文化传统横跨中国和西方，并且加入了一些平行研究的方法，从而具有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1985)是杨周翰从事中英文学比较研究的一部力作^[6]。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英国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和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学科知识，使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欧美学者在断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因为他的视角不同，所以基于这一视角所得出的结论也自然对英国文学同行有所启迪。在这本书中杨周翰突破了旧有研究格局，把17世纪英国文学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化背景下考察，并不时与中国文学相比较。他并不追求对此时期文学的全景式描述，而是专门探讨那些为常人所忽视的细节，并由此深入发掘出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该书的文化背景纵向上远及古希腊罗马，近至20世

纪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横向上越出英国本土，乃至欧洲的文化传统，进入与中国文化相比较的境地。因此，该书所得出的结论明显高于一般的国别文学研究，达到了某种超越的境界。此书虽未以“比较文学”为标签，但实际上却从方法论上给国内的比较文学学者以具体的启示和示范^[7]。

杨周翰生前曾多次表示，自己并没有进行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其实不然。他之所以选择研究17世纪英国文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巴洛克艺术风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巴洛克艺术主要影响造型艺术，对文学史上的大作家影响不大，但它毕竟曾在17世纪英国文学的散文风格中占据过主导地位，因而杨周翰在书中着重分析勃朗、泰勒等作家的散文，指出“泰勒是个极讲究修饰的、具有华丽的巴洛克风格的散文家”（220）。而勃朗的风格则体现在“文字形象化（逻辑思考不严密）；想象奇特而突兀，使人惊喜；行文曲折，信笔所之，很像浪漫派（他很受浪漫派的推崇）；他的文字隐晦而多义，又古色古香；他善于用事用典（这与他博学有关）；他的情调幽默、挑逗、微讽”（153）。

王佐良是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界的另一位大师级学者。他与杨周翰曾是西南联大的同学。长期以来王佐良从事英国文学教学和翻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英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者。此外，他本人也有着丰硕著述，广泛涉猎英国文学、语言文体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等多个领域，出版过《英国诗史》、《英国散文的流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合著）、《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语文体学论文集》等著作。除了对莎士比亚等作家有着精深研究之外，王佐良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翻译和研究更是独树一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和他本人的诗人气质不无关系。除此之外，他还曾将曹禺的《雷雨》译成英文，其译文质量完全可以和英语国家的母语译者相比。王佐良晚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主持编撰了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众所周知，他历来对文学史的编撰有着明确的目标，特别是由他和周珏良主编的《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是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出发重写外国文学史的一个有益尝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该卷中专门写了一章“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这应该说是中国学者从世界文学的视角来考察英国文学的首次尝试。在当时的国际比较文学界，也只有佛克马（Douwe W. Fokkema）等人发表了一些论文讨论世界文学现象，相关讨论尚未成为一个热门的前沿理论话题，而现在当红的世界文学理论家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以及莫瑞提（Franco Moretti）的著述那时都还未问世，更不用说在中国学界讨论世界文学问题了。而王佐良却以其理论的前瞻性和宏阔的比较文学视野写下了这一具有很高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专章，可以说是代表中国学界为世界文学研究做出的独特贡献，今天的我们无论对之如何估价都不为过。

四、中英文学关系的未来前景

从上述中英文学关系的历史及现状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中国文学在英国的翻译介绍与英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几乎同时开始，但是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里，后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前者却步履艰难。笔者认为，这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人印象中扭曲的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自然产生不出优秀的文化作品。我们自己也有着重大失误：在大力译介外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推介却大为滞后，也没有注意培养自己的外译人员，因而当中国经济腾飞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在国外影响有限。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要实现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不能仅仅诉诸翻译，还需要借助其他手段，如跨文化阐释，因为对那些只想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做泛泛了解的人来说，学者们撰写的阐释性著述可以起到导引作用，部分读者可能会因此产生阅读一手原著的兴趣。这就是跨文化阐释的作用，目前很多人仍未意识到这一手段的力量。另外，国外汉学家以及中国学者直接用外文撰写的研究性著述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为保证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们应该与国外的汉学界合作，共同推介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这方面，《红楼梦》的成功就足资我们参考借鉴。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使得我们在考察和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时往往会自觉地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之下，评价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时，往往也会将其与国际范围内的前辈或同时代人相比较，这样我们才能判断这位作家或作品在绝对意义上的独创性。这样看来，人们对翻译的要求就更高了。否则，我们就会像某些人那样，认为既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可以通过英语进行交流，那么翻译还有什么用？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翻译，尽管这种翻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层面的翻译，而是深层次的文化翻译。

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而且在外译中方面也堪称翻译强国。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向世界真正开放以来，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几乎把西方所有的主要学术思想和文学名著都译成了中文，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文学翻译史，甚至现代汉语也是在翻译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翻译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早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现象，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可以同时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因此确实离不开翻译，就像我们也离不开语言和文化一样。我们每天都要以不同的方式接触翻译过来的文化，这种文化已经侵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且渗透到了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霍克斯和杨宪益对中国文学英译的贡献。我认为，前者更注重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程度和理解水平，因而在其译本中加入了許多解释性的段落，虽然从语言文字的层面来追究，这种添加有失“忠实”，但从更深层的文化翻译和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它恰恰有效地把中国文学的精髓翻译到了英语世界，因此效果更为显著；后者则在一个大量翻译国外作品的年代独辟蹊径，走一条更为艰难和寂寞的道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果，这种精神也是我们今天要大力提倡的。

总之，通过本文的粗略描述，我们不难看出，中英文学关系的确存在着某种不平衡的状态：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大大胜过英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因此我们今后的比较文学和世

界文学研究应该果断地将重点放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大力弘扬中国文学及其研究上。既然英语是当今时代实际上的“通用语”，故而要走向世界就得首先走向英语世界。在把中国文学有效地翻译到英语世界进而翻译到整个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更为注重译入语的文化接受因素，这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在目的语国家的接受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原为作者在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特别活动“跨越时空的交响：中英文学对话”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后改写成本文。在此特向主办这次活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致以谢忱。)

注释 [Notes]

- [1] 参看何成洲最近发表的英文论文：“World Literature as Event: Ibsen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载2017年第54卷第54期，文中的具体数据更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 [2] 参看王柱：《新历史主义与中国的莎士比亚剧作研究》，载《文学理论前沿》2016年第16辑。
- [3] 这部由名教中人撰写于18世纪某个时期的小说率先由托马斯·波西（Thomas Percy）译成*HauKiouChooan*于1761年出版，后来才由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译成*The Fortunate Union*。
- [4] 参看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年。
- [5]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1978—1980. Translated by Xianyi Yang and Gladys Yang, 4 vols. Foreign Languag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1973—1980.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and John Minford, 5 vols. Indiana UP.
- [6] 有关《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详细评论，参阅拙作：《超越传统模式的国别文学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 [7] 参阅拙作：《外国文学研究的全新角度——读〈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载《读书》1987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Ge, Guilu. *Remote Voice from Afar: British Writers and Chinese Culture*. Ningxia People's Press, 2002. [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 Jiang, Huimin.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Novels in Great Britain.”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 6, 2014, pp. 30-38. [江慧敏：《中国小说在英国的翻译传播与影响》，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30-38页。]
- Lu, Tonglin. “Shenghao Zhu: Shakespeare Translator and a Shakespearean Tragic Hero in Wartime Chin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49, no. 4, 2012, pp. 521-36.
- Miller, Hillis J.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 *Neohelicon*, vol. 38, no. 2, 2011, pp. 251-65.
- Wang, Ning. “Ibsen as an Artist: Reflections on Ibsen and Chin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2, 2003, pp. 8-15. [王宁：《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易卜生与中国重新思考》，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8-15页。]
- . “‘Translated’ and ‘Constructed’ Ibsen: Ibsen Metamorphosed in Chin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6, 2009, pp. 50-59. [王宁：《“被译介”和“被建构”的易卜生：易卜生在中国的变形》，载《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50-59页。]
- . “Shakespeare as a Historicist: The Illuminations of His History Plays to U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6, 2016, pp. 8-15. [王宁：《作为历史主义者的莎士比亚——兼论莎士比亚历史剧对我们的启示》，载《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8-15页。]
- Yang, Zhouhan. *17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Peking UP, 1985.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 “*King Lear* Metamorphos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39, no. 3, 1987, pp. 256-63.
- Zhou, Xiaoyi, and Qingsheng Tong. “Introduction, Research and Influence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Translations*, no. 4, 2002, pp. 189-95. [周小仪、童庆生：《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及影响》，载《译林》2002年第4期，第189-195页。]

◇责任编辑：陈忠平

略论中美现代文化交融的三种模式 ——以赛珍珠、林语堂和汤亭亭为例

◎ 杨仁敬

内容提要: 文章从多元文化理论出发,深入比较了美国作家赛珍珠、旅美作家兼学者林语堂和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创作生涯,评析他们所处的文化语境、身份差异和代表作的特色等,指出他们所代表的美中文化交融的三种不同模式,这些模式涉及美国主流文化和少数族裔文化,影响了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中美现代文化 文化交融 三种模式 赛珍珠 林语堂 汤亭亭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058-08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Title: Three Patterns of Cultural Ble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Using multiculturalism,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Pearl S. Buck, Lin Yutang,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 exploring their cultural contexts, identity differences, and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y represent three patterns of cultural ble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volving the dominant culture and the minority culture. Thus, the three patterns have impacte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U.S.

Keywords: modern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ultural blending, three patterns, Pearl S. Buck, Yutang Lin, Maxine Hong Kingston

Author: Renjing Yang, Professor, English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拉近了各国间的距离,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美经贸和文化交往也不断增加。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引起中美两国作家、学者及读者的关注。从20世纪30年代寄居中国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兼学者林语堂到当代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三位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中西神话原型、文化语境、人物命运和话语特色,从而构成了其独特的艺术取向,获得了美国读者的认同和接受。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中美现代文化交融的三种模式,他们倡导的东西文化融合的理论 and 实践,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

事实上,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由来已久。鲁

迅就曾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尼采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高尔基的现实主义影响；诗人郭沫若受过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的影响；美国诗人庞德则接受了孔子、孟子的思想；散文家梭罗、戏剧家奥尼尔（Eugene O' Neill）也很喜欢孔孟哲学。欧美文化之间的影响也很明显，比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留恋英国文化，小说中多次以伦敦为背景，最后他干脆加入英国籍。海明威则钟爱西班牙文化，在《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中精心刻画了山区游击队员西班牙老猎手安塞尔莫的形象，在《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里用了许多西班牙语词汇。至于当代许多美国后现代派作家，他们深受欧洲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外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深入探讨，留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迪。

美国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多元文化时代，文化交融和文化混杂成了美国文化表述的一大特点，也构成了美国社会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一幅更加复杂的图景。诚如美国著名学者艾略特（Emory Elliott）所说：是到了该给少数族裔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作出新评价的时候了（5-6）。本文通过分析赛珍珠、林语堂和汤亭亭三位作家的不同特点，回顾他们所代表的美中文化交融的三种模式，展示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美文化交融的发展和变化，以加深对美国文学的理解，进一步增进中美文化交流。

一、赛珍珠模式

赛珍珠（Pearl S. Buck）于1892年6月26日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希尔斯巴罗（Hillsboro）。父亲赛兆祥和母亲凯丽都是来华的传教士。赛珍珠原名珍珠·赛顿斯特里克（Pearl Sydenstricker）。她在江苏镇江长大，后去上海念中学，再回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毕业后，她返回镇江，在中学任教，同时照料生病的母亲。1917年，她嫁给美国传教士、经济学家约翰·布克博士。婚后，全家随布克去皖北大学等地住了五年。后与布克回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英文，度过了十二年。课余时间，赛珍珠试着写作。她从小学会汉语，熟悉中国社会生活，也曾亲历北伐军攻占南京这一历史事件。1930年，她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东风·西风》（*East Wind: West Wind*）。

1931年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在美国出版，好评如潮，名列畅销书榜首。第二年便荣获普利策奖，1937年改编成电影，影响很大。1933年，她将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水浒传》译成英文出版，改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1934年，《母亲》（*The Mother*）问世，接着又推出了《儿子们》（*Sons*）和《分家》（*A House Divided*）两部长篇小说。它们与《大地》合成《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同年，她荣获了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豪威尔斯小说奖。1938年，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荣获该殊荣的第一位美国女作家。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她继续以中国题材进行小说创作，发表了《龙子》（*Dragon Seed*）、《群芳亭》（*Pavilion of Women*）、《牡丹》（*Peony*）和《同胞》（*Kinfolk*）等。但二战期间，中美两

国变化都很大，这些作品内容显得有些陈旧。她在报刊上发表不少文章，呼吁美国支持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对中国人民深表同情。赛珍珠也写亚洲其他国家如朝鲜、印度题材的作品，一生共写了70多本书，既有长短篇小说，又有诗歌、戏剧和儿童文学等（Parini 214）。1949年后中美对峙期间，赛珍珠发表了一些反华言论，影响消极。1973年3月6日，赛珍珠于佛蒙特市去世，终年81岁。

《大地》是赛珍珠的代表作，它描绘了中国普通农民王龙一家的兴衰，揭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妇女的悲惨命运。这在当时美国文坛是很少见的。赛珍珠结合她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开创了美国文学中的异国他乡新题材，展现了欧美各界长期不了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变迁，引起广大读者的深切关注和莫大兴趣。

《大地》主人公王龙是中国农村的普通农民。他早年丧母，与父亲靠种地为生，清贫如洗，后来跟地主黄家的女仆阿兰结婚。婚后两人奋力拼搏，起早摸黑，一起战胜饥饿、水灾和疾病，在本乡活了下来。在日子渐有好转后，王龙买了地，准备扩种。不料突遇大旱，颗粒无收。夫妻两人只好逃到南方某地。他俩趁兵荒马乱时冲入某富家，弄到一些钱财和宝石，发了意外横财。返乡安家后，王龙又收购他人的土地，成了小地主。他找妓院歌女莲花当妾，阿兰只好忍气吞声，直至大病身亡。王龙的三个儿子不争气，打算卖掉家里的土地。王龙临终前闻讯，气得抱头大哭……

《大地》帮助欧美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增进中西文化的沟通和理解。赛珍珠在小说里纠正了不少欧美人士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的偏见和误解，批评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冷漠和无知。他们将基督教思想强行灌输给中国民众，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他们总以为中国历史悠久，但贫穷落后，充满神秘感，所以他们很想了解中国的真相。《大地》真实地刻画了主人公王龙眷恋土地，想脱贫发财的小农心志。他一旦有点钱，就想买地纳妾当老爷。像他这号人，在当时兵荒马乱的中国农村，确实有不少。他并非时代的尖兵，身上充满着矛盾。小说对王龙夫妇勤劳朴实的一面进行了描述，也揭示了他俩愚昧庸俗的另一面。他们经历了贫困的折磨，动乱中饱受冲击仍对生活充满信心，但他俩对社会腐败和军阀混战，逆来顺受，不闻不问，唯独关注自己的私利。赛珍珠关注当年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遭遇，同情受封建思想毒害的中国农民，体现了她的民主主义思想。小说还塑造了阿兰等农村妇女形象，阿兰一心一意支持丈夫，怀孕后仍下地耕作，任劳任怨，恪守封建礼教，受到冷遇忍气吞声，不思反抗，最后患病身亡。通过她的悲惨结局，小说揭露了旧中国男权制度的丑恶，呼吁给广大妇女以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些栩栩如生的描述为当代女权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证据。

赛珍珠在中国老百姓中生活了近四十年，她懂汉语，熟识中国的风土人情，对中国人民有感情，把中国视为她的第二故乡。因此，《大地》的成功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小说生活气息浓烈，展示了现实主义风采。该书文字清晰流畅，精练凝重，富有史诗特质。作者运用独特的手法遣词造句，巧妙地将《圣经》式平白简洁的语言与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相结合，形成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展示了中西文化和语言相融合的特色。美国学界称她是多元文化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她既是作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冷战，反对迫害妇

女儿童，热心公益事业（Parini 216）。

二、林语堂模式

林语堂是福建龙溪县坂仔村人，基督教牧师家庭出身，原名林和乐，上大学时改为林玉堂，后来又改成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结识了美国女作家赛珍珠。1936年8月1日，承赛珍珠的邀请，他举家前往美国纽约市，靠卖文为生，开始走进他写作的丰收年代。

林语堂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赴哈佛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1923年转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荣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应聘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26年5月下旬携妻女到厦门大学教书。1927年3月去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后来辞职移居上海，发表了不少隽永有趣的小品文，被称为“幽默大师”，还主编了《开明英文文法》和《开明英文读本》等，在文艺界和教育界均有一定影响。

1966年6月，林语堂携妻子和三个女儿回台湾定居，继续他的中文写作。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在香港去世。从1936年去美国至1976年去世的40年间，林语堂共发表英文著作36种，中文著作5种，几乎平均每年一种，是一位多产的双语作家。他在美国主要用英文写作，向美国读者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礼仪和民间习俗等。他的著作涵盖面很广，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他既写小说、传记、散文，又写评论，还从事古典文学名著翻译，在各领域都有一定影响。赛珍珠曾为他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作序。美国学界称：《吾国与吾民》和杨希尔·康（Young Hill Kang）的《东西倒转》（*East Goes West*）是1937年问世的两大名著（Marcus and Sollors 959）。他的《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成为美国畅销书，发行量很大，重印达40版以上，并被译成18种语言。《中国印度之智慧》（*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则成了美国大学的教科书。难怪有人戏称：谈到中国文化，美国人只知道孔子和林语堂。

林语堂的三大长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风声鹤唳》（*A Leaf in the Storm*）和《朱门》（*Vermilion Gate*）很受美国各界欢迎。1940年至1947年8年间，《京华烟云》共在美国卖了25万册，并于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虽然落选，但影响深远。该小说写于1938和1939年间，出版于1940年。全书分为三大部分，描写20世纪初北京曾家和姚家等几家人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至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难断恩怨，生动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小说涉及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袁世凯窃国称帝、张勋复辟、直奉大战、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文坛笔战、二战爆发等，展现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广阔画面。书中有重要人物80多个，丫头10来个，主要人物木兰、莫愁、红玉等人酷似《红楼梦》中的相关人物，所以《京华烟云》被称为现代版《红楼梦》。小说对所刻画的人物各有褒贬，深受庄子生死循环的达观哲学影响。小说的英文流畅，趋近口语化。总之，《京华烟云》艺术上受《红楼梦》的影响比较明显，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民族正气。

此外，林语堂曾将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的《卖花女》译成中文，还翻译了《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等西方名著。同时，他将我国古典名著《论语》、《道德经》、《庄子》、沈三白的《浮生六记》、高鹗的《老残游记》等译成英文，推荐给西方读者。他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成英文版的《杜十娘》，并将唐宋传奇、话本小说和清代志怪小说改写成二十多篇现代短篇小说，让美国读者欣赏。他利用传记《苏东坡评传》的艺术形式向西方介绍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使它逐渐走向世界。

林语堂自己曾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萧南 212）。有人评说，他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表示非常认同。他认为自己是一捆矛盾，比如他献身文学又心近科学；他爱中国人，但批评中国人比谁都诚实、坦白；他崇拜西方，可是蔑视西方教育心理学家；他是现实主义的理想家，也是满怀热情的达观者、冷静的观察家（萧南 95）；他寄居美国 30 年，有人劝他加入美国籍，他婉言谢绝，认为那里不是他落根的地方。

1968 年 6 月，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第二届大会在韩国首尔召开，林语堂以新加坡南洋大学“影子校长”的身份出席，并作了题为《趋向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的报告。他提出了东西方文化比较和融合的理论。他认为，东西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相互补充和融合，以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他指出，东西文化存在的基本差异表现在三个方面：（1）中国人的思维以直觉的洞察力和对实体的全面反应为优先；西方人则以分析的逻辑思考为优先，执着于抽象分析的思维方式。东方哲学除了研讨知识外，对人生的探究也占很大比重，认为宇宙的奥妙和人生的美好不是用三段法的逻辑所能推演出来的。（2）中国人以感觉作为现实体不可分的一部分。在对事物的看法上，多兼顾感觉，有时还将感觉置于理由之上。（3）中国哲学的“道”相当于西方哲学的“真理”，但含意比真理广阔些。林语堂认为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但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遗产，所以要互相学习、沟通，以利于世界和平及社会安宁。因此，他主张东西文化的融合。显然，这种融合的文化将极大地促进人类创建和平合作、合理的生活方式及和谐社会。

总的来看，林语堂旅居美国时，用纯熟而清新的英语书写中国题材的长篇小说，改写中国古典故事的短篇小说，撰写一系列介绍中国哲学、文学、艺术、道德、宗教和习俗的文章，受到美国学者和读者的欢迎。他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加上寄居纽约 30 年，对美国社会、文化和宗教有深刻了解，也受到美国文化的一定影响，但他仍坚守中国传统文化，肯定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势，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荐，同时努力倡导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和融合，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欧美的影响。

三、汤亭亭模式

汤亭亭的英文名是马克辛·汤·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中文名汤亭亭是她父亲

为她起的。1940年10月27日，她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托克顿市一个华裔家庭。祖母原籍广东省新会市。“Hong”是广东省南部新会四邑方言中“汤”的发音，不是汉语普通话里的“洪”。她父亲在加州华埠开过洗衣店和赌场，母亲是个护士。汤亭亭从小爱读书，中小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她在夏威夷住了多年，并开始文学创作，先后用英文写了《女勇士》(*The Women Warrior*)和《中国佬》(*China Man*)，一举成名，获“夏威夷之宝”的美称。《女勇士》在文学界和学术界引起轰动，荣获美国全国书评界奖，作者对种族主义和歧视女性的现象发出了愤怒的抗议声。有学者称，该书代表了美国亚裔文学的新突破(Fox and Kloppenberg 373-74)。

汤亭亭曾自称是“德顿人”，也是广东人，自我界定为“美国西岸的华裔美国人”(A West Coast Chinese American)。有人将她的名字写成“婷婷”，她说这是个错误。其父根据一首中国古诗，给她取名为“亭亭”，意为独立自强、独立自主、独一无二的样子。许多中文学者和译者用她的中文名字时，经历了从“洪婷婷”到“汤婷婷”的失误，最后由她本人出面澄清，才写对了“汤亭亭”。1987年，汤亭亭出版了《在夏威夷的一个夏天》(*Hawaii One Summer*)和《孙行者：他的即兴曲》(*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后来又出版了《第五和平书》(*The Fifth Book of Peace*)。这些作品受到美国学术界和文艺界的高度重视。汤亭亭也因此成为最优秀的美国华裔小说家，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997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授予她美国国家人文奖章，1998年《孙行者》荣获约翰·多斯·帕索斯文学奖和美国西部笔会奖，2008年汤亭亭又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杰出文学贡献奖。

作为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汤亭亭创作的两部姊妹作《女勇士》和《中国佬》构成了作者完整的自传，书中描写她的先辈四代人从中国移民美国的坎坷经历。她用英文创作了跨国题材的文学作品，充满了中国元素与西方文化的融合。

在作品中，汤亭亭写了曾祖父一辈被骗到美国夏威夷开荒种甘蔗、当牛做马难以生存的经历。祖父一辈到美国西部修铁路，备受白人工头鞭打和虐待，甚至监禁和杀害。父亲一辈勤俭度日，苦苦挣扎才幸存下来。美国白人称华工为“中国佬”，带有轻蔑之意。小说揭示了无数华工在饥寒交迫中为美国西部开发做出的重大贡献。作者采用黑色幽默手法，将事实与虚构、自传与家史以及中国神话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女勇士》通过女主人公“我”将五个片段组成一个整体，按时间顺序讲述来自中国的五个女人的故事。首先是无名氏姑妈与人私通怀孕，被逼抱着婴儿跳井自杀。母亲勇兰乐于助人，深受邻里敬重。月兰姨妈对丈夫逆来顺受，最终发疯而死。女主人公崇拜花木兰为家乡父老报仇，但对家庭的压抑和旧习俗感到困惑，常与母亲争吵。小金斯顿最后学会独立谋生，寻找自己的天地，决心当个作家，成为母亲所希望的“女勇士”。小说揭露了旧中国封建戒律和旧习俗迫害普通妇女的凶残、重男轻女的陋习，表达了对姑妈所遭遇的不幸和姨妈痛苦婚姻的深切同情。它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特色，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所以小说问世后深受好评，社会反响很大。有评论指出，在《女勇士》里，汤亭亭记得她在加州长大，像“魔鬼堆

里的一个少女”。严格来说，这些“魔鬼”们就是华人社团眼中的美国白人，但文化的对抗也影响了她一家人，她们信仰和行动的力量都被她们所移居的美国社会耗光了（Hoffman 382）。

有趣的是，作者对中国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并不是照搬不误，而是大胆加以改编，为读者们所接受。比如小说将岳飞母亲在岳飞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移到花木兰身上，改刺成“为民牺牲”。这引起了学界的热议，尤其遭到华裔作家的反对（Ling 112-13）。但大多数人认为它增添了美国华裔小说中的东方色彩，使美国读者着迷。

汤亭亭“说故事”（Talk Stories）的手法特别受人称赞，她常将真实细节与虚幻成分相结合，突显中华元素的特色。小说中五位妇女从古老的中国来到现代化的美国，发现两国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差别很大。汤亭亭对她们的发式、衣着、绞面和裹脚进行了细致描写，尤其是婚礼上新郎缺席，姨妈与公鸡拜堂完成成亲仪式，这些都令美国读者们颇感新奇。有学者认为，汤亭亭以这个手法保持华人过去的习俗，维持小说的悬念，读者很难知道她们的最终命运（Limon 220-221）。也有学者提出，作者使用日常美国英语，通过“说故事”的方式写出了新奇的文化习俗和鲜为人知的迷信活动（Hoffman 382）。小说中大故事套小故事，如母亲讲到广东人办猴子宴的故事，又如金斯顿的母亲讲到唐朝有些猎手吃鸟、蛇、野兔、昆虫、蝎子、蟑螂和豪猪等。这些别开生面的细节非常引人入胜，令美国读者们百读不厌，争相传阅。

在《中国佬》中有一段涉及鲁滨孙的故事。汤亭亭说那是她小时候听来的中文故事，而这个中文故事却又译自英文。她说：“我写我的鲁滨孙故事时，试着唤醒读者去意识神话的互动”（何文敬、单德兴 218）。她还说，“如果你仔细阅读花木兰篇章，便会发现除了岳飞的故事之外，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佛教中的兔子故事、香港的功夫片。除了母亲吟唱的花木兰之外，我也在剪纸中发现花木兰……”（218）。由此可见，汤亭亭的作品是中西文化的交融，是英语与汉语的杂糅。正如她所说，“我显示的是小孩如何听睡前故事。故事、梦、想象、意识、潜意识进出睡眠、混合、溶化、流动”（218）。

与赛珍珠和林语堂的身份不同，汤亭亭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从小学到大学她接受了系统的美国教育，熟识英美文学作品和理论，接受的美国文化影响要大一些。但她不忘自己祖先的根，牢记妈妈口述的中国故事和中国人的习俗及命运，特别关注华人在美国的遭遇，用英文写成小说和非小说，以独特的后现代派艺术风格展示了东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取得了美国华裔文学的新突破，受到美国学者和读者的欢迎。汤亭亭成为当代中美文化交融的佼佼者。华裔评论家林英敏（*Emy Ling*）认为汤亭亭是位杰出的作家，“具有沉着的勇气和深切的自信。可以说，她是一位处于世界最前列的重要作家”（转引自 Fox and Kloppenberg 374）。

赛珍珠、林语堂和汤亭亭都是名闻欧美的作家，赛珍珠和林语堂又是将中国古典名著译介到西方的翻译家。他们三人都对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作品受到美国学者和读者的欢迎和接受，译介到中国以后，也受到我国学者和读者的青睐和好评。

赛珍珠、林语堂和汤亭亭三个人身份不同，身处的环境有很大差异——赛珍珠是有着 40

年在中国生活经历的美国人，林语堂是旅居美国 30 年的地道中国人，而汤亭亭则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其作品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但他们作品中所揭示的东西文化交融是一样的。他们从小就受到东西两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此在其作品中依然保持这种文化的影响，并都用英文创作中国体裁的小说或非小说。有趣的是，他们三人之间还互相联系和影响。赛珍珠邀请林语堂用英文撰写《吾国与吾民》并亲自为它作序。她丈夫的约翰·黛公司出版了林语堂小说《京华烟云》，并广为宣传，使林语堂到达纽约后能顺利从事写作^[1]。汤亭亭虽然没有像赛珍珠和林语堂那样经历过战争的凄风苦雨和文坛的纷争非议，但她牢记母亲口述的中国故事和中国人移民美国当苦力的血泪史，又认真读过赛珍珠和林语堂二人的作品，深受他们的影响（何文敬、单德兴 219）。但是，汤亭亭并非简单重复他们作品里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而是更多体现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痕迹，如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的运用，展示出新时代特色。

从 1931 年《大地》问世至今有 80 多年了。中美文化交融不仅涉及美国主流文化，而且影响了少数族裔文化的发展，对美国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今多元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中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日益增多。新的东西方文化交融模式将会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出现，也必将增进人类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

注释 [Notes]

[1] 林语堂因研发中文打字机倾家荡产，耗尽多年积蓄 10 万美元，向赛珍珠借款遭拒，双方从此断绝来往。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Elliot, Emory. "Introduction." *Aesthetics in a Multicultural Age*, edited by Emory Elliot, et al., Oxford UP, 2002, pp. 3-27.
- Fox, Richard Wightman, and James T. Kloppenberg, editors.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Thought*.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 He, Wenjing, and Dexing Shan, editors. *Representing Politics an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何文敬、单德兴编：《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6。]
- Hoffman, Daniel, editor. *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ing*. Harvard UP, 1979.
- Limon, John. *Writing after War: American War Fiction from Realism to Postmodernism*. Oxford UP, 1994.
- Ling, Jinqi. *Narrating Nationalism: Ideology and Form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Oxford UP, 1998.
- Marcus, Greil, and Werner Sollors, editors.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Harvard UP, 2009.
- Parini, Jay, editor.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1).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10.
- Xiao, Nan, editor. *Lin Yutang with a Pipe in His Mouth*. Sichuan Art and Literature, 1995. [萧南编：《衔着烟斗的林语堂》。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陈忠平

潇湘八景诗之“远”意象在东渐西传中的流变

◎ 冉毅

内容提要: 庞德的《七湖诗》，是基于日本佐佐木玄龙绘八景图玉涧题诗的英译而创作。本文通过史料耙梳，分析玄龙八景图题诗款识玉涧的致因及日本八景诗形成的背景，探讨日本八景如何展开。以八景中“远”意为例，论考八景诗“远”意象在东渐西传中的意蕴流变。旨在厘清史实，以期从更深层面认识潇湘八景融通东西文化的意义。

关键词: 潇湘八景 远意 庞德 《七湖诗》

中图分类号: I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066-11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典籍解读、文艺批评、汉诗赏析及汉日翻译统合教学法研究”(15JG04)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Title: Changes in the Image of “Distance” in “Eight Views of Xiaoxiang” during its Spread to the West and East

Abstract: Ezra Pound's “The Seven Lakes” was based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Yu Jian's poem inscribed in the paintings of “Eight Views of Xiaoxiang” by Sasaki Genryu. Through examin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during its spread to the West and East, Yu Jian was mistaken as the author of the poem. It also discusses the contexts of “Eight Views of Xiaoxiang” and how they are spread in Japan by using the image of “distance.” Hence, the significance is recognized of “Eight Views of Xiaoxiang” in connect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Keywords: “Eight Views of Xiaoxiang”, the image of distance, Ezra Pound, “The Seven Lakes”

Author: Yi Ran, Professor,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庞德《七湖诗》的创作灵感,源于曾葆荪英译日本佐佐木万次郎(号玄龙)绘八景图(以下简称玄龙图)的玉润题诗之史实研究^[1],蒋洪新、钱兆明已有论文详考结论^[2]。欧荣赞同叶维廉和陶乃侃的分析,认为玄龙图的题诗“可能是诗僧玉润所写,也可能是五山时期日本人所作”“也有可能是几个日本书法家照抄了流入日本的某一南宋《八景图》上的原作七绝”(232);能阿弥(1397—1471)所绘八景图上,施印徽堂公敞(1732—1772)的题诗与玄龙图题诗雷同,注明“与相国寺是庵绘八景图自题诗同”(正木孝之 162)。同一题诗何以出现不同人款识?玄龙图题诗非玉润原作,何故款识玉润,致因何在?这首诗究竟是谁所作?潇湘八景诗画传到日本后,原题、仿诗和注释本“烟寺晚钟”多变成“远寺晚钟”,变因何在?拙稿通过史料耙梳求解存疑,再依据地理文献、《长沙府志》及唐诗和明宣宗“潇湘八景画诗”的“七泽”出典,探赜庞德融“三湘七泽”致思“七湖”之文理思路。

日本最早研究潇湘八景的论文《牧溪・玉潤瀟湘八景絵及びその伝来研究》(1926)是大正晚期书画师高木文依据 28 种典籍考证撰写,其再稿《牧溪・玉潤名物瀟湘八景絵の伝来と考察》(1935)附英译鉴证了当时西传的需要实态,文中有牧溪、玉润八景图及原题诗,这里与玄龙图题诗、和歌同列,以资比较。

玄龙图题和歌 ^[3] (草书和歌读解庆应大学堀川贵司教授,中译冉毅,2006)	玉润八景图 自题诗	玄龙图 款识玉润诗
船よするなみにこゑなき夜のあめを とまよりくぐるしづくにぞしる 扁舟穿浪渡寒江 夜深静闻苦雨声	潇湘夜雨 古渡沙平涨水痕 一篷寒雨滴黄昏 兰枯惠死无寻处 短些难招楚客魂	潇湘夜雨 先自空江易断魂 冻云粘雨湿黄昏 孤灯篷里听箫瑟 只向竹枝添泪痕
秋にすむ水すさまじくさよふけて月を ひたせる沖つ白波 清澈秋水晚来急 冲滩月影白浪翻	洞庭秋月 四面平湖月满山 一阿螺髻镜中看 岳阳楼上听长笛 诉尽崎岖行路难	洞庭秋月 西风剪出暮天霞 万顷烟波浴桂花 渔笛不知羁客恨 直吹寒影过芦花
暮かかる霧よりつたふ鐘の音に遠方人も道いそぐ也 暮霭深处寺钟声 道中远人行色急	烟寺晚钟 钟送斜阳出暮山 遥知烟寺隔前湾 山翁莫怪归来晚 欲待峰头月上还	远寺晚钟 云遮不见梵王宫 殷殷钟声诉晚风 此去上方犹远近 为言只在此山中
風むかふ雲のうきなみたつとみてつりせぬさきにかへる ふな人 风起云涌浪涛起 渔人收钓撑棹归	远浦归帆 无边刹境入豪端 帆落秋江隐暮岚 残照未收渔火动 老翁闲自说江南	远浦归帆 鹭界青山一株秋 潮平银浪接天流 归樯渐入芦花去 家在夕阳江上头

松たかき里よりうえの峯はれてあらしにしづむ山もとの雲 村市后峰高松秀 山麓白云随岚飘	山市晴岚 雨拖云脚敛长沙 隐隐残虹带晚霞 最好市桥官柳外 酒旗摇曳客思家	山市晴岚 一竿酒旆斜阳里 数簇人家烟嶂中 山路醉眠归去晚 太平无日不春风
浪の色は入日の跡になをみえて磯ぎは くらき木がくれの宿 落日余晖映清波 渔村炊烟荻花舞	渔村夕照 一江晴日满沙汀 卖尽鱼来酒半醒 蓑笠未干榔板静 一声横笛数峰青	渔村夕照 薄暮沙汀惑乱鸦 江南江北闹鱼虾 呼童买酒大家醉 卧看西风舞荻花
蘆の葉にかかれる雪もふかき江の汀の 色は夕べともなし 芦苇叶枯雪皑皑 寒江扁舟寄吟情	江天暮雪 万里江天万里心 飘飘花絮洒平林 桥横路断马蹄滑 更说蓝关转不禁	江天暮雪 云淡天低糝玉尘 扁舟一叶寄吟身 前湾啣轧数声橹 疑是山阴乘兴人
まつあさるあし辺の友にさそはれて 空行く雁も又くだるなり 芦荡水寒情依旧 长空雁过思别离	平沙落雁 点点随群旧处栖 蓼花芦叶暗长堤 大寒水冷难成宿 犹自依依怨别离	平沙落雁 古字书空淡墨横 几行秋雁下寒汀 芦花错作衡阳雪 设问斜阳刷冻翎

一、玄龙图题诗款识玉涧致因

玉涧八景诗有潇湘地名及文学特质，如：楚客魂、岳阳楼、烟寺、江南、市桥官柳等。“潇湘夜雨”诗中的“兰枯惠死”呼应“楚客魂”，意涵屈原冤沉汨罗江的悲苍史实，也蕴涵着他被流放溆浦沅江；采兰花佩戴表高洁，清雅兰花象征屈原精神，凸显出潇湘文学的幽怨特质。玄龙图玉涧诗也渲染雨雾空蒙、风舞荻花、扁舟孤影的萧瑟，却无幽怨意蕴。其中“山市晴岚”诗中的“太平无日不春风”，烘托出“桃源乡”意境，讴歌室町幕府广开宋日贸易，新政带来经济繁荣太平盛世，这与玉涧诗之潇湘文学幽怨底蕴相悖。这显露出玄龙图题诗非玉涧作的痕迹。玉涧八景图是足利将军珍藏的“上上”极品，爰权威性、正统性而增幅着教化性，获得武士、公卿、僧侣、缙绅等共同体认可。题诗注释者皆大儒或高僧。玄龙图题诗注释者多身份不明，各自以所具知识屡改原作滋生新意。例如，能阿弥绘八景图题诗与玄龙图诗一致，注明“与是庵绘八景图自题诗同”。是庵，号子建西堂，相国寺僧，活跃于1469—1487年，自修牧溪画风，绘云烟技妙娴熟，其八景图载至文堂编《潇湘八景图集 59号》，图上并无题诗。

据现有资料，天宥（1600—1674）绘《潇湘八景长卷》[见图1正保年（1644—1648）作]，每景有题诗、和歌，铃印天宥，所题和歌系冷泉为相作^[4]。天宥7岁拜师天台宗高僧天海（1536—1643）习诗画，27岁任羽黑山第五十代别当（新泻县高山宗派统管）。据《江戸时代书林出版

书籍目录集成》记载，玄龙图面世于1685年，比天宥晚40年，后者应是袭录前者。玄龙图题诗何故款识玉润？



▲图1 天宥绘潇湘八景长卷《平沙落雁》(渡边明義 63)

潇湘八景图随中日禅宗文化交流于13世纪中晚期传到日本。“历应四年(1341)，室町幕府足利尊氏将军别墅等持院竣工，其中一室饰障壁绘十二景，中有‘潇湘夜雨’，请镰仓五山建长寺住持文学名僧梦窗疎石题诗”(渡边明義 39)。应永十五年(1408)三月，足利义满(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恭迎后小松天皇行幸北山殿(现金阁寺)，献唐物瑰宝(村井康彦 104)。以此为契机，京都御所(皇宫)设八景厅饰障壁画“洞庭秋月”(现存)。后继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恭迎后花园天皇驾临将军府，隆重展陈唐物瑰宝，以“和”风四季布展八景图，意在通过先进的中国文化，强调幕府拥有与宫廷文化匹敌且更精致高雅的文化体系。这在政体层面上，幕府鼎力推进与中国商贸，抛洒金银聚敛唐物瑰宝，图谋战略性的文化深远教化。义政将军建“书院”，障壁画特饰徽宗帝作《鹤图卷》、夏珪作《山水卷》及昭示帝王倡勤耕的《耕作图卷》(梁楷作)，彰显将军有同中国皇帝一样的政略和艺术鉴赏力，藉此构建幕府新政范式，八景图绘画艺术成为幕府推崇的最高文化新标范。

另有文安三年(1446)秋至翌年正月裱制的《潇湘八景诗轴》[见图2 正木美术馆藏]是宫廷宰相及京都禅宗七位长老的赋诗墨书。



▲图2 《潇湘八景诗轴》一条兼良、信仲明笃赋诗墨书(正木孝之 70)

潇湘夜雨：九嶷抹黛暮云浮，添得湘江夜雨愁。篷底萧萧无复梦，滴残寒玉泪痕秋。
 烟寺晚钟：紫翠阴阴拥上方，疎钟几杵向黄昏。残声风外渡湘水，隔岸行人沙路忙。
 平沙落雁：一夜雁王呼雁奴，衔芦飞过洞庭湖。晚风吹落数行影，阵阵平沙八阵图。
 江天暮雪：津树将沉暮色残，朔风吹雪暗江干。渔翁好典蓑衣醉，不耐篷窗今夜寒。
 山市晴岚：此地何曾市井喧，林间岚然自朝昏。淡阴风扫人归尽，獵獵青窗留月痕。
 渔村晚照：叶落孤村斜照多，鸣榔渔笛在烟波。半晴半霎手翻覆，明日江头雨一蓑。
 洞庭秋月：江绕长沙碧玉流，三湘舟载月明秋。洞庭无盖色如水，七十二峰波底浮。
 远浦归帆：帆腹满时烟浪翻，归程半浦欲黄昏。清风吹送知何处，翠竹白沙新月村。^[4]

兼良^[5]诗中的“九嶷、湘江”，信仲^[6]诗中的“长沙、三湘、洞庭、七十二峰”，瑞溪诗中的“湘水”，东沼诗中的“洞庭湖”，皆为潇湘地名。查年谱，他们未到过湘地，吟诗入境宛如亲身潇湘，诗中“抹黛、暮云、夜愁、寒玉、泪痕”盈含浓愁，折射出他们深受潇湘古典文学浸淫。“烟寺晚钟”诗题表明对潇湘八景实态的接受。国会图书馆藏《八景类聚》、宫内厅书陵部藏《八景诗歌》、横川景三（义政将军侍讲）编《百人一首》都收录有上列八景诗。这印证了潇湘八景诗画题在皇都文雅场的最高艺术定位。那么，是什么驱动他们如此醉心潇湘？一幅“潇湘夜雨图”中相国寺高僧瑞溪周凤题记〔寛政三年（1462）腊月〕叙其珍藏的师承关系，或可窥一斑。

“潇湘夜雨图”原为小幅，相国寺禅僧希世灵彦将其接裱成长轴，恳请师傅题记：“方方壶潇湘雨意图乃双桂翁藏。翁寂传无二。近顷授希世灵彦……”，文中“双桂翁”是南禅寺（将军礼佛寺）第九十八代住持惟肖得岩（1360—1437）。他曾师从誉为日本“五山文学双壁”的义堂周信、绝海中津，他腐心潜修佛典及汉籍经典，深谙汉学，誉为“天下学僧”，深得幕府信赖。“潇湘夜雨图”之师承系统，如湘水汨汨向洞庭，舜帝南巡薨苍梧葬九嶷的故事，不尽地述说着潇湘文学的深层意蕴；凝汉文学精髓的古典巨著《离骚》问世，楚湘仿佛代表着幽怨愁思的文学意蕴。杜甫诗“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7]；李白诗“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8]写尽英皇二妃死别帝王，泣血泪染竹的悲苍；钱起诗“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8]尽抒潇湘文学意蕴深邃。惟肖圆寂，弟子们冥思修禅，追忆恩师谆谆教诲的汉典文艺，睹物思人，淡墨“潇湘夜雨图”意象，风吹细竹，丝雨飘蒙，残滴如泪。竹，瘦身嫩笋菱叶摇，素装高洁且玉腰。俏立轻闻潇湘泪，不与雍容争媚娇。潇湘重叠着斑竹泪的故事联想，思绪或从语序轴涌出，或从语言联想轴外溢，潇湘泪重叠恩师寂灭之悲苍心绪。潇湘文学在日僧心中，丝丝入心，渗透浸染。惟肖禅师作“平沙落雁图叙”及瑞溪为高仓御所乌丸殿障壁八景图“平沙落雁”题诗，这都鉴证了八景诗画在日本被视为潇湘文学之精髓。这些诗作凭依禅宗文化的深邃意蕴，是五个多世纪传承至今的根源所在。

江户末期,德川吉宗(1684—1751,第八代将军)于享保十三年(1728)七月六日令“汇集八景图,诸侯一堂鉴赏”^[8]。这次汇集确认,牧溪八景图藏家有“远浦归帆·安永家、烟寺晚钟·畠山家、渔村夕照·根津美术馆、平沙落雁·佐佐木家。”^[8]此前的四个世纪,潇湘八景图为足利尊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各代将军府、松平越后等地方诸侯珍藏,散佚民间后藏家过百。玄龙时为“唐体”书法家,东洋文库藏有宽文六年(1666)六月他应求以楷草行隶篆,书《潇湘八景诗》卷,印证他谙熟仿玉润诗。现存《玄龙书八景诗》有延宝八年(1680)小嶋助左卫门版(后补外题“潇湘帖”)、天和三年(1683)浅见吉兵卫版、同年版(无商号),篆、隶阴刻诗,阳刻和歌刊印。这些都晚于天宥绘八景卷时间,显然,玄龙袭录前人。

玉润八景图在中国无存,日本存下来三幅(山市晴岚图、远浦归帆图、洞庭秋月图)^[9]。其诗画并茂着墨浸散画风,与中唐江南兴起的泼墨法有呼应之源,玉润八景诗传达出天籁意象——雨、风、岚、雪、月、光,静谧、迟暮、晚钟、烟寺、渔村、木桥、垂柳、雁声,深邃的文学意蕴勾起赏画人遐思和怀旧的诗意经验,性灵净化,日本人视自然与自我精神及生命同然,玉润诗唤起高雅的心灵共鸣和清丽的美景追求,滋生回归自然的渴望,不由地憧憬八景画面“桃源乡”那散淡随性的中空内里宁静。这契合日本茶人寻觅简朴恬静、幽寂奥妙意趣及“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大大发酵茶道界、公卿贵族、文人优雅恬淡的赏析风尚而经久传承,黑田泰三引《等伯画说》^[10]云“玉润八景图于茶道隆盛期备受青睐而价值骤增”(37)的记载印证了这一史实。永正时代(1504—21)云溪文怡绘《潇湘八景图》(常盘山文库藏),每景左侧书玉润八景诗;桃山时代海北友松(1533—1615)绘《潇湘八景图》(群馬县立近代美术馆藏)题记受托宫廷文臣近卫信尹作,每景左侧有名僧书玉润八景诗,都印证了当时欣赏八景诗画蔚然成风,玄龙图在此后不久诞生,题诗款识玉润或膜拜或尚雅所为。地方诸侯、缙绅、豪商附庸幕府,竞相收藏诗画并茂八景图,需求骤增,丹青手仿玉润图,年代最早有能阿弥(1397—1471)绘《潇湘八景图》,图上题有仿玉润诗,钤印徽堂(1732—1772)^[11]是晚了两个世纪的天台座主,无疑不实。值得注意的是挥毫即是且钤印,折射出仿玉润诗在天台僧中脍炙人口,也旁证了这首诗初出天台僧。

现查得仿玉润八景诗附为相作八景和歌的注释本九种。下列错记年代、作者的刊本,印证当时署名随意,鉴证八景诗画“和”化衍变实态:(1)《潇湘八景注》两种。一种是奥书(版权页)记“天文叁年(1534)貳月”时间最早,注记“或谓恶笔,或曰瑕疵。如形抄之,愿不遭后人嘲弄、悔耻”。古文献专家堀川贵司氏认为“年代无旁证,存疑”(153)。另一种注“此八景乃东坡贬滴潇湘作”是错注。“睿山文库”是天台宗坟莹,京都天台宗本尊地,从传播途径看仿玉润诗“可能出自天台宗僧侣之手”(堀川贵司 153);(2)《八景抄》[天明四年(1784)],题记“白居易作诗”,为错注;(3)《潇湘八景诗抄》(江户中期)内题“白居易作”,显然错注;(4)《八景诗谚解》[延保三年(1675)],题记“白居易作”,显然错注。“和学”家宫川达道(号一翠)集35位名人赋八景诗99首、和歌88首编成《潇湘八景大全》、《潇湘八景诗歌钞》[贞享五年(1688)]的眉批载玉润八景原诗,“烟寺晚钟”错成“远寺晚钟”,题注“作者在《古钞》

本注‘白居易诗’或谓‘东坡诗’，皆错。此为玉涧作也。”（堀川贵司 156）这个错注是玄龙图题诗及其他仿玉涧八景诗款识玉涧的起因。八景图题诗款识玉涧附为相作八景和歌，恰好佐证这是日本人仿诗，因为玉涧八景图无和歌。

二、“烟寺晚钟”变“远寺晚钟”致因

中国禅僧大休正念（1229—1289）于文永六年（1269）赴日弘法，最早在日本留下了潇湘八景诗，其“烟寺晚钟”：“翠岳回环藏古寺，烟林密密绝嚣尘。钟声透青云霄外，唤醒昏昏醉梦人。”（南条文雄等 1008）诗题未变成“远寺晚钟”。诗中翠微藏古寺，时隐时现，邈远；密林绝嚣尘，烟雾绝尘，悠远；钟声云霄外，殷殷九霄，疏远；昏昏醉梦人，梦境神游，幽远，蕴涵“远意”。大休诗中“远岑”“路细自幽”，“烟罩”不知“寺何在”，有视觉觅远而生渺远意。

日僧读大休诗“烟寺晚钟”，在禅意冥思，性照觉悟的“远意象”中受到熏陶开智。日本最早赋潇湘八景诗者是大休的高足秋涧道泉（1263—1323），诗如下：

远寺晚钟：尘外拽策问远岑，往来路细自幽林。青松烟罩寺何在，一扣钟声慰寸心。洞庭秋月：湖面溶溶爽气浮，江居启户向清流。吟情遥与月俱转，七十二峰各让幽。‘余有爱山水之癖也。因题八景，以呈同窗云，和尚此境未经，徒思也。余云，汝生和国，法而弄三十一字，试问吉野、立田、松嶋、末松山等之胜幽尽之，主尊□明堂，不遑万机，夫岂自□耕牧之事哉。其趣间见于高吟者坎，彼无言而退。余一笑而已。同志友于，共遊心与兹，是乃为幸。’”（秋涧道泉 46）

秋涧的“洞庭秋月”诗，素描湖畔人家临清流而居，这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全诗勾勒出烟波浩渺湖水平，涵虚混太清的湖光意境，道白诗人性在逍遥，情在邀月共饮，与月俱转，意在永结无情遊，相期南岳圣山的心绪。后记“法而弄三十一字”乃吟“和歌”必遵方法。“此境未经”表明诗人不曾到湘也未登过南岳，但却对潇湘风情烂熟于心。诗眼“七十二峰各让幽”，蕴涵“让与我作归隐处”意，道出秋涧归心南岳性随佛圣之志，折射出“潇湘八景”随禅宗文化远播日本的教化效应和信仰感召力。而日本绘师读解八景诗题“烟寺晚钟”，初始就理解成了“远寺”。画面构思为山巅寺院堂塔耸立、暮霭云遮的远景；近景多为小僧随老僧，自麓谷向寺跋涉，晚风传来殷殷钟声。远近间山峦雾朦，二僧渐行渐闻行色加快。山寺与山谷距离远，仰视山寺的视觉远，赏画人眼帘在地平线→山峰→山谷→行僧→寺塔之间移视，皆处“远”态而酿成远意。日本潇湘八景研究专家认为“远寺更正确地表现了题意”（渡边明義 93）。

日本受汉魏六朝道佛文化影响，“远”意象早已潜移默化渗透于文艺思想里，浸淫心性，可信手拈来随性活用。《万叶集》“自然关照”歌融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山水含清

辉,清辉能娱人”意象(萧统 314);法隆寺金堂壁画四十八尊菩萨半跏像台座雕云纹山岳画、平等院凤凰堂来迎僧云中奏乐、正仓院藏织锦平远山水,极尽悠远意;文士对“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句耳熟能详(陶渊明 208)。八景图山寺远在传“晚钟”,契合“和”文化底蕴的幽远意绪。“烟”暮霭朦胧,难透视而意蕴致远。以墨之浓淡表现飞白光晕八景,幻化为“桃源乡”境,契合日本人本体精神追求。玄龙图“远寺晚钟”和歌中的“暮雾传钟声”“远方”更坐实了“远”意象。

日语“烟”“远”同音而致“烟”变“远”。池大雅(1723—1776)绘八景图中,错成“烟浦归帆”。汉诗视觉、听觉之二重性,能自然地调整律调,汉诗诵成“文语自由诗”,韵律依然琅琅上口,沉浸于诗境,“烟”错成“远”多难不察知。从诗的韵律而言,玄龙图“潇湘夜雨”与玉涧八景原诗同韵:

原诗:古渡沙平涨水痕,一篷寒雨滴黄昏。兰枯蕙死无寻处,短些难招楚客魂。

仿诗:先自空江易断魂,冻云粘雨湿黄昏。孤灯篷里听萧瑟,只向竹枝添泪痕。

同一人赋诗应该同韵不同字,同字换位的诗艺瑕疵,绝非高僧玉涧所为。

三、“七泽”致思“七湖”之文理思路分析

云梦泽、洞庭潇湘风景优美,以文学为载体的潇湘八景诗,其深邃厚重的文化意蕴有强大的融与力。玄龙图题诗意象、意境、氛围气息之景象非本土潇湘,因铺展在八景主题意象中,融异域美景,依然矜持着潇湘文化意蕴,庞德融合异域潇湘八景诗意象,创作《七湖诗章》,鉴证了潇湘八景文化的厚重深邃,远播异域,经由重构,皆栩栩再生为文学杰作。1959年,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在日本观赏牧溪“渔村夕照图”,激赏其画风,言:“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风景画杰作。”^[9]

庞德何以由“八景诗”致思“七湖”?查《湖南通志》^[12]、《中国历史地图集》^[13]均无“七湖”记载。关联潇湘有“七泽”一词,初出司马相如《子虚赋》“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峩郁,隆崇崔嵬”(萧统 119)。酈道元《水经夏水注》“云梦泽”方位四种,第三种引“郭璞巴丘湖说”。巴丘湖又名青草湖,俗云古云梦泽。地理学家考订“云梦泽汉代犹见,故汉代文献记载虽简略但基本正确……‘云梦泽’战国至两汉期是夹在沅江、湘江间的湖泊,后扩至《水经注》所言方圆五百里,宋代扩至八百里。”(谭其骧 1)南朝宋颜延年诗《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三湘沦洞庭,七泽藹荆牧”(萧统 383),表明岳阳楼可眺望“七泽”。李白诗“洞庭潇湘意渺绵,三江七泽情洄沿”^[9],苏轼《凤翔八观并序》“李太白亦以七泽之观至荆州”(傅璇琮等 9105)表明“云梦泽”在荆楚相连巴陵,“七泽”指由云梦泽缘南延伸

的洞庭湖。

《寰宇记》“以湘潭湘阴湘乡为三湘。……地輿志以湘水进永州会潇水为潇湘，经衡州会蒸水为蒸湘，经长沙会沅水为沅湘。”（吴兆熙、张先抡 87）。这表明古诗中的三湘，泛指湘江流域。陶渊明《赠长沙公》“遥遥三湘，滔滔九江”寓三湘连九江（47）。陶澍集注：“湘水发源会潇水，谓潇湘，及至洞庭陵子口，会资江谓资湘，又北与沅水会于湖中，谓沅湘。”（王叔岷 29）何景明《吴伟江山图歌》“去雁遥知七泽中，落花误认桃源口”，意涵七泽连桃源（201）。陶渊明《桃花源记》言“桃源”在洞庭西。沈佺期诗“七泽云梦林，三湘洞庭水”中^[7]，七泽对三湘，二者在地理上同在洞庭。李频诗《湖口送友人》“去雁远冲云梦雪，离人独上洞庭船”^[7]表明“湖口”连云梦、洞庭。权德舆诗中，“七泽兰芳千里春，潇湘花落石磷磷”^[7]。“潇湘”对“七泽”，二者在地理上同在。而“纷离念兮随君，溯九江兮经七泽”^[7]，表明溯九江必经“七泽”。司马光《再和伯常见寄》诗“遍游七泽身忘倦，更赋千篇意转新”赞“七泽”美景千篇难道尽（傅璇琮等 6217）。华镇诗《洞庭》“险固三苗左，茫洋七泽西。山光千迭小，天碧四垂低。风便修途近，波惊跬步迷。谁知鱼鸟乐，不复待鼙鞞。”（傅璇琮等 12322）《史记·五帝纪》言“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张守节正义“吴起曰‘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10）。综上可以确认，“七泽”连云梦泽，指洞庭湖泊。

八景诗画母题有填词、散曲、小说等文学体裁。明凌濛初著《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故事“伪汉裔夺妾山中，假将军还姝江上”，便有《潇湘夜雨》诗：“云暗龙堆古渡，湖连鹿角平田。薄暮长杨垂首，平明秀麦齐肩。人羨春游此日，客愁夜泊如年。”^[14]卷末言“此八词多道着楚中景致，乃一浙中缙绅所作。楚中称道此词颇得真趣，人人传诵。这洞庭湖八百里，万山环列，连着三江”^[14]，鉴证潇湘八景广行世间。明史九韶《潇湘八景图记》言“凡此八景，各极其致，皆潇湘之所有也。善观者，合八景斯，足以尽其胜；不善观者，反是”（陈梦雷 24645），“善观者”据此在湖泽联想潇湘风景，尽其胜，皆成立。

《周礼·职方》释“凡大泽畜水，南方名曰湖”（朱骏声 846）表明“湖泽”同义。《长沙府志》载“长沙幅员甲三楚，北拥岳鄂，南襟交广，荆襄袁吉左右环翼。域广九百里，袤过半焉，三湘七泽间，真一大都会哉。”^[15]曾宝荪生长于斯，谙熟潇湘文学地理风情，英译日僧仿玉涧八景诗，讲述洞庭“三湘四水”之“七泽”。庞德闻之，渺远遥视，憧憬东方，神游潇湘，致思“七湖”意象，文思泉涌，创作不朽的《七湖诗章》，实不难想象。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一带海域”交流，融通中外文化，在西方及日本的历史文化中，亦可找到中华传统精髓文化的深远影响和痕迹。远播异域的仅非物性之物，更本质的是中华文化价值观及对外的影响。水墨潇湘八景图空灵平远，高雅淡泊，枯淡质非幼拙，是精品之上更高一筹的艺术，其历久弥新的文化张力，幽寂清美的艺术价值被域外深度认知并流传至今，始终保持着中华本源文化之特质，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见证了潇湘八景诗画代表中华传

统优秀精神，具有融通东西文化的学术价值及世界性意义。

注释 [Notes]

- [1] 据元吴太素编《松斋梅谱》(约元至正十一年成书)记载,僧若芬,字仲石,号玉涧。婺州金华人。俗姓曹氏,九岁得度,受业宝峰寺,学天台教,受具临安,天竺寺书记;另据吴太素编《松斋梅谱》日本静嘉堂文库本载,“玉涧晚年(绍定年中,1228—1233)归故里。居亭称‘玉涧’,专画墨梅,八十歿。有竹石、西湖、潇湘、北山作品传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14卷。
- [2] 参看蒋洪新:《庞德〈七湖诗章〉与潇湘八景》,载《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钱兆明:《〈七湖诗章〉:庞德与曾宝荪的合作奇缘》,载《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1期。
- [3] 冷泉为相(1263—1328),镰仓初期歌人、歌学者,京极中纳言(宫廷文臣)。有《新古今和歌集》(共撰),《新敕撰和歌集》439首,《千载和歌集》等名著。据落合博志氏(庆应大学)教示:藤田経世編『校刊美術史料寺院篇』上巻「護国寺本『諸寺縁起集』紙背の康永元年(1342)書状についての言及がある。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1972」。冷泉家時雨亭文庫蔵室町期抄本影印「源家長日記いほでしのふ撰集抄」第四十三巻収録がある。冷泉家時雨亭叢書,朝日新聞社,1997。
- [4] 参看正木孝之:『正木美術館名品図録』書画編,同朋舎,昭和五十三年(1978)。
- [5] 谦良,1446年任宫廷太政大臣,翌年升任宫廷总理。时为一流书法家,誉为“古笔”。
- [6] 信仲,禅宗京都五山东福寺、天龙寺住持,1445年南禅寺第156世住持。
- [7] 参看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全唐诗库》,216卷;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179卷033首,《杂曲歌辞·远别离》026卷第022首,《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167卷第002首,《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170卷第012首;钱起:《归雁》,《全唐诗库》,239卷;沈佺期:《别侍御严凝》,《全唐诗库》,095卷;李频:《湖口送友人》,《全唐诗库》,587卷;权德舆:《药名诗》,《全唐诗库》,327卷;《杂言同用离骚体送张评事襄阳觐省》324卷第039首。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年。
- [8] 参看根津美術館编:《潇湘八景画集》(根津美術館主催潇湘八景主题展出品集),昭和三十七年(1962)10月20日。
- [9] 参看講談社编:『水墨美術大系牧溪・玉澗』(第三卷),昭和五十三年(1978)。
- [10] 参看长谷川等伯(1539—1610)著,约1592年成书,和光出版社,源丰宗考注。
- [11] 铃印徽堂:宫廷中御门院皇子,轮王寺住持后升天台第208代座主。
- [12] 清李瀚章等编,岳麓书社,2009年。
- [13] 谭其骧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 [14] 参看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第27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5] 《长沙府志》卷之四十六,“艺文”,第1269-70页。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Akikan, Dōsen. “Akikan-dōsenwajuōgoroku (Part 1).” *Osanbungakushinshū*, vol.3, edited by Tamamura Takeji, Tokyo UP, 1969. [秋澗道泉:《秋澗道泉和尚語録》(上)。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学新集》(第3卷)。東京:東京大学出版,1969。]
- Arima, Raitē, and Takeshi Umehara. *Kinkakuji*. TanKosha, 2008. [有馬頼底、梅原猛:《金閣寺》。京都:淡交社,2008。]
- Arima, Raitē. “The Shangrila in My Heart.” *Ginkakuji*. TanKosha, 2007. [有馬頼底:心の理想郷《銀閣寺》。京都:淡交社,2007。]
- Chen, Menglei, et al., editors. *A Collection of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Books*, vol. 304. Chinese Publishing & Bashu, 1986. [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第304卷)。北京: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6。]
- Fei, Zhengang, et al., editors. *Collected Works of Fu in Han Dynasty*. Beijing UP, 1993. [费振刚等编:《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Fu, Xuancong, et al., editors. *Full Collection of Song Poems*. Beijing UP, 1998.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He, Jingming. *Collected Works of He Dafu*. Zhongzhou Classics Publishing, 1989. [何景明:《何大复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 Horikawa, Takaji. *Eight Views of Xiaoxiang: Japanization of Chinese Poems and Pictures*. Linsen Bookstore, 2003. [堀川贵司:《潇湘八景——诗歌と絵画に見る日本化の様相》。京都:臨川書店, 2003。]
- Kawahira, Hitoshi. “Notes on *Eight Views of Xiaoxiang* Collected in Ezanbunnko.” *Atomigakuen Heisei*, no.24, 1996, pp.51-69. [川平ひとし:《叡山文庫蔵〈潇湘八景注〉をめぐって》,《跡見学園女子大学国文学科報》平成八年(1996)第24期,第51-69页より。]
- Kuroda, Taizo. Hasegawa. *Tôhaku's Career & Art Work*. Tokyo Fine Art, 2010. [黒田泰三:《長谷川等伯生涯と作品》。東京:東京美術, 2010。]
- Masaki, Takayuki. *Bulando Zuluoku of Masaki Museum of Art (Shogahen)*. Dôhōsha, 1978. [正木孝之:《正木美術館名品図録》(書画編)。京都:同朋舎, 1978。]
- Murai, Yasuhiko. “Culture of Drawing Room.” *Kinkakuji*. TanKosha, 2008. pp. 1-218. [村井康彦:“会所の文化——北山の時分”《金閣寺》。京都:淡交社, 2008, 第103-109页。]
- Nanjō, Bunyu, editor. *Encyclopedia of Japanese Buddhism*, vol. 48. Busshokannkokuai, 1916. [南条文雄編:《大日本仏教書》(卷48)。東京:仏書刊行会, 1916。]
- Ou, Rong. *Indescribable Seven Lakes and Ekphrasi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o. 18, 2013, pp. 229-40. [欧荣:《说不尽的七湖诗章和艺术格符换》。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3年第18期,第229-40页。]
- Tan, Qixiang. Yunmeng and Yunmeng Marsh. *Journal of Fudan University*, no. 1, 1980, pp. 1-11. [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第1-11页。]
- Tao, Yuanming. *Tôenmêzenshû*. Translated by Matueda Shigeo and Takeshi Wada. Iwanamishoten, 1990. [陶淵明:《陶淵明全集》,松枝茂夫、和田武司(訳注)。東京:岩波書店, 1990。]
- Watabe, Akiyoshi, editor. *Eight Views of Xiaoxiang* (No.124). Shibondô, 1976, pp. 1-102. [渡辺明義編:《潇湘八景図》(No.124)。東京:至文堂, 1976。]
- Wang, Shumin, Annotations on Tao Yuanming's Poetry.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証稿》。北京:中華書局, 2007。]
- Wu, Zhaoxi, and Xianlun Zhang. *Annals of Shanhu County*. Yuelu, 2011. [吴兆熙、张先抡:《光绪善化县志》。长沙:岳麓书社, 2011。]
- Xiao, Tong, editor. *Anthology*.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7. [萧统编:《文选》。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Zhang, Shouji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1987. [张守节:《史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Zhu, Junsheng. *Shuo Wen Tong Xun Ding She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北京:中华书局, 1984。]

◇责任编辑:罗辉

FLC

文学与评论

乔叟在中世纪后期的经典化

◎ 肖明翰

内容提要: 乔叟在英国历史变革时期创作了大量传世佳作,深刻触及时代精神,体现和弘扬了发展中的英格兰民族意识,极大地推动了英语语言的发展,基本奠定了英语文学传统。中世纪后期英国文学家和学者在英格兰民族形成和民族意识高涨时高度颂扬乔叟的杰出贡献,广泛借鉴和模仿其诗歌艺术,确立了他经典作家和“英诗之父”的地位。他们对乔叟及其作品的经典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乔叟奠定的英语文学传统,确定了英语文学发展的方向,还为伊丽莎白时代英语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乔叟 中世纪后期 经典化 民族意识 英语文学传统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077-12

基金项目: 中国社科院重大创新课题“外国经典作家学术史研究”的子课题“乔叟学术史研究”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Title: The Canonization of Chaucer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Abstract: In a period when England wa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Chaucer refined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laid down the basic tradition for English literature. At the time when the English nation was taking shap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as on the rise, late medieval English poets and scholars canonized Chaucer. They praised him for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established him as “the father of English poetry.” The canonization of Chaucer wa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his influence on the future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us paved the way for the literary greatness of the Elizabethan age.

Keywords: Chaucer, late Middle Ages, canonizatio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English literary tradition

Author: Minghan Xiao,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莎士比亚逝世后，其主要竞争对手、桂冠诗人本·琼生（Ben Jonson）赋诗悼念。尽管他与莎士比亚创作理念不同，且私下对莎氏也颇有微词，但他在诗中颂扬对手，说“他不归某一时期，而属千秋万代”（288）。对这样的赞誉，莎士比亚显然受之无愧，这表明真正伟大的文学家甚至能赢得对手的钦佩。在英国，另一位对这样的赞誉受之无愧且赢得了历代文学家乃至“对手”们尊敬的诗人是乔叟。他早在15世纪就被尊为“大师”和“父亲”，此后从未有人与他争夺“英诗之父”的荣耀。不仅如此，唯有他拥有英语世界历史上最长久且从未间断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而乔叟研究本身在英语文学领域也已形成一个重要传统。可以说，一部乔叟学术史既是乔叟经典化的历程也是一部英语文学批评史的缩影。

一个作家的经典化历程是他的文学成就、思想和艺术中方方面面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从不同视角被逐渐揭示出来并加以系统阐释，为历代文学家所借鉴和发扬，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文学传统的历史。一个伟大文学家的经典化是他与时代的对话，且随时代变迁不断推进，没有终点。一些作家在生前或一定时期内声誉卓著，但可能经不起时间考验，终被历史淘汰。乔叟的朋友高尔（John Gower）和15世纪英国最重要的诗人莱德盖特（John Lydgate）直到16世纪中期仍大体与乔叟齐名，但文艺复兴后期，他们都逐渐被乔叟抛在后面；现在他们仅被视为中世纪作家，而不属于所有时代。

一

自14世纪以来，英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经历了巨大变化，乔叟“英诗之父”的地位却日益巩固。他经受了时间考验和不同学术思想的挑战，回应了各时代的需求，名副其实地属于所有时代。反过来看，乔叟学术史，乔叟经典化历程，也从一个特殊角度折射出英国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变迁和英格兰民族的发展；因此研究乔叟的经典化也可从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侧面审视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和英格兰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发展。

在乔叟的经典化历程中，正处于英格兰民族形成和民族意识高涨时期的中世纪后期的文学家和学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开启了经典化乔叟的历史，其努力和成就本身也具有特殊意义。乔叟是中世纪英国正经历深刻变革时期那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造就的伟大诗人，其作品触及时代脉搏，其成就最好地体现了时代精神。中世纪后期的文学家和学者与乔叟大体处于同一历史语境，对乔叟奠定英语文学传统的艰辛身同感受，对他的成就由衷敬佩并倾心借鉴。在认识乔叟的成就、贡献和历史地位上他们有其特殊优势，同时他们经典化乔叟也是时代需要。

乔叟在英语文学草创之初，在英语还非成熟的文学语言之时，通过广泛借鉴和不倦实验与探索，创新了英诗诗艺，确定了未来英诗发展的方向，创作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坎特伯雷故事》等许多永远令英语世界骄傲的传世佳作，基本奠

定了600多年来的英语诗歌传统。毫无疑问,乔叟在生前已是英格兰诗坛的重要人物,同时代英国重要作家如高尔和乌斯克(Thomas Usk)在作品里都对他表达了敬意;法国著名诗人德尚(Eustache Deschamps)在14世纪80年代就为他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将他同苏格拉底和维吉尔相比,给予了当时最高的赞誉(Burrow 26-27)。

但现存文献显示,当时英国国内提到乔叟的都是与其同属伦敦派的文学家,他们所赞颂的也只是他的爱情诗作;而英格兰另外一批重要文学家头韵体复兴运动的诗人,则对他只字未提。尽管德尚是法国人,但英国文坛和法国诗界当时联系紧密,且他们都在宫廷爱情诗传统中创作,他也主要是把乔叟作为法诗《玫瑰传奇》(*Le Roman de la Rose*)的译者和思想深刻的爱情诗人来颂扬。严格说,乔叟生前主要是被一些贵族上层和宫廷文人认为是一位重要甚至杰出诗人,但其作品还没被视为英格兰文学典范而被广泛借鉴与模仿:他还没有真正被经典化。

乔叟开始被经典化是在15世纪初的亨利五世时期。那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时代,是英格兰民族形成、民族意识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英国特别需要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学以体现民族意识和弘扬民族精神,被后世尊为“民族诗人”^[1]的乔叟无疑最好地代表了英格兰精神,他的创作特别突出地体现了民族意识。那个特殊时代把乔叟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声名不仅遍及英格兰文坛而且他的诗作还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苏格兰诗歌。

15世纪前期英国的社会和文化,英格兰民族在此时的形成,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14世纪一系列重大变革和事件的必然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英法之间那场断断续续长达百余年的战争,史称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同时“铸就”了英格兰和法兰西民族^[2]。百年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变革的深化、爱国热情的高涨,特别是英格兰民族发展的加速,既是乔叟文学创作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基础,也是乔叟随即被经典化的重要原因。

在战争前期,在爱德华三世和黑王子领导下,英国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法国国王和一大批贵族在战争中被俘。受胜利刺激,加之统治阶层为鼓动民众支持战争而大力宣扬,以及不间断举行大型骑士比武,爱国热情和骑士精神在14世纪中期迅速升温,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骑士精神也成为当时英格兰宫廷文化的核心组成,并超越传统意义,成为英国人爱国热情和英格兰民族精神的载体和表达。所以毫不奇怪,流传至今并在英国政治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嘉德骑士制(the Order of the Garter)就产生于这样的氛围中。

乔叟从进入王府当童仆起,就浸淫在这种文化中,并在这样的氛围里开启创作生涯。《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乔叟”条目指出,“骑士精神对乔叟所有的作品都是生死攸关的空气,是使它们迅速发芽并养护它们成长的雨露、和风与阳光”(Minto 453)。所以说,乔叟大量作品都是以弘扬骑士精神为主题,其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骑士的故事》(*The Knight's Tale*)是英国历史上诠释中世纪骑士精神最杰出的诗作。乔叟作品触及时代脉搏,也是时代精神最好的文学表达。

不仅如此,在中世纪以及随后各时期的英国人看来,乔叟特别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推动

了英语语言的发展，并奠定了英语文学传统。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6—11世纪），古英语是当时欧洲唯一的民族书面语言和文学语言，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古英语诗歌。与古英语语言和古英诗同时，英格兰民族也开始形成。但诺曼征服（1066）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结束了古英语的官方书面语地位，终结了古英语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当时所有西欧国家一样，拉丁语在英格兰是流行于官方、教会和学术领域的超级语言。12世纪以后，随着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新诗和北部浪漫传奇的发展与繁荣，法语诗歌引领欧洲文坛两个多世纪。在讲法语和遵循法国文化的盎格鲁—诺曼王朝和贵族阶层主导下，法语也成为英国的官方书面语和主要文学语言。于是英国便出现了教会和学术界使用拉丁语，官方和文学界流行法语，广大普通民众讲英语的局面。在失去官方语言的地位后，曾高度发达且产生出《贝奥武甫》、《十字架之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流浪者》（*The Wanderer*）等优秀作品的英语，随即“沦落”为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之口语，无论作为书面语还是文学语言都极不成熟。然而因祸得福，正是这样的“沦落”使原本已经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的古英语再一次回到广大民众的生活中，不仅没有像拉丁语那样永远成为“死”的语言，反倒历经巨大变化之后再生为充满生气的中古英语，为未来英语文学的发展和辉煌奠定了基础。

乔叟特别伟大之处在于，在中古英语书面语尚不成熟之时，他却倾其一生用英语创作。在当时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重要作家如高尔、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等都用了拉丁语撰写学术或他们认为更高雅的著作，唯有乔叟将民族语言用于所有创作。他广泛借用其他语言的词汇与表达法，通过长期实验，探索出符合中古英语特点的节律和韵式，创作出可以与任何时代的杰作相媲美的传世佳作，不仅指明了英语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奠定了英语文学的传统，而且使英语发展成为可以同法语和意大利语相媲美的文学语言，能胜任任何体裁的创作。当然，中古英语如此重大的发展并非乔叟一人之力，但他对英语语言无与伦比的贡献得到了自15世纪以来所有时代的重要诗人、学者一致的颂扬。

二

由于这些重要成就和贡献，乔叟在去世后不久的15世纪初，特别是亨利五世时期开始被经典化。亨利五世是一位负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期间，英国在百年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以致他死后，英军尚能攻占巴黎，他年仅11个月的孩子也加冕为法国国王。同时，亨利五世还是一位见识非凡的政治家，在推动民族团结、促进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和民族意识的发展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在亨利五世时期，英格兰民族因诺曼征服造成的统治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的长期分裂的局面终于结束。诺曼征服改变了英国历史的方向和英格兰民族发展的进程。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廷斯战场上和随后几年的平叛战争中，系统地消灭了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用诺曼人

和他在欧洲各地招募的追随者缔造出一个掌控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的新贵族阶级。这个阶级凭借在战场上赢得的权力使自己从欧洲大陆带来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成为英格兰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在大陆的财产和利益，没有中断与大陆的联系。前7位英国国王主要住在大陆。英国王室和高等贵族也主要是同大陆，特别是法国王室和贵族通婚，直到14世纪，英国王室和高等贵族仍然主要讲法语，崇奉法国文化。此时的英国统治阶级和广大普通民众还没有真正融合为一个统一民族。

一个民族往往是在同外部的冲突中形成。百年战争为英格兰民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契机，刺激了英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也使“外来”王室和贵族最终融入英格兰社会，成为真正的英国王室和英国贵族。早在14世纪，英国王室和贵族就能讲英语，熟悉英国文化，但他们为保持优越感有意同普通民众拉开距离。然而长期的对外战争迫使英国统治阶层同本国人民共命运同患难，并认同本国文化，而不是同敌人和敌国文化联系在一起。正是在百年战争中，各阶层的英国人最终成为一个具有统一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一致对外的民族。这绝不是说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之间没有矛盾冲突，实际上在这期间，英国阶级矛盾有时十分尖锐，如1381年就爆发了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矛盾冲突并不影响各阶层对统一民族的认同。乔叟诗作最好地体现了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在《坎特伯雷故事》里，僧俗两界上至贵族下至农夫工匠几乎所有阶层的30位男女香客象征性地组成了一个统一的英格兰社会，他们之间充满矛盾冲突，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但都朝一个大的共同目标和方向前进，斗而不破。这样的冲突与统一在乔叟名作《百鸟议会》(Parlement of Foules)里也有突出表现。

民族意识的加强和升华反过来要求和促进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发展，因为民族意识需要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来表达和弘扬。为得到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爱德华三世曾到议会演讲，说法国人妄图“毁灭英语”(Coleman 34)。对于骑士大比武这一当时十分重要的活动，除1348年用法语箴言(mottos)外，他为其他所有大比武选用的箴言全是英语。在对法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后，英国议会在1362年第一次用英语开幕并在发言中使用英语；同年国会决定，诉讼程序一律使用英语^[3]。虽然该决议未能完全执行，在习惯法^[4]法庭上，法语一直使用到1731年，但其他法庭都陆续使用英语。同样也是在1360年代，商业和政府部门的口头语言似乎已经是英语(Fisher 8)。由此可见，在爱国热情高涨、民族意识大为发展的1360年代，英国朝野都很重视提高英语的地位，而乔叟正是在这时期开始其文学创作。

到15世纪，英语地位继续上升，亨利五世极为重视激发英国人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他还是王子(即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尔王子”)时就大力提倡使用英语和发展英语文学。他身体力行，是第一位用英语写手谕的国王。1417年，他第一次用英语给大法官下手谕；此后，他的正式手谕全都用英语。他特别注意语法规则和修辞，其手谕是当时书面英语的典范，为众人所模仿(Fisher 9)。到1430年，英语取代法语成为英国国会和政府文件的官方语言。百年战争开始后，经几代人长达百年的努力，英语终于从下层民众的口语上升到全民族的语言和官方语言。这一过程几乎同百年战争相始终，这也是诺曼征服之后英语文学第一次大繁荣

时期。在英语书面语和文学语言的发展以及英语文学的创作中，乔叟的贡献无与伦比。

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亨利五世自然意识到文学的特殊意义，所以一直鼓励和赞助诗人们用英语创作。早在登基之前，他在1412年授意当时最著名的诗人莱德盖特“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翻译特洛伊的故事（Crow and Olson 146）。他特别重视特洛伊故事，是为了表明不列颠同古罗马一样^[5]承接辉煌的特洛伊文明以激发英格兰人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因为在不列颠民间传说乃至一些“史书”，比如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那部在中世纪影响广泛的著作《不列颠君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里，不列颠被认为是由特洛伊后裔所创建，伦敦也被称为“新特洛伊”（Troia Nova）。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莱德盖特创作了一部长达3万余行的诗作《特洛伊书》（*Troy Book*），这至今仍是英语文学史上最长的诗篇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诗人们在1410年前后所写的许多作品，其中包括那些涉及对乔叟赞颂的诗作，大都与亨利王子有关。这些诗要么献给亨利，要么由亨利授意所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乔叟的名声迅速上升；从1407年起，他就被许多诗人热情歌颂，被尊为“乔叟大师”（*mayster Chaucer*）和“父亲”（*fadir*）（Fisher 148-50）。

莱德盖特是15世纪最著名的乔叟派诗人，也是乔叟儿子托马斯的朋友，曾见过老诗人。他几乎在所有作品中都提到和称颂他的“乔叟大师”，说他第一个用“黄金般的甘露”滋润“我们的语言”，“使我们的语言完全改变”（转引自Lauritis 426）；所以“您是我们英格兰民族语言/诗人之花，你前无古人，/用修辞的花朵使我们的语言美丽辉煌”（转引自MacCracken 65）。特别有意义的是，他说并非只有少数人颂扬乔叟，“整个国度都对他唱出赞美之声，/因为他是我们语言之北极星”（转引自Bergen 7）。这与乔叟生前只为少数人所知的情况极为不同。莱德盖特还专门用一个长达200多诗行的段落逐一简述和评价乔叟诗作。这表明他对乔叟作品十分熟悉，而非对他的大师只给予空泛赞扬。温迪亚特（Barry Windeatt）指出：“莱德盖特对乔叟的赞颂是如此频繁和持续不断，而且莱德盖特自己的作品是那样广为流行，他实际上确立了15世纪赞颂[乔叟]的标准。”（Windeatt 3）希尔默（Walter F. Schirmer）也说，自莱德盖特之后，对乔叟如此赞颂，后代诗人从未中断，乔叟也被后继者们尊为“诗歌艺术之花”“我们美丽语言的第一位奠基者”“不列颠的崇高辞章诗人”（Schirmer 32）。

同莱德盖特一样，15世纪前期另一位著名乔叟派诗人霍克列夫（Thomas Hoccleve）也曾见过乔叟。他“为让人们牢记他的形象”（Hoccleve 47），凭记忆画了一幅乔叟肖像。此后，包括浪漫派诗人和艺术家布莱克等都根据这幅肖像以及他们对乔叟作品、特别是《坎特伯雷故事》的理解，画出大量乔叟肖像，突出乔叟作为诗人的一些特点。这些肖像也成为经典化乔叟的一个方面。霍克列夫还高度颂扬乔叟，将他比作亚里士多德和维吉尔：“在我们语言中，谁是哲学领域/亚里士多德之传人，不是您还能有谁？/而且无人不知，您还漫步/在维吉尔的诗歌之路。”（47）他用不少诗行热情赞美他的“大师”和“父亲”，称他为“亲爱的导师和敬爱的父亲，/我的乔叟大师”（转引自Brewer 133）。他因此成为最早尊乔叟为“父亲”的诗人。后来这一称谓一直为乔叟独享，并最终定格为“英诗之父”。

除这两位见过乔叟并对他执弟子礼的诗人外，其他诗人也参与了乔叟的经典化。一位佚名作者在诗作《典雅之书》(*The Book of Courtesy*)中，称颂乔叟为“华美语言之父与雄辩的奠基人，/您给整个不列颠带来光明”，并说“父亲乔叟”“大师杰弗里”“从未离去，他和我们同在”(Burrow 44)。他也强调乔叟“给整个不列颠带来光明”。可见，乔叟不仅被视为杰出作家，还是全民族的诗人。在日不落帝国达到顶点、英格兰民族意识再次大发展的维多利亚时代，经典化乔叟达到另一高潮，乔叟是民族诗人的观点也将进一步发展和升华。

三

经典化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不是赞誉，经典化的核心是借鉴和模仿，是继承和发扬。一个时代的赞誉很可能在下一个时代被遗忘，许多名重一时的作家都不幸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只有被不断借鉴和模仿才有可能使一个作家进入生生不息的传统。所以，一位作家是否真正被经典化要看他是否活在后辈的创作之中，是否进入文学发展的主流甚至决定其方向，他的传统是否被继承和发扬。乔叟在中世纪后期被经典化的最重要标志是，几乎所有主要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诗人们都在创作中广泛借鉴和模仿乔叟。正是他们的借鉴和模仿继承和发展了乔叟奠定的传统，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英诗之父”。

修道士莱德盖特是15世纪最重要也是最多产的英国诗人，留下14万多行诗作。他在诗艺和内容上都追随他的大师，许多作品都是对乔叟诗作的借鉴、模仿与扩充。他的《黑衣骑士怨歌》(*The Complaint of the Black Knight*)源于乔叟的《公爵夫人书》(*The Book of the Duchess*)。其代表作之一、长达3万余行的《特洛伊书》，使用的基本韵律正是乔叟创造的五步抑扬格。他那部3万6千余行的《王者之败落》(*The Fall of Princes*)是遵格拉斯哥公爵之命创作，至今仍是英语中篇幅最长的诗作。它基本上是按乔叟的悲剧模式和薄伽丘的《名人落难记》(*De Casibus*)对乔叟诗作《修士的故事》中那些短小“悲剧”以及其他类似故事的大幅度扩充。另一部重要作品《底比斯之围》(*The Siege of Thebes*)以乔叟《骑士的故事》为蓝本，甚至模仿《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借用乔叟创造的朝圣旅程这一叙事框架，把自己描写成一名香客，加入乔叟的朝圣行列，同他们一样讲述自己的故事。莱德盖特自己没有创立诗歌传统，但他的重要地位和他的作品在当时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广泛影响对乔叟开创的英诗传统的确立和发展很有意义。尽管没有他的推崇，乔叟也迟早会被经典化，但他无疑是经典化乔叟的第一人；可以说，他在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继承和发展乔叟奠定的音步体英诗传统，同其他乔叟派诗人一起，使之在与15世纪头韵体英语诗歌复兴运动的竞争中最终胜出，成为近现代英语诗歌的主流。

霍克列夫同莱德盖特一样是乔叟诗歌艺术的崇拜者。虽然不像莱德盖特那样直接以乔叟作品为创作蓝本，但他更注重遵循乔叟的诗艺和发扬乔叟创作中关注生活现实的倾向。他的

主要作品都是按乔叟创造的英诗诗艺创作。他特别喜欢每节七行、韵式为ababbcc的所谓“乔叟诗节”，即后来被称为“君王体”（rhyme royal）的著名诗节形式。“乔叟诗节”是乔叟受法国诗歌启发而创造，特别适用于叙事。它最先用于《百鸟议会》，后用于《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以及《坎特伯雷故事》里风格比较高雅的故事。这种诗节是十五六世纪英语叙事诗中最常用的诗体，后来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许多诗人都用过，成为英语诗艺的重要组成。

乔叟诗节之所以被称为“君王体”，据说是因为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创作的名著《国王之书》（*The King is Quair*）使用了这种诗体。该诗作者在书中高度赞扬乔叟，说他“像桂冠诗人一样至高无上”（McDiarmid 117）。除使用乔叟诗节外，《国王之书》还在宫廷爱情内容和风格上广泛借鉴和模仿乔叟作品，特别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成为苏格兰第一部重要的宫廷爱情叙事诗；乔叟开创的英诗传统也逐渐成为苏格兰诗歌的主流传统。

在十五六世纪，苏格兰诗人特别推崇乔叟。当时苏格兰还是独立王国，乔叟对苏格兰文学的重大影响有助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文化融合，有效促进了两个地区的统一。除《国王之书》的作者，这时期最著名的苏格兰文学家如罗伯特·亨利逊（Robert Henryson）、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沃特·肯尼迪（Walter Kennedy）、格文·道格拉斯（Gawin Douglas）、大卫·林德赛（David Lyndsay）等诗人都深受乔叟影响，被统称为“苏格兰乔叟派”（Scottish Chaucerians）。

苏格兰诗人不仅参与了乔叟的早期经典化而且将他苏格兰化。他们广泛借鉴和模仿乔叟，在苏格兰社会文化语境中运用乔叟诗歌艺术，开创了苏格兰文学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亨利逊被认为是“苏格兰乔叟派中最接近乔叟的诗人”（Fox 172）。其代表作《克瑞西达的遗嘱》（*The Testament of Cresseid*）可以说是专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写的续篇，对克瑞西达的背叛给予严厉惩罚。邓巴则突出地借鉴了乔叟的诗歌语言艺术。他说乔叟“用天堂般美妙的鲜活言辞/使我们的语言光辉无比。/因为你，英语将世上一切语言超越”（转引自Kinsley 37）^[6]。他模仿乔叟为理查德二世的婚事撰写的名著《百鸟议会》，创作了《蓟与玫瑰》（*The Thrissil and the Rois*）以祝贺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豪华婚礼。同《百鸟议会》一样，邓巴诗作里的聚会也由自然女神主持，只不过乔叟的参会者只有鸟类，而邓巴将走兽和植物也包括进来。邓巴同时代诗人道格拉斯在他的《埃涅阿斯记》译本第一部的引言中，将“尊敬的乔叟，无与伦比的诗人”比作“天堂的号角”“测时的日晷和规则的制定者”，感谢他为英语诗歌“带来生命的清泉”（Douglas 14）。不仅如此，他的长篇诗作《荣誉之宫》（*The Palace of Honour*）从标题到内容都借鉴乔叟的《声誉之宫》（*The House of Fame*），而且从格律和诗节形式、语言的使用到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荣誉之宫”的描写，他都直接模仿《声誉之宫》和乔叟其他诗作。福克斯（Denton Fox）认为，《荣誉之宫》“不仅表明道格拉斯多么受惠于乔叟，而且还反映出他对乔叟的理解是多么深刻——道格拉斯这部诗作是一部对《声誉之宫》非常有意义的评论”（Fox 193）。

在16世纪，当苏格兰和英格兰冲突日益严重，苏格兰面临被吞并的威胁时，乔叟在苏格

兰仍享有崇高地位。《苏格兰的怨诉》(*The Complaynt of Scotland*)是苏格兰文学史上第一部散文作品,作者可能是一位名叫罗伯特·威德邦(Robert Wedderburn)的苏格兰人。这部作品是苏格兰人面对英格兰的军事和文化入侵做出的应对。针对英格兰关于苏格兰属于英国的宣传,它强调苏格兰从来就是独立王国。然而作者在讲述苏格兰文化传统和文学渊源时列出的一份苏格兰人喜爱阅读的书单里,位列第一的竟是《坎特伯雷故事》(Mackenzie 26)。由此可见苏格兰诗人和学者经典化乔叟的成就:乔叟诗歌已深入苏格兰主流文学,“英诗之父”已成为苏格兰人崇敬的经典作家。

四

乔叟经典化历程上特别重要的一步发生在15世纪后期。大约在1476年,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将印刷术引进英国,在西敏寺创建了第一个印刷所,新技术随即参与到乔叟的经典化中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卡克斯顿是一位成功商人,在欧洲大陆经商达30年之久,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见解独到的文学评论家和眼光独到的版本学家。他生活在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转变的时代,深受人文主义和各种新思想影响,回英国后全身心投入英国文化建设,甚至亲自翻译出版了20多种著作。他的印刷所最早出版的书籍中包括大多数乔叟的主要著作,如《坎特伯雷故事》(短期内出了两版)、《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声誉之宫》、《安妮丽达和虚假的阿塞特》(即《安妮丽达和阿塞特》, *Anelida and Arcite*)、《铜殿》(即《百鸟议会》)以及译著《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等。其他新成立的印刷所也纷纷出版乔叟作品。品逊(Richard Pynson)的印刷所和沃尔德(Wynkyn de Worde)的印刷所分别于1492年和1495年出版了《坎特伯雷故事》。在印刷费用不菲,能阅读诗作的人不多的情况下,短期内这样一部大部头诗作仅在伦敦就出了4个版本,这在当时极为罕见,充分反映出“英诗之父”在英国人心目中经典作家的崇高地位。

卡克斯顿在他为乔叟著作写的前言后语中还留下了许多极有见解的评论文字。他高度评价乔叟被后世尊为“英诗之父”的那些重要成就,颂扬乔叟对英语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和高超的英诗艺术,称他为“高尚而伟大的哲人”和“桂冠诗人”(转引自Blake 61)。他第一个注意到乔叟诗作的现实主义倾向。他说:“我决定印刷《坎特伯雷故事》,因为我在里面发现许多关于每一个行业和阶层的绝妙故事。”他强调诗作里“每一个行业和阶层”,是在表明乔叟是对整个英国社会和英格兰民族“尽可能真实的描写”(62)。换言之,他不惜重金一再出版这部著作就因为它真实地描写了英国社会和英格兰民族。他从大陆回到正处于文艺复兴前夕的英格兰,作为一个在文化领域引领潮流的知识分子,得风气之先,敏锐地感觉到英格兰民族意识正在高涨,并认识到被他称为“令人崇敬的父亲”的乔叟及其诗作最好地表现了英格兰民族感,所以他说:“我认为,他理应得到高尚的英格兰王国永恒的赞誉与感谢。”(59)于是

他的印刷所一建立就着手出版乔叟著作。

先进的印刷技术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大量书籍投放市场，完全改变了中世纪羊皮纸手抄本价格昂贵、数量极少的状况，使乔叟的作品更容易到达学者、文学家甚至一般读者手中。不过，新技术的参与能极大地推进乔叟的经典化，不仅仅因为它拓宽了乔叟诗作的受众，还在于具有专业的文献和版本学知识的学者能为读者提供尽可能高质量的版本。中世纪誊抄员（scribe）往往因为知识的局限、工作的疏忽和其他一些原因造成错讹，甚至随意改动原作；因此中世纪手抄稿，特别是那些几经转手的手抄稿，一般都存在许多错误甚至重大缺陷。乔叟本人就曾写过一首小诗《乔叟致誊稿人亚当》（“To His Scribe Adam”），抱怨亚当“未能誊抄忠实”且“过于疏忽”，以致诗人不得不“每天/花尽了功夫去删改、去擦抹”（乔叟 756）。他十分担心自己死后誊抄员会损坏他的诗作。他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结尾专门表达了这种担心：“主啊，不要让人因此抄错，/也不因其发音不准搞错韵律。”（Chaucer 479）然而他不幸言中，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乔叟作品手抄稿（仅《坎特伯雷故事》就有 80 多种）都是在他死后，于 15 世纪誊抄的，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错讹。尽管卡克斯顿没能也不可能一一修订^[7]，但他尽自己所能订正了一些错误；而且在第一版《坎特伯雷故事》（大约 1478 年）出版后不久，他从朋友处得到另外一部手抄稿，尽管它与前一版只稍有差别，但他认为更好，于是在 1484 年毫不犹豫地根据该稿本出了第二版。这反映出他对乔叟的景仰和对这部杰作的高度推崇，同时也体现了他作为学者的严谨和对英国文化事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在英国文学史上，乔叟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犹如处于乔叟时代和文艺复兴两座高峰之间的一块谷地，没有人取得特别令人骄傲的成就，但它连接沟通那两个伟大时代，在英国文学发展史上十分特殊而且重要。自 14 世纪中期以来，英格兰文坛出现了以乔叟为代表的音步体新诗和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英诗头韵体的复兴运动两大流派的兴盛与竞争，且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可以同任何时代的作品媲美的杰作。它们共同创造了英语文学的第一次繁荣，也把英国诗歌的发展带到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中世纪后期的文学家和学者们在英格兰民族形成和民族意识高涨的大环境中，以开放的心态，敏锐地做出了正确选择。他们选择了更符合自诺曼征服以来已经深刻改变了的中古英语语言特征，更能体现正在蓬勃发展的英格兰民族精神，更能代表未来英语文学的新诗运动。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精心细致地消化吸收乔叟时代的成就，广泛而持之以恒地颂扬、借鉴、推广乔叟。他们经典化乔叟就是为英语文学发展选择了乔叟奠定的文学传统，这对未来英语文学的发展、对文艺复兴时期英语文学的大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15 世纪诗人和学者经典化乔叟的贡献很快得到确认。在随后兴起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中，在英格兰民族意识日益高昂的时期，乔叟“英诗之父”的地位进一步上升。1542 年，英国颁布新法案以“清除王国内所有异端邪说”，改革运动前的大多数书籍和文章遭禁，文学界只有乔叟和高尔两位诗人的著作被容许阅读，且在可阅读的文学作品中只有《坎特伯雷故事》被专门提及（Simpson 266）。更重要的是，到伊丽莎白时代，当英语文学达到史上最繁荣时，

包括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诗人都在借鉴乔叟诗作，而“莎士比亚受惠于乔叟超过”其他“任何前辈”（Bloom xi）。这些伟大的文学家像他们 15 世纪的前辈一样，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其特殊的方式继续经典化乔叟，进一步发扬乔叟奠定的文学传统。

通过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家的进一步经典化，乔叟的崇高地位最终确立，他的传统得以发扬。18 世纪最著名的英国诗人之一蒲伯说：“要指出我国诗歌大的发展走向很容易：乔叟、斯宾塞、弥尔顿和德莱顿是其主要标志。”（转引自 Spence 84-85）美国诗人和学者爱默生也指出：“在我们所有早期文学中，乔叟的影响显而易见；近期以来，不仅蒲伯和德莱顿受惠于他，而且在所有英语文学家那里，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大量从他那里得来但没有被公开承认的恩惠。”（Emerson 113）如同所有最伟大的经典作家，乔叟属于或者说活在所有时代。

注释 [Notes]

- [1] 同样在民族精神高涨的维多利亚时代，许多学者，如道森等称他为“民族诗人”。参看 George Dawson. *Chaucer. Biographical Lectures*, edited by George St. Clair. Kegan Paul, Trench and Co., 1887.
- [2] 许多学者论及这场战争对英格兰和法兰西两大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参看 David Green. *The One Hundred Years War: A People's History*. Yale UP, 2014. 特别是其中第 10 章: National Identities: St George and *La Mere France*。
- [3] 作者不详,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1/14/2003 <icg.fas.harvard.edu/~chaucer/language.html>.
- [4] 习惯法 (common law), 即非国会制定的法律, 而是由古老习俗或者法官判例演变而来的法律。
- [5] 中世纪人相信古罗马是由特洛伊后裔创建; 罗马诗人维吉尔那部在中世纪影响广泛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就主要是描写劫后余生的特洛伊人在埃涅阿斯率领下远渡重洋到意大利创建罗马。
- [6] 邓巴称英语为“我们的语言”, 因为低地苏格兰地区同英格兰一样使用英语。
- [7] 经过历代学者们不懈的集体努力, 特别是维多利亚时期学者们的系统搜集、考证与研究, 到 19 世纪末才基本订正了这些错讹, 为现代读者和学者提供了高质量的乔叟全集版本。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Bergen, Henry, editor. *Fall of Princes*. Oxford UP, 1967.
- Blake, N. E., editor. *Caxton's Own Prose*. Andre Deutsch, 1973.
- Bloom, Harold. Introduction. *Bloom's Classical Critical Views: Geoffrey Chaucer*, by Harold Bloom. Inforbase, 2008, pp. xi-xiii.
- Brewer, Derek. *English Gothic Literature*. Macmillan, 1983.
- Burrow, J. A., editor. *Geoffrey Chaucer: A Critical Anthology*. Penguin, 1969.
- Chaucer, Geoffrey. *Chaucer's Works*. Translated by Zhong Fa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1979. [乔叟:《乔叟文集》, 方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 Coleman, Janet. "English Cultur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haucer and Italian Trecento*, edited by Piero Boitani, Cambridge UP, 1983, pp. 33-63.
- Crow, Martin M., and Clair C. Olson, editors. *Chaucer Life-Records*. Oxford UP, 1966.
- Douglas, Gawin, translator. *The Eneid of Virgil*, Vol. 1. AMS, 1971.
- Emerson, Edward Waldo. "Shakespeare, or the Poet." *The Collected Wor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edited by Douglas Amory Wilson, Vol. IV, Belknap, 1987, pp. 109-25.

- Fisher, John H. *The Importance of Chaucer*. Southern Illinois UP, 1992.
- Fox, Denton. "The Scottish Chaucerians." *Chaucer and Chaucerians*, edited by D. S. Brewer, Nelson, 1966, pp. 164-200.
- Hoccleve, Thomas. "De Regimine Principum on Chaucer." *English Poetry (1170-1892)*, selected and edited by John Matthews Manly, Ginn, 1907, p. 47.
- Jonson, Ben. *The Works of Ben Jonson*, Vol. 3. Chatto and Windus, 1910.
- Kinsley, James, editor. *The Poems of William Dunbar*. Oxford UP, 1979.
- Lauritis, J., et al, editors. *The Life of Our Lady*. Dusquesne, 1961.
- MacCracken, Henry Noble, editor. *The Serpent of Division*. Henry Frowde, 1910.
- Mackenzie, Agnes Mure.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cottish Literature to 1714*. Alexander Maclehose, 1933.
- McDiarmid, Matthew P., editor. *The King is Quair of James Stewart*.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73.
- Minto, William. "Chaucer."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and General Literature*, edited by Thomas Spencer Baynes, 9th ed., Vol. V, Henry G. Allan, 1891.
- Robinson, F. N., editor. *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 Riverside, 1957.
- Simpson, James. "Chaucer's Presence and Absence, 1400-1550."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aucer*, edited by Piero Boitani and Jill Mann, 2nd ed., Cambridge UP, 2003, pp. 251-69.
- Spence, Joseph. *Anecdotes, Observations, and Characters of Books and Men*. John Murray, 1920.
- Schirmer, Walter F. *John Lydgate: A Study in the Culture of the XV Century*. Translated by Ann E. Kee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1.
- Windeatt, Barry. "Chaucer Traditions." *Chaucer Traditions: Studies in Honour of Derek Brewer*, edited by Ruth Morse and Barry Windeatt, Cambridge UP, 1990, pp. 1-20.

◇责任编辑：谢文玉

大众传媒与美国小说的演进

◎ 朱振武 周博佳

内容提要: 就美国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 大众媒介形态的变化在美国本土小说的兴起和繁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众传媒不仅影响了民族文学所赖以存在的传播条件, 而且随着大众传媒自身形态的变化, 小说的诸种审美要素也在不断地运动和重组。不仅如此, 大众传媒本身的一些特性如受众广、商业性和娱乐性强等特点也给小说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当下电子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人们阅读和思维的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而美国小说也在传统与革新中继续引领世界文学的创作潮流。

关键词: 大众传媒 美国小说 电子传媒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089-09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Title: Mass Media and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Fiction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iction, the gradually varied form of mass medi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merican fiction's rise and popularity. Mass media affects American fiction's conditions of propagation, and consistently reshapes and restructures its aesthetic elements. The arrival of the electronic media age has brought about huge changes to people's reading and thinking habits. Currently, American fiction has kept its leading place in world literature by inheriting and renovating its literary tradition.

Keywords: mass media, American novel, electronic media

Author: Zhenwu Zhu, Professor,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Bojia Zhou,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1980年代以来, 随着女性主义批评、新左派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起, 对文学与大众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也开始大量出现。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争论与怀疑, 这不仅因为大众文化一直是各种思潮及社会权力争论的场所, 也因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辩在战后尤为引人注目。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小说研究逐渐脱离传统文学批评的窠臼。随着消费社会研究、媒介理论的兴起, 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及跨学科的态势。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产物, 媒介批评自1930年代至今在西方已羽翼日丰, 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rzarsfeld)、阿多诺(Theodor Adorno)、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及霍尔(Stuart Hall)等学者对媒介的本体论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媒介在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下所发挥的作用,并阐发媒介伦理及媒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麦克卢汉曾为媒介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媒介即信息”(33),即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信息,或者说人类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媒介才能从事与之相应的传播及社会活动。而小说同样与媒介的发展及变化密不可分。

就美国文学而言,虽然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有着悠久的口头文学历史,但美国文学的发端是以印刷文化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兴起为基础的,并且“在书籍逐渐商品化的过程中,从报纸连载小说、一角钱小说,到廉价通俗杂志、面向大众的纸皮书和网络书店的出现,当然还有畅销小说及其发生体系,每一次的发展进步都由美国发明并完善”(John Sutherland 4)。这与美国发达的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不无联系。从美国小说发展历程看,早期国内的报纸杂志为本土小说家提供了媒介基础,到19世纪中期以后,中产阶级读者不断扩大,印刷体文学种类和数量激增,在这种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和传统媒体兴盛的背景下,美国小说逐渐走向了繁荣。而在电子媒体时代,大众媒体不仅改变了美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方式和技巧,也改变了小说阅读方式。可以说,在美国小说史上,大众传媒通过改变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而间接地改变文学,不仅深刻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技巧、形态,重组了文学内部审美要素,而且从外部直接影响了小说的传播及其社会功能。

一、早期传媒环境与美国小说的肇兴

从很大程度上说,人类文化是在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美国学者萨丕尔(Edward Sapir)指出,“社会仅仅在表面上是一些社会机构的静态总和,它实际上日复一日被一些因为个体参与其中而具有传播性质的特别行为所创造、改变并重新确认”(78)。美国早期文学及文化的构建和发展就与印刷业以及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的初步发展密不可分。早期欧洲移民带来的印刷术是美国大众文化得以发展的技术基础。新英格兰拓殖初期的移民大多是受过教育的手工业主和私人产业主,北美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广阔的土地使他们在拥有一定产业的同时,也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新英格兰文学的最先发展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因为“1800年时新英格兰的文化普及率就已经最高,学院、大学、出版社、报纸和杂志的数量也最多”(路德克 126)。大众文化的兴起则带来了早期的杂志和期刊,这些早期杂志为美国人创造独特的美国声音、建构本土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

印刷术的发展为美国图书出版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早在17世纪初,图书出版商就随着欧洲移民来到了北美大陆,1640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清教徒出版了基督教赞美诗《海湾诗集》(*Bay Psalm Book*),这是在北美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印刷书籍。随后,在殖民地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印刷业开始发展起来,“英国各城市直到1693年最后一项限制法令废除之后,才有印刷厂……但是到那一年的年底,在北美各个殖民地,坎布里奇、波士顿、圣玛丽城(在

马里兰)、费城和纽约等城市都已经有了印刷出版机构”(布尔斯廷 373),而印刷业在殖民地的生活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 1775 年独立战争爆发后,潘恩(Thomas Paine)在 1776 年出版的《常识》(*Common Sense*)曾席卷了整个殖民地,在使公众观点倾向于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随着印刷业的发展,美国建国初期的图书出版也得到了发展,这为美国小说的肇兴提供了媒介基础。到了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美国本土的图书市场已经初具规模,“19 世纪波士顿的蒂克纳·菲尔德以及小布朗出版社出版了以下几乎可以和‘美国文艺复兴’同义的几个作家的作品:霍桑、爱默生、梭罗、詹姆斯·罗威尔以及斯托夫人”(Travis 178)。而后美国的出版中心由波士顿转移到纽约。

而美国国内最早出现的大众媒介——通俗报刊则成为美国本土小说初试啼音之处。美国最早的两份杂志是布拉德福德(Andrew Bradford)的《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主办的《综合杂志》(*General Magazine*)。到独立战争时期,沿海城市已有近 50 所报社。纽约、波士顿等城市在 19 世纪之交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发达的杂志文化,如纽约出现的《芒西杂志》(*Munsey's*)、《科利尔杂志》(*Collier's*)以及《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这些杂志使纽约在出版和营销上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聚集了具有出版头脑的印刷主,这为后面形成全国范围的中产读者大众打下了基础。这些杂志成为后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些“时髦杂志”(smart magazine)的雏形,如《时髦的人》(*Smart Set*)、《名利场》(*Vanity Fair*)、《纽约客》(*The New Yorker*)和《绅士》(*Esquire*)等。这些期刊的特点是散文随笔偏多,因其篇幅更适合期刊发表,同时内容覆盖广泛,包括哲学、文学、风俗、政治、艺术等方面,客观上为美国本土小说的出现提供了创作平台。

可以说,通俗报刊的出现影响了美国早期小说的创作形态和传播方式。美国本土小说的雏形最早以一些生动故事和小品文的形式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并构成了美国本土小说发展的最初形态。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一些小说以“增刊”的方式随报纸免费发放。随后综合类杂志开始出现专门的小说板块,纯文学杂志也应运而生,如 1815 年在波士顿创刊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 Review*)。

美国早期小说家大多都与大众报刊有一定联系。华盛顿·欧文和他的哥哥曾创办了名为《萨尔马贡蒂》(*Salmagundi*)的杂志,刊登有关纽约社会的幽默短文和散文。到 19 世纪中叶,杂志对短篇小说的需求量非常大,霍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故事重述》(*Twice-Told Tales*)中的作品,都曾匿名发表在杂志和礼品书上。19 世纪上半叶在美国流行的英国式礼品书由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组成,而霍桑的短篇小说大多发表在当时很受欢迎的礼品年刊《象征》(*Token*)上。爱伦·坡同样与期刊有很深的渊源,“以拒绝庸俗但又描写冒险、恐怖、侦探、科幻题材著称的爱伦·坡在以报纸和杂志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介绍下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欢迎。这一时期先后刊登或连载过坡作品的杂志有《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博顿绅士杂志》、《格雷汉姆杂志》、《纽约镜》(*New York Mirror*)、《晚镜报》(*Evening Mirror*)、《戈迪斯杂志》(*Godey's Lady's Book*)等”(朱振武,《爱伦·坡现象》24-25)。可见报刊对爱伦·

坡作品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了吸引多方读者，大众杂志会刊登一些娱乐性、趣味性较强的文章，而由大众期刊带动的对消遣文本的需求，则构成了美国小说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重要动力之一。“最早的印刷版本带有美国的特点，他们不是以文学形式出现，而是以‘亚文学’的形式出现，是一些关于民间的或通俗题材的作品，是逗人捧腹大笑的幽默故事、插科打诨和海阔天空的故事以及讲给头脑简单的人听的冒险故事”（布尔斯廷 428-29）。这些亚文学都还不具有虚构性文本的性质，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有一定的差异。但“捧腹大笑”、“插科打诨”以及“海阔天空的故事”表明，小说一开始就与消遣、娱乐及游戏难脱关系。对于新大陆的建设者来说，繁重的工作需要从情节曲折离奇、充满冒险、刺激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中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受制于国内环境、教育水平、交通和传媒的发展水平，19世纪初期的小说读者群仍然比较小，小说并不具有过多的社会批判和道德训诫的社会功能。爱伦·坡是一名具有一定大众意识的作家代表。可以说爱伦·坡是一名小说逻辑游戏专家，他的《莫格街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窃信案》（*The Purloined Letter*）、《金甲虫》（*The Gold Bug*）、《玛利亚·罗吉特之谜》（*The Mystery of Marie Rogêt*）和《你是凶手》（*Thou Art the Man*）等作品创立了密室模式、侦探与助手在壁炉前一对一的分析形式等模式，体现了很强的游戏性。“尽管爱伦·坡把他的推理小说称为‘游戏之作’，但正是这些充满了语言游戏、逻辑游戏，乃至权利游戏的作品成为文学世界中一道别致的风景且经久不衰”（朱振武，《爱伦·坡研究》73）。爱伦·坡小说中的游戏性已经成为其作为文学经典的重要构成部分。

世界各国小说的起源及萌芽往往都伴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以及社会世俗化的进程，如金属活字这一技术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结合，使大众传媒的萌芽变成具有组织性的媒介，从而为欧洲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现代期刊的发展则为小说的发表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的平台，如在18世纪的英国，笛福（Daniel Defoe）、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等与印刷业、出版业和书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按照菲尔丁的说法，整个文学界正在变成‘一个民主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状态’”（瓦特 57-58）。这种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标志着新的文学发生机制的形成，文学创作的自由风气往往是孕育不朽文学作品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是以报纸、期刊的兴起和发展为契机的，鲁迅、沈从文等作品的主要传播渠道也是现代期刊。对美国而言，建国以后社会的稳定及经济的发展，大众刊物的兴起与印刷术的成熟，公众闲暇时间的增多、阅读兴趣不断增长，这些都对带有消遣意义的文本产生了需求，也为小说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

二、传统媒体下的美国小说

在传统纸媒环境中，小说的生产和阅读过程就是一个传播循环，即作品通过出版商、印刷商、分销商到达读者手上，再回到作者那里。作者会受出版商要求的影响，出版商则会预

测图书市场的需求，而读者也会影响作者，作者在写作时也会预估潜在读者的喜好。这就是典型的艺术家与市场之间的连接模式，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小说生产的主要方式。美国内战后，大众阅读市场初步形成，报纸和期刊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专业文学期刊的出现以及图书出版业的兴盛，为形成不同于英国小说的独特叙事语言和主题风格的美国本土小说奠定了媒介基础，同时也使美国小说逐渐成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艺术形式，并促进了美国畅销书文化的形成。

大众媒体的繁荣以及阅读群体的扩大，使小说的社会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除去娱乐功能外，小说在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揭露方面的自觉性开始逐步提高，即小说成为更加社会化的艺术形式。如《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就在废奴运动中起到了社会舆论上的推动作用。1905年开始在杂志上连载的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屠场》(*The Jungle*)则直接推动了美国有关食品安全法律的制定。同时，美国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都与娱乐性密不可分，这与以连载形式发表在杂志上的出版模式有关。这些杂志都要求作品符合时代趣味，而增加作品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是吸引读者的关键。小说阅读群体的扩大使作家不得不重视作品的可读性。如马克·吐温虽然受到高雅文化阶层的欢迎，却仍然采用接近大众的订阅——出版这种模式来出版小说，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更高收入。“在1889年一封信中他曾这样说，‘我始终迎合大众口味，从来不关心那些文化阶级的生活’”(伯科维奇33)。马克·吐温代表了能够兼具娱乐性和艺术性的美国作家，马克思(Leo Marx)曾指出，“《哈克贝利·芬》是真正属于我们民族的文学，是高雅和通俗的汇合之处”(转引自Robbinson 93)。他作品中的语言游戏和文体游戏所体现的“谐趣”是能够与大众融通的重要原因。另一位作家欧·亨利也是在报刊小说中逐渐形成了其独特风格，他的作品描写美国的世态人情，通俗易懂，情节上的“意外结局”更是吸引了大众阅读。这些作品在体现娱乐性和消费性的同时，也兼具关注现实、道德批评以及人道主义的倾向。

同时，美国小说能够采用真正的本土口语进行创作，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叙事语言风格，也与大众媒体的繁荣有一定关联。许多小说家原本的职业是记者，或杂志的编辑、撰稿人等，这无疑会对创作语言及文体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同是记者出身的马克·吐温和海明威是两个非常能代表美国文学特点的作家。正因为马克·吐温必须不断为报纸撰文，所以他总是在文体上进行创新，好让他从任何一个主题上都能取得幽默效果。而海明威为《堪萨斯城市之星报》(*The Kansas City Star*)和《多伦多星报》(*The Toronto Star*)撰文的经历使他把新闻写作的简洁文体带入小说创作中。从整体上看，相对于英国小说，美国小说在语言上更倾向于清晰与简练的文风。这与许多小说家在大众媒体中接受的训练不无关系。

除了期刊，出版条件与作家事业的发展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报社和杂志的编辑部以及出版社成为联结作者和读者的中介。20世纪著名的天才编辑人珀金斯(Max Perkins)就挖掘了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海明威和托马斯·伍尔夫(Thomas Clayton Wolfe)等作家，并给他们作品的出版提供了诸多帮助。珀金斯称自己是“一个坐在大将军肩头的小

矮人，知道将军该去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无人觉察到这一点”（转引自伯格 161）。作者和读者之间联系的中介，除了文学机构以外，还有逐渐在大众文化中形成的名人效应。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成为第一个明显地意识到这种名人效应的作家，他会亲自为读者朗读自己的作品，并为自己的作品做巡回演讲。19世纪初期这种名人效应的机制还没有在美国形成，如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时期的小说创作还局限于新英格兰小范围的文化圈内。而到了19世纪后半叶，小说创作的职业化越来越明显，“全国巡回式的个人作品朗读会、个人采访、拜访名家住所等方式、撰写个人专栏以建立个人形象（豪威尔斯）”等都是作家走进大众、与大众融通的方式（John G. Cawelti 167-68）。而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广播以及新媒体的普及，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签售会、读者见面会和交流会等都是小说宣传的一部分。

大众期刊的兴盛，不仅促进美国小说进入了独立发展的轨道，也使美国从19世纪中期就进入畅销书时代。美国图书市场在19世纪初就超过了英国。相比之下，美国的图书销售更为灵活。英国在19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实施《净价图书协议》，该协议禁止图书售价低于或高于图书定价。同时，美国拥有更为发达的畅销书文化，“在1960年以前，英国无较为成熟的畅销书榜单的制作与发布体系。而在19世纪末，美国的畅销书榜按时得到发布”（John Sutherland 214）。斯托克顿（Frank R. Stockton）的《船长霍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Captain Horn*）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畅销小说排行榜冠军。从销量上看，美国畅销小说的销量也是年年攀升。1900年约翰斯顿（Mary Johnston）的《拥有与占有》（*To Have and to Hold*）年销量为两万五千本，而《飘》（*Gone with the Wind*）则在一年内卖出了一百万册，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斯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和格雷森姆（John Grisham）的作品首印一百万册、销售过千万已不足为奇。可以说，美国畅销小说的历史，见证了美国的小说发展史和出版史，同时也成为人类印刷文明的一个缩影。

小说与印刷文明下传统媒体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纸媒的繁荣往往见证了小说的繁荣，在文化语境下考察小说家的作品，会发现出版业与作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派特恩（Robert Pattern）在研究狄更斯和出版商之间的关系时指出，“狄更斯为钱写作可能是19世纪文化的核心，也是艺术家与时代互恩互惠的紧密联系”（转引自赵炎秋等 176）。这一点在美国文化环境中也是如此。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小说在美国的持续畅销使小说的地位在美国逐渐提高，出现了长篇小说的繁荣景象。美国小说逐渐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文学主题及创作范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脉络，并开始在世界文坛上确立其地位。而到了互联网时代后，小说的生产不再是作者独有的权利，写作成为一种开放事件。传统媒体遭了解构。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也迎来了革新和发展的新机遇。

三、电子媒体时代：小说何为？

媒介理论家波斯特（Mark Poster）从信息传播方式的角度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进行了划分，

即“面对面的口头媒介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的交换；以及电子媒介交换”（13）。而这种信息传播方式的每一次转变都给文学阅读和接受的方式带来了显著变化。二战后，美国信息工业和电子工业迅速发展，美国开始进入后工业电子媒体时代，而伴随而来的是传统媒体的式微及大众期刊的衰落。新媒体（New Media）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及思维方式。因此，当代美国小说的创新与大众传媒的多样化快速发展密不可分。大众文化中的视觉文化转向对小说的叙事方式及表达形式产生了影响，而电子媒体对艺术生产和消费模式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小说的接受和传播。电子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思考方式，也带来了新命题。

当代大众文化更多是一种视听文化，而这种视觉文化的转向，使现代绘画、摄像和摄影技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思维方式，同时对小说的文本结构和叙事方式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电影在展现现实方面无疑更为逼真，“摄影机光学性能和胶片乳剂摄取的外部世界所创造的现实，不再是对于现实的摹仿，而已经成为现实本身”（朱国华 75）。许多当代美国作品中就有很明显借鉴电影叙事艺术的痕迹：在冯尼古特（Kurt Vonnegut）的小说《冠军的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中，文字叙述和速写式图画交错呈现；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小说《洛丽塔》（*Lolita*）中有明显的电影元素；创作了众多美国历史小说的多克托罗（E. L. Doctorow）、极简主义的代表卡佛（Raymond Carver）和后现代派作家德里罗（Don DeLillo）等也将电影蒙太奇手法融入他们的创作中。另外，互联网为人们构造了一个巨大的非线性的叙述文本库，这种信息的“碎片化”难免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一定影响。一些现代作家就放弃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以情节破碎代替情节连贯，以时空交错代替时空统一，以开放结局代替闭合结局等，从而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多元性。品钦（Thomas Pynchon）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中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叙事结构，以及似是而非、五花八门的叙事就体现出这种非线性、甚至反线性叙事的倾向。

视觉文化的发展倾向为小说形式的创新提供了文化环境。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绘本小说”（Graphic Novels）得到了一定发展，这种小说形式正展现了小说这种以语言符号为载体的叙事艺术和绘画这种具象性的艺术形式的结合。费德勒（Leslie Fielder）认为：“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和史诗、民谣都无太大关系，而是同它的后继者关系密切：连环画、漫画、电影、电视。”（33）绘本小说的特点在于创造性地将图画这种更加明确、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与文学叙事结合起来，并相互补充和阐释，使小说的文学性向图延伸。施皮格尔曼（Art Spiegelman）就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绘本小说家。他曾于1992年凭借两卷本绘本小说《鼠族》（*Maus*）获得普利策特别奖。这部作品集文学、漫画、新闻录和自传于一体，以动物为叙述视角讲述大屠杀经历，展现大屠杀中各方立场、身份及特殊环境中的人性。进入新世纪后，施皮格尔曼发表了《无塔之影》（*In the Shadows of No Towers*），描述“9·11事件”对个人的影响。绘本小说家们对图文结合的叙事技巧进行探索，同时关照当下社会的热点。

电子媒体对当代美国小说的另一影响体现在网络小说的迅速发展。博客等自媒体使作家

这一职业变得越来越开放，网络文学也日益繁荣。《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多年来就为网络小说所占据，其中的典型作品包括《暮光之城》（*The Twilight*）系列。网络小说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小说生产方式，一些作家将作品放在自己独立博客上，待价而沽。不仅如此，电子图书还有改变图书作为媒介的潜力，例如交互式超文本小说（hypertext fiction）能够让读者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修改故事情节，读者对小说创作的参与度通过互联网得到进一步增强。可以说，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同时，媒体技术带来了小说阅读方式的明显变化，电子媒体的发展使移动阅读越来越便利。美国媒介理论家莱文森（Paul Levinson）曾写道：“当有人破天荒地想到在石板、木板、泥板书写的时候，人类就已经进入了一个移动媒介的领域。……摩西很聪明，他把‘十诫’刻在石板上带着，于是，‘十诫’不仅在他穿越沙漠时能够携带，而且最终被带到了全世界。”（17）如今，传统书籍和报刊不再是人们阅读的唯一来源。依赖于网络技术的移动终端阅读冲击着传统出版行业，手机、平板电脑和以Kindle阅读器为代表的电子阅读器成为很多人的首选。而谷歌的数字化图书馆提供全文搜索，期刊、书籍被扫描、上传，在互联网上向大众免费开放。针对传统纸质书面临的挑战，麦克卢汉曾预言书籍的消亡。但美国书籍史专家丹恩顿（Robert Darnton）则认为，人们对电子书的迷恋会经历三个阶段：“初期的乌托邦式的狂热、中间的梦想幻灭期以及务实主义的新趋势”（67-68）。尽管目前美国阅读市场中数字阅读比例逐渐上升，但纸质阅读始终稳定地据有一席之地。而不可否认的是，电子科技的发展还会持续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

美国当代作家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曾感慨，“19世纪，当狄更斯、达尔文和迪斯雷利阅读彼此作品之时，小说是社会教化的卓越媒介。民众期待萨克雷或威廉·迪恩·豪威尔斯新书之殷切，不亚于今天圣诞档电影激发的热情”（59）。在电子媒体时代，电视、摄像等都是更为生动而实时的实体，小说或许不复为大众想象的最有力代表，但是美国始终保持了小说创作的活力，创作势头有增无减。美国小说家不断对新的叙事空间、可能性和叙事主题进行积极的探索，以其丰富的作品颠覆“小说终结论”。他们继续传承美国文学的传统，同时又不断在审美叙事方面大胆创新，还在娱乐性与艺术性、商业性与思想性之间取得平衡，成为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语境下进行自我突破的范例。

在美国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大众传媒的发展对小说起了一定形式上的框定作用。作为一种人类心灵交流的形式，小说也必须依赖于传媒来决定其叙述方式。20世纪后半叶，媒体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变革，对人的思维方式及大众想象的表达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电子媒体的发展中，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生变化，小说的发展遇到了挑战，但也获得了改变和重新审视的空间。在这个阶段，美国小说在创作方式和主题上的发展，对小说技巧的尝试和革新，及在对小说本身的重新定义上，都走在了各国文学的前沿，而这也与其大众文化及大众媒体的发达紧密关联。在非虚构媒介抢占小说的生存空间时，小说仍然被大众阅读。传媒环境固然在变化，但故事艺术始终是人类灵感的重要来源，在传媒和阅读环境中如何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这应当是人们不断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Bercovitch, S., edit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3. Translated by Jian Cai, et al.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2010. [伯科维奇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3卷,蔡坚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 Berg, A. Scott. *Max Perkins: Editor of Genius*. Translated by Lun Peng. Guangxi Normal UP, 2015. [伯格:《天才的编辑》,彭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Boorstin, Daniel J. *The Americans: National Experience*. Translated by Tingguang Xie, et al.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2009. [布尔斯特廷:《美国人:建国的历程》,谢廷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Cawelti, John G. "The Writer as a Celebrity: Some Aspec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s Popular Culture."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no. 1, 1977, pp. 167-68.
- Fiedler, Leslie. *What Was Literature? Class Culture and Mass Society*. Translated by Yang Lu. Yilin, 2011. [费德勒:《文学是什么: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陆扬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Franzen, Jonathan. *How to be Alone*. Translated by Shimin Hong. Nanhai Publishing, 2015. [弗兰岑:《如何独处》,洪世民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5。]
- Hamilton, Geoff, and Brian Jones, editor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Popular Fiction*. Infobase Publishing, 2009.
- Levinson, Paul. *Cellphone: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Mobile Medium*. Translated by Daokuan He. China Renmin UP, 2004. [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召唤》,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Luedtke, Luther S., editor. *Making America: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United States*. Translated by Bo Wang, et al.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2006. [路德克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王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Translated by Daokuan He. The Commercial, 2000. [麦克卢汉,2000,《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Poster, Mark.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s*. Translated by Jingye F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Robinson, Forrest G., edito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k Twain*. Cambridge UP, 1995.
- Robert, Darnton. *The Case for Book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ranslated by Xiang Xiong. China Citic, 2011. [丹恩顿:《阅读的未来》,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 Sapir, Edward.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4. Macmillan Free, 1967.
- Sutherland, John. *Bestseller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P, 2007.
- Travis, Trysh. "New York's Culture of Prin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New York*, edited by Cyrus R. K. Patell and Bryan Waterman, Cambridge UP, 2010, pp. 176-88.
- Watt, Ian P. *The Rise of the Novel*. Translated by Hongjun Dong and Yuan Gao. SDX Joint Publishing, 1992. [瓦特:《小说的兴起》,董红钧、高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 Zhao, Yanqiu, et al.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arles Dickens Studies*. Yilin, 2014. [赵炎秋等:《狄更斯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Zhu, Guohua. "Movies: The Terminator of Literature." *Literary Review*, no. 2, 2003, pp. 74-80. [朱国华:《电影:文学的终结者》,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第74-80页。]
- Zhu, Zhenwu, and Nana Deng. "The Poe Phenomenon and Popular Culture." *Foreign Literature*, no. 2, 2008, pp. 19-28. [朱振武、邓娜娜:《爱伦·坡现象与通俗文化》,载《国外文学》2008年第2期,第19-28页。]
- . *Study on Edgar Allan Po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2011. [朱振武:《爱伦·坡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曾艳钰

“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

——论《福楼拜的鹦鹉》对历史真实的质疑和反思

◎ 何朝辉

内容提要: 在《福楼拜的鹦鹉》中,朱利安·巴恩斯对福楼拜的传记书写中历史文本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进行了反思。巴恩斯灵活运用多种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对福楼拜创作时使用过的一只鹦鹉标本的真实性进行了质疑和追寻,进而对福楼拜形象进行了多元建构,在挑战传统的传记写作范式的同时,还上升到对“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即如何了解和认知历史真实的后现代反思。此外,巴恩斯的写作还对历史的文本性、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和历史真实的多元性等后现代历史观进行了观照。

关键词: 朱利安·巴恩斯 《福楼拜的鹦鹉》 后现代主义 历史真实 质疑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098-10

基金项目: 韶关学院 2015 年度科研项目“朱利安·巴恩斯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研究”(S201502009);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 年度一般项目“后现代视角下的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研究”(GD16CWW09)

作者单位: 韶关学院外语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Title: “How Do We Seize the Past?": On Interrogating and Rethinking Historical Truth in *Flaubert's Parrot*

Abstract: In *Flaubert's Parrot*, Julian Barnes rethinks the reliability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ical text in the biographical writing about Gustave Flaubert. By applying various postmodernist narrative strategies flexibly and skillfully, Barnes interrogates and pursues the truth of a specimen of parrot used by Flaubert in his writing, and then sets out to explore and construct the image of Flaubert in multiple ways. This challenges the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biographical writing and further rethinks in a postmodern way, “How do we seize the past”; that is, how is it possible to know and understand historical truth? What's more, Barnes's writing also involves and discloses such postmodern historical views as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 the subjectivity of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e pluralism of historical truth.

Keywords: Julian Barnes, *Flaubert's Parrot*, postmodernism, historical truth, interrogation

Author: Zhaohui He, Lecture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Guangdong, China.

《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是当代英国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一部后现代主义实验之作,自1984年出版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文体的后现代杂糅性和叙事的后现代特质:小说糅传记书写、小说叙事和文学批评于一炉,运用了戏仿、反讽、拼贴、互文和元小说等多种叙事策略,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精神”(Bradbury 487),挑战了小说这一文类的创作惯例和极限,具有明显的“非小说化”特征(阮炜 51)。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称它为“自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微暗的火》以来……体裁最为奇特的小说”(Updike 86)。小说对法国作家福楼拜创作短篇小说《一颗单纯的心》时使用过的一只鹦鹉标本之真实性进行了质疑和追寻,探讨了福楼拜形象的多元建构和福楼拜的传记书写中有关历史文本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问题,并上升到对“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的思考。本文将围绕“福楼拜的鹦鹉”之真实性、福楼拜形象的多元建构和如何认知过去等内容展开论述。本文认为,巴恩斯灵活运用多种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观照了历史的真实、历史与文本的关系和历史书写的文本性和客观性等问题,打破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藩篱,以文学创作的形式揭示了诸如历史的文本性、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和历史真实的多元性等体现后现代特征的历史话语和历史观。

一、追寻“福楼拜的鹦鹉”

在论及历史的文本性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 Jameson)曾指出,只有通过前(再)文本化的方式,历史才能被认知(82);琳达·哈琴(L. Hutcheon)也认为,历史(真实)只存在于“文本的印迹中”(80)。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巴恩斯通过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小说人物兼叙述者)对福楼拜创作时用过的那只鹦鹉标本之真实性的质疑,对福楼拜的形象进行了后现代探讨和多元建构,并上升到对历史真实的质疑和反思。小说写作或巴恩斯运用的“证据”是被福楼拜用作模型的那只鹦鹉以及各种各样的“文本”,包括福楼拜(或与之有关)的小说、信件、旅行日记和回忆录等。巴恩斯对福楼拜形象的多元建构以及对历史真实的质疑和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历史的文本性这一观点。

这部小说的创作源于巴恩斯个人经历中碰到的两只鹦鹉标本。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巴恩斯就是一位忠实的福楼拜爱好者,“大约15岁的时候就读了《包法利夫人》;读大学时特别写了一篇有关福楼拜的论文;而且还觉得在某个时候……想要写一写福楼拜”(“When Flaubert Took Wing” 30)。巴恩斯想要写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福楼拜传记,而是某种不同的东西。这一愿景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得到了实现。小说完成之后,巴恩斯在多种场合讲述了小说创作的缘起。在《作家崇拜的愚行》中,巴恩斯详细介绍了写作该小说的缘由:1981年9月,他参观了福楼拜故居,但没有在那里看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作家住的房屋100年前就被摧毁了,他的大部分财产要么散落在四处,要么已经丢失,但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碎纸片保存了下来,因其稀少而更显价值”;随后,巴恩斯参观了主宫医院的一间小博物馆,发现

了一只绿色的鹦鹉标本，上面附有一张标签，写着“这是福楼拜创作《一颗单纯的心》时从当地历史博物馆借来的鹦鹉”；两天后，巴恩斯参观了位于市郊克鲁瓦塞的第二个福楼拜纪念馆，看到一只鹦鹉标本上也标注了“福楼拜创作《一颗单纯的心》时借来的那只鹦鹉”（“The Follies of Writer Worship” 2-3）。正是这两只鹦鹉标本困扰着巴恩斯，激励他去质疑和探寻历史的真实以及“如何抓住过去”的问题。

通过艺术构思，作家巴恩斯变成了医生杰弗里·布拉斯韦特，一位“业余的福楼拜研究者”（《福楼拜的鹦鹉》118）。小说对两个鹦鹉标本之真实性的质疑，表明布拉斯韦特是一位非常执着的真相追寻者：“我给各式各样的研究者写去了书信，他们也许知道两只鹦鹉中有一只是真实的。我给法国大使馆写了信，给米其林导游手册编辑写了信”；“我还给霍克尼先生去了信。……我不知道，当他在蚀刻睡着了的费莉西泰的肖像画时，心中想的是第一只还是第二只鹦鹉”（17）。写了这些信之后，布拉斯韦特希望能够很快得到回信，但是没有收到任何有用的回音。两年过去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他决定再次走访那两个纪念馆。两年前发生的事情再次上演了：两个纪念馆的管理人员都向他保证说，他们的鹦鹉标本是福楼拜写作时用过的。布拉斯韦特拍下了两只鹦鹉标本，把它们和福楼拜描写的那只鹦鹉进行对比之后，认为主宫医院博物馆的鹦鹉标本才是真正的“福楼拜的鹦鹉”。

之后，布拉斯韦特拜访了研究福楼拜的专家卢西恩·安德里先生，就两只鹦鹉标本的真实性和他进行了交谈。安德里先生告诉他，当时，在鲁昂的博物馆里有50只鹦鹉标本，福楼拜借用了一只并创作了小说中的鹦鹉露露；小说完成之后，福楼拜把鹦鹉标本还给了博物馆；此后，克鲁瓦塞的纪念馆和主宫医院博物馆分别于1905年和1945年向鲁昂博物馆索要那只“福楼拜的鹦鹉”，并且都根据福楼拜的描写得到了一只鹦鹉标本。据此，布拉斯韦特改变了最初的想法，认为克鲁瓦塞纪念馆的鹦鹉标本更有可能是真正的“福楼拜的鹦鹉”，因为它最先挑选。但安德里解释说，有两件事值得注意。首先，福楼拜是一位艺术家，“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作家”，“他可以为了生活节奏（cadence）变动一个事实”（247）。其次，福楼拜1876年写完小说后就把鹦鹉标本归还给了博物馆，而克鲁瓦塞纪念馆大约于30年后的1905年建立。安德里说，动物标本会生蛾子，有的地方会脱落，日子长了颜色也会发生变化（247）。因此，从安德里这里，布拉斯韦特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鹦鹉的真实性问题依然是个谜。最后，他又回到博物馆仔细查看那50只鹦鹉标本中仅存的3只标本。“大概就是它们中的一只吧”（249），这是布拉斯韦特最后得出的结论。

可以说，这些作为“证据”的唯一可以认识“福楼拜的鹦鹉”之真相的鹦鹉标本，并不能保证我们能获悉真相。经过语言的织造和着色，“福楼拜的鹦鹉”已经变为文本世界里虚构的真实，而非客观实体本身。藉由这一质疑和追寻，巴恩斯向传统的认识论和历史观提出了挑战：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真实受到语言叙事的影响，历史真实的唯一性和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

小说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对“福楼拜的鹦鹉”之真实性进行了质疑和追寻。如果巴恩斯仅仅停留于这两章的描述，小说将成为又一部关于质疑（历史）真实的传统小说。但巴恩斯“移

花接木般地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着迷于福楼拜的故事。其结果是一本奇妙的混合小说，部分是传记，部分是虚构小说，部分是文学批评，整体来看充满了奇思妙想”（P. Brooks 7）。可见，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福楼拜的鹦鹉”的杂糅式小说，也是一本关于福楼拜的准传记，一本对福楼拜形象进行多元建构的文本。

二、福楼拜形象的多元建构

巴恩斯在小说第一章对“福楼拜的鹦鹉”之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在最后一章进行了回答。虽然小说中间 13 章约 157 页（英文版）的篇幅中依然可见鹦鹉的影子，但呈现在读者眼前的主体画面是福楼拜的形象。小说“约有 12 章（共 15 章）在专门谈论福楼拜，表明小说真正关注的对象是福楼拜”（Berlatsky 187）。小说是一部对福楼拜的形象进行后现代建构的传记式文本，充满了反讽、互文和元小说等叙事特征。那么，巴恩斯是如何对福楼拜的形象进行多元建构的呢？有论者指出，“古斯塔夫·福楼拜是一个在历史上可证实的实体，但是我们只能通过小说、信件和回忆录等书写的证据认识他”（Lee 39）。小说也传递了相似的信息：“许多与福楼拜相关的东西都没有长久地保留下来。他一百多年前去世，而他所留下的都是纸上的东西（paper）。”（《福楼拜的鹦鹉》2）可以说，巴恩斯是带领读者在不同的文本中探幽索迹，捡拾有关福楼拜形象的碎片，力图拼接并呈现出一个丰富而多元的福楼拜形象。

一般读者对福楼拜的了解都是始于他的《包法利夫人》，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艾珉 1）。因为这部小说，福楼拜也被誉为 19 世纪中期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的作品中有大量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化及细节性描写，他也因此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左拉就认为福楼拜是“一个观察准确的冷静的……自然主义小说家”（左拉 169）。不管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还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开拓者，福楼拜作为伟大作家的身份早成定论。而巴恩斯通过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实验和叙事创新，建构了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福楼拜形象。

巴恩斯提及了福楼拜的外在特征。小说中写道，“福楼拜是一个巨人；大家都这么说。他比伟岸的高卢首领还要高大”（《福楼拜的鹦鹉》112），但是，巴恩斯指出，“六英尺高”的福楼拜“并不高大”（112），只是一个普通法国人的身高。这颠覆了传统观点中关于福楼拜的身高特征的描述。小说还提到，布拉斯韦特参观主宫医院博物馆时，看到“作家各式各样的肖像”，惊讶于青少年时期英俊的福楼拜到了中年就成了“大腹便便的”秃顶的小市民的快速转变（7）。不管原因如何，这一“大腹便便的”秃顶的小市民形象可能不同于或颠覆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很难与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画上等号，对于只阅读其作品而没有见过真实照片的读者来说尤其如此。

小说第二章《年表》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文本，从不同维度集中展现了巴恩斯对福楼拜形象的后现代建构。第一个“年表”式的传记文本刻画的是福楼拜的传统而积极的形象，即他的“光辉的正面”（郭宏安 11）。这一文本按时间顺序列出了 20 个条目，涉及福楼拜的出生、家庭背景、求学、友情、爱情、性史、旅行、疾病、隐居、写作或作品出版，与其他作家的交往，因作

品的成功而获得的社交成功以及去世等。下面仅举三例以说明。

1821 古斯塔夫·福楼拜出生。……这个家庭属于成功的职业中产阶级，在鲁昂附近拥有好几处家产。（《福楼拜的鹦鹉》18）

1843 在巴黎当法律专业的学生，与维克多·雨果相遇。（20）

1880 古斯塔夫·福楼拜满载着荣誉和广泛的爱戴在克鲁瓦塞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在刻苦写作。（24）

第二个“年表”式的传记文本颠覆了第一个文本中福楼拜积极而正面的形象，展现的是其消极而负面的人生，是其形象“昏暗的背面”（郭宏安 11）。这一文本按时间顺序列出了 21 个条目，简要地描写了作为“家庭的白痴”（L'Idiot de la Famille, 萨特语）和失败者的福楼拜^[1]。如果说第一个文本展现了一个积极向上、刻苦写作、大获成功、广受欢迎乃至名垂青史的伟大作家的形象，第二个文本呈现了一个不同的福楼拜：出生时便疾病缠身，从小行为叛逆，情感生活不顺，写作时充满痛苦和煎熬，作品不被看好遭受时人诟病，生活挥霍甚至放荡，亲朋好友相继离世后孤苦伶仃，晚年生活凄苦。这完全是一个落败的中产阶级子弟的形象。这种形象对一般读者而言是较为陌生的。巴恩斯的仿写为读者了解不一样但也真实的福楼拜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同时还关联了萨特的话语，能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福楼拜“家庭的白痴”这一形象^[2]。

第三个文本是从福楼拜写于 1842 至 1880 年间的文字中摘录的 32 段引语，它具有“年表”的形式，但缺乏历史编年纪事的内容，主要涉及福楼拜对生活、情感、作品、写作、自我、他人和社会的感悟和理解，而非对其生平事件的纪录，这反映了巴恩斯在文本形式上的创新。试举几例说明：

1846 我只是一条文学蜥蜴，在美的阳光下享受太阳，度过一天天的光阴。仅此而已。（《福楼拜的鹦鹉》34）

1852 生命是多么可怕的东西，不是吗？就像表面上漂浮着许多头发的汤。但是，你还是得吃下去。（35）

1867 确实，许多事让我愤怒。哪一天我不再怒火冲天了，那么，我将倒地而亡，就像一个洋娃娃被人拿走了支架一样。（38）

显然，与前两个文本从正反两面对福楼拜的形象进行历时性的传记式建构不同，第三个文本是从文学甚至哲学的角度探讨了福楼拜对生活自我与文学自我、自我与他人和社会之关系的比喻式阐释，可以看作是对前两个文本中的福楼拜形象的“哲理性的抽象与综合”（郭宏安 11）。由此，我们可以深入他丰富的内心世界，探究他对生活和情感的态度，考察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审美诉求等。譬如，福楼拜对待生活的态度就充满了悖论性：他热爱生活，深爱自

己的家人和朋友，但又对生活中的一切事物进行嘲笑（《福楼拜的鹦鹉》36）。概言之，“年表”中的三个文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福楼拜的历史形象和作家身份，把它们置于同一章中，凸显了巴恩斯对其形象的多元建构，丰富了读者对福楼拜形象的了解和认知。同时，通过对“年表”的戏仿性写作，巴恩斯向传统的传记书写和历史叙事提出了质疑。

巴恩斯还在不同章节中探讨了福楼拜的情感生活以及福楼拜对某些动物（意象）的特别关注和描写等，使福楼拜形象变得更为饱满。譬如，在第三章，巴恩斯论及了朱丽叶·赫伯特与福楼拜的神秘恋情，由于她是一个没有名气的英国人，一般的福楼拜传记对这段恋情都是一笔带过。但是，借由巴恩斯的挖掘和探究，我们看到在福楼拜的情感生活中，有一位差点成了其未婚妻的英国女性的存在，她对福楼拜传记的书写和福楼拜形象的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而这是以往的福楼拜传记作家不愿去承认的（43）。巴恩斯还提到，在福楼拜的情感生活和性爱经历中，除了与露易丝·科莱广为人知的恋情之外，福楼拜与其他女性甚至男性友人的性绯闻的史料都渐渐浮出水面，福楼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双性恋者”（126）。这无疑给福楼拜的形象增添了新的内容，使读者对“有些时候，很想成为一个女人”，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205）的福楼拜的性取向问题和形象建构产生更多的联想和思考。

巴恩斯还专辟一章探讨福楼拜与动物的关系以及他与某些动物类似的特性。生活中，福楼拜表现出对众多动物譬如骆驼、羊、鹦鹉和狗的喜爱，在作品中，他也不遗余力地描写人类与动物的亲密关系（如《一颗单纯的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福楼拜与动物的亲缘性。福楼拜曾表示憎恨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36），但却没有表示过对动物的厌恶和反感，这或许是他怪异风格（Flaubertian grotesque）的表征之一。这种怪异特征对理解福楼拜增加了难度，却是福楼拜的传记书写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方面。

福楼拜曾把自己比喻成一只“文学蜥蜴”（34），其隐喻意义颇让人费解，其怪异性也可见一斑，但这只是其众多的动物性隐喻中的一种。第四章中，巴恩斯探讨了福楼拜与熊、骆驼和鹦鹉等动物产生认同的现象。该章开头，巴恩斯开门见山地告诉读者，福楼拜是头熊（55）。而福楼拜自己也与熊有着极强的认同感：“我是一头熊，我想一直做一头留在我的洞穴里、我的窝里、我的肌肤内、我的老熊皮内的熊”（55-56）；“我独自生活着，像一头熊”（56）。在巴恩斯看来，福楼拜与熊产生认同感的原因可能在于福楼拜身上也体现了熊的“粗暴和野蛮（rough and wild）”的特性（61）；而“一只熊”（Un Ours）在19世纪的法国俚语中特指屡次投稿屡次被拒但最终被接受的作品，这可能是福楼拜与熊产生关联的一个更合理的解释（62），因为他的几部作品在写成之后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再以鹦鹉为例。福楼拜与鹦鹉的认同，可能在于它是一种容易得癫痫病的鸟类（66）；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它是一种会发声的动物，能模仿人类声音的稀有物种（11），因而可能隐喻“纯粹的语言”或“逻各斯符号”（11）。福楼拜在《一颗单纯的心》中对它的浓墨重彩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他与鹦鹉的认同感，鹦鹉成了作家本人声音的象征。巴恩斯对“福楼拜的鹦鹉”之真实性的质疑和追寻，则深化了鹦鹉的象征意义，正如论者所言，它指代的是“语言……而最终指的是追寻[历史]真实本

身”（Sesto 37）。巴恩斯对福楼拜与动物之认同关系的探讨，向我们敞开了福楼拜形象中另外的一面，这与读者期待中的福楼拜形象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充满了怪异、甚至不可思议的色彩，但却是值得挖掘的一面，它对读者了解福楼拜身上的怪异风格，了解福楼拜生活与创作中的矛盾性和悖论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外，小说也在多处提及了福楼拜的创作理念以及他关于民主和进步等思想的见解。福楼拜的创作以客观、准确和科学的描写为圭臬，强调写作时作家个人不介入叙事，不发表个人的观点。通过引用福楼拜自己的语言，巴恩斯让读者更深刻地体会了这位作家的创作观：“我认为人们不可以将自己的艺术理想表露出来，正如上帝现身于自然中一样，艺术家不可以现身于他的作品。人是微不足道的，而艺术作品是一切”（《福楼拜的鹦鹉》108）。巴恩斯还高度认同福楼拜的进步观，并对此多有论及。福楼拜“不相信进步”，“特别不相信道德进步”，而后者才是“至关重要的”（104）。在福楼拜看来，他生活的时代甚为愚蠢，普法战争之后的新时代更为愚蠢（104）；他甚至憎恨铁路的出现，他憎恨的不是铁路本身，而是因为它“让人沾沾自喜地产生了进步的幻觉”（136）。他认为，“铁路只是让更多的人方便出行，方便见面，方便愚蠢地待在一起”，但是，“科学进步了，而道德没有进步，那有什么意义呢”（136）？细察福楼拜的进步观，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19世纪中期的作家对人性、对道德、对科学进步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深刻的思考和非凡的洞见。这无疑是福楼拜形象中极为厚重和更为丰盈的一面。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通过挖掘史料和详细论证，巴恩斯对传统的福楼拜形象中的某些方面进行了颠覆、修正和补充，进行了后现代式的多元建构，既让读者历时性地纵览了福楼拜的传记人生，感受其生活与创作中的悲欢离合和荣辱得失，又让读者关注他的成长、情感生活、性取向问题、怪异风格、创作思想和进步观等众多方面，从而使福楼拜的形象立体、多维、充实和丰盈。这种展现所依赖的基础在于巴恩斯所引用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文本，包括福楼拜的小说、日记、旅行笔记、写给友人和恋人的信件、福楼拜友人和外甥女的回忆录、文学评论家包括萨特对福楼拜的评论性文字、各种文学轶事和寓言故事以及报刊中的新闻报道等等。大量援引福楼拜自己所写或有关他的文字凸显了小说的文本性以及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有意识地对历史和文本性之关系进行后现代式的探讨”（N. Brooks 46）。可以说，小说中的文本话语枝蔓丛生，向各个方向散发开去，一段文字引出一个文本，一个文本关涉另外的文本，充满了互文性的关联和指涉，而且小说文体杂糅、小说叙事背离线性的逻辑关系，这表明巴恩斯对传统的传记书写和历史叙事的写作成规进行了颠覆性的突破。这样的写作实验和形式创新旨在对作为历史人物的福楼拜的形象进行后现代式的探讨和多元建构，进而反思传记写作和历史书写中的可能性和多元性。

三、“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

面对遇到的两只鹦鹉标本，巴恩斯对哪一只才是真正的“福楼拜的鹦鹉”提出了质疑，

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追寻和反思。对鹦鹉标本之真实性的质疑源于巴恩斯对福楼拜的极度热爱和崇拜。于是，对“福楼拜的鹦鹉”的质疑和反思又转变成对建构福楼拜形象的尝试和努力。然而，巴恩斯并没有就此止步。巴恩斯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成长于大英帝国的衰落和冷战的政治冲突等当代历史现实的阴影之中，这使他对历史、政治和其他社会问题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小说创作体现了敏锐的历史意识和对历史观的后现代思考，这在他的小说《10¹/₂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¹/₂ Chapters)、《豪猪》(The Porcupine)和《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等当中有着集中的体现。《福楼拜的鹦鹉》对鹦鹉标本之真实性的质疑，对福楼拜形象的后现代探讨和多元建构，都不是巴恩斯的终极目的；巴恩斯是透过它们，对传统的历史叙事和历史书写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等问题提出质疑和思考。

小说中，这种质疑和反思主要体现在对“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的困惑和探讨中。一开始，巴恩斯就表明了他对过去或历史的看法以及“如何抓住过去”的认识论困惑：

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能够抓住吗？当我还是个医学院学生的时候，在参加期末舞会时，不知哪个爱开玩笑的人把一头身上涂满油脂的小猪放进了舞会大厅。小猪一边尖叫一边在大家的腿脚间躲来躲去，以免被大家抓住。大家扑过去，想抓住它，结果跌倒在地上，在整个过程中人们表现得滑稽可笑。过去似乎就常常像那头小猪。(《福楼拜的鹦鹉》6)

过去“就常常像那头小猪”，我们“想抓住它”，但又往往抓不到；这里，巴恩斯以隐喻的方式暗示出历史真实的难以企及性。

小说第六章用实例论证了这一观点。当文学批评家对福楼拜描写包法利夫人眼睛时的“不够准确”进行批评时，小说进行了反证，依据《包法利夫人》和福楼拜友人马克西姆·杜康的《文学回忆录》为死去的作家进行辩护。然而，在力图证实福楼拜描写爱玛眼睛时赋予其不同颜色这一事件之可信度时，叙述者告诫我们，杜康的叙述“就历史来看还是重要的”，但是他“喜欢饶舌、爱虚荣、好自我辩解且不可靠”(98)。由此可知，在确立与福楼拜有关的历史真实时，小说又认为相关的历史文本“不可靠”，以此提醒读者：“过去”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被“抓住”的，历史真实具有难以企及的特性；面对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时，应该采取客观科学的求真态度。

之后，小说第七章中，巴恩斯直接讨论了关于“如何抓住过去”的问题，提出了历史认识中的困惑和对历史真实的质疑。首先，小说这样质问，“我们如何抓住过去？我们如何抓住遥远的过去？我们读书、学习、讨教……我们毕恭毕敬；后来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改变了一切”(112)。巴恩斯例证中的“小事”涉及到有关“高大、肥胖、疯狂”和“颜色”等词语的意义。在他看来，这些词语的所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或者说它们的古今意义不同。巴恩斯认为，福楼拜所处时代关于高度、重量、心智和颜色的所指与我们当下它们的所指不同，对它们的理解也应发生变化。由此，关于过去的概念或对历史真实的认识也要发生变化。然后，

叙述者继续质疑，“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呢？当过去变得遥远的时候，它的轮廓还清晰吗？有人认为是的。我们知道得更多，我们发现额外的文档，我们使用红外线还原信件中被抹去的内容，并且我们可以不顾当时的偏见；所以说，我们更了解过去。是那样吗？我怀疑”（125）。在这段引文中，巴恩斯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他对认知历史真实的困惑和疑问。

接着，巴恩斯又俨然成了专业历史学家，罗列了福楼拜情爱生活的各种事实来探讨福楼拜的情爱史或性取向问题。在他看来，“体验过同性恋，也体验过异性恋”的福楼拜的性爱生活的“全貌”是逐渐被挖掘和建构成型的。这当中涉及的人物有露易丝·科莱、朱丽叶·赫伯特、艾丽萨·斯莱辛格、某些女演员、一位埃及妓女、开罗澡堂里的男孩和福楼拜的挚友路易·布耶等（《福楼拜的鹦鹉》125-26）。如此，我们是否就能确定福楼拜是一位双性恋者或“性倒错者”呢？巴恩斯告诫读者不要匆忙地下结论，然后援引萨特的文本进行说明：“古斯塔夫从来就不是同性恋者；只是他的心理是被动的，女性化的。”（126）然而，萨特的叙述可靠吗？随之，巴恩斯又对萨特的话语进行质疑：“萨特指责福楼拜在痴心妄想。我们不也可以同样指责萨特想入非非吗？”（126）此外，巴恩斯又指出要对以往的福楼拜传记书写中对福楼拜与斯莱辛格夫人之关系的描写进行修正，即他们并不是一直保持着纯洁的精神恋情，他们最终还是完成了肉体的结合：要么是在1848年，或更有可能，是在1843年春（126）。显然，对这一事件的纠正充满了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而巴恩斯没有列出具体的文本证据更加凸显了它的不可靠性和模糊性。总之，关于福楼拜的性爱史或性取向问题的“全貌”或清晰图依然是存在争议的，没有哪一种结论可以作为定论：有关福楼拜的过去都是建立在与他有关的历史文本之上，文本是语言的创造物，文本能否客观、如实地反映（传记的、历史的）真实是值得怀疑的。

由上可知，巴恩斯对历史真实的质疑和反思与“新历史小说”或“历史元小说”对历史的解读具有相通之处：当作家诉诸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力图追寻历史的真实并证实其真实性时，他会在小说中埋下伏笔，对其所用之文本的客观性与可靠性进行质疑和再认识，以此颠覆和解构所谓的“历史真实”。

《福楼拜的鹦鹉》是一本关于质疑和追寻“福楼拜的鹦鹉”之真实性的虚构小说。小说对历史人物福楼拜进行了多角度的挖掘和建构，成为一本关于福楼拜的传记之作。在深入探究有关福楼拜的历史真实时，小说提出了“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的困惑和思考，上升到对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和历史真实的唯一性的质疑和再认识，它因而成为一个对历史真实进行追寻和反思的后现代文本。在质疑和反思历史真实的背后，小说向传统的认识论和历史观提出了挑战。但是，巴恩斯并不否认文本之外历史真实的客观性存在，他对历史真实的质疑和反思并没有走向极端的后现代主义怀疑论和历史虚无主义。巴恩斯以戏仿、反讽、互文和元小说等多重叙事策略，颠覆和解构了历史叙事或历史书写中的客观性和历史真实的唯一性等传统史观，观照了历史的文本性、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和历史真实的多元性等后现代历史观，因此成为后现代历史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小说文本。

注释 [Notes]

[1] 这里也举三例以说明:

1822 ……古斯塔夫生于两个死去的孩子之间。他身体虚弱, 大家以为他活不长久。福楼拜医生在大公墓买了一块家庭墓地, 挖了一个小墓穴, 为古斯塔夫准备着。出人预料的是, 他竟活了下来。他是个动作迟缓的孩子, 满足于嘴里含着手指一连坐上几个小时, 脸上带着一副“近似痴呆”的神情。对于萨特来说, 他就是这个“家庭的白痴”。(25)

1843 巴黎法学院宣布他第一学年的考试成绩。考官用红球或黑球表示他们的看法。古斯塔夫得到两只红球和两只黑球, 因此他考试没有合格。(26)

1880 古斯塔夫·福楼拜死于穷困、孤独、疲惫中。左拉在讣告中说, 五分之四的鲁昂人都不认识他, 剩下五分之一的鲁昂人讨厌他。……(31)

[2] 萨特一生与福楼拜颇有渊源。4岁时就开始读《包法利夫人》, 晚年更是倾注全力去写福楼拜传记《家庭的白痴》, 运用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对福楼拜进行分析和研究。此书篇幅较大, 并未完稿, 也许是因为其观点有失偏颇, 或所引材料不够准确, 学界对其评价不高。国内暂无中文版。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Ai, Min. "The General Preface." *A Collection of Flaubert's Works*, translated by Jianwu Li, et al., edited by Min Ai, Vol. 1,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2014. pp. 1-26. [艾珉:《总序》, 载《福楼拜文集》第1卷, 李健吾等译, 艾珉主编。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第1-26页。]
- Barnes, Julian. *Flaubert's Parrot*. Translated by Yafang Shi. Yilin, 2010. [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 石雅芳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 . "The Follies of Writer Worship." *The Best American Essays 1986*, edited by Elizabeth Hardwick, Ticknor & Fields, 1986, pp. 1-8.
- . "When Flaubert Took Wing." *The Guardian*, no. 5, March 2005, pp. 30.
- Berlatsky, E. "Madame Bovary, c'est moi: Julian Barnes's Flaubert's Parrot and Sexual 'Perversio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no. 2, 2009, pp. 175-208.
- Bradbury, M.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5.
- Brooks, N. "Interred Textuality: The Good Soldier and Flaubert's Parrot." *Critique*, no. 1, 1999, pp. 45-51.
- Brooks, P. "Obsessed with the Hermit of Croisset."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no. 10, March 1985, p. 7-9.
- Guo, Hong'an. "The Essence of Flaubert, Rightly Uttered by This English Man." *Wenhui Newspaper*, 29 Nov. 2016. [郭宏安:《关于福楼拜的本质, 这个英国人说对了》, 《文汇报》2016年11月29日。]
- Hutcheon, L.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Routledge, 1989.
- Jameson, F.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Cornell University, 1981.
- Lee, A. *Realism and Power: Postmodern British Fiction*. Routledge, 1990.
- Ruan, Wei. "Barnes and his Flaubert's Parrot."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2, 1997, pp. 51-58. [阮炜:《巴恩斯和他的〈福楼拜的鹦鹉〉》, 载《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第51-58页。]
- Sesto, B. *Language, History and Metanarrative in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1.
- Updike, J. "A Pair of Parrots." *The New Yorker*, 22 July 1985, pp. 86-90.
- Zola, Emile. *Biographies of Six Great French Writers*. Translated by Kelu Zheng.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2011. [左拉:《法国六文豪传》, 郑克鲁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 谢文玉

FLC

翻 译 研 究

翻译观认识论过程例话

◎ 黄忠廉 袁湘生

内容提要:近年来,翻译的内涵与外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翻译观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翻译观研究随之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文章将翻译分为全译与变译两大类,重新探索了翻译观,以例话的方式,归纳了从全译观与变译观整合为翻译观的认识论过程。

关键词:全译观 变译观 翻译观 认识论过程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108-11

作者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Title: Comment on the Epistemological Process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Abstract: As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translation has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in recent year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translation are increasingly evident, leading to renewed interest in redefining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define translat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by dividing translation into full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variation. Examples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are employed to demonstrate the thought process involved in the quest for a new concept of translation.

Keywords: concept of full translation, concept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concept of translation, epistemological process

Author: Zhonglian Huang,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Xiangsheng Yuan, Ph.D candidat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新世纪以来,翻译的形式与内容日益丰富,翻译的属性也愈加复杂。具体而言,翻译方向、翻译的内容和对象、翻译方式、翻译手段、翻译队伍以至学科发展和翻译研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仲伟合 10-11)。在此背景之下,重新理解翻译的本质、更新更正翻译观以及对翻译重新进行定义定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如许钧曾经指出的:“既然翻译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划时代的变化,我们对翻译的认识自然应该修正,对翻译应该重新定义,翻译观念也应该更新。”(8)然而从主观方面来看,传统翻译观仍然根深蒂固。仅以翻译的形式而论,时至今日,认为翻译是一种以文本为核心的人类行为的传统观念仍然十分普遍(Melby et al. 394)。而事实上,翻译的形式已经远远超出文本范围之外,所谓文本,只是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众多信息符号中的一种。另一方面,翻译研究在经历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语文学/文学研究范式阶段及以文本为中心的语言学研究范式阶段之后,现在已经进入以译者/读者为中心的文化研究范式阶段(段峰 2)。第三个阶段与前两个阶段显然有着本质的不同。翻译本质的重新厘定,或者说翻译观的更新更正,对现阶段的翻译研究,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如何基于有限的翻译现象推演出翻译观,本文作一尝试。

一、传统翻译观之失与翻译之实

传统的翻译观种种,在此无需一一列举,其中多数有一个共同点,即视译文为原文的复制品,换句话说,“翻译总是作为原文的‘副本’而出现的,原文对于译文具有绝对的权力”(段峰 36)。表现在翻译方法论方面,则可以看出大多数的讨论都是以原文为指归。直译与意译之争,最核心的问题,不外乎是对原文的“忠实”,尽管这里的“忠实”,主要是在形式上。严复所谓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排在第一的就是“信”。从其翻译实践可知,“信”其实主要是指不得不“信”之处而言,然而世人不察,曼声应和,乃至以讹传讹,久而久之,“信”就成了翻译界的金科玉律。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提出的“翻译三原则”,也主要是以原文为观照对象,要求思想内容、写作风格等都与原文一致(9)。钱钟书的“化境”说,主张“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2),评判一篇译文好坏的标准,仍然是“忠实”二字。傅雷的“神似”说,“似”相对于“信”或者“忠实”来说,更符合实际情况,因为绝对的“信”或者“忠实”是不可能的(1-4)。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片面求似,仍然未能摆脱传统翻译观“原文至上”的桎梏。奈达(Eugene A. Nida)的“动态对等”理论,将讨论的对象从文本转向文本在读者身上所产生的效果(Nida and Taber 12),但是一说到“对等”(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仍然是将译文跟原文双方放在天平两端来衡量,归根结蒂,还是带有传统翻译观的烙印。

今日看来,传统的翻译观显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既不符合翻译活动的实际,也不利于翻译研究的发展。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翻译问题,见到的或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即:既要尊重对“似”的不懈追求,又要看到“不似”的存在意义。由此看来,可对翻译重新分类,

其类有二：一曰“全译”，二曰“变译”。

讨论全译与变译之前，有必要先简单讨论一下两个概念——“求似”与“求信”。两个概念只有一字之隔，却有本质的差别。正如王宏印所言，“概念转换并非全然是语言问题，而是基本的思维形态的转换问题”（225）。我们知道，任何双语之间的译作与原作既不等值，也不等效。所谓等值或等效，只存在于理想状况。如此看来，求“似”比求“信”无疑更切合实际。主张翻译求“信”，是翻译伦理的要求，一般不会容许“不信”，偶有“不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主张求“似”则不然。“似”只要求接近或相像，并不要求对等。似有大似，也有小似，而小似既可以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可以是有意而为之。据此思路，可图解“全译”与“变译”所构成的区间（见图1）：

等	极似	很似	相当似	较似	有些不似	比较不似	相当不似	很不似	极不似	不等
1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原作	全译	变译								无用之译

▲图1 “全译”与“变译”区间图

设译作与原作完全等值为1，完全不等值为0，则有九个层次。九个层次中，追求极似于原作的是全译，极似之外的八个层次追求特效的是变译。变译现象古已有之，于今为盛，只是一直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二、全译观认识论过程

全译观，简言之，是如何观全译。全译观如何表现，可从全译行为看，观察译文与原文的差异，最终从解决差异的方法中总结出来。

有什么样的翻译观，就有什么样的翻译方法论。无论是直译/意译或形似/神似之争，还是追求“化境”抑或“等效”，归根结蒂都是力求最大程度接近原文。只有在无法做到面面俱到的时候，才不得已弃卒保帅，退而求其次，比如无法做到形神兼备，就只能舍形求神，无法字面对应，就只能改词易句，曲求其意。这样看来，传统的翻译观似乎都可归入全译观的范围之内，至少就其大体而言，不外乎此。然而，对于全译的本质，还需厘清。请看下例中的语言单位标本，除划线部分以外均为单词。

例1：

He hated failure. He had conquered it all his life, risen above it, despised it in others.

↑ ↑ ↑ ↑ ↑ ↑ ↑ ↑ ↑ ↑ ↑ ↑ ↑ ↑ ↑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⑧ ⑨ ⑩⑪ ⑫ ⑬ ⑭⑮ ⑯

机译：他讨厌失败。他一生都曾战胜过它，超越了它，藐视了它。（有道网）

原译：他讨厌失败。他一生中曾战胜失败，超越失败，并且藐视别人的失败。

改译：他讨厌失败。一生中他曾战胜失败，超越失败，藐视他人的失败。

表1 全译前后的形义转化对比与观察所得

事实	观察	所得		
①②④	原文单位与译语单位一一对应	形对义对风格对	对	直译
⑤⑬	增加原文所无的单位	增形不增义	增	
③⑦⑪⑭⑨⑯	减去原文单位	减形不减义	减	
⑨⑮⑯	转移原文单位	移形不动义	移	
⑧⑫⑮	互换原文单位	换形不换义	换	意译
⑥⑦⑩⑪⑬⑭	拆分原文单位	分形不动义	分	
⑦⑪⑭	合并原文单位	合形不动义	合	

总体而言,三个译文基本都可称之为“全译”,在信息传达方面都力求接近原文,从机译到原译再到改译,接近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仔细分析,上述译例涉及下列翻译方法:

对:第一句的改译除却③-ed的过去时意义外,所剩全是一一对应,英语词对应为汉语的字和词。第2句三个并列谓语的单句整体对译为汉语分句,整句也整体对译;全例属于句群整体对译。可以看出,对译基本就是直译。下面所说的六种方法,则可归入意译的范围。

增:无论是机译,还是原译与改译,均增加了表过去时间意义的“曾”;原译增加了“并且”,汉语的并列关系多靠前后语序自然显示,不用增加表并列的关联词,此处为不必要的增添,故改译中删掉了。

减:③表示的过去时意义和⑦⑪⑭表示的过去完成时意义在改译中均减去;⑨中的his省略。机译不知为何删除了in others,原译及改译均依原文补回。

移:all his life移至汉语动词前,还可移至主语前,统管整个句子。despised it in others中它与in others互换,可视作二者相互移动位置。

换:机译将三个it机械地对应为“它”;原译与改译均换成三个“失败”,因为英语尽量避重,常用代词或者其他手段替代,而汉语不怕重复,重复往往表强调,更有气势,在排比结构中词语重复率更高。若译成“战胜它,超越它”就难有这般霸气。

分:conquered语义分为⑥与⑦,-ed词尾意义分割出来,移入“曾”中;⑩与⑪、⑬与⑭同理。

合:改译中所分割出来的⑦⑪⑭的过去完成时意义,全集于“曾”字;还可理解为had的助动语义与动词过去分词的合并,是词与词素的合并。

由例可知,译的主体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机器,综合起来是“人或/和机器”,表明译者是人或机器,也可是人和机器,如机助人译、人助机译等。译的方式或工具是译语,是用译语将原语文化信息再次表达出来的过程,具有工具性。译的行为轴心是转化,可分解为“转移”和“化解”,重在转移,即转移原作的内容,化解原作内容与译语形式的矛盾。化解策略包括直译与意译,再进一步细分,则有对、增、减、移、换、分、合等七种手段。这些手段,既

可能是单用，也可能是合用。译的客体或对象是原文，即原语所表达的文化信息。译的结果是产生译作，即用译语创造的口头语或书面语成品。译的目的是追求译前译后信息量的极似，即尽可能地传达原作的信息，包括内容、形式及其统一体（即风格）；如机译、原译、改译与原文越来越近似，由形似走向意似，最终走向风格似。译的类属是人类的一种行为，包括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因为机器同人一样具有某些“智慧”和“才能”，即使是纯机译，也可称之为“智能活动”；同时，因为译除了涉及语言符号之外，还可能涉及图表、音乐等其他符号，用“符际活动”更具概括性和普适性。

只有活动才讲究方法，因此可从人类活动的主体、方式/工具、行为、客体、结果、目的、类属对人类这种活动进行概括：

全译，质言之，指完整性翻译，或译作相对原作力求完整的翻译活动。

全译，简言之，指译者用译语转化原作以求信息量极似的翻译活动。

全译，具言之，指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化为译语以求风格极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

全译，细言之，指人或/和机器通过对、增、减、移、换、分、合七大策略用乙符转化甲符文化信息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

三、变译观认识论过程

变译观，简言之，是如何观变译。同理，变译观也可从译文与原文的差异及其解决方法中总结出来。

翻译观与翻译方法论的互促互动过程中，因主客观因素，常发生偏离和失误。21世纪前，国内外译界的认识多限于全译，比如对严复达旨艺术的误解就延续百年之久。严复的“信、达、雅”之说，虽然“信”居其首，但在实际操作中，只是部分内容信于原作，更多的内容（四分之三）来自原作之外，是为了取悦且服务于译语读者；严复的“达”是达传播原作之要旨，且达服务译者之宗旨；严复的“雅”是指规范文言，即采用秦汉以前通用的文言，其风格是精练而丰富，简洁而深刻，明晰而典雅（黄忠廉 239）。由于没有正确地认识变译大师严复的翻译现象，有人不敢对原作大幅度地变通，有人不敢教给学生摘译、编译等大量变通原作的变译方法。据文军调查，甚至有个别学者否认变译属于翻译范畴，这是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不足所致（60）。先请看下例。原文中的下划线，表示该部分内容在翻译过程中略去未翻。

例2：

Novice drivers crash supercars in Canada

[1] (1) Police think their inexperience was a factor, potentially ruining supercars for everyone. (2) In a world where there are plenty of people who can afford to buy a car that operates at a level way beyond their ability, it's not unusual to see a pair of supercars that have crashed into each other. (3) But what makes this one a bit more out of the ordinary is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

drivers was a “novice”.

[2] (1) The crash occurred last Thursday as the red Lamborghini Huracan and blue Ferrari 458 Italia drove through the Massey Tunnel in Vancouver, Canada. (2) Both cars were wearing “N” license plates, indicating that the drivers had only recently gotten their licenses.

[3] (1) According to CTV News, local police described the drivers, both males in their 20s, as “inexperienced”. (2) However, they said that only one of them was still technically a novice.

[4] The cause of the crash is unknown, however Sgt. Lorne Lecker said it seemed as though speed was not a factor, but their lack of experience may have been.

[5] (1) “These cars have a great deal of power and it's very easy to give into the impulse to try to use that power,” Lecker said. (2) “And on these roads, it can be very dangerous.”

[6] (1) Neither driver was injured. (2) The police suggested the cars had been totalled, but that assessment seems pessimistic. (3) But the chances of the drivers' parents ever letting them behind the wheel of anything more extreme than a Toyota Corolla are not looking good.

[7] (1) The incident has inevitably sparked debate about whether or not newbies should be allowed to drive such powerful cars. (2) As anyone who has driven a genuinely fast car, or at least one a lot faster than their previous experience, will know, it can take your brain a while to catch up. (3) The sensible approach, of course, is to take it steady and build the speed up so you can acclimatize. (4) But youth and sense rarely go together.

[8] We can only hope a couple of idiots don't ruin it for everyone else.

(CTV News www.motor1.com/news/131636/novice-drivers-crash-supercars/)

加拿大两超跑相撞司机皆为年轻新手

[1] 【环球网综合报道】①超跑由于超速发生车祸的情况并不少见，②但两个初学者驾驶超跑，③由于经验不足相撞的情况就比较稀奇了。④上周四，加拿大发生一起超跑相撞的事故，⑤所幸无人员受伤。

[2] ①据悉，②事故发生在温哥华梅西隧道，一辆红色兰博基尼 Huracan 与一辆蓝色法拉利 458 Italia 相撞，③两辆车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法拉利的车头部分损伤较为严重。

[3] ①据当地警方人员称，两超跑的司机均为 20 多岁的男性，②事故原因并非超速驾驶来不及躲闪，③而是两车司机均是取得驾照不久的新手，④缺乏经验，⑤难以驾驭超跑这种强劲功率的车型。

[4] ①警方警告称，②超跑的魅力正在于其高性能与车速，③对于年轻新手来说更是难以抗拒，④但在市区公路上驾驶超跑危险性还是很大的。⑤新手初上路最好不要一开始就尝试超跑，而应该驾驶更好驾驭的常规车型。

表2 变译前后的形义巨变对比与观察所得

译文章法	与原文关系	观察	所得		
[1]	①	无直接关系	据语境添写	增(写)	编
	②③	[1](2)后一句+[1](3)	合并且转述	减或摘;并;述	
	④	[2](1)	提取	摘	
	⑤	[6](1)	摘选	减或摘	
[2]	①	无直接关系	据语境添加	增(写)	
	②	[2](1)	摘	摘	
	③	无直接关系	加写	增(写)	
[3]	④	[3](1)前	摘选	摘	
	②③④	[4](1)+[3](1)末+2+[3](2)+[4]末句	摘选+添补+合并	摘+增+并	
	⑤	[7](1)后半部	摘选	摘	
	①②	[5](1)	摘取+加写+阐释	增(写+阐)	
[4]	③④	[5](2)	全译	全译	
	⑤	[7](3)	阐释	阐	

这是一例“另类”的翻译。与全译相比，本例仅从局部看有全译，如原文段[5]句(2)。其他各处通过对比译前译后文本结构的变化，发现形式、内容方面均有较大变化，已不再是全译例证所示的微观变化，即只在词句之间发生变化，若将全译例的变化设为微变，那么本例的变化则是巨变。这便是在此要讨论的人类早已从事但直到最近才入法眼的另一种翻译——变译。

本例至少涉及增、减、述、编、并、仿几种变通手段。

增：译文段[3]句②将原文译作“事故原因并非超速驾驶来不及躲闪”，增“躲闪”之意，对原文进行合理阐释，使其更加易懂。

减：译文减去了原文的不少细节性或背景性信息，见文中被删各处。原文段[2]句(2) Both cars were wearing “N” license plates, indicating that the drivers had only recently gotten their licenses 尽数删除，只用段[1]句(3)中的 novice 一词，存其大意。另外对警察的采访、警察姓名等细节信息也全部省略。

述：原文段[1]句(2)后一句 it's not unusual to see a pair of supercars that have crashed into each other 与句(3) But what makes this one a bit more out of the ordinary is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 drivers was a “novice”，原译转述为“但两个初学者驾驶超跑，由于经验不足相撞的情况就比较稀奇了”，其实还可进一步简化为“但新手驾驶超跑相撞就稀罕了”，转述其核心内容。见下文改译。

编：译文将原文的意义板块，按汉语行文思路，重新铺排整合。如译文段[1]据原文加写后，又合并原文段[1]句(2)后一句与句(3)，最后将出现于原文中间段[6]句(1)的事故结果(无人受伤)提置段首，开门见山地报道事故信息。译文的整体结构段[1]、[2]、[3]、[4]也是重编的结果。

并: 原文对司机为新手的介绍比较散乱,译文将原文段[3]句(1)末句与段[2]句(2)和段[3]句(2)以及段[4]的末句合并,构成了译文段[3]的句③与句④。原译至少段[2]与段[3],分段仍可商榷;若是非报网类载体,还可同类合并。

仿: 译文首段仿新闻导语,与原文大不相同。

经过分析,发现例2的变译仍可改进:

加拿大两超跑相撞皆因年轻新手上路

[1]【环球网综合报道】超跑超速发生车祸并不少见,但新手驾驶超跑相撞就罕见了。上周四,加拿大发生一起超跑相撞事故,所幸无人伤亡。

[2] 据悉,事故发生于温哥华梅西隧道,红色兰博基尼与蓝色法拉利相撞。据警方称,两超跑司机均为20余岁男性,事故原因并非超速躲避不及,而是新手缺乏经验,难以驾驭超跑。

[3] 警方建议,超跑功率大,车速快,年轻新手难抵魅力,在市区驾驶会很危险;新手上路最好是先求稳,再求速。

改进后的译文,相比原译更加简练。换句话说,在原译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新的手段:

缩: 在删掉原文无用细节的基础上,译文还做了进一步的压缩、提炼处理,用尽可能凝练的译语,把原文的核心内容表达出来。比如第一段,从原文到原译再到改译,可以明显看出文字变得更加简练,中心意思也更加突出了。当然,本例中所看到的还只能算是一种微型缩译。假如取一篇中文学术论文,撮其大要,译成英语,结果类似于英文摘要的形式,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缩译了。

可以看到,经过上述每一种翻译策略处理之后,译文在形式或内容上,相对原文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改变。然而还可以改得更加彻底一些。如:

例3:

Looking here at Wednesday's weather forecast for Europe, it's certainly clear that winter is starting to take its grip on the continent. Berlin on Wednesday, mostly cloudy and very cold, and -2 degrees for your high. Brussels, Belgium, a little warmer at one degree, partly sunny. London, 5 degrees for your high, mostly cloudy throughout the day. In Paris, your high temperature is 0 degrees on Wednesday, partly cloudy as well. Rome, 8 degrees for your high, with periods of clouds and sunshine. And Vienna, Austria, -2 degrees on Wednesday, cloudy and of course cold. Athens, Greece, a little warmer at 10 degrees, periods of clouds and sunshine on Wednesday. Belgrade, Yugoslavia, 1 degree for your high, mostly cloudy. Istanbul, 5 degrees, and partly sunny. And Kiev, Ukraine, -7 degrees, and you can expect snow. Moscow, -9 degrees on Wednesday, also snowy. And in Prague, the Czech Republic, -4 degrees with snow flurries, so sounds like typical of weather for that area of the world. Let's look at what we have here in Washington D, C., no snow yet, but it will be coming.

表3 对照译文

城市	天气状况	最高气温(0℃)
柏林	多云	-2
布鲁塞尔	转晴	1
伦敦	多云	5
巴黎	转阴	0
罗马	阴转晴	8
维也纳	阴	-2
雅典	阴转晴	10
贝尔格莱德	多云	1
伊斯坦布尔	转晴	5
基辅	预计有雪	-7
莫斯科	雪	-9
布拉格	阵雪	-4
华盛顿特区	预计有雪	

相比例2,例3主要涉及另一种变译策略。

改:这是一则天气预报的翻译。原文以文字叙述为主,译文改为表格的形式,各大城市的天气和气温一目了然,语言精练,数据清晰,直观性很强,省却了纯文字阅读的麻烦。由于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是这些有效信息内容,所以其他文字完全可以省略不译。这是一种典型的改译,语用效果相对于纯用文字来逐句翻译无疑要好得多。

总体而言,上述是对在原作基础上大举变通即增、减、编、述、并、仿、缩、改的过程的简要介绍,可名为“变译”。与前述的全译相似,变译的主体依然是人或/和机器,目前人尚是绝对的主体;其工具仍是译语;其客体仍是原作;它仍属于人类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但与全译相比有三点新的差异:

第一,行为不同。其行为轴心除了全译的“化”之外,还有较大幅度的“变”,即因译语读者需求与原作供应方式之间的矛盾而对原作施以“变通”,包括增、减、编、述、并、仿、缩、改等八大策略。如新闻导语,在译之外还有写,此为“增”;许多细节信息非中国读者所需,予以删除,此为“减”;有关司机的信息分散各处,加以整合,此为“并”;等等。整个行为不再是全盘输入,而是摄取有用信息。

第二,目的不同。其目的是追求译前译后信息量不同程度的相似,不求极似,而是有所不同,且是大不同,旨在取得更简更明更优的特效。

第三,结果不同。其结果已不是原作的极似品,形体、内容各有变化,甚至是与原作风格迥异。如例2中原译相较原文变短了,改译比原译更短更简洁,跨语传播速度更快。

同样,可根据人类活动的主体、方式/工具、行为、客体、结果、目的、类属对人类这种

活动进行概括：

变译，质言之，指变通式翻译，或力求多样变通原作的翻译活动。

变译，简言之，指译者用译语变通原作内容以满足特定需求的翻译活动。

变译，具言之，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

变译，细言之，指人或/和机器通过增、减、编、述、缩、并、仿、改等八大变通策略用乙符摄取甲符文化信息，以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特殊需求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

四、翻译观合成

从目前来看，人类翻译不外乎上述两大类：完整传达原作信息以求极似的全译；大变原作信息以求特效的变译。翻译兼指译者、行为和结果，核心所指是行为，按照动词理解，可综合前面对全译与变译的讨论，先理清其最基本要素，发掘其内涵，再做厘定。无论是机制、策略，还是方法、技巧，翻译行为中七大要素都不可或缺：主体、客体、动作、工具、目的、结果、类属。这七要素共同决定了翻译行为的内涵，换言之，七要素是翻译定义的根本属性。视“翻译”为动词，则可取动词义素的分析模式“{义项}=[主体+方式+动作+客体+目的+结果]”，用逻辑学中的“概念=种差+属”定义模式，得出“翻译”的义素和种差综合表，大体如下：

表4 翻译的义素与构成

动词			动词义素						
			主体	客体	行为	工具	目的	结果	类属
译	易	变	人或/和 机器	甲符 文化 信息	变通 转化	乙符	求特效，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	信息量有意失恒	智能活动 符际活动
		化					求极似，力保原文信息量不变		

对翻译本质的厘定应概括而不空泛，具体而不繁琐，专业而不深奥，易懂而不俗套。翻译之内涵不妨确定如下：

翻译是人或/和机器将甲符文化变化为乙符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

翻译活动发展到今天，形式与内涵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除了追求与原文信息量极似的全译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追求不甚相似的变译。全译和变译目前是最根本的翻译分类，两者构成了翻译的全貌。要了解翻译的本质，可以先了解其基本分类，即全译和变译的本质。全译与变译之分及全译观与变译观的厘定，有助于聚合为新的翻译观，即“翻译是人或/和机器将甲符文化变化为乙符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基于这一翻译观，翻译虽然在伦理上要求“信”，实际上求不了“信”，只能求“似”，“信”要求对等，而“似”只要

求相似，其中还有大似小似的不同程度之分。这一与时俱进的新翻译观，相对于传统翻译观，或许更能接近当下翻译活动的本质，也更能满足现阶段翻译研究的需要。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Duan, Feng.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Subjectivity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Sichuan UP, 2008. [段峰:《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 Fu, Lei. "Introduction to Re-translation of *Le Père Goriot*." *What Fu Lei Says about Translation*, edited by An Nu, Liaoning Education, 2005, pp. 1-4.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载怒安编《傅雷谈翻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第1-4页。]
- Huang, Zhonglian. *On Yan Fu's Thought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黄忠廉:《严复变译思考》。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 Melby, Alen, et al. "Defining the Landscape of Translation." *Revista Tradumàtica: tecnologies de la traducci*, no.12, 2014, pp. 392-403.
- Nida, Eugene A., and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E. J. Brill, 1982.
- Qian, Zhongshu. "Lin Shu's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1, 1985, pp. 2-10. [钱钟书:1985,《林纾的翻译》,载《中国翻译》1985年第11期,第2-10页。]
- Tytlar, Alexander Fraser.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E. P. Dutton & Company, 1907.
- Wang, Hongyin.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ritings on Translation: from Dao'an to Fu Lei*. Hubei Education, 2003.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Wen, Jun. *A Review of Chinese Translation Criticisms in the Past Century*. Beihang UP, 2005. [文军:《中国翻译批评百年回眸》。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5。]
- Xu, Jun. 2015.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oblems in the New Era."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15, pp. 8-9. [许钧:《关于新时期翻译与翻译问题的思考》,载《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第8-9页。]
- Zhong, Weihe.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Re-positioning and Re-defining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15, pp. 10-11. [仲伟合:《对翻译重新定位与定义应该考虑的几个因素》,载《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第10-11页。]

◇责任编辑:蒋莉华

《狼图腾》英语世界译介效果研究

◎ 鲍晓英 游春艳

内容提要: 译介效果是检验翻译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 中国文学译介效果研究目前已经成为研究热点。《狼图腾》英译本问世近十年了, 现从图书馆馆藏量、西方主流媒体评价报道量、读者评价等角度考察其译介效果, 以期其经验和教训能够给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提供经验和参考。

关键词: 《狼图腾》 译介效果 中国文学译介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119-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 (15YJA740002);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2015BYY001);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 (15PJC081)

作者单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上海 200083

Title: *Wolf Totem's* Communication Effec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ommunity

Abstract: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is an important assessment of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Studies on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have become a heated topic. At a time whe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olf Totem* has existed for ten years,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Wolf Totem*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oping it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Keywords: *Wolf Totem*, communication effect,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uthor: Xiaoying Bao, Professor,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Chunyan You, MA candida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翻译是跨文化传播行为, 通过翻译实现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 靠的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 而是译介。翻译文本的产生只是传播的开始, 在它之前有选择谁翻译和译什么的问题, 在它之后还有“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谢天振 11)。翻译文本能够进入异域阅读层面, 赢得异域行家的承认和异域读者的反响才有译介效果(吕敏宏 11)。译介效果是衡量翻译行为成败的重要标准。

中国文学要“走出去”，达到译介效果，就得让中国翻译文学作品进入译入语社会，得到传播，为其接受并产生影响。这对于不属于世界主流的中国文化和文学来说，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鲍晓英 13）。中国文学译介效果已经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

2004年,《狼图腾》在国内出版,至2014年在中国大陆再版150多次,正版发行近500万册;其英文版权2005年以10%的版税和10万美元预付款出售给世界知名的企鹅出版集团,由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翻译后,于2008年在110个国家同时发行,其中第一版精装本在全球发行50万册。本文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狼图腾》英译出版近10年的译介效果,以期其经验和教训可以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译介效果

传播效果指传播者发出的信息,通过一定媒介到达受众后所引起的受众思想行为变化,只有传播信息到达受众、被受众接受,传播才有效果(田中阳 164)。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成败的关键。

拉斯韦尔传播模式认为,传播均由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途径”“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五大基本要素构成(郭建斌、吴飞 116-25)。五大要素中,效果研究最受重视,研究传播、探讨传播规律,都是为了提高传播效果(张鑫 110)。

文学译介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同样包含传播模式中的五大要素,即文学译介包含“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译介作品若无法为译介受众所接受,翻译就达不到传播文化的目的,也就不存在译介效果,译介行为便失去意义。研究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最终都是为了提高译介效果。

二、《狼图腾》英译译介效果

2005年8月企鹅出版集团买下了《狼图腾》的英文版权,这是该集团自2005年设立中国办事处以来取得的最大成就。虽然它过去也曾出版过一些经典的中国文学作品,如《红楼梦》《围城》《红高粱》等,但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发行一本书还是第一次(龙行健 4)。《狼图腾》英文版权输出在国内至少创造了三项第一:首先,这是我国图书按照市场规则首次成功进入欧美主流市场和世界市场;其次,10万美元的预付款,是先前所有中国图书单本书版权输出一次性收入的最高纪录;最后,10%的版税也创下了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版税收收入的新纪录(陈燕 81)。

《狼图腾》英译本译介效果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考察:

(一) 全球图书馆馆藏量

全球图书馆馆藏量是衡量海外译介效果的重要标准。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是目前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的提供线上图书馆和文献信息服务的机构,其WorldCat数据库是全

球最大的联合编目数据库，从中检索的图书馆馆藏量能最大程度上接近真实数据。

根据 2017 年 3 月 OCLC《狼图腾》英文本在使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的馆藏情况的检索，并与两部极具代表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太多的幸福》（*Too Much Happiness*）的馆藏量作为对照，结果如下：

表 1 全球图书馆馆藏量（数据来源：OCLC WorldCat 数据库）

	《狼图腾》（英译）	《生死疲劳》（英译）	《太多的幸福》（英文原版）
作者（译者）	姜戎（葛浩文译）	莫言（葛浩文译）	爱丽丝·门罗
出版年份	2008 年	2008 年	2009 年
美国馆藏量	663	776	1786
英国馆藏量	80	6	137
澳大利亚馆藏量	78	31	79
其他国家馆藏量	152	72	275
总馆藏量	937	885	2277

2012 年，何明星检索了 44 部中国英译作品的馆藏量并进行排名，其中《狼图腾》排名第一（920 本），《生死疲劳》排名第七（644 本）。对比两组数据，《生死疲劳》的馆藏量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大幅度增加，但仍然没有超过《狼图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狼图腾》仍然是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当代中国作品（何明星 48-51）。爱丽丝·门罗是英语世界本土作家，其作品馆藏量远高于两部中国代表作的馆藏量之和，也说明中国文学要真正走向世界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海外获奖情况

在国际上获奖有助于作品的海外传播，是其海外译介效果的重要体现。虽然《狼图腾》作者姜戎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图书推广，但这部小说的不同版本仍然斩获了诸多国外文学奖。2009 年其法译本获得翻译“金字奖”；其英译本则于 2007 年获得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该奖项旨在将亚洲作者的英译作品带到英语世界，获奖作品有望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得到肯定与认可。在首次颁奖提名中，共有 243 部亚洲作品，其中不乏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知名作家的作品，但《狼图腾》最终脱颖而出。评审团主席克拉克森（Adrienne Clarkson）颁奖时如此评价，《狼图腾》“具有强大的感人力量，景观恢弘，读后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与众不同”（李小江 88）。

（三）西方主流媒体报道刊载和书评

媒体报道刊载评论也是译介效果的体现。《狼图腾》的海外发行得到许多西方媒体的刊载推介和报道评论。根据目前搜集到的 2005 年到 2017 年的文献资料显示，相关媒体报道刊载次数如下：

表2 西方主流媒体刊载报道

媒体类别	主要代表	报道(刊载)次数
报媒	《纽约时报》、《卫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美国通讯社》、《星期日泰晤士报》等	237
期刊	《书商周刊》、《出版人周刊》、《纽约客》、《世界比较文学评论》、《亚洲民族》等	172
线上数据库	ProQuest 检索图书馆、OneFile 数据库、JSTOR 档案期刊、文学资源中心等	303

表3是美国亚马逊书城上近100条书评的年份分布,曲线代表每年书评数量所占的比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狼图腾》英文版在美国的销售趋势。

表3 《狼图腾》十年书评走势(数据来源:美国亚马逊网站)



书评越多,意味着读者越多,书的销量往往也越大。曲线的最高峰值落在2015年,因为这一年电影《狼图腾》在全球上映。

2009年,著名法国导演阿诺德(Jean Jacques Annaud)开始筹备《狼图腾》电影改编;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该电影作为中法合作的成果被视为两国友好关系的重点交流项目,获得八百万美元的欧洲市场保底发行,这是近年来中国电影最高的保底发行量。2015年2月7日,《狼图腾》在欧洲电影市场首映;2015年9月11日,该电影登陆北美市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IMAX院线同时上映;2016年,《狼图腾》作为唯一的一部中国电影被提名奥斯卡奖。与此同时,在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平台YouTube上搜索关键词“wolf totem”,可获得78300条相关视频。除了不同语言的完整版电影,其他都是不同版本的短视频和预告片,其中2015年全球上映的官方英语预告片获得最多的点击率,观看人次高达56万左右。通过电影的媒介,《狼图腾》小说获得了更大的受众群体。

畅销书改编电影吸引了大量媒体进行报道。从Factiva全球新闻数据库搜集到的2283条关于《狼图腾》的英文报道,根据不同的主题可以分为五类,每类所占比重如下:

表4 《狼图腾》英文报道分主题统计数据(数据来源:Factiva全球新闻数据库)

报道主题	电影	文化	图书	政治	书评
所占比重	53%	25%	14%	5%	2%

由此可见,2015年之所以能成为《狼图腾》英文版在美国最畅销的一年,同名电影的广泛传播功不可没。

（四）畅销书排名和读者评论等级

国际互联网平台是了解图书译介效果的重要渠道，亚马逊网站（Amazon.com）和好读网（Goodreads.com）这两个权威线上平台可以提供畅销程度排名和读者评论等级方面的数据。因为“亚马逊是全球最大的网上书店，其客户评论体系成熟，评论者言之有物，是目前了解普通读者群对作品意见的最为直接、最为系统的渠道”（车艳秋 54）；而好读网是全球最大的读者交流和图书推荐平台，旨在帮助人们发现和分享他们喜爱的书籍。

下表是三本中国畅销书在亚马逊的排名：

表 5 三本中国畅销书在亚马逊的排名（数据来源：亚马逊网站）

作品	《狼图腾》	《青衣》	《兄弟》
作者	姜戎	毕飞宇	余华
译者	葛浩文（H. Goldblatt）	葛浩文（H. Goldblatt）	罗鹏（Carlos Rojas）
排名（2011.01.11）	84187	288502	206596
排名（2016.06.17）	46797	601748	202989

近年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英语作家的代表作英译本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排行榜上，能位列万名之后十万名之内已属难能，所有主要著作的英文版在这一榜上只列第几十万名的也并非不可思议（刘亚猛、朱纯生 5-12）。《青衣》和《兄弟》排在几十万名实属正常，而《狼图腾》的排名从八万多名攀升至四万多名，这对非英语母语的文学作品而言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下表是好读网的海外读者对上述三本中国畅销书的星级评价：

表 6 三本中国畅销书在好读网的排名（数据来源：好读网）

译介图书	海外线上评论人次	好评率（3-5 星）	差评率（1-2 星）
《狼图腾》	4839	93%	7%
《青衣》	268	73%	27%
《兄弟》	2869	92%	8%

英译本《狼图腾》不但在评论人数上远胜其他两部畅销书，而且好评率高达 93%。

（五）受众评论

“要考察一本书的接受效果，最为准确的就是分析读者留言”（何明星 80）。专业评论和普通评论两种不同受众视角可以考察英译本《狼图腾》的海外接受效果。

1. 专业人士评论

“对于很难进入主流视野的翻译文学来说，专业书评是吸引读者注意的主要途径”（车艳秋 54-56）。通过研究 20 余篇英文本《狼图腾》专业书评后发现，对《狼图腾》的批判主要来自三个人：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印度作家尼维第塔（Charu Nivedita）和米沙拉（Pankaj Mishra）。顾彬批评小说中的“法西斯主义”，针对的主要是小说中很多对少数民族的强制行为；尼维第塔也提出了相同的质问：相比法西斯式的、任由强势民族屠杀和吞并

其他民族的草原，我们不更热爱和平的沙漠吗？米沙拉批评小说为“说教主义”，认为小说充满了乏味生硬的说教，他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么乏味的书在中国会成为轰动性的畅销书，而且畅销程度仅次于毛泽东的“小红书”。除此之外，其他的评论基本上是赞扬，如何成洲（He, Chengzhou）认为，《狼图腾》中的中国人对环境问题的忧思有助于该书从本土走向国际”（788）。葛浩文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表示，“就这本书而言，它最大的特点不是语言，而是它其中的一些精神，比如追求自由”（转引自顾湘）。杜特莱（Noël Dutrait）将《狼图腾》中的精神价值视为最重要的因素，认为作者从哲学、历史和民族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毫无轻蔑之意，还满怀崇敬之情（126）。导演阿诺德在谈到为什么愿意改编《狼图腾》电影时，高度称赞了小说原著，认为这部小说的美在于故事中的世界性主题，他希望通过电影的形式，体现小说中的普世价值和宏大主旨（转引自祝虹 72-78）。

2. 普通读者评论

普通读者书评主要体现在 468 条普通读者的文字评论中。评论来源于美国亚马逊网站（94 条）、英国亚马逊网站（37 条）和好读网（337 条），这些评论少则上百字，多则上千字，具有可靠的参考价值。所有评论中，除了 10% 批评故事情节和语言拖沓、冗余、说教等外，约 90% 是积极肯定的评论，“读过的最好的书本之一”“强烈推荐”“最不可思议、最感人肺腑、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小说之一”“这个故事具有普世性，不仅仅涉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内蒙古，任何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挣扎的社会也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这是我第一次深入了解中国文学，能够更多了解这个泱泱大国的历史，感觉非常有趣”“异域文化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让我大开眼界。习惯了阅读西方文学，因而阅读中国文学能感受到很多差异，这深深吸引了我”。

三、启示

全球化使得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文学加速向全球传播，而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中国文学则在“向心”传播中阻力重重（孙艺风 19）。在这种情况下，《狼图腾》却逆势而动，在图书馆馆藏量、海外获奖情况、西方主流媒体报道刊载量、专业和普通受众的评价等方面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其译介效果令人鼓舞。它的成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启示颇大。

首先，电影是非常有效的译介途径。影视文化产品在文化产业中有着核心地位，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也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狼图腾》电影带来的效应也说明，影视作品作为海外受众认知中国文学的重要渠道应该得到更好的利用。其次，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作品是一个重要译介途径。翻译作品生成之后就必须要考虑到作品的出版问题，出版是一国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鲍晓英 109）。《狼图腾》英译本为国际知名企鹅出版社出版，其影响力和大力宣传提高了作品的知名度。再次，汉学家应该是中国文学外译的译介主体。译者在提供译本之外，还要在原作者、编辑、赞助人之间发挥沟通协调作用，像商务人士、谈判专家和外交官一样，做文化交往的中间人。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Bao, Xiaoying.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odel of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5. [鲍晓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5。]
- Che, Yanqiu. "Interpretations of New Century Literary Works in the West."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no. 4, 2014, pp. 54-56. [车艳秋:《新世纪中国文学作品的西方解读》, 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第54-56页。]
- Chen, Yan. *Cases of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Books*. Foreign Languages, 2010. [陈燕:《中国图书“走出去”成功案例选》。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0。]
- Dutraït, Noël. "Wolf Totem." *Book Reviews*, no. 2, 2009, pp. 125-27.
- Gu, Xiang. "The Lack of Individual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Bund*, 25 March 2008. [顾湘:《中国文学普遍欠缺个人化》, 载《外滩画报》2008年3月25日。]
- Guo, Jianbing, and Fei Wu. *Guides on Reading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unication Books*. Zhejiang UP, 2005. [郭建斌、吴飞:《中外传播学名著导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 He, Chengzhou. "The Wolf Myth and Chinese Environmental Sentimentalism in *Wolf Tote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no. 21, 2014, pp. 781-800.
- He, Mingx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World." *China Book Review*, no.1, 2013, pp. 48-55. [何明星:《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载《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期, 第48-55页。]
- Li, Xiaojiang. "Wolf Totem, A Post-time Fable." *China Book Review*, no.1, 2009, pp.87-91. [李小江:《狼图腾》是一部“后”时代寓言, 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1期, 第87-91页。]
- Liu, Yameng, and Chunshen Zhu. "International Comments and the Active Exist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in Foreign Countrie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5, pp. 5-12. [刘亚猛、朱纯深:《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 载《中国翻译》2015年第1期, 第5-12页。]
- Long, Xingjian. *Criticism on Wolf Totem*. Xuelin, 2007. [龙行健:《狼图腾批判》。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7。]
- Lv, Minhong. "The Background,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odels of Chinese Modern Novels in the English World." *Novel Criticism*, no. 5, 2011, pp. 4-12. [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 载《小说评论》2011年第5期, 第4-12页。]
- Sun, Yifeng.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1, 2012, pp. 16-23. [孙艺风:《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 载《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 第16-23页。]
- Tian, Zhongyang.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ies*. Yuelu Books, 2002. [田中阳:《大众传播学理论》。长沙:岳麓书社, 2002。]
- Xie, Tianzhen. *Medio-Translatolog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1999.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Zhang, Xin. "New Theories on Mass Communication Effects." *Hunan Social Science*, no. 1, 2013, pp. 109-12. [张鑫:《大众传播效果研究新论》, 载《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第109-12页。]
- Zhu, Hong. "The Grasping of the Soul of the Film." *Interviews*, no. 2, 2015, pp. 72-78. [祝虹:《用电影捕捉灵魂——〈狼图腾〉导演让·雅克·阿诺访谈》, 载《访谈录》2015年第2期, 第72-78页。]

◇责任编辑:蒋莉华

新世纪《译林》汉译外国通俗小说考察

◎ 李琴

内容提要: 新世纪以来, 外国通俗小说汉译进入繁荣期。《译林》作为我国译介外国通俗文学的重要平台, 向国人译介了大量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技法新颖的外国通俗小说。文章考察了新世纪以来《译林》汉译外国通俗小说的数量、来源国、主题及译者情况等方面的现状, 并分析特点, 以期深化人们对新世纪以来外国通俗小说汉译发展的全景认知, 同时引起学界对外国通俗小说汉译的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 新世纪 《译林》 外国通俗小说 汉译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126-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汉译研究”(13CWW007); 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元批评’视域下的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汉译批评研究”(16JZ055)

作者单位: 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8

Title: A Study of Translated Foreign Popular Fiction in *Trans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popular fiction boomed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Based on *Translations*, this article conducted a survey on the quantity, countries of origin, themes, and translators of foreign popular fiction in 21st century in China.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a panorama of, and arouse further inter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ed foreign popular fiction in 21st century China.

Author: Qin Li, Professor,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nxi, China.

在我国, 外国通俗小说汉译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清末民初外国文学翻译兴盛期, 我国主要译介四大外国小说类型, 即侦探小说、政治小说、言情小说和科学小说(查明建、谢天振 32), 其中一半是通俗小说。此一时期外国通俗小说汉译的繁荣并未持续太久, 很快就遭遇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知识精英阶层的强烈批评和苛责, 以至于在此后几十年外国文学汉译的历程中, 外国通俗小说译介始终处于被政治化、庸俗化和边缘化的境地, 在“文革”期间更是达到了极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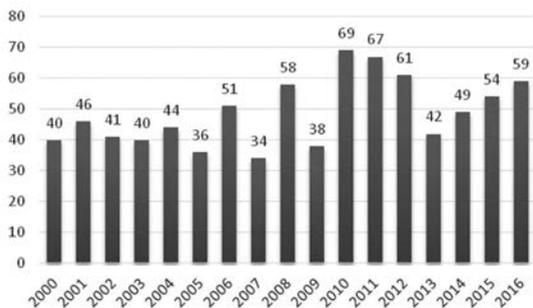
“文革”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逐渐解冻，文学艺术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外国通俗文学的译介也不例外，开始了“解禁”后的新征程，于1979年创刊的《译林》杂志迅速成为复兴外国通俗文学译介的主力军。《译林》创刊伊始就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办刊宗旨，“重点选登反映外国现实较深刻的、健康的当代外国通俗文学”（李景端，《打开“窗口”促开放》46）。三十多年来，《译林》为外国通俗文学的译介以及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本研究将以《译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新世纪以来外国通俗文学汉译现状做一番考察和研究。

本研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新世纪，首先是因为外国通俗文学在新世纪呈现出勃兴之势，“哈利·波特”系列、“魔戒”系列、《达·芬奇密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纳尼亚传奇》等外国通俗小说借助广告和影视媒体的宣传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狂潮；其次，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和诗学语境都发生了一系列转型和变化，作为通俗文学主要消费群体的中产阶级队伍日渐庞大，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等文化形态甚嚣尘上，新媒体大势崛起，凡此种种都为外国通俗文学在我国的译介与传播营造了充分利好的时代文化语境。因此，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外国通俗小说汉译的发展进行研究有其意义和价值。

一、译介情况调查与分析

法国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 Escarpit）认为，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是认识文学事实的好方法，“只有对经过系统地、不带任何成见地整理出来的客观资料的研究，才能较好地分析文学事实”（51）。对翻译文学事实的认识亦如此。翻译文学受社会文化影响显著，会在选材、数量、来源、体裁、译者构成等方面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为了透视新世纪社会文化语境下《译林》汉译外国通俗小说的特点，本研究对2000年至2016年《译林》汉译外国通俗小说的数量、来源国分布、主题、译者构成等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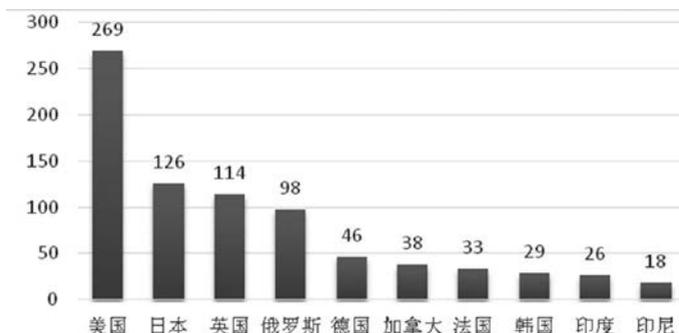
（一）译介数量



▲图1 2000—2016年《译林》汉译外国通俗小说数量统计图

统计显示,《译林》在2000至2016年共译介外国通俗小说900余篇,其中长篇小说占15%,中篇小说占13%,短篇小说占72%,在有限的版面内,译作数量逐年提升,并于2003年创设增刊,2003至2004年每年1期,2005至2008年每年2期,2009年至今每年4期,以满足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对外国通俗小说的阅读需求。在出版模式上,“每期全文译载一部外国长篇小说,兼配其他体裁的作品,使每期《译林》既是一本书,又是一本杂志”(李景端,《波涛上的足迹》46)。这种出版模式造成外国长篇通俗小说的译介数量最少,但份量却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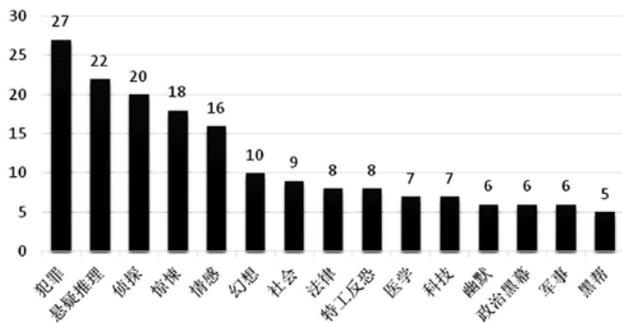
(二) 译介来源国分布



▲图2 2000-2016年《译林》汉译外国通俗小说来源国分布情况

新世纪以来,《译林》汉译外国通俗小说的来源国数量已由2000年的22个国家,逐渐增加到2016年的50余个国家,来源国遍布世界各大洲。笔者对译介数量排在前十位的来源国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新世纪以来译介数量最多的外国通俗小说主要来源于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经济文化大国。其中源自美国的通俗小说共计269篇,占总量的31%;源自日本的共计126篇,占13%;源自英国的共计114篇,占12%;源自俄罗斯的共计98篇,占10%。这四个国家的汉译通俗小说占据了新世纪以来《译林》译介外国通俗小说总量的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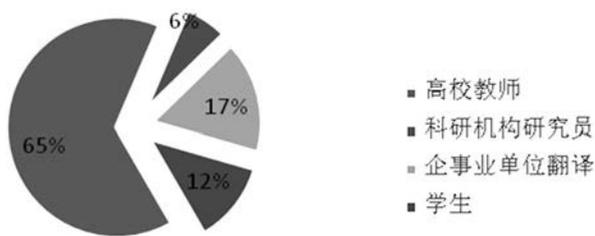
(三) 译介主题



▲图3 2000-2016《译林》汉译外国长篇通俗小说主题统计

关于西方通俗文学(小说)的主题分类,目前为止尚无定论。Wikipedia在“genre fiction”词条下,将西方通俗小说分为犯罪小说、幻想小说、惊悚小说、侦探悬疑小说、言情小说、科学小说、西部小说、励志小说八大类^[1]。我国诸多学者也依据不同的标准,对通俗文学给予不同的分类^[2]。以上分类标准各不相同,但都说明“实际上没有一个全社会通用的、适合于所有人的‘通俗文学’,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各自的‘通俗文学’”(王友贵 10)。通俗小说分类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通俗小说概念界定的不同,因为“事实上,通俗小说这一概念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含义,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是依凭其实际存在而不是‘定义’”(孔庆东 2)。鉴于通俗小说概念的流变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类的模糊性,本文以具体的文本为基础,对2000—2016年《译林》刊载的通俗小说,特别是长篇通俗小说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新世纪以来《译林》译介的外国通俗小说共分为犯罪小说、悬疑推理小说、侦探小说、恐怖惊悚小说、情感小说、幻想小说、社会小说、法律小说、特工反恐小说、医学小说、科技小说、幽默小说、政治黑幕小说、军事小说和黑帮小说等15大类,其中犯罪小说、悬疑推理小说、侦探小说、恐怖惊悚小说和情感小说的译介数量居于五强地位。

(四) 译者构成



▲图4 2000—2016年《译林》汉译外国通俗小说译者构成

《译林》不仅是外国当代通俗小说的译介平台,也是我国译界人才培养的摇篮。根据统计,以《译林》为翻译实践平台进行翻译创作的群体,除去身份信息不明确的译者外,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高校教师,二是企事业单位翻译人员,三是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四是学生及业余翻译爱好者。其中高校教师居于多数,占65%,接下来是企事业单位翻译人员,占17%,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占12%,最后是学生及业余翻译爱好者占6%。

二、译介特点

(一) 畅销作家作品引介

作为国人了解当代外国通俗小说发展现状的风向标,《译林》长期以来都致力于将国外最新、最流行、最畅销的通俗小说译介进来,让国内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一饱眼福。“《译林》

上的长篇作品都是国外近一两年内面世的，有的作品是根据与国外第一出版商同时拿到的外国作家刚写就的打印稿译出的；作品的题材求新，尽量选用其题材在《译林》上甚至在国内少见或未见的作品；作品的内容求新，所有文学作品都是重点反映当今国外的社会情况”（王理行 43）。新世纪以来，《译林》对外国通俗小说的译介延续了以往引介畅销作家作品的风格，截至 2016 年底，《译林》已经译介了国外一百余位畅销书作家的长篇通俗小说，其中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名字对国内读者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仅以美国为例，就有著名悬疑小说家托马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及其“食人魔”系列小说之《汉尼拔》；法律惊险小说家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及其《遗嘱》；军事小说家卢西恩·特拉斯科特（Lucian Truscott）及其《西点危机》；幽默小说家戴夫·巴里（Dave Barry）及其《问题搞大了》；“悬念女王”桑德拉·布朗（Sandra Brown）及其《不在犯罪现场》；政治惊险小说家斯图亚特·伍兹（Stuart Woods）及其《总统竞选》；情感小说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及其《梦系廊桥》；犯罪推理小说家杰弗里·迪弗（Jeffery Deaver）及其《蓝色虚拟空间》；“科技惊悚小说之父”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及其继《侏罗纪公园》后的力作《猎物》、《恐惧状态》；被誉为“美国的琼瑶”的爱情小说家丹尼尔·斯蒂尔（Danielle Steel）及其《画廊情殇》；著名恐怖小说与情欲书写代表作家安妮·赖斯（Anne Rice）及其继《夜访吸血鬼》之后的力作《吸血鬼莱斯特》，等等。除老牌畅销书作家外，《译林》还不断推陈出新，译介了不少美国畅销书新秀的代表性作品，例如珍妮特·菲奇（Janet Fitch）的情感小说《白夹竹桃》，詹姆斯·鲍里克（James Powlik）的海洋惊险小说《海变》等。

《译林》在大量译介美国畅销书作家及其作品的同时，也间或译介了不少其他国家的畅销书作家及作品，例如日本著名恐怖小说家贵志佑介（Yusuke Kishi）及其《黑屋吊影》；英国著名特工反恐小说家斯特拉·里明顿（Stella Rimington）及其《险情》；法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斯特凡妮·本森（Stephanie Benson）及其《图书馆纵火案》；神学惊悚小说家艾列特·阿贝卡西（Eliette Abécassis）及其《最后的部落》；意大利著名黑帮小说家奥塔维奥·卡佩拉尼（Ottavio Cappellani）及其《谁是娄·肖获诺》；爱尔兰首席惊悚小说家约翰·康诺利（John Connolly）及其《情人》；德国惊险小说家海因茨·孔萨利克（Heinz G. Konsalik）及其《沉默的运河》；瑞士文坛最富特性的作家于尔格·费德施皮尔（Jurg Federspiel）及其《欲望地理》，等等。

（二）“惊险悬疑+”主题套餐

所谓“惊险悬疑+”主题套餐，是指以惊险、悬疑等主题为主，或融入大量人文与科学知识，或与其他次级主题搭配而形成的主题模式。

如前所述，《译林》译介的外国通俗小说主题总体而言是以犯罪、悬疑、侦探和惊悚为主，这是因为此类小说情节曲折复杂，可读性强，更富娱乐精神，也更能够满足读者大众的猎奇心理。正如《译林》杂志社社长顾爱彬所言，“可读性是《译林》一直强调的，而在文学作品中，畅销小说或者通俗小说是最具有可读性的。以上两点是《译林》有别于其他外国文学杂志的

地方，也是《译林》长久以来保持的鲜明个性和特色”^[3]。

与传统同类小说不同，《译林》译介的外国犯罪、悬疑、侦探和惊悚小说，不仅情节出众，而且融入了大量人文与科学知识，俨然一部部百科全书。这是因为《译林》译介的外国畅销书作家，大多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广泛涉足于不同的社会领域且颇有建树，学历背景丰富，知识面广，视野宽阔，这使得他们在通俗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能够广泛借鉴各种学科专业知识，同时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在情节之外，增加小说的知识性、趣味性和真实性。例如《译林》2010年第2期刊载的英国长篇爱情小说《东非鸟类指南》，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大学生在东非肯尼亚这个鸟类天堂上演的爱情故事。故事虽以爱情为主题，但称其为鸟类百科全书也毫不过分。其中博大精深的鸟类知识为小说增添了无穷魅力，使之奇趣盎然。新世纪以来《译林》刊载的通俗小说还涉及海洋、生态、网络、环境、军事、政治等不同的领域，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将通俗小说置于强大的知识和文化体系中，极大地提升了通俗小说的地位，使其“通”而不“俗”，为广大读者所称道。

除了写作主题上的多元丰富之外，《译林》译介的外国通俗小说还常常在同一部作品中交错叠加不同主题，形成别具一格的“主题套餐”。例如《译林》2002年第2期刊载的美国著名“悬念女王”桑德拉·布朗的惊险悬疑小说《不在犯罪现场》，就是一份风格鲜明的“悬念+爱情”特色套餐。布朗善于将美丽的爱情置于惊险的悬念中去，让小说读来紧张刺激而又不乏温情。套餐型主题在丰富通俗小说主题形态的同时，又深化了通俗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叙事艺术等，增强了通俗小说的审美内涵。

（三）“学院派”专业译者

《译林》自创刊以来，就以提供翻译平台，培养译者队伍为己任，迄今为止，已经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译技出众，成果丰硕的翻译工作者。目前活跃在我国翻译界的中老年翻译家们，有相当一批人都是在《译林》提供的翻译平台上锻炼和成长起来的。不少中青年译者，依然以《译林》为平台积极进行着通俗文学翻译实践。

纵观《译林》创刊至今所刊载译文的译者，绝大多数都是“学院派”译者或专业翻译。所谓“学院派”译者，是指在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工作，具有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背景、翻译学理论素养和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正如曾任《译林》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的王理行先生所说：“《译林》长篇的译者都经过精心选择，基本上都是在国内翻译界有一定知名度、同时翻译质量确实较高的教授为主。”（43）《译林》上刊载的通俗小说作品大多是各个国家享有极高声誉的流行畅销书，好的作品当然需要好的译者，才能完美展现原作的魅力，使目的语读者得到与原语读者同样的阅读体验。“学院派”译者大多能将翻译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能较大程度地实现原语作者的创作意旨，又能关照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审美需求，因而在翻译质量上有所保证。

《译林》启用的译者除了“学院派”外，还包括大量企事业单位专职翻译人员。他们在译

学素养上可能不及“学院派”译者，但却具有丰富的专业翻译经验，在各种不同的专业知识领域驾轻就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院派”译者译学和语言素养深厚，但专业知识稍显欠缺的不足。两类译者的结合无疑能起到相辅相成、互相弥补的作用。

（四）归化策略为主

《译林》的总体译介策略还是以归化为主。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我们不便找到原著——比对、研究其总体翻译策略取向，但从《译林》杂志的创刊初衷及其发展历程中历届主编的叙述中，可以大致了解《译林》的总体译介策略倾向。

《译林》杂志创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稍有松动，但各种“左”或“右”倾的思想束缚依然存在，加之《译林》创刊之初因刊载《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发生的一段波折，使得《译林》在整体翻译策略上显得小心谨慎。译林出版社前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回忆当年为《译林》杂志请编委的经历时就提到，“第二次去拜访，周（煦良）先生说，《译林》创刊号内容健康，各类文章搭配得也不错……他问：“有犯忌描写怎么办？”我答：“就适当做些技术处理吧”（《我为《译林》请编委》47）。后来，李景端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译林》既然以介绍外国通俗文学为主，在译文上也要求力求通俗化，在忠实于原作的前提下，使译文尽量符合现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波涛上的足迹》210-11）。且在回忆《译林》杂志走过的20年征程时，也谈到了《译林》的翻译问题，他指出，“《译林》的一贯做法是：对于并非经典的当代通俗小说，在不影响其总体面貌和情节发展的情况下，对其中会明显产生副作用的色情描写适当进行删节”（35）。归化策略的使用，既顺应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又适当地剔除了外国通俗小说中的色情、暴力等不利于社会精神道德建设的糟粕，从而使《译林》始终保持着健康明朗的期刊形象。

三、机遇与挑战

新世纪的时代语境赋予外国通俗文学汉译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以《译林》为代表的我国通俗文学译介在译介主题、译介作品来源国、译介策略、译者选择、传播模式等方面都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在主题上的多样创新为我国通俗文学翻译带来了新的契机，以《译林》为代表的我国通俗文学汉译平台应紧握外国通俗小说的发展脉搏，在强调可读性的基础上，兼顾时代性和多样性，进一步拓展题材范围，丰富主题模式，展现外国通俗小说发展的最前沿动态，使我国读者对外国通俗文学发展形成更为及时和全面的认知。要打开窗口，让国内读者真正“了解世界”，还应进一步扩大译介作品的来源国范围，令读者看到更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通俗小说精品。

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外国通俗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愈发精良，蕴含了愈来愈

愈多的知识和文化因子，“而当代（外国）通俗文学作品追求创新性、可读性、多面性、全方位性的特点也给翻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陈小慰，《通俗文学对译者的挑战》46）。当今人们接受外来语言和文化的速度与日俱增，要求读到原汁原味的外国通俗小说，拒绝删减、添加等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因此《译林》长期以来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倾向越来越受到挑战。当今译学的发展已经为译者提供了越来越多可资借鉴的翻译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以《译林》为代表的外国通俗小说汉译策略也将越来越灵活多样。

再次，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文化的兴盛，一支网络文学翻译生力军应运而生。这支网络大军以“要用当代人更接受的不隔膜的语言，重新翻译文学经典”为宣言^[4]，集结在各类网站上，以论坛、贴吧、博客等为平台，借助先进的网络翻译技术和工具进行群体在线文学翻译，成为译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网络虽是这些译者群体成长的摇篮，但是在目前互联网发展还不够完善，网络版权和著作权纠纷频发的时代语境下，他们急需一些便捷、规范的翻译平台以展现翻译实力，提升翻译素养，而一直以扶植和培育译界新人为己任的《译林》，可以考虑给予网络新人更多锤炼译技的机会，购买更多网络版权，招募更多译技、译德均佳的网络译者参与到外国通俗小说翻译事业中来，进一步丰富译者结构，壮大译者队伍。

最后，21世纪也是一个“新媒体时代”。所谓“新媒体”是指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在新媒体崛起的时代语境下，人们的文学阅读媒介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 and 手机因其移动、易携、便捷等优势，已经成为人们进行文学阅读的首选媒介。因此，我国对外国通俗小说的译介应进一步创新传播模式，在传统影视媒介的基础上，大力开拓网络、手机等数字化媒体阅读领域，借此加大外国通俗小说汉译的流通和传播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译林》对外国通俗小说的译介开阔了我国读者大众的视野，提升了通俗文学在我国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同时为我国文坛和学术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文本素材，激发了他们对通俗文学研究和评论的热情（陈小慰，《当代英美通俗小说的译介与影响》68-70）。在新世纪的今天，《译林》所处的时代政治、文化和诗学语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种种利好条件为新世纪外国通俗小说汉译的繁荣发展铺设了平坦大道，但同时信息化时代读者接触外国文学和文化的机会大幅度增加，阅读水平和要求已今非昔比，这也为今后我国的通俗文学译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译林》为代表的我国通俗文学译介应进一步开拓创新，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译介更多更好的、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时代感和创造性俱佳的外国通俗小说以飨读者。同时，我国的文学和翻译批评界也应与时俱进，对通俗文学的译介给予更多的关注、批评和研究，促其进一步发展和成熟。

注释 [Notes]

[1] 通俗小说在西方又被称为“bestseller”“popular fiction”或“genre fiction”。

- [2] 通俗小说的分类参见:董乐山 2002;黄禄善 2006, 2007, 2009, 2010;王友贵 2011。
- [3] 《译林》杂志社社长顾爱彬:我们不会强行求变 news.xinhuanet.com/book/2012-05/22/c_123171162.htm, 20/10/2015。
- [4] 网络翻译力量正在崛起 www.china.com.cn/book/txt/2010-01/08/content_19201987.htm, 09/11/2015。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Chen, Xiaowei. "Translation of Popular Literature: A Challenge for Translator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2, 2005, pp. 46-50. [陈小慰:《通俗文学对译者的挑战》, 载《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 第46-50页。]
- . "Translation and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Popular Novels." *Journal of Fuzhou University*, no. 3, 2005, pp. 66-70. [陈小慰:《当代英美通俗小说的译介与影响》, 载《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第66-70页。]
- Dong, Leshan. *Westbound Footsteps*. Hubei Education, 2002. [董乐山:《西行的足音》。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Escarpit, R. *Literary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Meihua Wang and Pei Yu.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1987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 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 Huang, Lushan, editor. *A Highlight of American Popular Fiction (the Volume of 18th-19th Century)*. Shanghai UP, 2006. [黄禄善编:《美国通俗小说菁华(18—19世纪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 . editor. *A Highlight of British Popular Fiction (the Volume of 18th-19th Century)*. Shanghai UP, 2007. [黄禄善编:《英国通俗小说菁华(18—19世纪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 . editor. *A Highlight of British Popular Fiction (the Volume of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Shanghai UP, 2009. [黄禄善编:《英国通俗小说菁华(20世纪上半期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 . editor. *A Highlight of British Popular Fiction (the Volume of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Shanghai UP, 2010. [黄禄善编:《英国通俗小说菁华(20世纪下半期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 Kong, Qingdong. *Beyond Elegance and Popularity: Popular Fiction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Peking UP, 1998. [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Li, Jingduan. "Open the 'Window' to Promote the Opening Up: A Review of the Twenty-Year History of *Translations*." *A Vast View on Publishing*, no. 12, 1999, pp. 46-48. [李景端:《打开“窗口”促开放——〈译林〉二十年回顾》, 载《出版广角》1999年第12期, 第46-48页。]
- . *Footprints on the Wave: A Review of the Twenty-Year Editing Career for Translations*. Chongqing Publishing, 1999. [李景端:《波涛上的足迹——译林编辑生涯二十年》。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9年。]
- . "Set Up the Editorial Board for *Translations*." *Editors Monthly*, no. 6, 2010, pp. 45-47. [李景端:《我为〈译林〉请编委》, 载《编辑学刊》2010年第6期, 第45-47页。]
- Qie, Shi. "Enjoy Wind, Rain and Beautiful Woods": The Extraordinary Two Decades for *Translations*." *A Vast View on Publishing*, no. 6, 1999, pp. 33-35. [且示:《“沐风迎雨蔚然成林”——〈译林〉杂志不平凡的20年》, 载1999年《出版广角》第6期, 第33-35页。]
- Wang, Lixing.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ranslations* in Recent Two Years." *A Vast View on Publishing*, no. 3, 1998, pp. 42-43. [王理行:《在传统与创新之间——谈近两年的〈译林〉》, 载1998年《出版广角》第3期, 第42-43页。]
- Wang, Yougui. "A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Translation of Foreign Popular Literature: 1949-1977."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no. 6, 2011, pp. 9-13. [王友贵:《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共和国首29年对外国通俗文学的翻译:1949—1977》, 载2011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第6期, 第9-13页。]
- Zha, Mingjian, and Tianzhen Xie, editors. *A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ry Translation (Vol. 1)*. Hubei Education, 2007 [查明建、谢天振:《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年。]

FLC

语言与语言教学

移位? 还是原位? ——以被动结构为例对生成句法逻辑结构的考察

◎ 赵彦春

内容提要: 移位理论体现了生成句法学的核心思想,是句法操作过程中的主要手段。从方法论上讲,移位理论中由于存在着重大理论弊端而失去解释力,主要是:形式与意义的缠绕、历时与共时的混淆、短语与句子的错位、词库与句法的含混。以被动句的移位问题为例对生成句法的逻辑结构进行考察,可以得出取消移位这一操作手段的合理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方案有望解决移位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可以满足理论最简和方法最简的科学要求。

关键词: 移位 被动结构 逻辑结构 基础生成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135-12

作者单位: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Title: Moved or In-situ: An Inquiry into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in TG Based on the Passive Structure

Abstract: Move is a central no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as well as a main means of syntactic operation. But methodologically, it has inherent problems that lead to the loss of its explanatory power. The inadequacies include the tangling of form and meaning, the confusion of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the dislocation of phrases, and sentences and the blurring of lexicon and syntax. This article inquires into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generativ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ove in the passive structure so as to give plausible reasons to abolish move as a means of syntactic operation, and put forward a solution to problems that the move theory cannot solve in the spirit of minimalism,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Keywords: move, passive structure, logical structure, in-situ genesis

Author: Yanchun Zhao,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一、引言

生成句法学以普遍语法为理论指向,对人类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寻求统一的解释是其理论目标之一。移位是生成句法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句法运算中最重要的操作手段,它在普遍原则和个体参数之间充当桥梁,以期达到解释充分性和描写充分性之间的平衡。

在生成语法理论创立初期,乔姆斯基(Avrom Noam Chomsky)在分析有限状态语法和短语结构语法的缺陷时,提出在短语结构语法的基础上添加转换规则。短语结构规则负责生成最初的句子结构,而转换规则负责把生成的结构加以改造,生成同转换合在一起就是句子的主要派生过程。其中转换的功能范围涉及序列成分的移位(movement)、重新组合(rearrangement)、删除(deletion)和添加(addition)(吴刚 47)。在限制转换规则的形式和功能应用的过程中,“转换”一词逐渐被新的术语“移位”或“移动”所代替。语法模式中转换部分的规则也概括合并为“名词词组移位(NP-movement)”和“Wh-移位(Wh-movement)”。后来,到了扩展的标准理论时期,生成句法学家又提出用“移动 α ”来统称所有的移位规则。随着理论的不断修改和发展,移位的句法地位逐步提升,到最简方案时期,移位和合并(merge)成为了句法操作的主要手段。

移位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名词短语(NP)移位;WH-移位以及中心语移位。NP-移位是整个移位系统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其移位主要是受到格驱使和题元角色分配而发生的。在乔姆斯基理论框架下,NP移位主要涉及三种结构:被动结构^[1]、提升结构(raising construction)和动词组内主语假说(VP-Internal Subject Hypothesis)。本文主要以被动结构为例来揭示移位理论中存在的重大理论弊端。

二、移位理论对被动结构的解释

(一) 移位理论下的被动结构

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分析中,转换是句子生成的一种重要语法手段,借此深层结构变为表层结构。这种转换是单向性的,其形式是:A→B。比如,英语主动句和被动句的转换规则可以表示为:

$$(1) NP_1 - Aux - V - NP_2 \rightarrow NP_2 - Aux - be + en + V - by + NP_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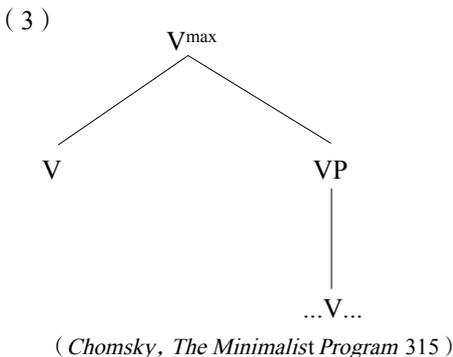
据此,被动句由主动句转换产生,即动词由主动转换为被动是及物动词的被动化(passivization)过程。早期的句法理论在Burzio定律^[2]的基础上认为:内部题元由于受到动词V的管辖(government),可以从V处获得题元角色,但是由于动词在被动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形态变化,使动词丧失了分派外题元角色的能力,即被动态语缀-en吸收了动词的外题元角色;同时吸收了动词补语的格,使其丧失了给补语赋结构格的能力^[3]。为了通过格的鉴别(case filter),内论元只能前移到主语[Spec, IP]的位置,由Infl赋给其主格。这样就满足了格的理

论规定: 显性NP必须要赋格。因此内论元的外移完全是受格的驱动 (case-driven) 所致。

随着研究的深入, 生成语法学家们发现, 格理论作为移位动因能够很好地解释一般被动句, 却不能解释双宾结构的被动句是如何由主动句转换而来的, 如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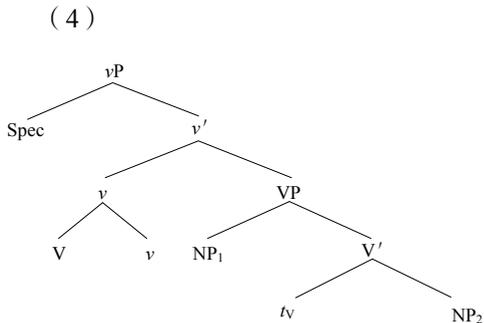
(2) John was given a book.

既然动词be given不能给它的内题元角色赋格, 那么(2)中的a book又是从何处获得格的呢? 乔姆斯基认为, “give”之类的双宾动词具有独特的词汇特征 (lexical property), 它们能够给邻近的NP赋主要格 (primary case), 然后给另一个NP赋次要格 (secondary case), 并且他认为能否赋次要格是由这些动词的词汇特征所决定的 (*Lectures on Government* 94)。此处本文有两点反证: ①如果带两个论元的give具有独特的词汇特征, 那么带一个论元的动词如break不也同样具有独特的词汇特征吗? 带一个论元的动词和带两个论元的动词都属于动词, 我们没有理由说一类动词具有词汇特征而另一类不具有; ②就算 [V NP NP] 中的V可以赋两个格, 那么根据题元角色吸收和格吸收的设定, V改写为be-V-en之后便不能再赋格了; 如果说John为获得格而移位, 那么a book并没有移动, 因此它格依然没有被赋格。基于以上两点, 乔姆斯基的赋双格说还是解释不了双宾结构的被动句的赋格问题。



到了最简方案时期, VP嵌套理论 (VP-shell Hypothesis) 和特征核查理论被用于了对被动结构的解释。在VP嵌套理论中, 动词词组被看成是一个双层的嵌套, 上层动词词组的中心语是一个轻动词 (light verb) v。v并不是一个词汇语类, 而是一个功能语缀, 呈强语素特征。因此, 它要触发下层VP中的动词V进行移位且并入v来核查自身的特征。也就是说, VP是这一功能语类的补语, V是动词中心语; V提升嫁接与v之上, 与之构成动词性复合体。如(3)所示:

生成语法学家认为这一理论能很好地解释双宾结构的被动形式, 即移位的动因是为了实现特征核查。



如(4)所示, 双宾结构的被动形式中, V向v移动, 留下语迹t (trace), 随后前移到 [Spec, vP] 的位置。两内部题元NP1和NP2理论上都可以前移, 但是乔姆斯基提出: 只有一个题元能够从VP的位置移到 [Spec, I] 的位置, 且移动必须按照等级的高低进行 (*Minimalist Program* 347)。比如:

- (5) a. e_i was given John a book.
 b. John was given a book.
 c. *A book was given John.
 d. A book was given to John.

(5b) 是合法的, 因为NP1从VP的位置移到 [Spec, I] 的位置; (5d) 是合法的, 因为插入了to, 其目的是为了给John赋格。问题是: ①为什么(5b)中“a book”没有介词赋格却合法, 而(5d)中的John需要插入to才合法? ②在(5d)中“a book”的移动还是跨越了比它高一级的另一个NP“John”, 这又如何解释?

随后, 为了对移位进行限制, 生成语法学家又提出了自利原则或贪婪原则 (the Principle of Greed)^[4]; 迟延原则 (the Principle of Procrastination)^[5] 以及迫不得已原则 (Last Resort Principle)^[6]。这些原则共同构成了最简方案的经济原则, 在句子生成过程中, 合并与不移动最经济, 语类移动有代价, 因而不经济。然而在操作过程中, 这些原则之间往往相互矛盾, 相互违反, 而且随着探索的深入, 自利原则和迟延原则不断地受到人们的质疑。由于这不是本文论述重点, 固在此不展开讨论。

现在我们反观VP嵌套理论, 其本身是存在问题的。乔姆斯基指出轻动词v与其补语VP构成的结构v-VP, 决定和表达外论元的“使役 (causative)”或“施事 (agentive)”的角色 (Minimalist Program 316)。这种结构适用于分析一般语法中所说的双宾结构, 及物动词和“作格动词 (ergative verbs)”所形成的表达式, 也就是说, 这种结构分析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动词, 除了“非宾格动词 (unaccusative verbs)”。雷德福 (A. Radford) 把这种结构分析推而广之, 将其应用于各类谓语结构 (210), 包括非宾格动词结构。这样, 轻动词v成了各类谓语结构中的强制性成分, 它必须选择一个VP作补语。这样的分析达到了理论的最简, 但是却使得原本简单的分析变得更为复杂。而且, vP理论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如前面所言, 主语怎么能出现在VP结构内部。其次, 根据vP的分析, 由于一个实意动词总是包含一个轻动词, 所有的动词都是被驱动的, 含有do、make、cause等意思, 如“我走”, 就是“我使我走”, 然而, 按照其理论, 任何一个vP都包含在另一个vP中, 如此一来就陷入了循环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被动结构在移位理论框架下, 其句法结构分析本身呈现出诸多问题, 并且移位的动因也很难具有说服力。

(二) 移位动因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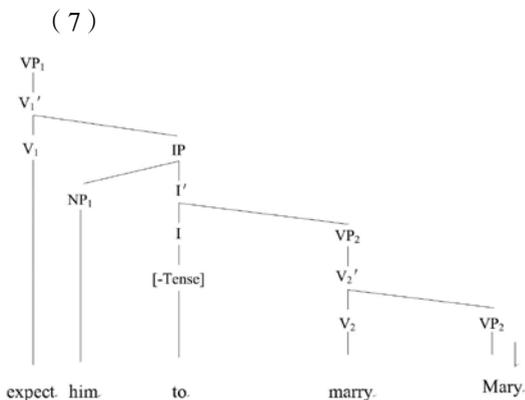
1. 格理论

格是移位发生的主要动因之一。根据格理论, 句子中不能出现没有被赋格的NP, 即进入句子的NP都必须有格, 格是这个NP在句子中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 如果NP在句中基础生成的位置上得不到格, 就必须在格的驱动下向可以得到格的位置移动。然而, 格理论却面临很多挑战。

首先, 格理论本身就存在着“例外”情况。如(6):

(6) They expect him/*he to marry Mary.

谓语部分的句法结构是(7):



其中, him合乎语法, 说明它通过了格的检验, 而he则没有通过, 因此不合乎语法。如(7)所示, 在不定式分句中, V_2 管辖 NP_2 并授之宾格, 但问题是 NP_1 的格是从何处得到的? 不定式分句的中心语 I 具有 [-Tense] 的特征, 没有赋格的能力, 而且其最大投射不能构成管辖障碍, 所以 NP_1 的格不是 I 赋予的。唯一的可能是, 主句中的动词 V_1 越过 IP 给 NP_1 授格。乔姆斯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例外授格 (exceptional Case-marking, ECM),

即这是格理论存在的一种“例外”现象 (转引自 Ouhalla 197-199)。但是, 从逻辑上讲 him 应是 V_2 管辖的主语, 为什么却是宾格形式呢?

其次, 根据格理论, 我们无法解释下面这样的句子。

(8) Me, I like beans.

(9) Him tired, they decided to camp for the night.

如果根据其形态, me 和 him 应该是宾格, 那么是谁赋予了它们宾格? 很明显, (8) 中的 me 是独立存在的, (9) 中的动词 tire 以过去式的形式出现, 也不具备赋格能力, 这就意味着 (8)、(9) 两句中没有对 me 和 him 进行赋格的成分, 也就是说, me 和 him 没有被赋格。按照格理论, 没有被赋格的 NP 应该被核查掉, 但事实上, 这样的句子却存在。因此, 我们有理由怀疑, 格理论就其本身而言, 是不完善的。

再次,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格理论无法解释的, 那就是英语中的同源宾语结构。

(10) I dreamed a good dream.

(11) John died a gruesome death.

die 和 dream 都是不及物动词, 是不可以对其后面的 NP 赋格的, 那 NP 的格是从何而来的呢?

另外, 在舒茨 (T. Schütze) 中还提到了这样的句子 (53):

(12) Her/*She cheat on you? Never!

(13) Her/*She in New York is what we must avoid.

这些语言现象也无法用现有的格理论来解释。这给我们一种启示, 语言中是否存在没有被赋格的 NP。如果存在没有被赋格的 NP 这一假设成立, 那么格过滤 (case filter)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格作为移位的主要动因可能就不再成立, 也就是说句子中的 NP 没有必要为了满足格

鉴别式而移位了。这将直接危及生成句法学赖以存在的根基,即移位。

2. 题元理论

题元理论的提出,是因为在生成语法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仅凭句法结构特征无法决定动词能否带宾语,也无法决定动词能带多少宾语。题元理论在词库中记载着动词的“论元属性”(相当于动词的价数,即动词可以带的论元的数目)。题元准则规定 a) 每个论元都必须且只能充当一个题元角色; b) 每个题元角色都必须且只能分派给一个论元。

NP 移位不仅和格有关也和题元角色有关。NP 移位的动因是为了获取所需要的格,因此就格理论而言, NP 移位总是从没有格的位置移向有格的位置。从题元理论来说, 移位则是从一个题元位置移向一个非题元位置。移动后, NP 在原来的位置留下了语迹, 通过语链 (chain) 把题元角色传递给移到前面去的 NP。题元理论还规定, 如果一个名词词组从一个题元位置移向另一个题元位置, 就会违反题元准则。

然而, 细察之, 题元究其本质是一个语义概念, 与句法没有必然的关联, 题元与 NP 不构成内在的统一。

对于题元理论, 它规定了动词所带论元的数目, 以及论元的语义特征, 比如 kill 这个动词是一个二元动词, 带一个外论元和一个内论元, 而且这两个论元都必须具有 [+animate] 的特征。如:

(14) He killed Bill.

(15) *He killed a desk.

(16) Curiosity kills the cat.

根据题元理论的规定, 前一句正确而后一句错误, 原因在于 desk 不具有 [+animate] 的特征。然而, 我们注意到 (15) 就一定错误吗? 在一定的语境下, 为达到一定的语用效果, 这样的句子是完全可以接受的。(16) 中的 curiosity 不具有 [+animate] 的特征, 却具有题元角色。因此我们认为题元理论并不是 NP 的制约条件, 它仅作用于语义或语用层面, 外在于句法。

再比如: 题元理论也无法解释 (17) 这样的句子

(17) He sneezed a tissue off the desk.

这个句子从题元理论来看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 sneeze 是不及物动词, a tissue off the desk 是小句, 那么 NP [a tissue] 在没有动词也就无所谓论元的情况下也就无所谓题元角色了。

3. 特征核查

在最简方案中, 特征核查是移位发生的主要动因。其基本思想是: 为了在 LF 接口处推导出成功的表达式或完全解释, 在抵达 LF 接口前, 应该在 PF 去掉所有在 LF 不能得到解释的成分, 即对语义解释没有意义的成分。特征核查的意义在于: 由词库所决定的词汇项目的形态特征, 是运算推导的主要动力; 功能中心语所具有的与实体词汇相对应的特征在强、弱方面的表现, 是造成显性移位的根本原因 (吴刚 258)。

然而, 特征核查理论本身存在很多的问题。

首先, 乔姆斯基曾对特征的类别做过以下区分 (*Minimalist Program* 277): ①语类特征; ② Φ 特征; ③格特征; ④强特征F (当F为语类特征时)。然而我们发现格特征、 Φ 特征并不是人类语言所共有的现象, 如对于格问题, 汉语中就并不存在格标记。

其次, 乔姆斯基认为不可解读特征存在的唯一原因是诱发移位; 在另一方面, 他又认为移位的起因是不可解释特征, 这就走入了一个循环论证的误区; 另外, 特征的强弱是从语言现象中总结出来的, 随之又用来解释现象, 这本身也是一种循环论; 再说强弱的判断标准如何确定也是一个问题。

(三) 移位理论存在的问题

1. 形式与意义的缠绕

在1957年的《句法结构》中, 乔姆斯基曾经批判过把语法研究建立在意义之上的主张。他认为“主动句与被动句是同义的” (*Syntactic Structures* 94) 这样的表述存在问题。他所举的例子是:

(18) Everyone in the room knows at least two languages.

(19) At least two languages are known by everyone in the room.

(19)是(18)对应的被动句, 然而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18)表达的意思可以是: 每个人所懂得的两种语言是不同的; 而(19)所表达的意思只能是: 每个人所懂的两种语言是一样的, 因此二者之间缺少同义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s* 100-101)。通过这样的例子我们发现, 所谓的主动句和被动句之间并非同义。

从(18)和(19)的结构来看, 动词发生了变化, 而且其中(18)中主语位置上的NP在(19)中加入了一个介词by。如果说(19)是对(18)通过移位操作转换过来的, 我们无法解释系动词和by是怎么来的。另外, 既然(18)和(19)结构不一样, 意义也不一样, 我们如何判断(19)是从(18)转换而来的, 而非(18)从(19)中转换而来的? 再次, 在做出被动句是从主动句转换而来的这样的论断时, 就已经受了两句话语义关系的影响 (即主动句和对应的被动句描述的是带有相同参与者的同一个事件), 就已经预示了这两句话的语义相似, 并以此来寻找两句话在形式上的联系。由此我们判断, 被动句的移位分析还是基于语义的考虑, 是意义和形式缠绕所致。

2. 历时与共时的混淆

历时和共时一直是语言研究中两个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生成语法研究采用的是共时研究。在句法理论中, 句子的生成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要经过不同的层面, 对每一个层面的分析都应该在一个共时平面进行。然而, 我们发现, 就移位理论而言, 其研究并未完全坚守在共时平面, 而是出现了历时与共时的混淆。比如在被动句的生成过程中, 在D-结构, 被动句的主语原位生成于动词的宾语位置, 然而这个过程已经涵盖了动词的被动化过程, 外题元角色的吸收, 格吸收这样的历时变化。很显然它们是先于D-结构发生的, 而这些又不是发生

在词库,那又应该发生在哪个层面呢?另外,外题元角色被吸收,但是外论元并没有被吸收,那么在D-结构中外论元的位置又应该在哪儿?外论元的NP又是如何转换成PP,即by+NP的?这个变化又是发生在哪个层面的呢?

同样在VP嵌套理论中,句子的主语基础生成于动词短语的内部,然后通过移位再从VP中移出,如果是这样的话,移位发生前的VP和移位发生后的VP还是同一个VP吗?这里很显然是一个历时与共时的混淆。这种混淆最终只能使得理论缺乏解释力和自洽性。

3. 短语与句子的错位

短语和句子错位的问题仍然发生在VP嵌套理论中。根据该假说,主语基础生成于动词短语VP的内部,此时,动词短语VP已经不再是其自身,而是相当于一个小句(small clause)了,这是一种XP和小句或句子的混淆,最终模糊了短语和句子的级阶,有悖于我们的语言直觉和逻辑。

4. 词库与句法的含混

在词库中,动词的表现形式应该是携带着该动词的一系列特征的集合,包括其题元结构、语类特征以及音系特征。这一系列特征决定了动词在形态运作过程中表现出的次语类选择特征。在被动结构中,动词的过去分词被看作是动词被动化的过程,是一种句法操作的结果。然而,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20a)中的broken来源于词库,而(20b)中的broken源于句法操作。

(20) a. a broken vase

b. The vase was broken by the blast.

考虑到“break”和“broken”的关系,“broken”更应该是“break”词汇化后的结果,并独立存在于词库中,由“break”到“broken”并非句法操作。

三、生成语法的逻辑结构

通过对移位问题的反思,我们不得不回到一个基础但又极为重要的问题上来,那就是生成语法的逻辑结构——移位解释不了英语现象,更解释不了普遍的语言现象。应该说各种语言现象都是普遍语法所允许的,都是逻辑形式在具体语言中的显现。

逻辑就其本质而言是离散的,非此即彼;没有人会接受一种思维本身的含混性和矛盾性。我们每一个人接触的世界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语言却可以无限地嵌入、无限地添加,而这正是逻辑递归性的体现。此外,逻辑的层级性表现为自下而上,从混沌到秩序,从有限到无限。简言之,逻辑具有离散性、递归性和层级性这三大特征;作为逻辑的产物,语言也具有这三个特征。

从逻辑上而言,构成句子的基本成分是主项(NP)和谓项(VP),这是人类所有语言都具有的,也是表达一个命题必不可少的成分。生成语法中所隐含的人类语言的基本逻辑结构可以表述为(21):

四、新的理论思考——取消移位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 移位操作是不经济的, 也不是所有语言中都存在的。现有的移位理论充满了矛盾, 并存在理论冗余和无法解释的问题, 而且移位的动因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大部分也都站不住脚。另外, 从语言的基本逻辑结构出发, 语言的逻辑模板也并不体现主动或被动, 因此我们质疑移位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或者有没有一种比移位更为简单经济的方法来解释句子的生成。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们取消移位, 提出句子是基础生成的这样一种观点。

在对被动句的结构分析过程中, 乔姆斯基也曾提出过一种基础生成观, 即词汇分析法 (lexical analysis), 但最终因为在习语的问题上无法解决而最终放弃。

(25) a. the *dead* woman

b. the *murdered* woman

(26) a. The woman was *dead*.

b. The woman was *murdered*.

对于(26a)、(26b)两个句子, 乔姆斯基认为, 过去分词 *dead* 和 *murdered* 具有同样的句法分布, 在(26a)中 *the woman* 处于主语位置, 由形容词 *dead* 分派题元角色。可对(26b)做同样的分析, 若把 *killed* 视为形容词, 由其分派题元角色, 则在(26b)中, 名词短语 *the woman* 不是通过移位来到主语位置的, 而是本身就处于该位置, 这就是“被动句的词汇分析 (lexical analysis)”, 也就是说该句子是基础生成的。但是这种词汇分析说在解释习语的问题时遇到了困难:

(27) John took *full advantage* of her innocence.

(28) *Full advantage* was taken of her innocence.

要得到习语的意义, 必须假定在 D-S 层面上先存在动词短语 *take full advantage*, 然后其中的名词短语 *full advantage* 经过移位成为句子的主语, 但是词汇分析说显然无法解释(28)的习语意义。

词汇分析说也不能给例外授格提供有效的证据, 如:

(29) I expect [_{IP} *John to win the match*].

(30) *John* is expected [_{IP} *to win the match*].

词汇分析说无法解释为什么处于主句主语位置的 *John* 所承担的题元角色是不定式分句的动词分派的。正是由于这些没法解释的语言现象, 乔姆斯基放弃了词汇分析法, 转而提出了 NP 移位。

对于例句(26a)、(26b)、(29)、(30), 我们认为主动句和被动句只体现为话题 (topic) 的转换, 并不存在必然的结构转换关系。被动句中的主语基础生成于主语的位置, 并不是从动词的内论元处移位过来的。*killed* 和 *expected* 都以词汇的形式存在于词库中, 它们和 *murder* 以及 *expect* 在构词上有一定的联系, 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继承 *murder* 和 *expect* 的次语类特征。

结合前面的分析,动词的外题元角色是外在于动词短语的,它和动词短语在句子生成过程中的关系是一种组合关系。因此,根据基础生成观,上面(26)和(29)的句法结构可重新分析为:

(31) The woman [_{vp} was] [_{adjunct} murdered]

(32) John [_{vp} is] [_{adjunct} expected [_{adjunct} to win the match]]

另外对于习语的分析,乔姆斯基走入了一个误区,“take full advantage”并非一个习语。我们对比一下以下两个句子:

(33) He kicked the bucket. 他死了。

(34) The bucket was kicked by him. 桶被他踢了。/*他死了。

我们发现,不能把kick the bucket被动化。如果习语的被动形式可以从主动形式推导出来的话,那么,句(34)也就应该表示“他死了”这个意思,而在实际运用中,句(34)是不能表示“他死了”这个意思的。由此可见,习语的被动形式是不能从主动形式中推导出来的。kick the bucket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句法块,对应“死亡”这一概念,和kick、the、bucket任何一个词项本身的意义都无关。习语在形成过程中的理据,和一个词形成的理据一样,并不等于习语本身的意义,如:blackboard ≠ black+board。因此,由于形成这些语言结构的机制都是不可分的整体形式对应于不可分的整体意义,所以我们把他们归为同一个层次:词汇层。如kick the bucket,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归入词汇层的时候,它的意义是“死”。而对于kick the bucket这个整体我们不再对其做任何的句法分析。在句法结构中,它占据VP的位置,和主语合并生成句子。

(35) He [_{vp} kicked the bucket] .

综上所述,格理论、题元理论、VP嵌套等理论在解决名词短语(NP)移位的时候都不能达到科学的统一性、解释的充分性,而用基础生成却能解释以上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并且使整个系统更加简洁。

对客体对象的最简单性研究是科学研究的理论追求。随着对内在性语言的运算推导过程和表现形式的经济性研究的深入,生成语言学发展到了最简方案。乔姆斯基认为人类语言是一个“完美的系统”,其“最优化的设计”能够满足与人类语言功能相关的认知系统施加的条件。因此,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高度经济简洁、取消冗余的理论来描述这个完美的系统。然而,在审视移位理论时,我们发现,移位理论在修改和发展的过程中,已逐渐达到了理论最简,却并未达到实体最简。究其原因,乃是整个理论受到了形式与意义的缠绕,历时和共时的混淆,并使得整个系统术语繁多,理论冗余。我们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取消移位,提出句子是基础生成的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不仅解决了移位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还能实现理论最简和句法最简。

注释 [Notes]

- [1] 无宾格结构的分析和被动句的分析类似, 故在此略去。
- [2] Burzio's generalization: A verb (with an object) Case-marks its object if and only if it θ -marks its subject, 参见Chomsky (1985): 139. 该定律包括两层含义: (1) 没有域外论元的动词不能赋格; (2) 不能授宾格的动词没有域外论元。关于Burzio定律的相关问题, 参见赵彦春 (2001), 第 133-142 页。
- [3] See Chomsky,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Foris Publications, 1981; L. Haegeman,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Basil Blackwell, 1991.
- [4] 贪婪原则: 某一成分的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对它本身的形态特征进行核查的需要, 参见Chomsky (1995), 第 200-201 页。
- [5] 迟延原则: 所谓“迟延原则”就是说, LF 移位比显性移位的代价低, 它比显性移位更加省力, 运算系统总是力图尽快地直接到达 PF 层面, 最大限度地缩小显性句法的范围和程度。如果能够不移位就不要移位, 不要为了收敛 (converge) 而被迫移位, 要尽量地把移位迟延, 参见Chomsky (1995), 第 198 页。
- [6] 迫不得已原则: 移动是为了满足特征核查 (形态属性) 的需要, 即一个推导的步骤是否合理, 取决于其是否为收敛所必须; 也就是说, 如果不采取这一步骤的话, 推导将会破裂 (crash)。参见Chomsky (1995), 第 200-201 页。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s*. Mouton & Co, Printers, 1957.
- .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Holland: Foris Publications, 1981.
- .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Praeger, 1985.
- .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IT, 1995.
- Ouhalla, J. *Introducing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From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o Minimalism*. Edward Arnold, 1999.
- Radford, A. *Syntax: A Minimalist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P, 1997.
- Schütze, T. *INFL in Child and Adult Language: Agreement, Case, and Licensing*. MIT, 1997.
- Wen, Binli.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Syntax*.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2. [温宾利:《当代句法学导论》。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Wu, Gang. *Research on Generative Grammar*.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6. [吴刚:《生成语法研究》。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Zhao, Yanchun. "Falsifying the Internal Argument Hypothesi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no. 2, 2001, pp. 133-42. [赵彦春:《Burzio 内论元说证伪》, 载《现代外语》2001 年第 2 期, 第 133-42 页。]
- . "Perspectives of Cognition." *Foreign Languages*, no. 1, 2009, pp. 89-94. [赵彦春:《语言认知的多维视角》, 载《外国语文》2009 年第 1 期, 第 89-94 页。]

◇责任编辑: 罗辉

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量表的编制及应用研究

◎ 夏洋 孟健

内容提要: 为给我国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学业情绪研究提供科学规范的测量工具, 本研究尝试编制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问卷, 并以 145 名英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 对问卷进行预测和修订, 最终形成了由 21 个题项构成且信、效度较高的正式问卷。在此基础上, 应用该问卷对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感知进行了调查研究, 结果显示, 英语专业学生在课堂上对高兴、希望、放松、平静、焦虑、愧疚和厌倦等七种学业情绪都有不同程度的感知, 其中“希望”学业情绪的感知程度最高, “焦虑”学业情绪的感知程度最低。英语专业学生对课堂学业情绪感知的整体趋势是对积极情绪的感知高于消极情绪。

关键词: 学业情绪 量表 英语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7) 01-0147-10

项目基金: 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 (2015GJ01); 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学改革研究 (2015Y0205)。

作者单位: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Title: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Making of a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cademic Emotions of English Majors

Abstract: In hopes of providing a reliable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cademic emotions of English majors in China's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mpile and revise a questionnaire about academic emotions. With 145 English majors as participants, a validated questionnaire with 21 items surveyed academic emotions experienced in the classroom environment. Research findings show English majors sense seven major emotions, namely joy, hope, relief, calmness, anxiety, shame, and contempt. Among these emotions, English majors perceived more hope and less anxiety. It is a general tendency that the perception of positive emotions surpasses negative emotions.

Keywords: academic emotions,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English Majors

Author: Yang Xia, Associate Professor, English College,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Liaoning, China. Jian Me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Advanced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Liaoning, China.

一、引言

学业情绪 (Academic Emotions) 是与学业学习、课堂教学和学业成就有直接关系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统称 (Pekrun et al., "Positive Emotions in Education" 149-74), 这些学业情绪通常伴随着学业活动和学业成就出现 (Pekrun, "The Control-value Theory" 315-41)。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 学业情绪的研究多集中于考试焦虑, 而除焦虑外的其他学业情绪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Frenzel et al. 478-93)。佩克然 (R. Pekrun) 等人发现: 考试焦虑一直是学者们的主要关注点, 而其他情绪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Academic Emotions" 91-105)。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尝试编制包含多种学业情绪类型, 且适合英语专业学生的课堂学业情绪问卷, 并验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应用该问卷获得的量化数据, 并结合访谈等质性研究资料, 探讨英语专业学生在课堂环境下对不同学业情绪的感知情况。

二、文献综述

在学业情绪研究领域, 焦虑情绪受到的关注最多, 其测量工具也最为系统完善。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有考试焦虑问卷 (Test Anxiety Inventory, 简称 TAI)、考试焦虑量表 (Test Anxiety Scale, 简称 TAS) 和第二语言学习焦虑量表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简称 FLCAS)。TAI 问卷的中文版由我国心理学家宋维真和张瑶于 1987 年在大学生中试用, 此后我国学者王才康又对量表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重新检验 (69-70)。考试焦虑量表 (TAS) 由美国心理学家萨拉森 (Irwin G. Sarason) 于 1977 年编制完成, 也是国外研究和诊断考试焦虑的最常用工具之一 (董妍, 《学业情绪与发展》852-60)。我国学者宋飞和张建新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北京市随机抽取 15 所不同层次初、高中学生, 分析了考试焦虑量表 (TAS) 的信度和效度, 探讨了该量表对北京市中学生的适用性 (623-24)。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 霍维茨 (E. Horwitz) 对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学习焦虑进行明确界定, 并编制了第二语言学习焦虑量表 (FLCAS) ("Preliminary Evidence" 37-39; "Language Anxiety" 116-26)。该量表包含 33 个题项, 共分为交际焦虑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考试焦虑 (test anxiety) 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感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三个部分。该量表的应用对第二语言教学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也证实了焦虑情绪对外语学习的负面影响较大。

以上分析可见, 早期学业情绪研究主要集中于焦虑情绪。但近年来, 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焦虑情绪以外的其他类型情绪。例如, 特纳 (J. Turner) 等对愧疚学业情绪开展了丰富的研究^[1]。我国学者钱铭怡和戚健俐探讨了大学生的羞耻和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 并将不同因素对两种情绪影响的差异进行了对比研究 (626-33)。特蕾西 (Jessica Tracy) 和罗宾斯 (Richard Robins) 关于羞耻和内疚的研究也显示, 内部归因与羞耻和内疚正相关, 羞耻与对失败做出的内在的不可控归因呈正相关, 而内疚与对失败做出的内在可控归因呈正相关 ("Appraisal

Antecedents” 1339-51)。除愧疚和内疚情绪的研究外,戈茨等(T. Goetz et al.)探讨了学生在完成作业的情境下和课堂情境下的高兴、骄傲、焦虑、气愤和厌倦等情绪的差异(225-34)。特蕾西和罗宾斯以及杜建政和夏冰丽开展的对于自豪情绪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自豪是个体把一个成功事件或积极事件归因于自身能力或努力的结果时所产生的一种积极的主观情绪体验(Tracy and Robins, “Show your Pride” 194-97; “Emerging Insights” 147-50;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ride” 506-25; 杜建政、夏冰丽 857-62)。

学者们为了更加客观和全面地了解不同类型的学业情绪,也开始尝试编制包含多种学业情绪的问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佩克然等编制的成就情绪问卷(Achievement Emotions Questionnaire, 简称AEQ)(“Academic Emotions” 91-105; “Measuring Emotions” 36-48)。该问卷涵盖了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情境中和考试情境中高兴、希望、骄傲、放松、气愤、焦虑、愧疚、无助和厌倦等八种主要的学业情绪。我国学者董妍和俞国良编制了《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发现了13种主要学业情绪,并将其归为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和消极低唤醒四个维度(852-60)。马惠霞编制了《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该问卷由愧疚、焦虑、气愤、兴趣、愉快、希望、失望、厌烦、自豪、放松等十个情绪分量表组成(594-96)。王妍以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编制了信、效度良好的《小学生学业情绪问卷》,并基于该问卷对小学生的学业情绪总体情况和学习者差异等进行了调查研究^[2]。

此外,泰勒(W. Taylor)等开发了学业厌倦感量表(Academic Boredom Scale, ABS),并通过该量表探讨了学生在“挑战过低”或“挑战过高”两种情境下对厌倦感的感知(17-27)。达施曼(W. Daschmann)等对厌倦情绪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进行了检验,并对厌倦情绪的诱因进行了性别差异比较(421-40)。利奇费尔德(S. Lichtenfeld)等以德国和美国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汇报了小学生学业情绪问卷的开发与验证(190-201)。保罗尼(P. Paoloni)等研究者以阿根廷45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验证了西班牙语版的成就情绪问卷(AEQ)的信度和效度(671-92)。

以上文献回顾可见,从研究内容上看,目前学业情绪研究主要仍以焦虑、厌倦、愧疚等消极情绪为主,对积极情绪的研究仍然不足。从学业情绪的工具上看,目前已经形成了接受度较高的学业情绪测量工具,例如佩克然等编制的成就情绪问卷(AEQ),但相关问卷在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地域、不同层次学习者中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本研究将在整合相关学业情绪问卷的基础上,尝试编制并验证适合中国高等教育环境的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问卷,并探讨其应用效果。

三、研究过程

为了能够科学编制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问卷,我们在问卷设计之前在东北某外国语大学随机选择了67名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探索性问卷调查,以确定预测问卷所涵盖的情绪类型,并编制预测问卷。

在问卷预测过程中,我们随机选择了来自两个年级(2013级和2012级)共五个班级的145名英语专业学生,实施了问卷的预测。通过因子分析和问卷修订,最终形成由21个题项构成的正式问卷,并对该问卷的信、效度进行了检验。

在应用正式问卷探讨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现状的研究中,我们随机选择了该校817名英语专业学生实施问卷调查,剔除34份无效问卷,最终获得783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95.8%。此外,为了弥补量化数据的不足,我们还邀请了10名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通过获得的质化研究资料对量化数据进行三角验证,展开讨论。

四、问卷编制

(一) 预测问卷编制

在问卷题项设计之前,笔者收集整理学业情绪相关的问卷和量表。相关文献显示,自20世纪50年代起,教育心理研究者就认识到了对学业情绪进行量化研究的重要性。但由于早期的学习者情绪研究主要集中在焦虑情绪研究方面,因此学业情绪相关测量工具的早期发展与考试焦虑问卷的发展密切相关。至今,已出现许多以测量考试焦虑为主要目的测量工具^[3]。早期针对考试焦虑以外的其他学业情绪的研究主要使用一般情绪的测量工具,而这些测量工具并非专为教育环境设计(Weiner 548-73),因而需要结合教育情境下的情绪研究进行修订。

本研究在借鉴和参考佩克然(“Academic Emotions” 91-105; “Beyond Test Anxiety” 287-316)、斯潘格勒等(Spangler et al.) (413-32)、董妍、俞国良(“青少年学业情绪” 852-60)等人的研究和相关量表的基础上,编制预测问卷。该问卷主要适用于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目的是考察学生课堂学业情绪体验的类型和维度。在问卷编制的设计阶段,研究者确定了该问卷的编制原则。

首先,基于文献回顾中学业情绪类型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学业情境中,各种类型的学业情绪出现的频率也不尽相同。本研究专门选择前人研究中较为突显且对学习有显著作用的学业情绪类型作为研究对象。

第二,基于前期对学生实施的学业情绪类型问卷所获得的数据,分析总结出学生认为体验程度较高的情绪类型。在预测问卷设计之前,研究者随机选择了67名英语专业学生,进行学业情绪类型的探索性问卷调查。该探索性问卷以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呈现,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在英语专业课堂上的情绪体验程度完成(探索性问卷获得的数据详见表1)。也就是说,本量表仅涉及英语专业学生体验程度较高的代表性学业情绪。

表1 学生课堂学业情绪感知程度均值统计

情绪	平静	高兴	放松	希望	愉快	满足	厌倦	自豪
均值	3.815	3.682	3.500	3.470	3.045	3.045	2.591	2.545
情绪	焦虑	愧疚	无助	紧张	沮丧	失望	心烦	恼火
均值	2.212	1.924	1.909	1.879	1.788	1.712	1.712	1.394

第三,基于佩克然提出的控制—价值理论中提出的学业情绪的愉悦度 (Valence) 和唤醒度 (Arousal) 两个维度 (315-41),研究者期望问卷能够从愉悦度和唤醒度两个维度,较为全面地考察学业情绪类型。因此,从愉悦度上看,所选择的学业情绪类型同时包含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就唤醒度而言,应当既包含高唤醒情绪,又包含低唤醒情绪。

第四,就学业情境而言,课堂、课外以及考试是学校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三种学业情境。由于三种学业情境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功能,与三种学业情境相关的学业情绪也不尽相同 (Pekrun et al., “Academic Emotions” 91-105)。本问卷仅考察课堂环境下与学生课堂学习和学业成就相关的、重要且有代表性的学业情绪。因此,情绪类型问卷中不涵盖课前、课后以及考试等其他学业情境中可能体验到的学业情绪。

基于以上四点原则,研究者参考了关于学业情绪结构的研究 (Pekrun et al., “Academic Emotions” 91-105; Spangler et al. 413-32) 以及以学业情绪量表编制为主要内容的量化研究 (Govaerts and Grégoire 34-54; Pekrun et al., “Beyond Test Anxiety” 287-316; Spangler et al. 413-32; 董妍、俞国良 852-60),结合探索性问卷获得的学生课堂学业情绪感知程度数据,研究者最终选择了高兴、希望、平静、放松、焦虑、愧疚、无助和厌倦等八种有代表性的主要学业情绪,并编写了相应的题项 (每种情绪各五个题项),最终获得共有 40 个题项的预测问卷。预测问卷的具体维度、题目分布和题目举例详见表 2。

表 2 预测问卷的维度名称、题项分布和题项举例

维度	N	题项分布						题项举例
积极高唤醒	高兴	5	t3	t14	t17	t24	t33	t3. 学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课程,我感觉很高兴。
	希望	5	t4	t10	t22	t28	t36	t4. 我对英语专业课程学习充满了希望。
积极低唤醒	平静	5	t6	t16	t25	t29	t34	t6. 我在上课时感觉心情很平静。
	放松	5	t1	t8	t13	t30	t39	t1. 在英语专业课堂上,我心情放松。
消极高唤醒	焦虑	5	t7	t15	t19	t20	t37	t7. 英语专业课程让我感觉很焦躁。
	愧疚	5	t11	t21	t26	t31	t35	t11. 如果我没能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堂任务,会感觉很内疚。
消极低唤醒	无助	5	t5	t18	t23	t38	t40	t5. 在英语专业课堂上,我时常有种无助的感觉。
	厌倦	5	t2	t9	t12	t27	t32	t9. 老师的授课方式让我感觉上课枯燥无味。

(二) 预测问卷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检验问卷结构效度的最常用方法。研究者首先对由 40 个题项构成的主要学业情绪分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 SPSS 输出的数据显示,由 40 个题项构成的学业情绪量表的 KMO 值为 0.864,且 Bartlett 的球体检验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p=0.000<0.05$)。以上结果说明该量表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时,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来进行因子抽取,输出的旋转成分矩阵显示:全部 40 个题项大致进入四个维度,但部分题项因进入多个维度考虑删除。基于此,研究者删除了这部分题项,得到一份由 21 个题项构成的主要学业情绪分量表,

并大致析出四个因子。

为了验证这份分量表的结构效度，我们将进行第二次因子分析，具体过程与之前的因子分析步骤一致。结果显示，该学业情绪量表的KMO值为0.827，且Bartlett的球体检验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p=0.000<0.05$ ），该量表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Varimax正交旋转析出并命名了积极高唤醒情绪、积极低唤醒情绪、消极高唤醒情绪和消极低唤醒情绪等四个因子，每个因子均含有三个以上题目，且绝对对数因子负荷大于0.50，四个因子累计解释该量表56.669%变异。基于以上数据，研究者确定了结构效度良好的“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问卷”。

（三）正式问卷的维度构成及信、效度检验

正式问卷由21个题项构成，KMO值为0.827，析出并命名了四个因子，累计解释该量表56.669%变异，以上数据说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正式问卷四个维度（详见表3）分别为：积极高唤醒情绪维度包含五个题项（q3、q6、q8、q10、q13），积极低唤醒情绪维度包含六个题项（q5、q7、q14、q15、q18、q21），消极高唤醒情绪维度包含五个题项（q9、q11、q16、q19、q20），以及消极低唤醒情绪维度包含五个题项（q1、q2、q4、q12、q17）。

表3 正式问卷的维度构成

维度	n	维度含义	题项分布	题项举例
积极高唤醒	5	学生对高兴和希望等积极高唤醒情绪的体验水平	q3、q6、q8、q10、q13	q3. 我总是希望自己能把英语专业课程学好。 q6. 能够听懂老师的授课内容，我会很高兴。
积极低唤醒	6	学生对平静和放松等积极低唤醒情绪的体验水平	q5、q7、q14、q15、q18、q21	q5. 在课堂上，我会以放松的状态完成课堂任务。 q7. 我能平静地对待课堂上老师的提问。
消极高唤醒	5	学生对焦虑和愧疚等消极高唤醒情绪的体验水平	q9、q11、q16、q19、q20	q9. 我听不懂老师的授课内容，感觉很焦虑。 q11. 如果其他同学知道我听不太懂老师的授课内容，我会感觉很愧疚。
消极低唤醒	5	学生对厌倦消极低唤醒情绪的体验水平	q1、q2、q4、q12、q17	q1. 我在英语专业课堂上总是感觉很厌倦。 q2. 老师的授课方式让我感觉上课枯燥无味。

研究者对由21个题项构成的问卷进行的信度检验数据（表4）显示：该分量表中的积极情绪总体信度alpha值为0.791，消极情绪总体信度alpha值为0.808。

表4 正式问卷各维度信度检验结果

量表	维度	n	内在信度（Cronbach's alpha）
积极学业情绪		11	0.791
	积极高唤醒情绪	5	0.667
	积极低唤醒情绪	6	0.835
消极学业情绪		10	0.808
	消极高唤醒情绪	5	0.784
	消极低唤醒情绪	5	0.829

五、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感知的现状

为了描述课堂环境下英语专业学生学业情绪感知的总体情况,研究者应用上述正式问卷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整体看来,课堂环境下英语专业学生对积极情绪的感知程度高于消极情绪,其中,积极情绪(高兴、希望、放松、平静)的均值均高于3,均值范围介于4.401至3.284之间。而消极情绪(焦虑、愧疚、厌倦)的均值接近或低于3,均值范围介于3.016至2.530之间。七种主要课堂学业情绪的均值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希望(4.401)、高兴(4.200)、平静(3.596)、放松(3.284)、愧疚(3.016)、厌倦(2.569)、焦虑(2.530)。

学业情绪四个维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从均值来看,英语专业学生课堂环境下的学业情绪总体体现出积极情绪体验水平高于消极情绪体验的趋势。其中,积极高唤醒情绪的均值最高($M=4.301$),说明学生在英语专业课堂上的高兴和希望等积极高唤醒情绪的体验水平最高。学生对平静和放松等积极低唤醒情绪的体验水平位居第二,均值达到3.409。相比较而言,学生在英语专业课堂上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普遍较低,其中学生对焦虑和愧疚等消极高唤醒情绪的体验水平平均值为2.773,而学生对厌倦这一消极低唤醒情绪的体验水平平均值最低($M=2.569$)。从数据的标准差来看,学业情绪的四个维度的离散程度差异不大,积极高唤醒情绪的标准差最低($SD=.662$),消极高唤醒情绪的标准差最高($SD=.821$)。

以上数据显示,课堂环境下英语专业学生感知到的高兴、希望、放松、平静、焦虑、愧疚和厌倦等七种课堂学业情绪可以形成四个维度:积极高唤醒情绪,主要包括希望和高兴两种情绪;积极低唤醒情绪,主要涵盖放松和平静两种情绪;消极高唤醒情绪,主要是学生体验的焦虑和愧疚;消极低唤醒情绪,主要体现为学生的厌倦情绪。

总体看来,英语专业学生对积极情绪的感知程度高于消极情绪。其中,积极情绪(高兴、希望、放松、平静)的均值均高于3。而消极情绪(焦虑、愧疚、厌倦)的均值接近或低于3。学生对各维度的课堂学业情绪的感知程度按降序排列依次为:积极高唤醒情绪($M=4.301$)、积极低唤醒情绪($M=3.409$)、消极高唤醒情绪($M=2.773$)、消极低唤醒情绪($M=2.569$)。学生对七种主要课堂学业情绪的感知程度按照降序排列依次为:希望($M=4.401$)、高兴($M=4.200$)、平静($M=3.596$)、放松($M=3.284$)、愧疚($M=3.016$)、厌倦($M=2.569$)、焦虑($M=2.530$)。

下面,我们将基于以上数据,结合访谈和学生书面反馈等质化研究资料对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感知的现状进行讨论。

首先,我们发现英语专业学生对积极情绪的感知整体较高,其中高兴和希望等积极高唤醒情绪是学生感知程度最高的两类课堂学业情绪(均值分别为 $M=4.401$ 和 $M=4.200$)。质化研究资料显示,学生一般会在教学内容比较新颖、教学方式相对灵活或者学生参与度高的课堂上体验到了积极高唤醒情绪。在反思报告中,学生就描述了自己体验“高兴”情绪的场景。而“希望”这一情绪在英语专业课堂上,主要出现在学生对教学内容“感兴趣”“感觉好奇”“希望通过学习了解更多的知识”,并且“希望能好好学习这些课程,掌握这些知识”之时。

作为积极低唤醒情绪之一的“放松”情绪($M=3.284$),也得到了学生反思报告的证实。由于“课程的内容贴近生活实际”“课堂活动多样”,使得“上课感觉互动很多,和老师就是平等的交流,没有任何压力”,在这种课堂情境之下,学生感觉很放松。而学生对于“平静”这一情绪的感知,主要出现在课堂“按部就班”“没有什么起伏”的情境之下。

其次,我们发现学生在英语专业课堂上对消极情绪的感知整体较低,其中焦虑情绪最低($M=2.530$)。根据学生的反思报告,我们发现学生的焦虑情绪主要来自于教学内容和教材。由于CBI课堂教学材料多为与英语国家相关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文学相关的内容,往往会涉及较多的英文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加之全英文的教材和课堂教学用语,使得学生的认知负担大大加重,焦虑情绪也随之产生。例如,在反思报告中,学生就分别提到英语专业课堂上体验到的焦虑感。与“焦虑”情绪相比,学生对同属消极高唤醒情绪维度的“愧疚”反馈数量不多。学生主要是在将自己的付出和实际学习效果直接比较时,或是将自己和其他同学进行比较时,会出现愧疚这一情绪。

作为唯一的消极低唤醒情绪,英语专业学生对“厌倦”情绪的感知程度不高($M=2.569$),质化研究资料显示厌倦情绪的出现多与教材难度和篇幅以及教师的教学方式有关。在学生访谈中,学生就汇报了自己因“生词太多”“文本难度增加”“老师进度较快”“教师频繁提问”和“书编得不是很有条理”等原因而出现“厌倦”情绪的情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生在英语专业课堂上对本研究中涉及的七种学业情绪都有不同程度的感知。总体而言,英语专业学生对积极学业情绪的感知高于消极学业情绪,这与常俊跃和董海楠的研究是一致的(11-20)。不仅如此,本研究还发现,内容依托式教学会对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的学生产生积极和消极情感影响,但是积极情感影响显著超过消极情感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由21个题项构成的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问卷整体信、效度良好,七种主要学业情绪可形成积极高唤醒情绪、积极低唤醒情绪、消极高唤醒情绪和消极低唤醒情绪四个维度。应用以上问卷对英语专业学生学业情绪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英语专业学生在课堂上对高兴、希望、放松、平静、焦虑、愧疚和厌倦等七种学业情绪都有不同程度的感知,其中“希望”学业情绪的感知程度最高,“焦虑”学业情绪的感知程度最低。

注释 [Notes]

- [1] See Turner, J., and J. Husman.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Self-regulation Following Academic Shame." *Journal of Advanced Academics*, vol. 20, no. 1, 2008; Turner, J., and D. Schallert. "Expectancy-value Relationships of Shame Reactions and Shame Resilienc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 93, no. 2, 2001; Turner, J., and R. Waugh. *Feelings of Shame: Capturing the Emotion and Investigating Concomitant Experiences*.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National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2001. Unpublished Conference Paper.
- [2] 参看王妍:小学生学业情绪的问卷编制与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9。
- [3] See Hodapp, V., and J. Benson.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Test Anxiety: A Test of Different Models." *Anxiety, Stress, and Coping*, vol. 10, no. 3, 1997; Zeidner, M. *Test Anxiety: The State of the Art*. Plenum, 1991.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Ainley, M., and J. Ainley. "Student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in Early Adolescence: The Contribution of Enjoyment to Students' Continuing Interest in Learning about Science."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 36, no. 1, 2011, pp. 4-12.
- Chang, Junyue, and Hainan Dong. "The Impact Analysis of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to English Majors on Students' Emotion." *Language Education*, no. 2, 2013, pp. 11-20. [常俊跃、董海楠:《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内容依托教学对学生情感的影响分析》,载《语言教育》2013年第2期,第11-20页。]
- Daschmann, E., et al. "Testing the Predictors of Boredom at Schoo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Precursors to Boredom Scale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 81, no. 3, 2011, pp. 421-40.
- Dong, Yan. *Academic Emotions and their Development: From Academic Environment to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 Interest*. Anhui Education, 2012. [董妍:《学业情绪与发展:从学业情境到学习兴趣的培养》。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
- Dong, Yan, and Guoliang Yu. "On the Compilation of a Questionnaire for Academic Emotions of Youth." *Journal of Psychology*, no. 5, 2007, pp. 852-60. [董妍、俞国良:《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的编制及应用》,载《心理学报》2007年第5期,第852-60页。]
- Du, Jianzheng, and Bingli Xia. "The Construct, Measurement, Express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Pride." *Advances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s*, no. 4, 2009, pp. 857-62. [杜建政、夏冰丽:《自豪的结构、测量、表达与识别》,载《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4期,第857-62页。]
- Frenzel, A., et al. "Perceived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Students' Emotional Experiences: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Mathematics Classrooms."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vol. 17, no. 5, 2007, pp. 478-93.
- Goetz, T., et al. "Students' Emotions during Homework: Structures, Self-concept Antecedents, and Achievement Outcomes."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22, no. 2, 2012, pp. 225-34.
- Govaerts, S., and J. Grégoir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n Academic Emotions Sca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sting*, vol. 8, no. 1, 2008, pp. 34-54.
- Horwitz, E. "Preliminary Evidence fo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a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Scale." *Language Anxiety: From Theory and Research to Classroom Implications*, edited by E. Horwitz and D. Young, Prentice Hall, 1991, pp. 37-39.
- Horwitz, E. "Language Anxiety and Achievement."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21, no. 21, 2001, pp. 112-26.
- Lichtenfeld, S., et al., editors. "Measuring Students' Emo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The Achievement Emotions Questionnaire-Elementary School (AEQ-ES)."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22, no. 2, 2012, pp. 190-201.
- Ma, Huixia. "On the Compilation of a Questionnaire for General Academic Emo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no. 6, 2008, pp. 593-96. [马惠霞:《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的编制》,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年第6期,第593-596页。]
- Paoloni, P., et 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Achievement Emotions Questionnaire: A Study of Argentinean University Students." *Electronic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 12, no. 3, 2014, pp. 671-92.
- Pekrun, R. "The 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s: Assumptions, Corollar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12, no. 4, 2006, pp. 315-41.
- Pekrun, R., et al. "Measuring Emotions in Students'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The Achievement Emotions Questionnaire (AEQ)."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 36, no. 1, 2011, pp. 36-48.
- Pekrun, R., et al. "Positive Emotions in Education." *Beyond Coping: Meeting Goals, Visions, and Challenges*, edited by E. Frydenberg, Elsevier, 2002a, pp. 149-74.
- . "Academic Emotions in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A Program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vol. 37, no. 2, 2002b, pp. 91-105.
- . "Beyond Test Anxiet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Test Emotions Questionnaire (TEQ)." *Anxiety, Stress & Coping*, vol. 17, no. 3, 2004, pp. 287-316.
- Qian, Mingyi, and Jianli Qi. "A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Shame and Guilt of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Psychology*, no. 6, 2002, pp. 626-33. [钱铭怡、戚健俐:《大学生羞耻和内疚差异的对比研究》,载《心理学报》2002年第6期,

第 626-33 页。]

- Spangler, G., et al. "Students' Emotions, Physiological Reactions, and Coping in Academic Exams." *Anxiety, Stress & Coping*, vol. 15, no. 4, 2002, pp. 413-32.
- Song, Fei, and Jianxin Zhang. "Test Anxiety Survey (TAS) and Its Feasibility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Beijing."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no. 6, 2008, pp. 623-24. [宋飞、张建新:《考试焦虑量表(TAS)在北京市中学生中的适用性》,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年第6期,第623-24页。]
- Taylor, W., et al. "Academic Boredom in Under- and Over-challenging Situation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 35, no. 1, 2010, pp. 17-27.
- Tracy, J. and R. Robins. "Show Your Pride: Evidence for a Discrete Emotion Express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5, no. 3, 2004, pp. 194-97.
- . "Appraisal Antecedents of Shame and Guilt: Support for a Theoretical Mode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2, no. 10, 2006, pp. 1339-51.
- . "Emerging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rid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6, no. 3, 2007a, pp. 147-50.
- .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ride: A Tale of Two Face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2, no. 3, 2007b, pp. 506-25.
- Turner, J. and R. Waugh. "A Dynam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Regarding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es: Shame Reactions and Emergent Self-organizations." *Emotions in Education*, edited by P. Schutz and P. Reinhard. Academic, 2007, pp. 125-45.
- Wang, Caika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est Anxiety Inventory (TAI)."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no. 1, 2003, pp. 69-70. [王才康:《考试焦虑量表(TAI)的信度和效度研究》,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年第1期,第69-70页。]
- Weiner, B.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92, no. 4, 1985, pp. 548-73.

◇责任编辑:罗辉

《外国语言与文化》征稿启事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6)5011号]的外语类学术期刊。本刊热切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热忱欢迎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踊跃来稿。现就投稿事宜说明如下:

1. 本刊欢迎以下领域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性、实证性和综述性论文: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区域与国别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测评等,也欢迎介绍相关学科最新动态的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
2. 来稿格式采用MLA(第八版),具体细则见本刊网址。研究性论文篇幅一般在10,000字左右,综述性文章8,000字以内,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一般为4,000字左右。
3. 为便于匿名审稿,请另页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份、最后学位、职称、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E-mail地址等。投稿后3个月内若未接到稿件修改意见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优稿优酬。
5. 投稿方式:Word电子稿请发编辑部邮箱:jflc@hunnu.edu.cn
6. 编辑部电话:0731-88873041 传真:0731-88872636 网址: <http://jflc.hunnu.edu.cn>